

序 言

人們久在期望能出版一部关于日本农民运动的新通史，但是，这种通史，特别是通俗的，始終沒有出現。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們才編写这本书。

但是，当我们实际着手編写的时候，才重新深刻地体会到农民运动史所以迟迟未見出版的理由。因为，如果不对于那許許多多真被埋沒的無名战士的斗争痕迹細心和耐心地加以發掘，这件編写工作就一步也难进展。这是不計其数的痛苦呻吟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像野草一样尽管遭到踐踏和焚燒，还仍然不断长出新芽的不屈不撓的純朴的历史。是不宜使用鮮明的色彩、雄壮的鼓动以及令人目眩心悸那样有趣的笔調来加以叙述的。

当我们刚一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立刻使我们發生了一种反省。我們对于日本革命傳統的薄弱以及对于日本还不具备一个現代国家的条件，往往易于陷入慨嘆的境地。但是，即使仅就粗淺的分析，这生动而丰富的革命傳統，不是尽够使人激动不已，感到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嗎？

現在，在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上，标榜着民主革命的一切要求而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已經得到了肯定的証明，近代的無产阶级从誕生到今天的领导作用，也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过，如果对于这些革命斗争所遭受的“挫折”和“困难”进一步作深刻的观察和挖掘，我們必然会在这悠长的历史的

底層，發現日本農民——特別是貧農的堅強不屈的閃耀着的目光。高揚着“自由民主”的輝煌口號和“民族獨立”的有力要求而站在最前列的當然不是日本農民。站在一切民主主義鬥爭最前列的，有時是資產階級，有時是地主，以後又多半是工人階級。儘管如此，當這些鬥爭作為真正不屈的鬥爭而進行的時候以及顯示出真正的革命的本色的時候，經常是貧農站在最基層，保持着堅毅不拔的鬥爭。

當曾經提出堂皇的民主主義的要求的資產階級和地主不久即行妥協或背叛了的時候，貧農却始終流着他們寶貴的鮮血。當繼承了一切民主主義革命的要求的工人階級站在最前列進行鬥爭的時候，掌握着鬥爭的勝敗關鍵、積極地爭取向日本的現實緊密靠攏的，就是這流着鮮血的貧農。

我們為了能夠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這些在歷史的底層閃耀着的貧農的炯炯目光，才決定編寫這本書。因為，我們如果不認真地衡量貧農的英勇不屈的力量的深度和幅度，就很難把今天的民主主義革命向前推進一步。

例如，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為日本農村依舊處於反動勢力盤踞之下而興嘆。然而，這些人應該重新檢查自己對“農村”和“農民”的認識。每個人的內心都應該對於日本貧農在歷史現實中要求革命的呻吟聲，喚起共鳴。

此外，我們中間，過於機械地歌頌“工農聯盟”的人也不在少數。他們的頭腦只想到某些地方的工人和某些地方的農民互相攜手採取一致的行動之類的問題。實際上問題却首先在於，我們是否真正把燃燒着的貧農迫切的歷史性要求作為自身今天的要求在各自的內心裡燃燒起來——是否這樣注視着今天農民鬥爭的實際力量。

最後，我們希望不要把本書僅僅當作“農民”的歷史讀完了

事。希望工人、職員、知識分子……穿西裝的、坐電車和汽車的、在現代化工厂里、在大廈和办公室里生活的人們都要各自檢查一下。彼此間的生活面貌和生活意識看來都是十分“現代化”的了，但是，如果仔細加以觀察的話，難道你的臉型不是和農民一樣，你的家庭生活不是和你的父親母親的農民生活一樣，你對待妻子和兒女的态度不是像地主一樣么？據說在某次集會上討論到制定一個日本工人階級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曾有這樣一種違反常情的說法：學者主張一萬二千元，工會的領導人主張八千元，工人自己規定為六千元。平日耽心解雇的工人很清楚知道，在周圍的工厂里至今還有以二千元三千元的工資從農村吸收來的許多貧農。他們不僅知道，而且正在受着這種威脅。不，他們還亲身体驗到，如果一切勞動人民都能建築在合理的最低工資標準上，那將是多麼好呢。從這被迫提出最低限度的六千元要求的工人生活的現實中，我們必須正確地沿着革命的傳統來研究貧農的要求。這就是根本的問題。

本書只是走馬觀花地從一個鬥爭的高峰涉獵了另一個鬥爭的高峰的一本通史，但願我們這一點微衷能夠得到讀者們的諒解。

大眾讀本刊行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序 言	
一 佐倉宗吾仍然活在农民心中	1
——“越訴”和“强訴”的时期	
二 冲破藩鎮的垣牆	7
——国民的統一的萌芽期	
三 农民反对侵略	12
——幕府末期的民族斗争	
四 “改革世間”	16
——农民的斗争和倒幕运动	
五 被背叛了的革命	22
——明治政府的反革命行徑	
六 土地革命的萌芽	28
——天皇制度統治权力奠定时期的斗争	
七 “旧平”的意見	32
——天皇的政治	
八 “熬油”暴动	37
——反对征兵的斗争时期	
九 “竹槍戳出的二分五厘”	44
——从要求減輕地租到爭取自由民权	
一〇 秩父事件	49
——革命的新萌芽	

一一一	佃农爭議的爆發	54
	——平分土地的思想及其斗争	
一一二	矿毒事件和田中正造	62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泡影	
一一三	“米騒动”	75
	——威胁半封建地主制度的四十天	
一一四	必須使用实力	86
	——第一次大战后的佃农斗争	
一一五	“日本农民組合”的誕生	91
	——創立經過	
一一六	“全国水平社”	99
	——創立經過	
一一七	大爭議的風暴	105
	——大正末期的农民斗争	
一一八	日本农民組合和劳动农民党	114
	——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的發展	
一一九	憤怒的火焰	123
	——从“三·一五”到“四·一六”时期	
二〇	走向战争的道路	135
	——全农全国會議的斗争	
二一一	“背陰村”	152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二二二	流离失所	162
	——战火的扩大和“滿洲移民”	
二二三	河山依旧	173
	——走向战败的道路	
二二四	憤怒的爆發	180
	——反对强征和檢举舞弊。改革村政的斗争	

二五	把土地交给农民	192
	——围绕农地改革的斗争	
二六	全国农民统一起来	204
	——日本农民组合的组成和分裂	
二七	种米的人还得买米吃	209
	——反对低米价和强制征购粮食	
二八	“征税旋风”	216
	——农民生活的贫困化	
二九	新的萌芽	222
	——南佐久和龟田乡的斗争	
三〇	要求开放山林	228
	——栃木县金田村的斗争	
三一	“金钱一年，土地万年”	239
	——反对军需基地的斗争	
三二	明朗的农村	251
	——农民觉悟的提高	
附表一	日本农民运动年表(战前部分)	260
附表二	日本农民运动年表(战后部分)	267

一 佐倉宗吾仍然活在农民心中

——“越訴”和“強訴”的时期

日本的历史人物里最为农民所熟悉的、最受农民尊敬的究竟是谁？是丰臣秀吉^①还是弁庆^②，是弘法大师^③还是亲鸞上人^④？是某某天皇还是水戶黃門^⑤？倘若采取“請举出一位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人”的形式来調查农民的輿論时，可能会举出以上的人物。因为，以往作为“历史人物”教給人民知曉的，只是这类人物。但是，如果用“下列人物里你最感到亲近而尊敬的是誰？”这种詢問形式，列举出神武天皇、弁庆、佐倉宗吾^⑥、丰臣秀

-
- ① 十六世紀时日本的武將。原为战国时代武將織田信长的家臣。信长死后，秀吉取而代之，自立为將軍。秀吉在爭伐封建諸侯、創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巩固封建貴族階級的統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曾率兵侵略朝鮮。官至太政大臣(內閣总理)，卒于一五九八年。——譯者
- ② 鎌倉时代僧人，喜武功，是幕府第一代將軍源賴朝之弟源義經之家臣，以机智勇敢見称于世。——譯者
- ③ 原名空海(七七四——八三五)，为日本名僧，曾来中国學習佛法，归國后創立真言宗，弘法大师是其諡号。——譯者
- ④ 十二、十三世紀时日本佛教淨土真宗的創始人，著有“教行真証”六卷。明治九年追贈諡号見真大师。——譯者
- ⑤ 即德川光圀。德川光圀是日本江戶幕府創始人德川家康之孙，十七世紀时日本水戶的藩主。隱居以后改名水戶黃門。他崇尚尊皇敬神之說，师事朱舜水(中国明末节臣，曾渡日乞援复明，后留居日本)，獎勵儒学，設“彰考館”編修“大日本史”。一七〇〇年卒。——譯者
- ⑥ 一名木内宗五，又名佐倉宗五郎。或謂宗吾被害于一六五三年。請參閱本文。——譯者

吉、岩崎弥太郎^①、弘法大师、国定忠次等人的名字的话，那么，恐怕佐倉宗吾会擢居首位了。

佐倉宗吾的名字虽然在学校中未必教过，他却是农民群众培植出来的农民英雄，不论怎样没有学識的农民，恐怕没有人不熟悉宗吾。恐怕没有知道宗吾而不心怀敬意的农民。佐倉宗吾至今还活在农民的血里、肉里和灵魂里。这样的人才真正配称为“历史人物”。

可是，佐倉宗吾是傳說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否存在则大可怀疑。至少，談到他向將軍^②进行直接控訴或者落到甚兵衛手上的故事純系捏造的话，是会使人感到扫兴的。但是因此扫兴未免操之过急。現在流傳的有关宗吾的事迹并非全無根据的捏造。这是产生于近代封建社会农民斗争的事实里，并在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故事。这与“神武天皇从日向出征大和、即位于‘前傍橿原宮’”之类的謊言迥然不同。

据傳說，佐倉宗吾一六五一年因向將軍控訴領主堀田氏的殘酷剝削而被处死刑，这种傳說产生于十八世紀中叶。在此以前，流傳最早的佐倉宗吾的故事如下：

“在下总地方佐倉藩^③的領地公津村里，有个名叫宗吾（一作惣吾）的名主^④（一說为近似名主的富裕农民），因侵吞租稅罪被处死刑，而这是全無实据的誣陷，因此，宗吾的冤魂在堀田家作祟。”——除掉“作祟”这一点不科学的情况，其余恐怕均为事实。报复堀田的不是幽灵，而是活着的农民們为了反抗那个杀

① 明治时期三菱公司創始人、財閥巨頭岩崎弥之助之兄。——譯者

② 指十七世紀时德川幕府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而言。——譯者

③ 藩即大名，十七世紀时食邑万石以上的武家，此处指江戶时代前期下总佐倉侯堀田正信而言。——譯者

④ 名主是領有庄園土地或固有土地的人，多为武士（不問有無佃戶），同时也是农民中的上層分子。——譯者

害宗吾的領主的剝削与压迫，才繼續“作祟”。

十七世紀初叶，德川幕府^①与諸藩剛剛奠定它的封建統治的时期，有許多这样的故事：例如說，在下总地方名主反抗領主的压迫，杀掉官吏，然后自刃；荒年里名主做主开放繳納給領主的租粮的倉庫救济农民，而自己引咎自杀；或者說，名主因反抗官吏被处死刑等等。公津村有关惣吾的故事恐怕也是类似的事实之一。这种形式的斗争就是近代早期的农民斗争的表现形式（只有島原、天草暴动^②是例外。它不是近代农民斗争的序幕，却似中世的斗争“土一揆”^③和“一向一揆”^④的最后迴光。近代是从島原暴动失敗以后才开始的。即从島原暴动以后，才实行了全面鎖国政策，并完成了农村的封建統治秩序）。

名主、村长中的优秀人物，代表农民群众的要求，与領主做殊死斗争，当地方官拒絕他們的要求时，就向藩的大官申訴，倘使仍無結果，就直接向藩主或者向幕府申訴。这种越过直接管理自己的官吏向上一級的官吏进行申訴，被称为“越訴”。十八世紀时，越訴始变为群众性的行动，当十七世紀时，还只是名主、

① 幕府是日本封建时期的一种政权形式。一一八九年，貴族出身的武士源賴朝在全国武士的支持下，在鎌倉創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鎌倉幕府。表面上，幕府虽未廢黜天皇，但是幕府并不服从天皇的命令，幕府直接控制各藩，幕府的將軍即实际上的新的独裁君主。十七世紀初，德川家康在江戶所設幕府，是为德川幕府（亦名江戶幕府），这种武士政权延至一八六八年第十五代將軍德川庆喜时，因迫于内外形势才宣告結束。——譯者

② 島原、天草暴动亦名島原暴动。一六三七年，长崎县东南的島原半島上的农民，为了反抗領主松平氏的暴政，掀起了暴动，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动员了全国“大名”的武士，并得到荷兰軍艦的帮助，才于一六三八年包圍了从島原和天草島撤退的农民三万八千人，經過三个月后，除了一百零五名活贖的人做了俘虏外，其余悉数牺牲了。——譯者

③ 农民結党反官的斗争。——譯者

④ 室町时代末期，一向宗（即亲鸞創始的淨土真宗）的信徒反对封建压迫的暴动。部分“名主”武士也参加了这一斗争。——譯者

村长等的行动。一六五二年，若狭地方的村长松木长操以十六岁的幼龄站在农民的前列要求減輕租稅，被关进獄里达五年之久，其余的村长都向領主屈服，他却始終不屈，在断头台上犹然鼓动人民群众，終于使他們取得了胜利。

近代最初期的农民斗争为什么不是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而是采取了名主、村长的自我牺牲的行动这种形式呢？此因当时正为幕藩制的发展阶段，領主与农民間的对立尚不尖锐，而名主、村长与一般农民（“本百姓”^①）間的利害的共通性较强，他們实际上就可以代表农民。

在近代的封建制度下，大名和它的家臣在日本全国割据近三百个藩，这些武士占全人口十分之一以上，只有他們身佩双刀，恣意杀戮农民和市民，进行統治和剝削。

“对农民要剝削到使他們死活不得”、“农民和芝麻一样，愈榨愈出油”、“农民活着就是为了納稅”——农民只是这样作为向領主繳納租稅的人而存在。幕府毫無顧忌地这样命令农民：“农民沒有思想沒有見解，秋天一味大手大脚地把米和杂粮給妻子吃。倘如想到饑饉时的情形，随便扔掉大豆的叶子、豇豆的叶子和萝卜叶子显然是太浪費了。应该用这些东西煮菜粥吃，不許吃米飯。孩子多，应该送給別人或送給主人驅使，以減少家里粮食的消耗。”农民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选择职业、居住和結婚的自由，也沒有种植自己喜好的作物的自由。自然，也沒有买卖土地的自由。

但是，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領主造了登載着土地面积和产量的土地帳（亦名水帳），帳里并登記了耕种土地的农民和耕作量。被登入土地帳的农民即

^① 有自耕地的农民。——譯者

“本百姓”，領主按“五公五民”^①或較此尤多地征收租稅，此外還加上各種名目的徭役。領主直接剝削一般農民的方式構成了近代封建制度的基礎。

普通的農民和家屬在一起，或者農忙時雇一兩個短工來耕種一——二町^②土地。而名主、村長則領有數町土地，雇有長工。有了雇工的人，也就有了被雇的人。被雇的人是稱為“水吞”或“小前”的貧農。他們是沒有登入土地帳中的“帳外人”，他們無權或被限制了利用村中的入會地^③的權利。但是，近代初期，這個階層猶有上升為一般農民的機會。領主和大地主不願擁有更多的求屬者，而希望使他們自立，儘可能增加一般農民的數目。

當時也有從商業、農業里分離而獨立經營的若干手工業。但是，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农村尚未十分擴展和深入。富農與一般農民的大部分生活需要，幾乎都依靠自己的勞動和產物。

逐漸地，商業與商品生產發展起來，終於滲透到农村里。而一般農民中的上層分子特別是名主、村長們，兼充农村的商人、酒販，或者因地制宜地種植棉花、養蠶、種菜，用收穫的原料、材料來經營各種手工業，有些人甚至專業化了。與此相反，一般農民中的下層分子却因為受到領主愈來愈繁重的剝削、荒年和家屬患病而困窘不堪，或者因為許多其他原因不得不向富農、商人借高利貸，結果使土地脫手、下降為貧農的人增多了。這些土地被集中到富農、商人的手上。於是，名主、村長們攫取土地變為大地主，用奴隸待遇僱傭貧農來經營土地（經營地主），或者把土地租給佃農，從收穫里抽取百分之七十作為佃租，並且還用“帶

① “五公五民”即領主攫取收穫量的一半，剩餘一半歸農民所有。——譯者

② 土地面積單位，一町相當於我國一四·八八市畝。——譯者

③ 入會地是一定地區的居民根據慣例共同使用的山林。——譯者

工”等形式的劳役地租进行剥削。在江户、大阪或者诸藩所在的城市的近郊（“城下町”）和东海道以及其他交通干綫附近的村庄，或者在棉花、絲絹等类手工業發达的地方，因为貧农不願做地主的奴隶式的雇工，缺少做經營地主的条件，那里开始出現了把土地佃給佃农、依賴佃租的“寄生地主”。

随着农村的新的生产發展与階級分化，都市的人口增加了，大商人更形富裕。幕府与諸藩并未随之进步，他們依靠对农民的無情剝削而用在都市揮霍上的財政变得困难了。于是，他們強人所难地用各种手段增加农民的租稅。他們加重徭役，控制領地上的特产物的生产与买卖，或者用藩的名义进行壟断来謀利。

这样，領主与农民之間的矛盾变得尖銳了，同时在农村里名主、村长階級与普通农民、貧农之間的階級矛盾也变得尖銳了，普通农民就成为农民斗争的領導力量而站在最前列。一七一一年安房的屋代氏的領地一万石的各村庄，数百农民起来反对領主提高租稅，两次去江户向幕府申訴。这一群众斗争终于获得胜利，但是三个名主却因“越訴罪”被处死刑（万石暴动）。“公津村宗吾”的故事，發展为代表佐倉三百八十九个村庄的农民群众的英雄佐倉宗吾的傳說，万石暴动实为其基砢。从这时期起，农民斗争經常与群众暴动連在一起，开始群众性的武装反抗。一七二〇年，会津某幕府領民提出減輕租稅、廢除村吏“乡头”制度等十三項要求，掀起群众性的斗争。两年以后，越后地方出現了貧农要求退还“質流地”^①、数千人武装起来冲进地方官的事务所、用群众力量拔掉地主的禾苗、进行农民集体耕种、与相邻諸藩的軍隊对峙等大事件。这种群众暴动被称为“强訴”。针对斗争的發展，幕府于一七二〇年公布了“严禁农民無故聚众，宣誓

① 質流地即用土地抵押借款，至期無力偿还而被債主夺去的土地。——譯者

插盟，串通結黨”的禁令，施行严厉镇压。

自此以后，农民暴动的激烈深化与年俱增。一七二六年，美作地方八千农民反对領主預征租稅，掀起武装暴动，攻打城堡，与五百名武士軍交鋒，并取得胜利。一七三八年，奥州淺川八万四千农民与領主的軍隊进行战斗。翌年，但馬生野地方的农民和銀山矿工数千人联合起来，与附近十二个藩的大軍进行了战斗。一七五四年，二十万人参加了筑后久留米的暴动，当时，农民預先进行了縝密的准备，借口消灭踐踏庄稼的野猪，把城里的槍枝悉数借出来，用这些槍枝掀起暴动。同年，美濃郡上郡五千农民的斗争竟坚持奋斗达四年之久。

农民的要求也变得复杂、多样。除了反对各种形式的提高和預征租稅、反对增加徭役之外，并要求平抑物价、反对藩鎮专卖地方特产物、反对加于工業制品上的捐稅或檢驗費，进而檢舉村吏的瀆职行为和捣毀高利貸、富豪的家宅。

二 冲破藩鎮的垣墙

——国民的統一的萌芽期

自十八世紀后半至十九世紀初叶，农民斗争日漸發展。农村的階級分化也趨激烈。由于地域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就十九世紀初期的关东地方而言，在城鎮和漁村貧农占全部农民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在普通农村貧农約为百分之三，絕大部分則是普通农民。

但是，即使是普通农民也仅有極为零碎的耕地，半数以上的人所耕种的土地不足五反^①，而地主最多也不过持有五町——十町土地。貧农流浪至江戶和附近的城市的近郊，或者做搬运

夫、短工和长年佣工。在近畿地区新开垦的田地較多的地方，农民中約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是佃农，另一面是大地主。但是相鄰的村子里也有佃农很少的地方。根据长州藩一八四五年（弘化二年）的調查，該藩全部农民平均比率为：一般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五，完全沒有自耕地的农民占百分之四十五。但是这里因山区、沿海和平原地的不同，也有显著的差别，山区里零星的一般农民較多，平原地上則多数是大地主和完全沒有自耕地的农民。而农民中向地主租佃一部分土地来佃耕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地主常常又是向家庭手工業除銷原料的批發資本家，或者是自力經營小型作坊的小資本家。貧农和零星的普通农民同时又是在这些批發庄控制下的家庭手工業的工人，或者在地主和資本家的作坊里使自己的女兒参加劳动，有时自己也一同劳动，具有半無产階級的成分。

地主一方面連接在封建領主統治和剝削人民的机构的末端，依靠領主的武力权力来維護自己对隶农和佃农的剝削。但是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不滿意領主加在他們身上的沉重租稅和其他的剝削以及身分上的压制。地主在兼为商人和小营業主时，也具有两重性。他們在營業上常常作为領主統制物产和专卖的工具而从中取利，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爭取營業自由，有时也站在劳动群众一面来反抗領主。

地主的二重性哪一方面表現得較为明显，是依据各人的各种条件而不同，同时也因直接生产者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的消长而不同。因此，在十九世紀以来的农民暴动中，有时名主、村长仍然站在农民群众的前列，战斗到一定的程度，但在另外的暴动里，他們又会首当其冲地受到暴动的攻击，被搗毀住宅。愈是

① “反”是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亦称为“段”，約合九九一·七平方公尺。十反为一町。——譯者

接近幕府末期，后一种情形愈多。

这样，农村阶级分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的阶级团结的扩大。例如，幕府于一七八一年在武藏、上野两地设立计算纺织品和棉纱的度量衡修改所，通过检验费的形式征税，这时，三千名制造度量衡的农民掀起了暴动抗议，迫使撤销了这个修改所。又例如，一八二三年大阪棉花批发商的同业公会企图借幕府力量垄断棉花的收购，对此，摄津、河内两地一千零七个村庄的棉农和商人起来争取自由买卖的斗争，幕府也终于不得不准许农民和各村的棉商自由地向各地买主销售。这些村庄当然不是属于同一个领主，也就是说，农民的领主虽然不同，而他们在共同的利害上广泛地团结起来一致进行斗争。

这个例子虽然是与工商业关系较深的农村的情况，但一般说来，由于商品的流通乃至人们往来交通的频繁，一处的农民斗争的风声很快传到远处，刺激陷于同样痛苦中的农民起来斗争。同时，一处发生严重歉收则引起全国范围的粮价上涨，进而导致一般物价的飞腾。于是，城市无产阶级以及农村的贫农半无产阶级的生活都陷于严重的困难，因此全国各地不期而然地掀起农民暴动和市民的捣毁暴动。自一七八三年至一七八七年，在东北地区发生大歉收、大饥饉并且各地相继发生歉收和天灾，引起粮价和一般物价暴涨的时候，以上州、信州地方为首，全国各地掀起猛烈的暴动，袭击粮商和富农，在减轻各种负担、平抑物价的要求下展开了斗争。与此相呼应，一七八三年大阪发生捣毁囤粮商人的事件，一七八七年五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间，从大阪和近畿、东海各城市直达江户，在两部地区的广岛、熊本和长崎，在关东地方，特别是在甲府和陆奥的石卷等地，掀起了全国性的捣毁大暴动。它与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幕府倒台前夕的全国性捣毁暴动以及其后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的“米骚

动”都是互相关联的。

同时,从这时候起,在大藩主很多的西部四国地方也常發生“逃散”形式的暴动。例如,在土佐和伊予边境的土佐藩的領地池川、名野川地方,掀起了反对紙張专卖的暴动,村民离开村落,逃到邻县伊予境内,宣傳土佐藩的苛政,通过客地的官吏向土佐藩主提出要求进行談判,在問題解决以前始終未返原村。这說明,虽屬邻境領地的农民,作为同一階級的人,尽管領主相异,他們也有共通的階級感情,从而伸手相助。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現上述这类事情的。

只有通过这种階級团結和斗争的發展,日本人民才能打破封建的分散状态,才能作为一个“国民”或“民族”深刻广泛地团結起来。打倒封建制度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在成长。

一八三〇年代的天保年間正与一七八〇年代一样,連續發生严重的歉收和飢饉,全国各地掀起了几万人、十几万人的暴动,城市無产階級也积极活躍。一八三七年(天保八年)二月,前幕府的“与力”(相当于现在的警官)大盐平八郎^①站在苦于飢餓的市民的前列,在大阪率众起义。起义时他就指出,这次起义有别于一般的暴动,它是要打倒現在的暴政的。他标榜着这种政治目的,向大阪附近的农民以及“自臬天降生的各村的貧农們”进行号召。这是最早明确而有意識地提出了城市無产階級与貧农联盟的号召的。当时,摄津葱生村和大阪郊外的渡边村(今大阪市内西濱)的部落民^②因为感激大盐平日的恩义,立刻赶来参加起义。虽然起义仅仅两天即被鎮压下去,但城市無产階級、貧农

① 天保八年,他向大阪町的奉行官請求救济灾民,因未获結果,乃尽出家財及藏書以济众,并率众掠夺富豪,事败后自杀。——譯者

② 部落民即賤民(秽多),因其居住地区单独形成部落,故名部落民。——譯者

以及身份最低下的人們的反封建斗争联盟的短时间的成立，却表示出它已經具有了政治目的，同时还表示出反封建斗争正在向新阶段發展。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在日本尚未誕生領導全国革命的階級和理論。

就理論而言，十八世紀后半，秋田已出現了一位偉大的革命預言者安藤昌益。他說上古曾是“自然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土地財產不屬私有，所有的人在共有土地上耕耘而食、紡織而衣。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它是一个既無貧富、貴賤、上下之別，又無男女不平等現象的徹底平等的社会，更不存在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但是，自从聖人君子盜取了“自然天下”，自为君主而統率臣下，自己全不劳动，制定剝削“耕种之民”的“法治社会”以后，才产生了現在人民的貧苦。他主張必須一变而恢复为从前的“自然世界”。他还說，廢止剝削、实现人类平等，則不再有將軍、大名，他們也不再割据日本，就将誕生一个“人虽亿万，終为一体”的統一的日本社会了。

消灭一切剝削和階級制度在这里虽視為空想，但其历史的内容包括有：要求消灭封建剝削、把土地交給耕作农民的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的統一的国民国家。只是，昌益还不懂得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革命。他認為只要从“上”面出現偉人来实践他的主張即可。他完全沒有主張应由农民團結起来發動革命。不仅如此，他还像反对封建侵略战争一样地否定了人民革命的起义。昌益的思想上的最大的弱点即在于此。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弱点；而是因为当时农民革命斗争虽然發展到在全国范圍互相影响的地步，但是进行組織和統一，使之向有計劃的政治斗争方面發展的革命領導階級——就当时而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尚未成长起来，即使如昌益那样的天才，也未能够創造

出“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理論。

三 农民反对侵略

——幕府末期的民族斗争

十九世紀初，日本的农民斗争才开始冲破藩篱的扩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但犹苦于缺少这种革命的理論和組織。此时，适值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对封建日本施加压力。这急遽加深了幕府諸藩的全面的政治危机。于是，在人民成长为完成革命的力量以前，地主、商人阶级——即有着从属于封建領主的一面及与此相矛盾的一面的中間阶層，作为封建制度的改革派，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阶層的政治代表，主要是直接与地主、商人發生接触的下級武士官員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以大盐之乱为頂点的一八三〇年代的大規模的农民、市民斗争的高潮后，作为重建藩鎮統治的財政經濟上的改革派，或作为鎮压人民和抵抗欧美压力的新的軍事技术人材，开始在藩政中活躍。

一八五三年(嘉永六年)，培里^①艦队开到浦賀，对幕府施加压力，翌年，幕府被迫于神奈川簽訂最初的日美“友好”条約，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哈利斯^②同样以威胁和欺騙手段与幕府强行簽訂通商条約。自此以后，日本被当作欧美列强共同剝削

① 美国海軍少将培理，于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統率軍艦四艘、海軍官兵五百六十名开抵江戶外港浦賀，进行軍事性的示威，并将美国总统斐尔摩亚簽摺的信件交給幕府將軍德川家定，培里声明将于翌年春天回江戶来取回信。翌年二月，培里率十艘軍艦和二千名海軍再訪日本，幕府慑于美国的武力，表示屈服。經六周談判，簽訂了第一次日美“友好”条約，規定开放伊豆半島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館两港，并允許在下田設立美国領事館。——譯者

的半殖民地市場。伴隨開港貿易的開始，日本的封建制度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如“密閉的木乃伊突然接觸空氣而紛紛碎裂”一般開始分解了。改革派的勢力趁着這樣危機得到飛躍的發展。他們企圖沿着新的形勢、沿着資產階級的發展方向來改革封建制度，打倒德川幕府，建立新的統一的國家政權機構。

歐美各國表面上揚言“但願與日本自由地、和平地通商貿易，此外別無他望”。但實際上，正如英國奪取中國的香港作為根據地一樣，得隙便欲在日本開辟根據地，同時，他們就像在中國的上海以及其他開放的港口里佔據租界作為他們事實上的領地一樣，企圖把橫濱以及其他開放的港口的“外國人僑居地”（租界）據為事實上的領土。

外國作為根據地最先覬覦的是具有連接日本與亞洲大陸的跳板作用、控制着日本海與中國東海的據點對馬島。不論英國、帝俄、法國、美國，都覬覦這座島嶼。就中以英國和帝俄兩國為最甚。英國引誘法國，以支持法國侵略朝鮮為條件，換取它對英國攫取對馬時的支援。帝俄探悉這項陰謀後，遂於一八六一年（文久元年）三月用“波薩多尼克號”軍艦佔據了對馬的芋崎，在這裡開始建立海軍基地，迫使對馬藩主把附近一帶永久租借給帝俄。他們向藩主要求供應建築基地的木料、食用的牛、直到妓女，亂伐山中樹木，屠殺農民的牛。但是，幕府對此並不進行真正的抗議。對馬藩的大名和武士只關心自己的領地，為求得“穩便”的解決，終於要接受俄艦的要求。他們因為最後仍不能防止土地的喪失，遂向幕府請求另行撥給九州或其他地方的土地作為抵償，以便遷往居住。

② 美國外交官，一八五六年抵下田，出任美國駐日本第一任總領事，他迫使幕府繼續簽訂了不平等的通商條約，並取得了侵犯日本主權的治外法權等，擴大了美國的侵略活動。——譯者

这时候，毅然决心抵抗侵略的，乃是对馬的农民、漁民和武士里最低級的年輕人。四月十二日，一队侵略者攻破瀬戶防綫大船越而登陸。村民奋起阻止敌人，有的人躍入敌人的船內。其中有农民安五郎，奋勇抗敌，終于被敌人击中當場牺牲了。

伙伴被害的消息霹靂一般震动了全島农民的胸膛。大船越及其附近各村，疏散了老人和兒童，留下壯年男女，組成坚决抵抗的組織。他們甚至決定，倘使藩主接受俄国人的要求时，将不惜把藩主等人作为卖国賊来討伐。五月間，幕府的官吏小栗丰后守来到对馬島，会见了艦长，要求他們撤退。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他接受了艦长想会晤对馬島藩主的要求，暗地交給了允許会见的書面通知。但另一方面，因为他在人民面前摆起老爷架子耀武揚威，人民忍無可忍，于是警告小栗，倘不火速离去，将用实力驅逐他出境。小栗在对馬停留两个星期后倉惶地逃掉了。

七月八日，七名外国人深入境內。于是，各村的年輕人紛紛拿起镰刀、柴刀、猎槍，阻止外国人，把他們赶回軍艦去。在人民坚决抵抗的压力下，迫使畏縮的藩主們也不得不拒絕俄艦的租借土地的要求了。

七月下旬，反对使对馬置于俄国势力控制之下的英国艦队赶来，强硬地要求“波薩多尼克号”撤退。該艦看到六个月来的僵持只是使对馬人民的反抗加剧，也开始感到絕望，遂借此机会离去。日本的領土終于最先得到对馬农民和漁民的保衛。倘使当时沒有对馬人民的斗争，其后的日本将变成什么模样，实难想像。

农民和漁民并不像武士那样譏誚或詛咒外国人为鳥兽。这一点当日到过日本的一切外国人差不多都如此承認。但是，他們不管是外国人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人也好，对于非法者、侵略者却坚决地予以抵抗。

鑒于倒幕派的勢力年年增強，幕府遂自一八六四年（元治元年）末開始投靠法國，接受法國公使的政治策劃，向法國政府、銀行借貸軍艦和武器，並準備用北海道的采礦權和生絲貿易的獨占權作為補償。一八六六年（慶應二年）春天，法國軍事教官團前來指導訓練從強制征集農民而組成的新軍和建立新的常備軍征兵制。一八六七年，以打倒幕府為目的的薩長聯合^①愈形發展，幕府的生命危在旦夕，幕府遂極力擴充軍備，因此，想着手擴充江戶郊外德丸的前練兵場和征用土地。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數名法國軍官在幕府的保衛外僑特別部队的保護下，借口打獵進入德丸原野。農民為消滅來犯的官方，事先準備了竹槍等武器嚴陣以待，見到來侵的官吏，立刻吹起号角，敲起大鼓集合起來，包圍了法國軍官，準備擊斃他們。特別部队拚命保衛軍官們，軍官們才得打開血路逃遁，但是四名特別部队隊員被農民方面俘虜了。其後數日，以貧農為主力的約三千群眾防備幕府和法國軍人的陣勢並未解除，堅決拒絕聽從地方官和村吏的命令（何時釋放俘虜則無史料可查）。幕府在這時已面臨滅亡前夕，無計可施，終於停止擴充練兵場和征用土地。

同月二十五日，法國公使館兩名騎兵也是在江戶郊外的大森鈴森林里，由特別部队保衛着打獵。他們踐踏了庄稼，並借口擊落的鳥兒被村民拾去，闖入名主重藏的住宅內吵鬧，用刺刀刺傷重藏的前額。一個農民看到這個情況敲起了警鐘，大批農民立刻匯集前來，痛擊了外國人，毆傷其面孔，並且俘虜了一個外國人和一個特別部队隊員，作為人質，一直扣押到法國公使道歉為止。地方官和特別部队的軍官懇求釋放外國人，但是遭到村民的拒絕，終於用特別部队的軍官作為代替的人質才釋放了

^① 指以薩摩、長州兩藩內倒幕力量的聯合而言。——譯者

法国兵。这样，最后由法国公使道歉了事。

十九世紀後半，日本在歐美壓迫下，猶能奠定民族獨立的方向，正如對馬事件所顯示，首先因為人民直接抵抗了侵略者；其次是，人民鬥爭雖未發展為自己的革命，但卻成為打倒幕府的原動力，使改革派的中間階層在幕府的賣國政策成功以前，徹底打倒了它。

四 “改革世間”

——農民的鬥爭和倒幕運動

幕府末期的農民鬥爭如前所述，以貧農為基礎，間或由貧農充任領導。與此同時，正如謀求安藤昌益所謂“自然世界”的實現一般，提出了平分土地、財產的要求；並且為了這種目的，不再對地方官和領主進行強訴的姿態出現，時而掀起直接搗毀富豪、地主的住宅和財產的猛烈暴動。這就叫做“改革世間”——從根本上改革社會，或“平均世間”——使社會平均起來。幕府末期的大暴動多屬這種“改革世間”的暴動或者伴同這種“改革世間”的暴動，但同時也有上自地主、富豪，下至最下層的貧農一致聯合與領主展開鬥爭的情況。

一八三〇年代（天保）農民鬥爭的高潮以後，暫時渡過了一個相對的穩定時期，但從一八六〇年（萬延元年）起，暴動的波濤又形高漲。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信州伊那南山鄉三十六個村莊的“強訴”，就是全體農民對領主展開鬥爭的典型例子。當時運動的組織者以評書藝人的姿態四處講述佐倉宗吾的故事，有的組織者偽裝按摩師在村與村間進行聯繫，其他的組織者又作為往秋葉山進香隊的管事人來擴充組織。這種智謀與今天的工

人运动任何組織者相比，均無逊色。这样，經過慎重的計劃与准备以后，三十六个村的代表一千六百一十六人于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向地方官营房进行强訴，并未牺牲一人而达到了目的。

这一强訴通过从地主到吏役的紧密的統一战綫取得了胜利，吏役們在暴动中不仅单纯为了減輕租稅——这首先对地主、自耕农有利——而战，并且企圖获得个人身分的解放。在斗争过程中虽然上層农民变成机会主义者，發生过与貧农对立的形势，但貧农中名叫“伴助”的吏役，發揮了最为优越的領導作用，作为暴动的代表与地方官对抗到底。由于这一貧农階級的領導使一度掉队的名主階層的人也提出書面檢討，重新加入暴动，終于获得徹底的胜利。即貧农掌握了領導权，才使統一战綫維持到底。

农民斗争于一八六六年(庆应二年)夏天进入高潮。这时幕府在法国公使的援助和指导下，企圖一举全歼倒幕派的据点长州藩，乃率大軍指向长州边界。长州先于一八六三年夏开始把志願的农民編为騎兵队和其他軍队，由改革派、倒幕派的藩士率領，并在全藩广設农兵訓練所，由富豪出資供应。他們从一八六三年末到一八六四年間受到藩鎮統治势力的迫害，但自一八六四年末掀起暴动和在群众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以后，已控制了藩政权并着手准备倒幕了。这就是在改革派的地主、商人、武士知識分子的领导下，利用农民的反封建的力量，从軍事上也把他們組織起来。全国人民一致痛恨企圖镇压暴动的幕府。因为人民認為开港后与年俱增的物价飞騰、生活困难以及受着外国的民族压迫和剝削，幕府应負最高責任。人民虽然被禁止提出政治上的批評，但仍通过生活开始对政府的政治上的内幕展开了批評。不向权威势力屈服的勇敢精神已經逐漸高漲起来。領導南山暴动的“伴助”听到地方官威胁說，“結党行为乃天下所严禁者

也”，就抓住地方官的領領，大加搖幌，言下之意說：“說什麼？逼我們掀起這次暴動的就是你自己呀！”這表現了人民的心情。

稍具見識的官吏和大名耽心此時挑起戰爭，必將招致人民群起暴動，危及整個封建制度，乃建議幕府停止討伐，但是幕府置若罔聞。適值當時是青黃不接的季節，向例糧價上漲，由於戰爭氣氛濃郁，糧價更形增高，加上幕府在四月里還對大阪、兵庫的市民課征了巨額的臨時稅，因此民眾對幕府的仇恨爆發了。五月八日，從兵庫掀起了“市民搗毀暴動”。頓時波及附近的各市鎮，十三日，在將軍來到的大阪市及其附近一帶掀起空前的大搗毀暴動，那幾天聽人說着：“簡直是亂世的景象、沒有是非的世道”，接着又擴展到關西一帶地方。搗毀暴動的民眾被幕府官吏逮捕時嘲弄地說：“入獄有人管飯吃真是恩德無量！”還公然指責將軍說：“引起暴動的人就是住在城中的將軍。”

及至月末，江戶掀起較大阪尤為激烈的搗毀暴動。暴動自二十八日開始，到六月五日才平靜下來。不論江戶或大阪，幕府的權力在暴動期中都陷於癱瘓狀態。

當江戶的搗毀暴動剛剛平靜下去，六月七日，武藏川越的木匠就要求“改革世間”，掀起搗毀暴動。十三日擴展至飯能，繼而從八王子到上州、秩父，蔓延到甲州和信州。在秩父大宮，從地方官營房的長屋六棟直到監獄均被搗毀，釋放了囚犯，燒盡一切有關統治人民的檔案，燒毀槍枝，把大炮推入井里。同時，冲进當舖，當場發還了抵押的什物，銷毀了當票。暴動非常靈活，在馳往大阪以前，先派前哨前往通知：“為改革世間而採取搗毀行動的時候，附近各村從十五歲到六十歲的男人應準備好斧、鋏、鋸等等，迅速出來參加，倘有遲緩的村子，包括村吏在內，將一戶不漏地予以搗毀、燒光。”末尾一句不應理解為對群眾的威脅。實際上，“改革世間”的暴動里絕對沒有無理搗毀任何一戶同是

貧困伙伴的家屋。

以江戶、大阪两大城市的搗毀暴动和武藏上野的“改革世間”暴动为先声，相繼在中国^①、近畿以及东海、东山、关东和东北^②等地区到处掀起了数十件农民暴动和搗毀暴动。它使整个封建統治階級感到恐惧。对长州藩有好感的大名和拥护幕府的大名，都焦急地認為不应再糾纏于长州战争之类的統治階級內部的騷乱里，認為必須早日集中、統一統治階級的势力，建立新的国家机构。

过去拥护幕府派的官僚岩倉具視听到农村农民对統治者的怨恨，担心“天下亿万人心”所向，坚信必須迅速以天皇的名义統一政令，促使“万机一新”。

幕府也有同样的見解，但是为使自己成为新的統一的政权的主人，反加速地征討长州。然而惨败了。可以說，幕府灭亡的命运这时候已經注定。

第二年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根据已經研究的結果，农民暴动和市民搗毀暴动事件比前一年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当年八月下旬政局最为緊張的时期，市民群众听到在名古屋的伊势神宮从天上降下了护符的風声，突然在街头上瘋狂地手舞足蹈着喊叫：“可好啦！可好啦！”这从十月中旬，即最后的幕府將軍德川庆喜在名义上放弃政权的所謂“大政奉还”前后起，以京都、大阪为中心，从西之宮到大津一带地区，即当时政治斗争最重要的舞台，鬧得特別激烈。到十一月下旬为止，連續一个多月，市民叫喊着“可好啦！可好啦！把臭东西用紙糊起来，破了就再糊上它”；此外，不論說到什么，末尾总是“可好啦！可好啦！”地唱着猥褻的歌。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恣意穿起漂亮的服装，

①、② 均为日本地名。——譯者

夜間里头上頂着灯，成群結队地各处活动。在“狂舞”的名堂下，不管是誰家或是如何华丽的府邸，也不管是內室或外室，穿着鞋^①一面跳舞一面冲进去。被冲进去的家宅要設宴款待大家。

不仅如此，狂舞队冲到平日被市民憎恨的人家时，搗毀了室內一切家具和器物，把华丽的衣服扔到街上踐踏，或者随手送給过路的人。

这种騷乱不久波及东海道，从駿府，即德川氏的故乡最重要的地方，直到横濱、江戶，从防护江戶的外圍重鎮甲府远至信州的松本以及四国的阿波等地方，除了中国和九州以外，席卷了当时在倒幕斗争中一切政治上軍事上的重要地点，而且主要的是在这些地方旋風一般的煽动了群众。幕府諸藩拚命鎮压，但是群众狂舞得疲倦已極犹不肯停歇。这虽然没有証据足以断定最初是由倒幕派所策动，但至少当“可好啦！”發生的时候，倒幕派立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并且推广了它。由于这种情况，一般的說法認為，到一八六七年时，直到前一年高漲的民众革命斗争被轉变为“可好啦！”的騷动，在这个期間，倒幕派武士才得以掌握权力，树立了反动的天皇政权。但是，是否尽然如此呢？

第一，一八六六年的农民暴动、搗毀暴动、改革世間暴动的波濤虽在一八六七年稍見退落，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問題。因为，农民暴动、搗毀暴动之类的自發的斗争，今年激烈而翌年緩和是習以为常的事。

同时第二，一八六七年的农民斗争也絕未減弱到以往所說的程度。“可好啦！”的騷动本身即包含着一种搗毀暴动的因素。民众亦称之为“改革世間的狂舞”，或者說：“如今是‘神話时代’，每天可以尽兴嬉游。多么美妙的日子啊！”而且在农村里并無

^① 日本式的住宅进屋要先脫掉鞋子的。——譯者

“可好啦!”的狂舞。在农村，特别在幕府根据地关东地方，农民暴动的次数虽有减少，但贫农、半无产阶级却以流民的姿态自动武装起来，随地掀起慢性的近于暴动的状态。并且从这里面还诱发了政治意义很高的农民暴动。

譬如，八月间幕府征用了江户郊区的驹场野原，准备在法国军事教官团的指导下开辟大型练兵场。因此，农民掀起了反对征用土地（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与幕府军队、警察对抗了十日以上。如前所述，不论是德丸原野为反对建立同样的军事基地而征用土地的斗争，或者是反对法国骑兵在大森铃森林暴行的斗争，都各有其无比高度的政治意义，为以前的农民暴动所不及。边境地区的隐岐岛，从一八六七年六月以来，在地主阶级的国学家领导下，岛民群众进行了自主的文武研究，作为倒幕战斗的准备。信州佐久郡七十五个村的代表在“大政奉还”和“可好啦!”的大骚动的时候，向地方官要求免除农村青年被幕府征为步兵的兵役。关东各村以贫苦农民为中心全部激烈地动荡起来，幕府为了施行镇压，不得不利用各村的名主阶层的子弟组织“农兵”。“大政奉还”以后，幕府的威信扫地了。由征集的农民组织的士兵们，三、五百人结党成群，横行于江户市中，手中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械在吉原^①肆行捣毁暴动。江户的一般市民也因为被征收官税而满腹不满，诅咒幕府。由此可见，群众的革命力量并未被“可好啦!”的骚乱湮没。它比一八六六年更加成长了。正因为如此，民众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内战中到处起义或援助官军。

第三，认为一八六七年农民斗争受挫折的说法，把一八六六年的农民暴动、捣毁暴动解释为好像是革命领导部有计划的起

① 吉原是江户市内著名的妓院区。——译者

义,即使不是如此也陷于过高估价,认为只以这番起义就可以打倒幕府和实现民主革命。这种过高估价是与低估倒幕的意义互为表里的。但是,尽管倒幕后成立的天皇制政府具有如何反动的本质,不过倒幕这件事是进步的,几乎可以解释作为具有革命的性质。一八六七年八月到十二月间的倒幕派毫无麻痹群众的必要,对他们最重要的是使幕府权力陷于麻痹。

从以上理由分析,过去有关“可好啦!”骚动的许多说法以及一八六七年的农民斗争显著减少的看法,都不正确。只是因为有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六七年的愈形高涨的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反幕斗争,才能有“大政奉还”和继之而起的“王政复古”运动。天皇政府为了进一步从形式上的“王政复古”一变而为名副其实的天皇制政权,才断然采取发动内战的手段;当时他们所以装作是民众的救星并且能够向民众要求协助,是因为在倒幕的前提下他们不得不争取民众的支持,并且,他们也需要争取到这种支持。他们只有以民众,特别是民众中的主要力量农民的反幕、反封建的蓬勃斗争为基础,才取得了打倒幕府的胜利。

五 被背叛了的革命

——明治政府的反革命行径

不论是京都、大阪或江户,不论是飞驒的山村或隐岐的僻岛,全国各个城市、农村的人民,都为德川幕府的垮台而高兴,都支持“万事革新”,拯万民于水火的新的京都政府,并且对于它寄予期待。

幕府方面,为了夺回权力,准备向京都进攻,于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一月三日,率领法国军事教官团训练出的新式陆军

和会津藩兵，在烏羽伏見公路上，向以薩摩、长州两藩兵为主力的新政府军队开火。但是，用强征来的农民编成的幕府步兵队缺乏战斗意志，与此相反，由许多志愿参军的农民加入的长州奇兵队以及其他新政府的军队的士气却激昂无比。加上战地的人民也支持新政府军，见到薩摩、长州的队伍就称谢不置，向他们献着敬酒。因此，尽管幕府拥有三倍之多的兵力，终于一败涂地。

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逃回江户企图再举，但是江户市民已对幕府失望，盼其早日垮台。在烏羽伏见战败的幕府步兵撤回江户以后，每日都有大批的人开小差。幕府想在关东地方的农村征集新兵，但农民不仅拒绝应征，上州的綠野、多胡两郡还爆发了反对征兵的暴动，袭击了地方官事务所。幕府主战派的首领小栗上野介返回自己的领地上野新田郡时，七千多农民即时掀起捣毁暴动，甚至不惜与小栗一派进行炮战。

武藏、上野、下野、南信州的各村，从一八六八年二月末到三月，屡次爆发了大规模“改革世間”的农民暴动。这比一七八三年同一地方发生的暴动更加激烈。而且这次人民群众声言“已奉官军的密令”或“已奉薩摩、长州的指示”，冲到富豪、地主家里，要求勾销借款和退还土地。人民像期待解放军一样注视着新政府军。

薩摩、长州两藩也暗地放出风声说，如果变成薩摩、长州的天下，将免除本年度的全部租税，此后也要减半。正月間組織起来的各道的鎮撫总督，为了消灭幕府的势力，把人民拉到新政府方面来，发出布告说：“幕府治下的人民以及全体人民，倘有久受苛政虐待，或有任何冤屈，均可大胆向本座申诉，政府调查研究之后即将加以公正处理。”实际上，鎮撫总督(后改为追剿庆喜的先鋒总督)进据前幕府领地时，即宣布减征本年租税的半额。这些声明和布告赢得了人民的好感。

天下的人心如此，以致尽管庆喜和旗本^①企圖以武力維持他們的权力，却終無胜利指望。庆喜对抗战断念以后，遂向天皇政府請罪。一方面，新政府方面見到蔓延全国的人民革命情緒的高漲也大为吃惊。政府唯恐举棋不定之間不仅幕府被打倒，而且一切封建統治制度亦将被推翻，引起真正的“改革世間”的革命。例如东山道軍曾恫吓上野、下野、武藏的各村，严禁村民采取直接行动来革命，有何冤屈只准到总督府去申訴，倘敢發起暴动，即判处“与国賊同等之罪”；同时，对这个地区的大名命令說：“要用聖旨的名义以武力鎮撫人民。”

直到幕府被打倒为止，保皇派始終站在人民的一边。但是，一旦幕府陷于無力的境地，便立刻提出必須有“秩序”！三月十四日，京都宮廷發表了有名的五項誓文^②，說什么“一切政务都依照公意来决定”、“允許全体人民按各自的能力实现自己的志願”。就在同一天，在各个市鎮和农村立起了“五項官告”。其中第一項为“恪守五倫之道”，第二为“严禁結党暴动或惑众逃散”^③，第三为“繼續严禁天主教等邪教”等等。这与幕府时期的“告示”毫無差別。它意味着新政府已經公然轉向反革命。

最初，新政府拒絕接受德川庆喜的請罪，坚持要处以死刑，如今，随着对人民革命的日益恐惧，对反革命派的同情和和解思想也日見濃厚。支持和指导新政府的英国公使巴克斯耽心政府与幕府間內战的扩大和持久将会导致人民革命的爆發，尽力敦

① 旗本为江戸幕府时代家祿不滿万石的武士階級。——譯者

②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用明治天皇名义發表的五項誓文，是新政府內部矛盾的反映。当时的新兴資產階級直到普通的武士階級，在打倒幕府以后，为了廢除大名在政治权力上的獨立地位，才敦促發表了这个誓文。——譯者

③ “逃散”是鎌倉幕府以来农民反对大名的一种消極抵抗手段。由于农民采取全村逃往其他領地的斗争方法，使失掉农民的大名大为狼狽。——譯者

促两者之間和平解决，对新政府施加了压力。幕府遂于閏四月把江戸城和平移交給新政府。

其后，东北与越后諸藩以及旧藩的抗战派拒絕归順新政府，本州的內战又繼續到十月間。新政府当自己的势力尙未巩固的时候，依旧把自己宣傳为人民的朋友和解放軍。人民越反抗旧領主的苛政，就越对新政府軍寄以希望。不論是关东北部、信越或是东北地区，各地农民都支持新政府軍，反抗自己的領主。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的农民还剝夺了領主在农村中的統治工具村长和村吏的权力，掀起“改革世間”暴动。例如越后长岡藩領的西蒲原郡一带地方，从五月底到七月間，因为發現村长們在替藩征集軍伙时苛扣了口粮，从而引起了“改革世間”暴动。同是越后的南蒲原郡的下田乡，在八月下旬也因为追究村长們苛扣軍伙的口粮，掀起了农民暴动，要求罢免村长和村吏，“由村民協議会决定村吏的名額，并由村民投票选任”，这使領主（村松藩）也不得不低头認可。

在东北战場上，也不乏人民支持新政府軍、反抗旧領主的例子。新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在日本本部取得了內战的胜利。接着在一八六七年五月，困守在北海道的函館的榎本武揚等旧幕府的海軍和陆軍也相繼投降了。当时，函館的市民組織了反榎本的游击队，一个青年鉄匠蓮藏，給榎本等的中央炮台的大炮的火門里插上釘子，使它在战斗中失去作用，官軍得此帮助，因而容易地取得了胜利。

天皇政府只是利用人民，利用完了以后就出卖了人民。內战开始时期，曾揚言免征当年的租稅或減低当年租稅的半数，到了秋冬之际征收租稅时，却一粒也沒減免，更不要說什么減低半数了。越后水原县知事（县长）前田一誠因为当地遭受战争灾禍和水灾歉收，决定免征当年的租稅，結果被中央政府撤职。

在飞驒的高山，赶走了前幕府地方官以后，新政府的官吏曾用施行仁政的口惠收攏民心。但一旦認為無需如此的时候，政府就撤換了官吏，矢口否認曾答应租稅減半等事。于是，由市鎮貧民和农民联合的主力起来进行反抗，而农村的統治階級地主和市鎮的商人取得了領導权。但是他們很快就变为机会主义者。最后，农民掀起了暴动，迫使政府撤換了县知事。江馬修創作的小說“山民”就是用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饒有趣味的文学結構描写这一斗争的。烏崎藤春的小說“黎明之前”和用这部小說改編的影片“黎明之前”，也描写了农民怎样被出賣了他們的願望——最初是主人公青山半藏等滿腔感激地欢迎新政府东山道軍的到來，相繼而來的是农兵的征召，接着發生了农民暴动——尽管缺乏最起码的历史知識的人，讀了也会激动無已的。

当新政府背叛人民群眾的时候，首先在地主階級中間找到了政权的支柱。从另一方面講，鎮压农民起义就是对地主的保护。而一八六八年太政官^①下令規定：“除賜地和庙产等免征地外，凡屬农村土地悉归农民所有。非农民欲購置土地时，須設置代理人担負土地所在村庄的一般租稅和徭役。市区土地均应将市民姓名登入地契。市外人欲購置該項土地时，亦应設置代理人担負市的各種租稅和徭役。”因为土地所有人承担的負擔中也包括徭役，所以規定必須在村庄或市鎮里留有地主的代理人，但是因此竟允許富豪們公然收購土地，住在城里做寄生地主。幕府时期，地主反抗領主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無权自由購買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不自穩固。如今，这一点障碍被扫除了。

政府还大力地奖励了工商業。这主要是保护三井、鴻池、住友及其他大商業資本和矿山資本家，也就是把帶有資產階級成

① 太政官为明治政府最高行政机关。总管八省(部)百官，总理国政。內設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等官。——譯者

分的地主吸引到政府方面来的方法。政府与三井、鴻池等大资产阶级勾結一起，諸藩也与当地的豪商勾結起来，为了弥补一八六八年的內战費和維持战后的財政，發行了太政官幣、各种藩幣等不兌現紙幣，强制流通，盘剝人民。政府各藩还暗地里大大降低二分金幣和一分銀幣^①的成色，几乎搞成了假造硬幣。它使外国商人也蒙受了損失，以致外国公使团向政府提出了严厉的抗議，要求将外商持有的劣質幣兌換为純幣。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七月，政府終于在这种要求下完全屈服了。于是，外商大量搜購劣幣向政府兌換純幣。政府于倉惶中下令禁止劣幣流通，只用票面三十兩的太政官幣来收回銀質二分金一百兩。按照当时大阪錢庄的行情，每百兩劣質二分金相当于太政官幣一百二十兩，但政府仅以三十兩收回，可見这种欺騙和掠夺是如何卑鄙了。当时，三井与这项机密計劃有深切的关系，究竟三井从中取得了多少非法的利益，是无法估計的。

政府还通过种种机构和种种方法，在“选賢与能”的幌子下，把地主、资产阶级和藩士中間的改良主义的知識分子吸收到官僚机构里去。这也是利用地主和资产阶级来培植天皇政府基础的最有效的方法。

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天皇統治制度，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發展起来。

新政府使人民大为失望。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越后枋尾地方掀起农民暴动时，流行的“数来宝”里說：“嘿！嘿！大家听我談，皇上的聖旨是些大謊言，……‘高天原’^②解决不了你的飢

① “二分金”是半兩重的长方形金幣，“一分銀”是二錢五分重的长方形銀幣。
——譯者

② 高天原是日本神話里的天國之府。統治階級为了向人民灌輸偶像崇拜思想，巩固他們的統治地位，把它說成是天皇的远祖誕生之地。——譯者

和渴，外表好看骨子里却是臭不可言。”当时，就是掌握政府大权的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承認民心还怀念着旧幕府，因为新政府实际上比旧幕府更糟。

六 土地革命的萌芽

——天皇制度統治权力奠定时期的斗争

人民为了促进維新变革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在斗争里首先相当明确地提出了“改革世間”、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給耕作农民的要求。

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九月会津陷落，旧的統治权力全盘瓦解，不久后(十月)，从会津幕府領地的岩代到越后东蒲原郡爆發了空前的“改革世間”暴动。其中有些地方，人們高举着写有“德政”的旗帜，襲击了村吏和富豪之家。会津郡楢原組的村民大会通过決議：組織包括一向無权过問村政的“小前”在內的使全体村民享有平等权利的自治机构；更迭全部村吏；焚毀檢地帳、戶籍簿以及作为封建統治和剝削基础的一切文件；以前名主、村长命令“小前”代为負担的有关土地的各种劳役今后予以廢除；典押物品中的土地經村民大会協議后处理，其他則分期五年免息归还，借款分期十年無息归还。某些地方还实行了無偿索还典押的土地。有的地方要求除粮食外，准許自由販卖各种产物(廢止藩营专卖)。

在隱岐島，島民在一八六八年內战中，終于驅逐了郡代^①，施行自治。这虽在神主(亦是地主)、村长等的領導之下，受到了

^① 郡代是江戸幕府的一种地方行政官名，統治着幕府的直轄地区。——譯者

新政府的支援(为的是牵制松江藩),但是整个运动的主力軍仍为一般农民、漁民,隱岐島島民的自治組織利用新政府的神佛分离政策,沒收了寺院領地,对于还俗而自力耕作的僧侶,把前寺院領地按每人五反而低于市价卖給他們。怎样处理剩余的土地虽無史料可查,由此也可以看出已出現了土地革命的傾向。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十月,越中(富山县)新川郡中有一位出生于貧农家庭、从江戶流浪到北海道的名喚忠次郎的人,返乡組織貧农,掀起两万人的暴动,从要求減輕租稅發展为“改革世間”暴动,燒毀檢地帳等物,沒收地主土地平分給貧农,驅逐村吏,甚至就要树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在政府軍隊的討伐中,农民方面牺牲了六十余人,一直战斗到潰敗为止。

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一月,陆奥(宮城县)登米郡的祠官七郎散布傳单說:“为徹底复古,事無大小,一应世事悉应貫徹恢复本来面目之精神。凡过去轉移于他人手中之土地,根据革新原則,均应享有公开收回之权,可勿踟躕自誤。”他以此来組織农民分取土地。这里提到的复古是与安藤昌益的恢复“自然世界”的复古頗有共通之处。

又如贊岐阿野郡四千村民,从一八七〇年一月到三月,恣意采伐藩主在救济貧民(实际上这并不是救济貧民,而是藩主与地主榨取、奴役貧民的手段)的“旨意”下經營的郡的共有森林近一百町步。这是用实力来解放山林。

以上各个例子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此外,一八六九年八月信州上田藩八十个村的农民暴动以及波及附近的会田、蘆田等地方的农民暴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以反对由于假造硬幣的兌換办法和禁止不兌現藩幣的流通帶給人民的損失为开端(这个地区盛行养蚕、制絲,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上層农民和作为半無产階級的貧苦农民,都与貨幣經

济發生深刻的关系,以上的貨幣处理使人民遭受莫大損害),首先对領主进行强訴,轉而發展为搗毀豪商、地主的暴动,他們提出廢除大多长、建立农村三吏(村长、保长、甲长)的选举制、減輕定額地租、廢除物产会所等要求。及至一年多以后,一八七〇年十一月,發生了松代領内四郡七万人的暴动,在善光寺地方,鎮中無产群众發动起义,提出廢除藩营商業、收回藩幣等要求,迫临城下,向藩知事直接談判(这是空前的事),迫使他接受要求,并搗毀藩吏、豪农、当鋪和酒店等。領導人是一位名叫甚左衛門的二十六岁的貧农。接着在十二月間,各村佃农团結一致地对地主进行了要求减低佃租的斗争。但是,当时瘫痪于民众压力下的藩鎮权力又形恢复,他們支持地主的控訴,用武力鎮压佃农并使其遭受失敗。这表明当时脱离其他农民村民的佃农的单独斗争的弱点。

同年同月,同是信州的須坂藩的領地也發生了一万多人的农民暴动,以平抑物价作为主要要求,搗毀了須坂城下的富豪之家。总之,从一八六九年到一八七〇年,信州地方爆發了十三起农民暴动,每起都帶有搗毀行动,要求公选村吏或追究村吏瀆职行为。

仅据“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的記載,一八六九年全国农民暴动即不下四十二起,一八七〇年則为三十一起,但其中并未将一八七〇年与长州奇兵队瓦解騷动合流的农民暴动等事件列入。这些农民暴动每次規模均很大,同时領導权几乎均在貧农、佃农、半無产階級手上,它也伴同对地主、商人的搗毀行动,發生許多“改革世間”暴动或性質与此相似的暴动。可以相信,如果从事件發生的当地的史料仔細加以考察,則可判別出暴动的土地革命的性質,远較憑借以鎮压农民的官吏和藩厅的报告書为基础的史料来推测的尤为深刻。譬如,一八六九年飞驒高山的

騷動，一八七〇年松代和善光寺的農民暴動、越中貧農暴動等，在“明治初年農民騷擾錄”這一官方史料里，只列為一般性的藩民暴動，但是，如果仔細加以調查，可以發現它還具有下列的重大意義。從它提出的要求和領導人來看，它不僅具有以往的農民暴動所沒有的革命性質，而且暴動的戰術和政治認識也較以前有了飛躍的進步。

如果把以要求土地革命的貧農、佃農為主體的農民暴動作為這一時期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峰的話，那麼，在最高峰的下面同時還存在着包括地主在內的全部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以要求減輕負擔作為主要內容的鬥爭。不過，這種場合的地主不是寄生地主，而是經營地主或者是經營絲、棉的家庭手工業者以及手工工廠的經營者。而他們的立場多表現為要求營業自由等等。

倒藩後的農民鬥爭遠遠超過了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的階段。但不幸當時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從政治上組織、團結和領導這種鬥爭的力量和階級。大資產階級乃是政府的同伙。進步的知識分子也是政府的候補幹部。而無產階級尚在萌芽階段。於是天皇政府的統治勢力遠在農民、人民鬥爭在全國範圍擴充發展之先，就形成全國的集權並建立了全國範圍的統治機構。它採用了近代歐洲最新的文化。電信設備專供官方使用，交通運輸機關的設施也只供政府和享有特權的官僚資本家利用。“太政官日誌”^①出版了，供統治階級的一切機關閱讀。民間也出現了幾種報紙。但這只是大城市以及地方豪商們的報紙。在這種條件下，儘管各地爆發了深刻尖銳的革命暴動，但是它們無法避免被個個擊破的命運。而在政權方面，如前所述，以大商人和地主階級為基礎，經過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的廢藩置縣

① 日本明治初期的中央政府機關報，日刊。——譯者

的措施，获得了全国的統一与集中。即确立了天皇制的专制主义。

七 “旧平”的意見

——天皇的政治

廢藩置县前后，准許有选择職業的自由、旅行和迁居的自由，廢止关所^①和国内关税，准許有买卖土地的自由、耕种的自由以及廢除“賤民、丐民”階級制，准許貴族（特別是公卿与大名）、士族、平民三种身份的人互通婚姻等，概而言之即所謂“私事的自由”亦即市民的自由中的若干部分基本上得到承認。这是發展資本主义必不可缺的。但是，人民在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始終未得到承認。不仅如此，天皇政府的专制統治愈益加强了。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制定了“学制”，規定滿六岁以上的兒童不分性別均有义务入小學校學習。表面上，这好像是天皇政府为了使日本擡升为近代文明国家的英明措施，但是这些学校的建筑費和經費勒令由村鎮負擔，甚至批准公立学校征收學費。这不外是为了培养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被日為明治政府的大官僚中最进步派的木戶孝允曾于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曉諭后輩伊藤博文說：“在教育和兵役中絕不允許排除专制主义。”

明治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全力以赴地積極着手筹建作为专制政权最有力的支柱的軍隊。为此，政府首先禁止人民的武装，鎮压了一切帶有或多或少的民兵色彩的傾向，并費尽心机整編了諸藩的兵力。天皇政府因为一方面遭到人民革命的反

^① 关所是江戸幕府时期設于要冲或藩境的关卡，平日专司檢查通行証和貨物之职，战争时則于此地設防。——譯者

抗，另一方面遭到反动保守立場的士族大众^①的反抗，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首先考虑筹建强大的军队。

当时日本犹处于欧美各国压迫之下，成为欧美各国的附庸，谋求民族独立乃是日本各阶层一致的目标，但是，天皇政府并未选择（也不可能选择）为争取独立所必需的“民立而国立”的立场和通过在国内实现民主革命、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相反地利用人民的希望，在为了民族独立必须充实军队、繁荣经济的“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榨取人民。这不是为了使人民富庶而是为了充实国库，是为了加强镇压人民、保护天皇及其政权的军队，以之武装侵略朝鲜和台湾，从而在欧美的压迫下求得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补偿，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外问题上去。一八六八年在内战中获胜以后，天皇政府即着手制订侵略朝鲜的计划，并开始进行这种准备（征韩论）。

廢藩置县以后，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公布了全民兵役制度。当时政府扬言“此乃给予人民以自由和使人权平等的精神的表現”，而当时军部的首領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呈給天皇的报告中曾写道：“实施征兵的常备兵制，才能镇压国内贼寇和对抗外国。”

繼于一八七三年施行“地租改正”办法。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将过去征收的实物租稅改为貨幣租稅；（二）以前的租稅是征收每年收获量的几成，此后按土地买卖价格的百分之三征收（同时附加村稅百分之一）；（三）政府發給承認土地所有权的“官契”，不问耕作与否，土地所有权人应負納稅的义务。对

① 明治政府廢藩置县以后，被政府解职的前幕府时期的下層武士（士族）也因失掉职业和收入对新政府大不滿意，乃在各地发动叛乱，其中最激烈的一次为一八七七年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西南之役”，后为明治政府镇压下去。——譯者

政府來說，不再有運送、銷售實物租稅的麻煩，不受年成丰歉的影響，保證了固定的租稅收入，因此異常方便。在政治上特別重要的是統一了以前各地各藩沿戶收取租稅的方法和稅率，這意味着建立起全國統一的統治。但是，對人民毫無裨益。

第一、百分之三的稅率是政府根據從前的實物租稅為征收同額的稅而制定的稅率，毫未減輕人民的負擔。而地價的估定則由政府單方面硬性規定。

第二、在承認人民的土地所有權時，人民必須設法證明該土地為自己所有，提不出證明的土地，悉數被攫為官有。因此，從前一直供人民利用的山林荒地也被強制奪為官有。甚至各村的“入會地”也大部被據為官有。其結果，例如木曾的山林等，在藩政時代屬於尾張藩領，除了檜樹等特定的樹木不准人民采伐以外，其他樹木允許人民自由采伐。但在歸為官有以後，折樑樹枝也會立即以盜伐官林的罪名毫不寬容地被關進監牢（這一點在小說和影片“黎明之前”里描寫得很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把封建領主所有的一切土地無償地分給了勞動農民，但是，實行“地租改革”的時候，關於山林荒地部分，卻把封建的土地所有集中到天皇政府手中並且加強了。在日本這樣全國類似山國的地方，前面的問題作為天皇制的物質基礎來看，意義極為巨大。而天皇政府攫奪山林的行徑延至一九〇〇年止，逐年不斷擴大。

第三、從鑒定土地所有權這一點看，這與舊幕府和大名的“檢地”（丈量土地）意義完全相同，具有清查黑地、匿產的意義。實際上，這次新的“檢地”的結果，頓時增加出來田地、房屋基地達48%。

第四、從地主和佃農的關係上看，佃農的耕種權絲毫未得到保證，它只保護了地主的所有權。

不僅如此，地主還借此機會，利用自己的村長身分把村庄的

共有地改列于自己名下，或者把典押的土地换为自己名义的地契，此外还利用各种方法攫取土地。从前述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公布了准许购买土地的命令后，至此已具规模，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在国家权力的庇护之下建立起来了。

与设立学校、征兵、地租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町村制”也颁布了。设置户长(町村长)、区长(部落长)和他们的办公所，地主做了这些机构的官员，他们作为天皇政府的末梢，掌握着远远超过以前的名主、村长对村民的统治权力。名主、村长虽属封建领主的爪牙，但是多少还带有一些“村庄”这一共同体的首脑和村民的代表性质。新的户长彻头彻尾为代表国家权力的工具，成为征税、办理征兵事宜、管理义务教育的农村的天皇。

与此同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约自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在各村派置了驻村巡查，地居交通要道的街镇上设有警察署，统领许多巡查(一八七三年称为“巡查”，以前用英语“Police”，更早些时候曾名为“罗卒”或“捕亡”)，巡守所辖地方。

政府对占生产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如此进行榨取和统治，以榨取农民得到的钱为基础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事业的发展。而这种生产事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军队、警察、官僚统治机构用现代化的物资装备起来。

从这些根本改革直到鼓励吃牛肉、剪掉男子挽髻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总之，一切为了使封建天皇制度从物质基础到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并尽可能使之适应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政府宣扬这种改革是为了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出版了许多站在政府立场上推行“文明开化”、“启蒙”运动的小册子，它的内容采取以“文明”“开次郎”^①等代表政府和女

明开化的人物对“旧平”(旧弊)、“愚太夫”^①等意味着人民(指占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人物进行說服的問答形式。但是,讀了以后,書中理應得到啓蒙教育的人民对政府提出的那些批評却具体、尖銳得使人驚訝不置。茲举其具有代表性的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三月間最初發行的“开化問答”中“旧平”对政府的批評如下:

“开次郎說皇帝的施政是为了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業,可是,維新以来,一切都不分青紅皂白地征捐課稅。所以,黎民百姓碰面就說,最近皇帝害了喘哮喘病,因为他不住口地哼着‘稅!稅!’^②”

“現在还拉农民市民米扛槍,像狐狸精附体似地練操,这不是强人所难的規定嗎?”

“征收租稅方式的改变(改革地租)使农民感到很不方便。农民很少能够經常儲存繳納租稅的現金,因此,商人們到了征稅时期就前来乘机漁利,农民們則無法逃避它。(中略)并且領取官契时,征取許多印花稅、調查費等等莫名其妙的費用。(中略)尽管政府說官契是保証土地持有人的地权的法律,但是,因为这是以肆行盘剝为目的的虐政,欲盖弥彰,其灾难落于人民头上,終于給世間带来普遍無比的苦难。”

“如果完全像您所說的那樣,政府和官吏是屬於人民所有的,他們就應該遵照人民的意思办事,但是,今天倘若有人公然譏諷政府或者对官吏有失敬之处,他們就不肯饒恕地立刻加以逮捕問罪。不管怎样說,如果把您所說的和今天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照一下,則完全不可理解。”

①、② 均为杜撰的人物。——譯者

③ 此处原文借“稅”字諧音来形容喘哮喘音,因日語“腹”、“喘”两字的音讀相似。——譯者

“按照您的說法，所謂人民的權利簡單地說，就是‘自由自在’，而政府的施政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權利，但是，今天冷靜地觀察社會的情況，却完全沒有像您所說的那樣。理由是这样：請您首先看看警察的行為，訂出了一些什麼‘違警啦’、‘違法啦’等等名堂，有五十六條之多的罪名，這個也罰款那個也罰款，什麼都要罰款。並且當警察處理這些‘違法’的人時，對那些頭戴帽子、身穿羅紗褂子和絲料裙子的官員模樣的人物則曲意逢迎，對我們身穿粗布衣服的人則大肆蠻橫，你剛剛上前打招呼，他就煞有介事似地瞪眼噘嘴，發出老虎般的吼叫聲來喝斥你，有時甚至用隨身攜帶的棒子打得你站不起來。這些情況是我‘旧平’隨時見到的，所以每次都引起對警察的憎恨，如果能做到的話，我真想死勁兒揍它個嘴巴！”

“最近，世間有一個短笑話：有一天，皇帝駕臨高樓之上，眺望東京市區，然後，反復吟誦道：‘登高見烟起’。左右侍從的人惶恐地叩問下句是什麼，皇帝說：‘朕不問民苦’。”

讀過以上各節的人，怎能不產生出與聽到對投降後所謂“民主化”的批評同類的感觸呢！“旧平”的批評完全出自群眾的現實生活和社会的實際情況。這並非作者的主觀想像，而是當時人民發出的聲音。不，人民不只是用唇舌來批評，而是不顧性命地與天皇專制政權進行了鬥爭。“旧平”的發言里提出了從一八七二年起三年間的激烈的農民暴動的各種要求。

八 “熬油”暴動

——反對征兵的鬥爭時期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又形高漲的農民鬥爭，較之以一八

六九一一一七〇年为顶点的斗争，有很大的差别。废藩前的农民斗争是以贫农和半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带有“改革世間”的倾向；一八七二年以后的斗争，是以佃农为主力的、对统治全国的天皇政权进行的全面的农民斗争，在反对过重租税的斗争时，部分地主阶级也参加了斗争并攫取了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可以看作是十八世纪后期具有减轻地租、杂税和反对徭役等要求的全国农民的强诉，在新条件下重新出现。

起义农民的要求，如要求减轻租税、反对征收“改革地租”手续费、反对征兵、反对兴办学校、要求赈济灾民、反对强征入会地等，都集中地攻击了政府的施政，与此同时，其中也包括显然带有反动性质的反对解放“贱民”的要求。此外，从平抑物价到捣毁豪农、豪商的“改革世間”的农民暴动也屡见不鲜，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六月，福岛县的捣毁暴动竟发展为三十万人参加的大暴动。

据“明治初年农民骚乱录”所载，一八七二年的农民暴动为十六起，大部分是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要求减轻各种负担的斗争；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大分县臼杵地方四郡的农民大暴动，延续十三日之久，仅是被处刑的人即达二万八千人。农民向县政府提出的要求，除了反对屠杀牛马、要求平抑物价、反对强征入会土地、要求减低地租和按票面额兑换旧府内藩币之外，还包括值得重视的要求释放前年（一八七〇年）在当地发动农民暴动的人犯并把他们交给农民。农民暴动袭击了县政府，与临时征募的士族以及熊本镇台的日田分营的军队进行战斗，而且袭击了各村村公所，烧毁各种公文帐簿，还捣毁了平日不孚众望的豪富之家。这是具有“改革世間”的成分的；因为附和参与其事而被判罚款的两万六千五百一十四人中，有一百六十五个村长和保长（区长），还有参与其事而被判处除族处分的士族一百四十人、卒

族一百七十二人。这說明，貧农和山林工人是斗争的主力，并且在他們的领导下，使一部分地主也被迫参与了斗争。

一八七三年，农民暴动事件突見增多，較前一年增加一倍以上，达三十六起之多，其中参加人数超过万人的竟有五起。中心的要求为反对征兵令，加上反对征收官契費、反对兴建学校，同时也有反对“解放賤民”的。

尽管政府說征兵令体现了人权平等，但實質上它是为了保障天皇政权的統治，如征集半农奴徭役一般征集人民。人民知道这不是为了保衛人民自己的国家，对于这种征兵，自發地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幕府末期幕府以“兵賦”的名义征召农民入伍的时候，也發生了种种的反抗斗争。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最初反对征兵的斗争是一八七一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爆發于土佐（高知县）高岡、吾川、土佐三郡的山村地带。征兵制度頒布以前，土佐藩于幕府末期就曾着手准备征集庶民入伍；廢藩改为高知县以后，县政府逐村施行戶口調查，挨戶編起号碼，同时，县的兵役科勒令十八岁至二十岁的男子进行登記。人民認為这是征兵的先兆而大感不安。

当时，县政府宣布停止幕府貨幣的流通，規定用太政官幣按一比三收兌，改用現金繳納租稅，这引起了一般民众强烈的反感。此外，廢毀佛寺、強迫門徒以外的人信仰神道，也使人心波动。再加上前述的兵役科的壮丁調查，愈發加深人民的不安。于是，不約而同地紛紛傳起謠言說，政府用日本的年輕人“熬油”卖給外国人。

这时候，池川乡一个名叫竹本长十郎的相当富裕的农民發出檄文呼吁說，征兵是为了变人民为“兵虫”后送給外国人吞食，因此必須反对。于是民众应声而起，搗毀村长办公所，并准备前往襲击县政府（从暴动爆發地点到县政府要經過十余里^①的山

路)。担任軍事指揮的是一个名叫山中陣馬的旧日在乡武士。但是，民众遭到县政府派出的队伍的镇压，陣馬自杀而死（小野武夫“維新农民蜂起譚”）。

这次农民暴动，也包含反对廢除“賤民”的要求（一八七一年八月廢止“賤民”、“丐民”称呼，并規定享有与平民同等的就業权）。以同样的反对事項作为要求之一的农民暴动，从同年到一八七三年間發生了数起。其中，一八七三年五月，在現在的岡山县津山地方發生的数万人的农民大暴动，与反对征兵、反对学校的同时，还反对廢除“賤民”，对部落民施以殘酷恐怖的“狙击賤民”的行为，恣意杀伤人命和燒毀住屋。

其原因何在？直接原因自然是农民长期以来受到統治階級分化离間政策的欺騙。但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緣故：第一，当前述高知的“熬油”暴动發生的时候，民众向官吏提出的要求里會有这样的字句：“賤民将成家立業，賤民对待农民曾尽何忠勤，使农民降为賤民，有何益哉。”这是晦涩的語句，大意說变賤民为平民令人不能容忍，“使农民降为賤民”似指农民为賤民一流之意。这就是說，使賤民成为平民即意味着把平民等視为賤民。廢藩置县以后所采取的政策，使一般农民不仅未能获得絲毫利益，反而遭遇到比以前更大的苦难，如禁止藩幣流通、征兵、教育費、地契費、新町村制費等。因此，农民感到所謂变賤民为平民，并不是把下層人提拔上来，而是把自己貶低了。

第二，虽然沒有文献上的根据而只是一种推測，当变賤民为平民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認他們有权利用村中的入会地。但是农民从明治政府不仅沒有得到新的土地，反而被政府征夺了入会地及其他土地。因此，农民反对在日見縮小的入会地上增加有

① 指日本里，一日里約相当于八华里。——譯者

使用权的人数。估计这也是促使反对“废除贱民”的原因。农村部落多为山村或有山地带，山的问题也因之特别重要。这些推测得以成立，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对“贱民”等特殊部落的歧视后来还长时期根深蒂固地残存着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入会地问题所致；而现在，当这些部落民一旦争取到国有林的解放，那个村里的这种歧视立刻就消除了。

第三，这也是听特殊部落的老人所说的，从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特殊部落民因赖传统所限定的身分，只从事某种手工业终于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便开始从事农业劳动。那时候，他们除了开垦不毛之地和河岸荒地以外，在租地耕种时，还得忍受最苛刻的不利条件，例如，种地人要把田里收获的粮食悉数缴纳给地主作为地租，自己只能得到稻草和谷皮或只取得“里作”^①；或者种地人要向地主提供多于一般佃农负担的劳役等。这都引起了一般农民的反感。一般农民耽心废除贱民后将会促使特殊部落民这种向农业方面的发展变得更趋激烈。

由于这种情况，未解放的人民发动了迫害伙伴的悲剧。这也可以说是与农民的自我解放要求背道而驰的行为。所以说，农民暴动的主要要求，经常是反对征兵和反对学校等斗争。

土佐的反对“熬油”暴动所预示的反对征兵的斗争，到征兵令公布的时候愈形激烈。这一年适逢中部以西地方粮食歉收，以粮食为首，各种物价均形上涨，农村里也有很多人遭受饥饿。就在这个时期，前述各项政策，即各种负担一时群拥而来，令人无法忍受。其中以征兵一事最使人无法容忍。同时纷纷谣传说要征集寅年生的男子入伍攻打朝鲜。这并非望风捕影的谣言，在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等人领导下的政府，这一年正计划发动

^① “里作”是指在同一块耕地上每年进行两次耕种时其中一种附属作物而言。譬如，日本农民在麦收以后种植的萝卜即是“里作”。——译者

侵略朝鮮的戰爭。因此，當人民知曉開始對寅年生（一八五四年出生的人，在這一年滿二十歲）的男子施行兵役檢查的時候，都萬分激動。於是，從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間爆發了十四起反對征兵的暴動。其中聲勢最大的是前面所提到的津山地區數萬人的暴動，而在香川縣六郡的暴動中，僅被處刑的就有兩萬人之多。

對於反對征兵的暴動，當時的政府以及後世的御用學者們曾經這樣解釋說：因為政府在有關征兵的文告中使用了“血稅”的字樣，這被人民誤解了，以為政府要抽人民的血賣給外國人（與“熬油”的謠言性質相同），所以才爆發了農民暴動。但是，當時民間已經有人駁斥過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可能有人對字面發生過誤解。因為征兵實際上與抽人民的血毫無區別。但是，反對征兵的暴動並不是由此引起的。作為證據來說，自從字面的誤解消失以後，雖然已無採取農民暴動的形式來反對征兵，可是，利用假戶籍或兵役法中的免役規定設法逃避兵役的，以及在兵役檢查時用逃亡形式進行反抗的，實際上却有增無已。即使到了一八八〇年，譬如在長崎縣的長崎地區等，竟連一個適于被征入伍的人也沒有。以後，儘管修改了兵役法，並且嚴密地施行戶籍制度，再也無法利用戶籍來逃避兵役，但是仍然有人在兵役檢查時避不到場，或者入伍以後開小差，兩者合計竟達一萬人以上。

除反抗征兵外，一八七三年六月，以今福岡縣嘉麻郡、穗波郡地方為中心，爆發了縣境三十萬群眾參加的日本農民運動史上最大的暴動。這一年歉收，糧食價格從春天開始逐步上漲。借此機會，糧商和素有聯系的大地主們乃操縱行情從中謀取暴利。投機商人們在各山頭上設置行情連絡員，白天用紅白旗、夜間放起狼煙來傳遞大阪的糧食行情。集聚到神社“祈雨”的嘉麻郡二

十七个村的农民，一致決議要求投机商停止这种行为，六月十三日，他們派代表到投机商的行情連絡員的头子，叫做“笔海”的蹟踐力士的地方进行談判，遭到拒絕而冲突起来，几位农民代表被对方逮捕了。其中有一个人是筒野村的医生渊上琢章之子渊上佐一郎，琢章听说自己的兒子遭到意外，急忙發出檄文，呼吁援救农民代表。

十六日，一批农民各自拿起竹槍和其他武器冲入笔海家中，进行捣毀，自此，發展成为波及全郡的暴动，不久就發展为三十万人的大暴动。六月二十日，群众拥入博多，除了素称慈善家的榎井屋以外，把太田家、烏羽屋以及其他豪商逐戶捣毀，冲入县政府，燒毀官舍，并捣毀了电报局。因为电报主要是帮助官吏統治人民的，与官吏勾結在一起的豪商利用电报傳遞行情，陷人民于水火，对于人民毫無利益。捣毀电报局，从战术上来說，也是頗有見解的。六月二十五日，从熊本鎮开来两个中队的官方軍隊（这是从旧藩士族兵中征集的）与福岡县召集的数百名士族兵一起施行鎮压，才宣告平息。

当时被捣毀和被燒毀的房屋約四千五百九十所，其中包括官舍七所、小学校二十九所、村公所四十三所和倉庫六百四十七所。暴动群众死于战斗者二十八人，重伤十八人。并毀損电綫杆一百八十一根。主謀人渊上琢章被判絞刑，杀死官吏者处斬，此外有六万三千九百四十人被判罰款、杖刑或笞刑。曾經有过这样的故事：被杖笞以后，伤处要肿胀，傳說豆腐可敷伤处，人們竟相爭購豆腐，以致豆腐行情急剧升漲。人民就用这样的幽默来諷刺政府的鎮压。

鎮压这次农民暴动时，大阪豪商小野組的博多營業所曾献納了一万五千元巨款。相当今天五千万以上。这清楚地表明，誰是人民的敌人以及天皇政府与豪商間的勾結是如何密切。

九 “竹槍戳出的二分五厘”

——从要求減輕地租到爭取自由民权

与反对征兵同时，农民斗争的另一个大目标是反对“地租改革”和要求減輕地租。这从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起，一直繼續了很长时期。不仅因此爆發了农民暴动，而且这还为爭取自由民权的政治斗争中的主要經濟内容。斗争的基本队伍虽是自耕农，积极参加斗争的地主也不在少数。其中很少是完全脱离生产的地主，而是即使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給佃农，同时另一部土地又雇工自行耕种經營的、未尽丧失农民特点的人；他們另一方面还据有手工工場資本家或小企業主的資產階級特点。

一八七三年，还有許多反抗地契印花稅和其他地租改革手續費等农民暴动。及至改革措施——丈量土地、划分官地私地和土地評价——开始，黑地被揭發，政府憑空硬訂地价并以判处反政府罪来恫吓表示反对的人，施行高压手段，各地反对“改革措施”、“修訂地价”和要求減輕地租的斗争便激烈起来。

从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至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一方面板垣退助等反对官僚专制、要求召集国会的运动日見發展，另一方面，日趋沒落的士族的反动的暴动也頻發無已。政府乃于一八七四年侵略台灣，一八七五年攻击朝鮮江华島炮台，第二年一八七六年胁迫朝鮮簽訂不平等条約，想用这种繼續不断的对邻邦的侵略行动，把这一危机引向国外；同时对內则以新聞条例、讒謗律（禁止批評政府及官吏）压制言論，企圖克服危机。但是左右齐拥而来的对政府的攻击愈見激烈，一八七六年，获地方的前原一誠之乱、熊本敬神党之乱、秋月的士族之乱相繼爆發，

年末，土族的最大的首領西乡隆盛被薩摩士族拥立，大有掀起叛乱之势。正在这个时期，地租改革措施的厉行，又引起全国农民的不满与波动。五月，在和歌山县爆發了反对濶空修改地价的农民暴动；十一月，茨城县真壁郡的农民为反对地租改革而群起暴动；十二月，茨城县的那珂郡的农民因不堪忍受苛重的租稅勒索而掀起暴动，头扎白巾，手持竹槍，狙击警察，想向县政府进行强訴。县方募集了数百名旧水戶藩士族把暴动鎮压下去。

暴动平息几天以后，在十八日，三重县飯野郡丰原村的农民，因为不满意成为新地租計算标准的粮食平均价格过高于市价，遂掀起暴动要求降低这项价格。自此頓时波及二十余村，十九日夜間，侵入县政府所在地津市。当时的农民暴动变成了三重县一带地方（伊勢、伊賀两地）数万人的暴动。在津市县政府前被旧津藩士族和巡查部队阻回的农民退至松阪，搗毀三井組商社（三井是松阪出身），夺取鈔票，并連夜冲进四日市，搗毀当地地方政府、区法院等权力机关和电报局。二十日，縱火焚燒大矢知的監獄，釋放在押犯人八百余人（一說为三百余人）。

当日，农民暴动波及爱知县的海东、海西二郡，縱火焚燒各村公所，燒毀戶籍簿和地租改革賬簿。二十日夜間，暴动队伍的一部分一直追近名古屋鎮台二里之处，因碰上优势的鎮台兵而退散。

在其他地方，从二十一起波及岐阜县的石津郡、羽东郡、安八郡和多艺郡，到二十四日才被鎮压下去。岐阜县內五十一个村参加暴动，五十六戶民房被火焚，还有六所学校被焚毀。

二十一日，又冲进樺县境內的大和国古市場村。

这一暴动蔓延速度快得委实惊人，两天中，从三重县飯野、飯高两郡各村起，西南达紀州的牟婁郡，西至伊賀，北越桑名發展至爱知县和岐阜县境內。这說明各地人民对于地租改革的不

滿到如何程度。同时，暴动民众方面似有一項紀律，不焚毀人民的房屋，不伤害人民，指导部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凡屬官有之物必遭搗毀、燒光。官吏住宅以及区长、村长、学校監督的住宅也被搗毀燒掉。更無遺漏地搜出大小区公所的帳簿悉數投入火中”（“明治初年农民騷扰录”）。

当时，福島县也处于暴动前夕的状态，而全国各地都充滿了一触即發之勢。大久保利通——当时政府中實質上的独裁者——等認為士族的叛乱不足惧，但对农民群众的反抗，感到头痛不已，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一月四日，頒布了減輕地租的詔書，将按地价三分降低为二分五厘。农民歌頌这一胜利是“用竹槍戳出的二分五厘”。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清楚的信心。

自由民权运动倘不与这些群众相結合即無法前进。以前的自由民权运动，是下野的政府官僚借助于英国議會的政治知識，同时一方面以一八七三年的反对征兵和反对地租改革等民众斗争的高漲为背景而掀起的反政府运动。虽然他們的言論很激烈，如在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前后，高呼以血来換取自由、推翻专制政府、強調革命权的报纸，尽管几度被禁止發行，有多少名編輯被投入監獄，却仍然不断出刊；但是，这种“革命权”的标榜實質上也是西乡派的叛变，即本質上是反革命的。只是，其間陸續誕生了土佐“立志社”以及其他各地的政治、思想团体，“自由”“民权”思想的發展不容忽視，它打动了生活里稍有余裕和能够讀書的农家青年的灵魂。

自从三重、茨城的农民暴动得到胜利，另一方面以西南战争知名的反动士族的最后的大叛乱被击潰以后，从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起，自由民权运动与农民群众相結合，与商人相結合，甚至影响到士兵中間，从过去的“上流社会的民权說”發展为国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自由民权运动与农民的经济斗争相结合的典型例子，从越前首户豪农杉田仙十郎及其子杉田定一参与农民斗争一事可见一斑(杉田定一曾任“采風新聞”記者，攻击过政府的专制政治，被处六个月监禁，是自由民权的理論家)。石川县县令桐山純孝于地租改革时，以政府名义規定越前七郡每反田地的收获量为一石四斗，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見，并且揚言說：“即使富士山崩潰也决不改变这个規定，反抗者将作为叛国罪逐出国外。”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在大阪参加了“爱国社”(爭取自由民权的全国性政党)复兴大会后返回故乡的杉田定一，听到农民的实情控訴，遂站在农民前列領導修改地价的斗争。他在“抗議地价理由書”第三条中提到：“官也好，民也好，同是人类。既然同是人类，人民的申訴会有不正确的地方，而官吏的規定絕對沒有差錯，当然絕無此理。”天赋人权論不是作为空論而存在，它成为修改地价斗争的武器。經過一年之久的不屈斗争，最初是桐山知县不得不調任他处，繼于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二月农民的要求达到了目的。为巩固这一胜利并繼續前进，杉田定一于一八八〇年(明治十三年)召开越前七郡联合会，矢志巩固团结以扩大独立自主的風气。

反政府的斗争也在兵营中进行。一八七八年，近衛炮兵第一大队二百六十余名士兵在三添卯之助、小島万吉率領下，对于前一年参加西南战争的恩賞沒有發給下士兵卒，又加上从本年起削減了月餉，感到不滿，于是發动叛乱。他們以前曾向上級上書申訴不滿的意見，始終未見絲毫反响，因此，于八月二十三日夜間杀死大队长和值班士官，縱火焚燒兵营，拖起大炮从宮城附近的竹桥兵营来到赤坂的临时皇宮前面。預定的計劃是会同近衛步兵队焚毀皇宮，准备等候參議們急惶前来朝見天皇时悉数杀掉。至于在这以后再准备怎样行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任何

史料中均無記載，但是，僅就這些計劃的制訂并見于實際行動來看，其原因絕非僅是為了不滿恩賞的不公，一定還進一步有思想上、政治上的理由。然而不管怎樣，這些叛亂者在出了兵營不久，即被鎮台兵鎮壓下去。

結果，五十三名士兵被槍斃。處刑時，降着淒厲的暴風雨。士兵們泰然自若地吟着詩或唱着“都都逸”小調^①，冒雨跨進刑場，十五人一排地被槍殺。首領小島因為頭一發子彈擦過左耳，大聲呼喚：“這回要射得漂亮些！”這時，子彈應聲擊中肩間，氣絕身亡。

當時，官兵們因減餉而引起不滿的不只是竹橋炮兵隊，熊本、大阪兩鎮台以及宇都宮分營等也發生了各種動搖。

從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是自由民權鬥爭最為高漲的時期。一八八一年十月，天皇政府也被迫不得不頒詔允諾定於明治二十三年召開國會。而且，這個詔書中還恫吓人民說，朕既已頒發以上旨意，倘有人煽動世間要求提前召開者定予嚴懲不貸。以天皇名義直接用懲罰來恫吓人民的情形，這是空前絕後的（天皇通常以對人民仁慈深厚的姿態出現）。其後不久，創立了自由黨。自由黨的綱領政策中，毫無涉及皇室、天皇等字眼。其他任何政治結社均提及“促進皇室的尊榮”，只有自由黨一言也未提及。

在向中央統治勢力進行鬥爭的發展中，日常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同時還對地方統治勢力進行了政治鬥爭。鬥爭最為成功的是河野廣中領導下的福島縣的自由黨。一八八二年，自由黨控制了福島縣議會的大部分議席。對此，縣知事三島通庸表示，“禁止在本縣管界內留有一名自由黨和明火強盜”，尋

^① “都都逸”是日本天保年間流行於江戶的一種民謠。一般內容都是男女相悅的愛情故事，是用口語依七、七、七、五言的形式排列的歌謠。——譯者

找一切机会进行镇压。三島为了显示天皇政府以及自己的威信，發起修筑并非当务之急的公路工程，向各村分別摊派徭役，勒索徭役款項。沉重的負担使群众無法忍受。村长夹在村民和县政府中間左右为难，以致有人自感愧对村民而自杀。自由党坚决反对三島的苛政，在县議会上否决了預算案。而三島仍坚持执行原案。

河野等人清楚地認識到单纯依靠县議会的斗争不可能达到目的，宣誓說，“我党以顛复自由的公敌——专制政府、建立民主議會政体为目的”，并相約在达到目的前絕不松懈同志間的团结，在苦于徭役的民众中間进行打倒三島的煽动和宣傳。三島發覺这种情况后，突然逮捕河野等人，并且得到了他們的宣誓書。东京的自由党中央也立刻派遣組織人員到福島县。八月，耶摩郡以及其他各村人民終于和平地召开會議，向知县提出停止公路工程的要求；因为这个集会遭到了警察的暴力镇压，民众方面也群起进行武装暴动。結果是民众失敗了，造成很大的牺牲。当时，福島县各郡的活动，各自情况不同，其中最激烈的地区，地主、佃农居少数，而以自耕农为多。（參閱“历史評論”四卷八号，下山三郎“福島事件記錄”）

一〇 秩父事件

——革命的新萌芽

如果自由民权运动有如福島事件一样使政治斗争与經濟斗争結合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要的是对地方政权进行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話，那么，整个运动将發展得更为强大。东北、关东、中国、四国、北九州各地成立了許多自由民权派的思

想团体和地方政治結社。这些地方大講卢梭和穆勒，竞相閱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研究理想的宪法。然而他們很少在农民和城市劳动人民中間进行活动。在公認自由民权中心地的土佐，自由党認为县議會是专制政府的裝飾品(这种看法本身是正确的見解)，拒絕参加。他們一致期望参加中央政权，这一点可以說是暴露出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大弱点。

自由民权斗争是农民(主要是自耕农)群众反对封建地租和征兵等专制主义政府的压榨的斗争，是以主張“如果能做到的話真想死勁揍警察的嘴巴”的“旧平”一流的群众为基本力量。但是控制领导权的阶级則为地主、资产阶级和身兼两种成分的人。他們从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的詔書里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

但是，对于运动的镇压和破坏却日見加剧，威胁的字句甚至出現在詔書中。在这种形式下，他們机会主义的本性增长了。

而且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是从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起，自由党的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間阶级的矛盾开始發展了。自从地租变为現金定額以后，米价每年一定上漲；特别是由于西南战争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影响，米价愈形上漲。这使地主和中等以上的自耕农得到大發其財的机会。为他們开辟了走向农业資本家或独立自耕农的道路。同时，反对横阻在这条道路上的高額地租，也是使他們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的經濟上的基础。这个期間中等以下的农民(占农民的大多数)出卖的米很少，甚或完全無米可卖，所以不仅賺不到錢，并且为物价上漲所苦；不过，虽然这样，比較起来还具有一定的安定性。

然而从一八八二年起，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發生全面变化，开始激烈的通貨紧縮。这打击了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地主、特别是沉重地打击了一般自耕农。捐稅方面，这一时期府县以

及町村的地方稅增加了，間接消費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酒稅）也有增無已。因为無力繳稅受到拍賣土地处分的，从一八八二年起增多，一八八四和八五年达于最高峰。农民向地主和商人借債，又因为还不起債款，遂被沒收抵押的土地。自由党領導階層的地主、豪农、手工工場資本家們也遭到增稅和通貨緊縮的打击。但是，他們能够把它大部分轉嫁到消費者和在他們驅使下的农民、工人的肩上。同时，他們还收买沒落自耕农的土地，出租給佃农。因为，这时再像数年前那样，采用西洋农業技术，投資于經濟作物，已不能取得像过去一样的利潤了。

因此，自耕农的沒落和农村階級的分化，并未向富农資本家和农村無产階級雇工兩極分化，而向半封建的地主和佃农或农業奴隶似的长工方面發展。自然，当时減輕地租的要求从地主、自耕农到佃农都是一致的，但是，如今矛盾方面比起利害的共通性更加强烈。日趨沒落的农民首先必然与村中的榨取者、統治者即地主階級尖銳地对立起来。

这些情况促进了自由党中央的机会主义。与此同时，这使激进的黨員更形激进。天皇政权的压迫愈加重，这种差別發展得愈大。同时，地方黨員掀起了加波山事件等多起孤立無援的武装暴动。而且，这些暴动只是少数同志們所發起的，并没有組織和动員那些沸騰起来的迅速沒落的小农以及老佃农或雇农的計劃。并且在征集資金的时候强取豪夺，犯案后未被列为政治犯而被判处强盜罪，这种悲剧，一再發生。这种情况的發展，使党中央的干部逐漸丧失領導力量，松懈起来，終于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十月解散了自由党。失掉統一領導机构后，日本最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企圖也遭到了挫折。

自由党解散不久，埼玉县秩父地方爆發了以沒落小农和萌芽状态的無产階級为主力的大規模暴动。从前一年即一八八三

年起，关东地方北部（即从现在东京都三多摩地方西至甲府，并至埼玉县北部，由此再转入群馬县境沿信越铁路延至长野县一带，这是十八世纪末叶以来不断发生大规模暴动、改革世間暴动的地区），农民在极度不景气中負債累累，丧失了土地，自己称为“借債党”或“穷民党”，向高利貸进行反抗。这虽不具有“党”的严密組織，但值得注意的是貧农、半無产階級总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組織。这个地方是养蚕、紡織地带，对市场情况的变化最为敏感，因此过去也发生过許多次大规模的捣毁暴动。它們都被政府有计划的紧縮政策（这是剝夺小资产者的財富以实现資本主义化的手段）击潰了。而且，这里的农民大部分从事养蚕、紡織，或在紡織手工工場里劳动，比一般农民見識广，容易团結起来。

自由党左派党员——非負責干部——领导了这些民众。这与过去突發的改革世間暴动大不相同，它把問題提到思想上和政治上来。这就是說，攫取高昂地租、强迫壮丁入伍的政府，理应照顧人民的利益，然而不去这样做，因此，大家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秩父地方的“借債党”、“穷民党”的农民們，时常集合起来向高利貸者要求分年偿还債款，但是，不仅遭到高利貸者的拒絕，并且被警察出面驅散集会。秩父地方的农民們向秩父郡公所提出要求分年偿还債款的請求書，郡公所認為無法接受这种要求，加以拒絕。于是又和村长进行談判，但也未被接受。

这样，到了一八八四年，市場蕭条更加严重。唯一的希望是等待秋茧行情的好轉。但是这也落空了。事态已經發展到無法生活下去的地步。群馬的自由党领导人宮部襄的学生、农民井上傳三等准备从八月掀起分年偿还欠債、学校停課三年、杂稅村費減半的群众运动，請求宮部的朋友、秩父的賭棍头子（这时也是累于債務的农民）田代荣助帮助，再三要求由他出头领导。农民們在售茧市場上或在往来的途中互相傾訴飢苦，要一齐去悬

求高利貸者，于是三五成群地到高利貸处进行了談判，但是沒有成功，并且还遭到了警察的鎮压。

这些合法、和平的运动均告失敗后，只好訴諸武力了。在井上傳三等誠懇請求下，田代榮助終于决定举事。井上傳三于九月二十日到自由党本部訪問大井宪太郎，把秩父山中将要揭起革命义旗的計劃告訴他，請求他支持。大井表示反对。他派自己的屬員氏家直国代替自己到秩父去，劝他們中止暴动。因此田代等一时也傾向于停止暴动的意見，但是群众的情緒却一天天激昂起来。最后，氏家也被打动了。九月三十日，乃以田代、井上为中心，决定掀起暴动，除了要求分期四十年还債、停办学校三年、減輕公稅村費以外，还追加反对征兵令的問題，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准备。

十一月一日清晨，四方的农民扎上白头巾和白袖带，拿着猎槍、刀、竹槍等物，各自武装起来，到吉田村棕神社集合。于是暴动开始了。埼玉县警察署立刻派遣一队警察赶到吉田村，人民群众在下吉田村迎击，击毙两名警察。随后，群众占領了下吉田村村长办公处。当夜，編組了部队，以田代榮助为总理，石田村的加藤織平为副总理，在各村編組小队，并統編为两个大队。以井上傳三为财务負責人；此外，还規定各种职务，制定軍紀，比起沒有秩序的暴动，面目煥然一新。

一日夜間，从棕神社出發，搗毀各地高利貸者，燒毀借据。二日早晨进入大宮乡，占領警察署和区法院，然后在郡公所內設立了指揮部。大宮的高利貸者，或被搗毀或經談判減免了貸款，并且供給軍粮。当日傍晚，参加暴动的有七、八千人至一万人之多。这时，粮食已开始感到不足。

第二天(三日)早晨，政府的鎮压軍(总計为三个宪兵小队和一个步兵大队)迫临大宮。从当日至四日，在各处掀起了战斗。

四日，人民軍的主力被击潰，一部分轉入群馬县南甘乐郡，另一部分轉入长野县佐久地方。他們和当地民众一起向高利貸者和警察展开斗争。到十日，悉数被軍隊和警察鎮压下去。田代于十四日在埼玉县黑谷村被逮捕，加藤先于六日被捕于东京。井上傳三逃掉了。他們經审判后被处死刑。

秩父騷动是农民暴动最發展的形式，因此，它又是有別于一般暴动的嶄新的、人民斗争形式的最初萌芽。所謂嶄新的形式是什么呢？这就是工人、农民与全国人民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掀起武装暴动，打倒剝削階級，剝夺他們的权力的真正的革命。但是，秩父事件以后，这种斗争并未直綫地向前發展。在此以前，人民还必須經過曲折的、艰苦的、同时又是充滿希望的道路，學習許許多多的經驗。

一一 佃农爭議的爆發

——平分土地的思想及其斗争

明治初年約占全部水旱田地三分之一的佃耕地，从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明治十四——十五年) 逐漸增加，至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 近半数水旱田已变为佃耕地，这一点已为众所周知。勿庸解釋，这意味着土地不断地集中到地主手中，而無地的佃农在不断增多。以新潟县蒲原平野某地主为例，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原有二十五町六反土地，至明治十年为一百五十三町八反，明治二十年为四百四十町五反，明治三十年为七百七十町二反，明治四十年为一千零十三町四反，增殖速度实在惊人。这些数字粗粗看来枯燥無味，但在它們的背后，却有多少农民为了不得不放弃祖傳的土地而流下悲痛的眼泪！

从明治初年至二、三十年代，农民以惊人的趋势纷纷破产。与从前租税同样沉重的地租，连点心、酱油都要课征杂税，明治十四年以来粮价的猛跌，由于廉价的外国商品的侵入而使棉、糖、盐等有收益的经济作物及纺织品等农村家庭工业的崩溃，——这些因素重叠交集，使生活日益窘困，欠债日益增多。在“生活无路可走，许多人赖树芽草根充饥”（明治十八年五月“东京经济杂志”）的状态下，比生命更重要的土地，也不得不一片片地送入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尽管统治者从将军、领主更迭为天皇，但是，佃农仍须把一半的收获物交给地主老爷，自己的生活却愈加贫困了。

长塚节的著名作品“土”（明治四十三年）中描写了鬼怒川畔一个贫苦佃农的悲惨生活。互相爱慕而结婚的妻子，堕胎失败，她那年轻的生命将告終了，就在这极端悲痛的时刻，他还不能忘怀自己担心的佃粮。为了养活一家，对任何劳动都不发一句怨言，不得不靠着地主老爷的恩情去做短工，甚至还不得不去偷窃树根和玉米。那是“只要腰包里能够经常有一块钱就无所抱怨”（“土”）的贫困的生活。但是，为了这一块钱，或者把女儿送进纺纱或织布的工厂，陷入“女工哀史”的悲哀境地，或者把儿子送入矿山、煤矿的牢房或城市工厂去做工（当然，这就是低工资的源泉），或者当孩子还小的时候，自己就不得不在“丈夫变为长工在地主家里当牛马，妻子眼望着身边哭泣的孩子拼命地编席子”（横山源之助：“日本的下层社会”）的状态下，在地主手里做农奴式的劳动或从事收入菲薄的家庭劳动，熬煎自己的身体。那正如夏目漱石在“土”的序言中所说，“过着近乎牛马的可怕的最贫困的生活”，这些贫苦的佃农是“既缺乏教育又无教养，只是活在地上，同土地一起生长的蛆虫一般的可怜的百姓”。

地主在榨取佃农中积累了财富，他们成为农村的统治者，高

高在上。米价的上漲使他們的收入源源增加，法律清楚地保障他們征收佃租和任意收回租地的权利，他們作为构成国家权力的要素之一，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明治二十三年召集的第一届国会里，三百名議員中竟有一百二十九人为“农業者”、即地主，其后一直占据議員名額半数，同时，作为高額納稅人享有互选貴族院議員資格的人，也約有半数为地主所占据。这証明，带有土臭的地主，与旧公卿、大名以及發散銅臭的新兴財閥資本家并列，成了天皇制国家的統治階級的一翼。

这样，农村里分为地主与佃农两个敌对階級。自耕农处在两者之間，虽然幻想上升为地主，但实际却一步一步沒落为佃农。一方面是，周圍环繞着自古不变的高大的树林，一到秋天滿装着佃粮的沉顛顛的口袋接連不断的送进雪白牆壁的倉庫里和寬闊的宅第，里面寄生者过着享受“田园風光”的悠閑生活。另一方面則是，“近乎牛馬”、“蛆虫一般”的佃农的生活。这种对照一天比一天清楚突出。

但是，佃农并非永远生活在“蛆虫一般”的境遇里。尽管受到貧困的压力，慑于地主的眼色，卑屈不安地依附于少量的土地上，他們中間也經歷过几百年米向苛政和压榨进行勇敢斗争的农民暴动的革命傳統。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来，似乎消沉了的农村又紛紛閃动着将發展为巨大的农民斗争的火花。它們大体与工人运动的勃兴同一步伐，明治三十年代以后大放光輝。以佃农为农民运动的主要角色的时代到来了。

佃农单独与地主(或政府)进行的斗争，在明治初期的斗争中可以見到一些。例如，明治十年富山县礪波郡的騷动，在填制地契登記簿时，要求把实际耕种土地的佃农列为“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明治十五年鳥取县八东郡的騷动，要求減輕佃粮、免納佃粮，进而通过決議，于地主收回租地的时候，一致拒絕佃用該

地主土地或給他做短工。但是，在地主也因沉重的租稅与农民建立統一戰綫的当时，这些佃农斗争还未被推至历史舞台的前面。及至明治二十年代，地主、富农完全背叛自由民权运动，徹底投入明治政府怀抱，地主的統治充分控制了农民階級，从这以后，佃农对地主的斗争始轉为农民斗争的主要內容。

一八九〇年(明治二十三年)粮价暴漲，长野县的飯田、新潟县的柏崎、秋田县佐渡的相川等地暴發了“米騷动”。其中以相川的騷动最有組織，相川町的貧民与金山的矿工群策群力地襲击了粮食囤积商人和平日不得人望的好商；但是，并無絲毫掠夺暴行，在襲击囤积商人的家宅时，还特地派人到隔壁去安慰群众不必惊慌，叮嘱注意灯火勿使惹起火灾，行动很有秩序。因此，一般市民紛紛举炊敬酒，使警察也無力干涉。这种有秩序的斗争使政府大感惊惶，費尽力气才从新潟調来軍隊镇压下去。同时，爱知县丰桥男女老少数百人冲入警察署，一面提出要求說，因为無法活下去請求默許四处行乞，一面連日拥向郡公所，要求保障生活，展开富于創造性的战术。

在一八九〇年，三重县川口村还組織起战斗的佃农組合。該村一百几十名村民組織了佃农的同盟組織“徹交社”，制訂規章十数条，决定同心合力爭取減輕佃粮，如果获得減輕，将提出百分之六十归还佃农，其余百分之四十作为同盟基金。这种佃农階級組合的出現，使官僚恐惧到如何程度，从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如下消息即可了解：“內务大臣鑒于官厅报告所述之結社蔓延全国，使地主倍受佃农胁迫，实难預卜流毒遺患，業于一两日前飭令該社解散云云。”

繼而于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八月，爆發于富山市的“米騷动”，亦波及新潟及北陸一带地方，进而向佐賀、高松、长野、丰桥、山形等地，在全国範圍内扩展起来；这一年也是佃农对地主

进行斗争最活跃的一年。当时报纸用“农民暴动大流行”一类的标题，报导了这些动向。例如，山形县东置赐郡小松町两百五十多名农民集合起来，通过决议，要求本年度每反地减轻佃粮一草袋，如果地主拒绝这项要求时，来年拒绝佃种，并且如果有人私下承佃，每反将处五十元罚金；香川县阿野郡加茂村也要求按照旧藩政府的标准减低佃粮，如果要求遭到拒绝则交还租地，并且对于违约者采用全村与其断绝往来作为斗争战术。同时，还在加茂村成立了“人道会”，在橿木县足利町成立了“贫民共党组合”。这些名称各异的持久性佃农斗争组织的成立，也说明了佃农斗争的成长情况；不过，它们还只是局部的、自发的组织。

在前文引用的“七”的序文里夏目漱石也提到，不应忽视，“过着这样生活的人，和我们并存于同一个时代，并且居住在距离帝都并不遥远的农村里，这一悲惨的事实，紧紧地抓住了人们的心”。但是，明治三十年以后，与通过日清、日俄两次战争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资本主义相对照，农村的落后、农村的疲敝愈见显著。逐渐扩大的寄生性土地所有的集中，由于间接税和负债所引起的自耕农的“崩溃陷落”（社会主义者田添铁二语），使各阶级不能不注意到农村问题的尖锐化。“农村问题”和“保护小农问题”成为时代的问题。地主为了替压低地租找借口或者从维护收取佃粮的来源的意图出发，也喊叫“救济农村”和“保护小农”；当时开始抬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阵营，也开始认真地注意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了。曾是自由党左翼的健将大井宪太郎于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创立“大日本劳动协会”时，曾组织“佃耕条例促进同盟会”，打算开始参与农民运动，也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之一。与片山潜共同致力于社会民建党建党工作的西川光次郎认为，“救济农民的根本方法是什么？就是使耕者有其田，就是保护土地的实际耕种者，消灭凭着地主的空头衔坐享衣食

的人”。他提倡“土地國有論”，并且說，即使实行土地國有，如果不实行社会主义也無法真正解放农民，因此主張工厂工人与农民的團結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李德秋水也駁斥了地主及其代言人提出的所謂“地租減輕論”和“全廢論”，他說“他們（指最貧苦农民）收入菲薄，并不是由于地租沉重，难道不是因为需要耕种的土地的数量太少嗎？难道不是因为这些数量过少的土地分配得不公平嗎？分配得不公平，难道不是因为游手好閑的大地主非法壟断土地的緣故嗎？……要救济这些小农首先應該增加耕地的数量！要增加耕地就應該先斗争大地主！我們應該立刻發動全面廢除地主的大运动！我們只有發動土地公有的大运动！救济全体农民的根本办法只有这一条！”他这样提出了土地公有化的主張。

这样，随着农村疲敝情况的發展，在有关土地問題的各种解决办法紛紛提出时，出現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嘗試，它不停留在理論阶段，而是想进一步發展到實踐运动的阶段。那就是宮崎民藏的“土地均享运动”。

“有一件关系到我們生活运命的大事想和全国同胞談一談。这就是原来应由世界上每个人一律同享的东西，因为某些人过分享有和揮霍，以致另外一些人就得不到适量的滿足，过着委屈貧穷的日子。这就是我們和諸位必須共同協力坚决爭取一律享有的。这不是别的，就是我們大家为了生存絕對必需的土地。……”——这是“土地复权同志会”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布的呼吁書“告全国同胞”里的話。这个呼吁書指出，人間最重要的权利是不等地享有由“天道自然之力”而生的土地；但是如今土地兼并的情况却在迅速發展，佃农“虽然日日辛勤劳动，流血流汗，过着乏味的的生活，也不能从貧穷的束縛中解脫出来”。因此，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恢复天賦人权，必須起来爭取重

新平等分配土地。在这个呼吁書的后面，还附有一首“土地十謠”。它从：

头一年啊，不論富和貧，同样都是人；

开始，唱到：

第六年啊，寄生大地主，拚命收地租；

第七年啊，土地不到手，佃农無枝栖；

最后的結束是：

第十年啊，土地得到手，世界变乐土。

从文章的体裁上，也可以看出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这一运动的性質的一端。

土地复权同志会以“恢复土地的平等享有、奠定人类独立的基础”为目的，由宫崎民藏于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創立。宫崎民藏生于熊本县荒尾村（今改为市）的在乡武士之家，长兄八郎是与中江兆民等有交往的自由民权派，西南战争时投入西乡一伙而战歿。民藏深受长兄思想的影响，有感于贫穷已極的佃农和坐享佃租的地主的生活之間的深刻矛盾，年青时代即热中于閱讀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者亨利·乔治的关于土地問題的著作，但是，他在思想上最后認識到的却是与乔治并不相同的“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土地均享”的思想。

提出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給农民的思想，并不是从宫崎民藏开始的。远在一八八六年，大井宪太郎發表的“时事要論”里就主張重新平均分配耕地和禁止典当土地（即禁止地主、高利貸者自由兼并土地），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还發生过“神代复古請願运动”，要求恢复到与“神代”时期一样，把土地平均分配給人民。这是小林与平所倡导的，他在东京、广島設置办事处，企圖广泛开展請願运动，形势發展到“以極似社会党的主張进行宣傳，获得許多貧民的贊同”（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东京日

日”新聞),使当局不得不倉惶地采取禁止結社的处分。民藏也在前述呼吁書中說:“請看,天智天皇时,不就是那样(均分土地)的么?”借着土地私有制出現前的古昔情况提出均分土地的思想,有力地反映出沒有土地或仅有少数土地的日本貧农内心深处潜在着希望获得土地的强烈願望。

土地复权同志会創立后經過了一个时期,从一九〇六年开始活躍。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三月,民藏的主要著作“土地均享乃人类之大权”出版了,同年至次年明治四十年,民藏与几位同志赴东京时,順便在山梨、长野、新潟、大阪、奈良以及中国、九州各县农村进行巡迴講演,获得許多支持者。

当时适值各府县推行谷物檢查制度。地主对于府县檢查不合格的粮食拒收为佃粮,或在規定的佃粮以外收征罰粮。檢查制度制定以后,包装变得整齐了,按照質量訂出了等級,取得購粮人的信用,交易易于进行,这对大量出售粮食的地主很有利;但是,对佃农來說,为了繳納合格的粮食,必須在脫谷碾粮时多化工夫,而且他們自己出售的粮食很有限,得不到檢查制度的好处,徒然增加了負担。但佃农方面也决不是一成不变地順从地主的無理要求。佃农对于拒收次粮和征收罰粮等已不能繼續忍受,因此各地不断地爆發了佃农爭議。“蛆虫一般”的佃农对地主的斗争,也逐漸活潑起来了。

民藏等人的巡迴宣傳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收到相当的效果。土地复权同志会剛剛成立时,所有會員几乎都是知識分子,通过这次巡迴宣傳,正如在山梨县市川大門町吸收三百名佃农集体入会的記錄一般,运动逐漸得到佃农群众的支持,在群众当中生了根。但是,就在取得有如报纸所报道的“如今这一主义的潜势力已具有不可輕侮的力量”的同时,遭到了照例的鎮压。在市川大門町的活动,被警察當場沒收規章,勒令解散。一九一〇

年(明治四十三年)發生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的時候,因為被告人之一松卯一太與民藏過從甚密這一點成為鎮壓的絕好借口,民藏遂逃往朝鮮,同志會陷於自然消滅狀態。民藏感到孫文的“平均地權”的思想與自己很接近,後來赴中國,和變成“支那浪人”的弟弟寅藏(滔天)等在中國辛亥革命的幕後大肆活躍;其後,長期留居中國,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因病返國,不久以六十四歲的年紀逝世。

民藏的思想並不徹底。作為沒落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的軟弱性,表現在以下這些方面:他認為無償沒收土地、土地國有化“未免過火”而表示反對,贊許土地贖買方式;他陷於陳情請願運動的方法而未能組織佃農對地主進行直接鬥爭;他未能成為社會主義者而帶有強調個人自由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傾向。因此,他領導的運動未能向團結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運動合流的正確方向發展,孤零零地在“大逆”事件鎮壓的風暴下潰敗了。

但是,在他的土地均享的呼聲里流露出佃農渴望土地與自由的無聲的願望。其後不久,以來騷動為轉機的工人運動的高漲,引導它變為巨大的聲浪,瀾蔓了農村。

不過,我們仍應該先回顧一下這個時期里難於忘怀的先覺,以及在先覺引導下日本農民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

一二 礦毒事件和田中正造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泡影

從環繞中禪寺湖外圍的山巒中發源,流過赤城山麓,經過以絲織品知名的桐生町和足利町,在關東平野中心與大川根匯合

的渡良瀨川，它是把自然的恩惠慷慨地賜給沿岸各村的河流。它从上流山間運來肥沃的土壤。由於它的恩惠，農作物得到丰收。河裡豐產鮎魚、鯉魚、鯽魚和鱸魚。

從一八八〇——一八一年（明治十三——十四年），這條天然富饒的河流變為可怕的毒河。河裡不再有魚；沾了河水，手指縫就糜爛。到明治二十年代時，這條河造成的災害無人不曉。洪水沖來的土壤，過去是天然肥料，如今卻變為摧毀農作物的毒土。這種土重疊幾層以後，連雜草也不生長。洪水不斷發生，毒土的胎害也隨之激增。被毒土掩復了田地而被奪去收穫的農民，把毒土鏟起來集中於一處，堆成土堆，企圖避開災害，但這種措施也未能使收穫恢復原狀。過去豐收的耕地，如今隨處可見像墳墓一般的淒涼的土堆。稻子、麥子、菜種都不結穗，桑樹也枯干了。沿岸的人們過去引以為豪的粗壯的竹子，如今干枯得隨手即可拔起。

被奪掉收穫的農民遭到飢荒。此外，毒河還威脅人的性命。母親斷了奶水，孩子們消瘦了，死亡率驚人地增長。一個個村莊變得荒蕪了。許多人拋棄可愛的家鄉漫無目的地逃亡他鄉。過去是各村的幸福源泉的渡良瀨川，如今變成是化農田為荒地、縮減人的生命的災難的河流。被“毒河”渡良瀨川加害的地方，至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時，擴展到礪木、群馬、茨城、埼玉等四縣八郡，達三萬八千町步。

這種天變地異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因為河流的源頭是尾銅山流下的礦毒所致。歷史悠久的尾銅山從明治初年轉入古河市兵衛手中以後，規模突然擴大了。尾銅山的廢礦石、礦坑水把毒質帶進渡良瀨川，冶煉廠的黑煙和濫伐森林把山搞成淒涼的禿山。落在光禿禿的山巒上的雨，不容喘息地流入渡良瀨川的谷底。山巒間匯集的水變成激流以排山倒海之勢挾帶含有毒

質的土砂流下，越过堤防，冲破堤防，把毒土运到耕地里。

足尾山帶給渡良瀬川沿岸农民如此可怕的灾害，古河市兵衛却毫不关心。不管沿岸农民怎样痛苦，古河市兵衛却絲毫無动于衷。而制止矿毒灾害是要費錢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是“从头頂到脚尖，每个毛孔都冒着血和污物生长起来的”。正如所言，因主人小野組破产而落魄的古河市兵衛，以足尾山为依据，后来竟至身列財閥队伍之中，这段历史也是沾滿了“血和污物”的。市兵衛的养子潤吉是明治政府要人陆奥宗光的次子；与权貴結下亲戚关系的市兵衛的企業，也就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顧。譬如，他以每町步一元錢左右的低廉無比的代价把足尾附近七千余町的山林从政府买到手里。为了做矿井的架木，濫肆采伐山上的树木，使山变成了秃山。从而引起河流的泛濫，結果，为了治水工程从国庫支出了近一千万元的經費。市兵衛从政府廉價購買山林，攫取了暴利，但它所留下的后果却是讓全国人民用重稅——达到千倍以上——来弥补。古河市兵衛的資本家的財富，在与当代权势相勾結而获得的各种有利的权利和对足尾山的工人进行無情剝削的基础上迅速地积累起来；这种無情的剝削甚至無可避免地引起被列为日本工人运动的烽火之一的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足尾山大暴动。同时，由于市兵衛飽吸利潤后播散的毒質殘渣，渡良瀬川沿岸农民的祖傳水旱田地变为不毛之地，自己变成一無所有的無产階級，做了張着血盆大口的、貪婪無厭的資本家的牺牲。

“这样严重的事件政府全不知道，甚至不明白矿山規則。請問，政府都到什么地方去監督了呢？監督旅費應該用在哪兒呢？大臣們都注意了什么呢？矿业条例写了些什么？日本矿坑法里写了些什么？好好睜开眼睛看看吧！如果不会念，我可以念給你們听！”

不管古河市兵衛可以得到多少利益，难道看不见负担着纳税义务的人民、祖辈相传定居在沿岸地方的人民遭受到那样的毒害么！看不见这样显著的事实，念不懂这样清楚的规则，成何体统！你们尽可以进行答辩啊。”

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栃木县选出的改进党議員田中正造在第二届帝国議会的講台上，这样大声疾呼，質問了对矿毒被害事件視若無睹的政府。当时的农商大臣是与古河市兵衛关系亲密的陆奥宗光。他终于無法正面回答田中正造的質問。在田中發言后的第三天，討論預算問題时，政府与民党發生正面冲突，議會終被解散。对于田中正造在發言前提出的“关于矿毒貽害事件政府为何置之不問？政府是否打算援引日本矿坑法和矿业条例的条款停止古河的矿业权？”的抗議書，政府仅仅在官报上冷淡地答辩說：“渡良瀬沿岸灾害情况虽已肯定，但原因尚不清楚，目前正在調查中。据悉，古河方面已从德国、美国購进机器設法預防矿毒”。田中正造与渡良瀬沿岸农民們十余年的坚苦斗争之幕终于这样揭开了。

一八四一年（天保十二年），田中正造誕生于今栃木县安苏郡小中村的名主之家，一八五九年（安政六年）安政大獄兴起时，他以十六岁的幼齡繼承了父亲的职务。这位年青的名主不是充当領主榨取农民的工具的劣紳，而是作为农民的代表为农民利益而領導斗争的名主。当他看到領主六角家的財政，由于同商人勾結的官吏的舞弊而陷于混乱，領主却把負担轉嫁到农民头上去时，田中为了改革藩政、罢免貪黷的官吏，站在領内七个村七百多庄民的前头进行了不屈不撓的斗争。經過五年多的激烈斗争，当“彰义队”^①正在上野山間进行最后的抵抗斗争时，他終

① 田中正造当时領導的农民斗争队伍。——譯者

于被逮捕，在獄中受到殘酷的拷問。但是，他并未灰心喪氣。經過獄中十個月的鬥爭和對庇護領主的官吏的答辯以後，他的正確主張終於得到反應，貪黷的官吏被撤職了。田中正造雖然也在滋擾境內的借口下被判“驅逐出境”處分，但是農民的利益却因此得到保護。這是站在農民方面、終生與一切邪惡的敵人進行激烈鬥爭的田中正造的最初的表現。當時的田中正造猶是二十九歲的青年。

然而，從“六角家事件”以後，將近十年間是他最晦氣的時期。從村中被驅逐出境不久，他在岩手縣做了小公務員，在這里，他被憑空加上了殺人嫌疑的罪名，不得不在獄中度過了四年大可有為的歲月。但是，不久洗清了莫須有的罪名而返回故鄉的田中正造，經過十年隱伏之後，終於在政治舞台上顯露了頭角。當時適為自由民權運動達到最高潮的明治十三年二月，他在安蘇郡縣議會補選議員時，得到最多選票而當選，立刻一躍而為橈木縣里自由民權運動的中心人物。鎮壓自由民權運動和挑起福島事件的主謀人三島通庸做了橈木縣令後，依舊不變地肆行暴政，對此，田中毫不放鬆地進行了鬥爭，這使他的名聲顯赫全國，得到了“橈本鎮台”^①的綽號。被稱為“土木縣令”的三島，在橈木縣仍要大興土木，建築縣廳和修築公路，以之奴役人民。就在舉行縣廳奠基儀式那天，田中正造站在俯視縣廳的高崗上，以魷魚干作酒肴，飲着冷酒，大喝一聲：“混蛋！”由此集聚的群眾紛紛大膽地開始攻擊三島的胡作非為。田中正造在縣議會集結了反對三島的陣綫，三島把他投入獄中，但是，三島終於在全縣一致反對下被撤職。正造一躍而為打倒三島的英雄，不久被擢為縣議會的議長，於明治二十三年第一屆大選時從容當選。

① 鎮台即鎮守一方之兵營。此處借喻其為庇護橈本人民利益的人物。——譯者

在为了人民和正义的斗争中得到锻炼的田中正造，以明治二十三年的洪水事件为开端，率领奋起的农民，由于可爱的故乡的荒蕪和农民的苦难，全身燃起了愤怒，与古河市兵衛以及和他勾结着的藩閥政府冲突起来。

但是，斗争并未直捷地燃烧起来。思想单纯的农民还相信着古河方面的“今后将装设矿毒预防机器，决无问题”的欺骗。古河方面利用金钱的力量收买县吏、警察以及县议会议员等人，利用他们去击破农民，并且还以每反一元至二元的菲薄代价强迫农民约定今后不再提出任何不满。田中正造后来虽然三次在议会上提出矿毒问题，都因解散议会或政变未能向政府追问到底。

但是，矿毒的灾害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发严重起来。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大洪水又袭击了沿岸的村庄。受了古河的巧妙欺骗的农民猛然醒悟，从内心深处涌起强烈的愤怒。不进行斗争，只有毁灭！青年们最先奋起了。青年们在沿岸各村里逐村举行講演会，各村的动向不久都一致集中到查封足尾铜山矿业的巨大呼声上。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各村有志之士集于受灾地区的中心渡瀬村的云龙寺，讨论了今后的斗争。不久，云龙寺的山门挂起“查封足尾铜山矿业请愿办事处”的牌子，渡良濑沿岸各地逐渐地站起来了。

新年到了，吃不起年糕；没有力量给孩子买一双木屐，生活穷困到这种地步。于是，他们蜂起群拥地到东京去请愿。最初约为两千多人，途中遭到警察的阻难，三月三日清晨，拖着疲惫的身躯倒在浓霜掩复的日比谷原（当时尚未建为公园）的，仅剩下八百人左右。代表们向贵族院、众议院国会两院议长和外务省（外交部）去请愿。到外务省去，是因为传闻古河以矿产停办后无法履行向英国输出铜矿的合同为口实，曾唆使英国公使

对农商务省（农商部）施加压力。代表以外的人被驅出了日比谷，不知什么时候齐拥到农商务省来，挤满了院子。虽然警官在驅逐，但是他們坚决要見大臣，抵死不肯移动。他們听說大臣公务繁忙無暇接見，就喊着說他們是抛开一切工作赶来的，要求供应午飯。曾經馴似綿羊的农民，当他們瀕临死亡的边缘，絕不考虑讓步了。

經過整整一天爭执的結果，終于得到答复：当时的农商务大臣榎本武揚将于第三天（五日）接見代表五十人。那一天，代表們流泪述說各村实情，許許多多悲慘的講話，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曾經在五稜郭地方作战的勇将的心。

自从最初的大举入京以来，情况突然有了显著的进展。由于对田中正造的奋斗深怀敬意的农学家津田仙、律师高桥秀臣和基督教界的先觉松村介石等人的努力，在东京举行了矿毒問題的講演会，被目为貴族院长老、拥有巨大势力的熊本籠城老將軍谷干城也受到他們的影響，亲自赴灾区視察。当他亲眼看到惨状后，也变为很了解矿毒問題的人。在这种影响下，榎本农商务大臣也微服到灾区視察。

一方面，在受灾地区的各村，警察对請願运动的干涉愈益激烈；农民的斗争也發展得更加根深蒂固。自耕农和佃农、富农和貧农，在蒙受矿毒灾害的情况上毫無区别。本来，在沒有矿毒时，勉强糊口的佃农、貧农与地主、自耕农比較，前者自然穷困得多；但是在被矿毒毀掉生活依据这一点上說，不論是誰，村民的利害都是一致的。因此，尽管地主、富农中也出現了背叛本村利益、接受古河方面的賄賂来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但另一方面，村长、村吏、地主中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人也很多，斗争吸引了村中各阶層的人。卖身給古河充当走狗的人被目为叛徒驅逐出去，村民在古河以及与他勾結的中央和地方的統治势力面前，統一

了坚持斗争的意志。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于三月十八日发表了对于前一天田中正造提出的“抗议书”的“答辩书”，这份毫无诚意的“答辩书”更燃起农民的怒火。农民们从二十二日夜开始集合于云龙寺。他们下定坚强的决心：“当局毫无诚意，只好在农商务省的院子里吊死了。”在云龙寺正殿插盟后，一队人乘船沿渡良濶川顺流而下动员沿岸各村，一队人去向古河的党羽们提出抗议。无数火炬映照在渡良濶川上，和赶来的警官厮打在一起的农民的影子幌动着。当夜一度散去的农民在第二天（二十三日）夜間（正是视察归来的榎本到外相大隈处进行协商的时候），听到敲钟的信号，二十人一群、三十人一伙地集合到云龙寺里，数达四千人。早春的黑夜临近破晓时刻，他们挣脱警察和县议会议员在京委员的阻止，一拥而出，其中两人赤身跳进汇集融化的雪水汹涌流着的利根川，找到了警官匿藏的船只，顺利地渡过河，步步逼近东京。当时，在东京，田中正造站在国会的讲台上大声疾呼：“这是决心要在关东中部新制造四万町步以上的沙漠地带作为藩阀末路的纪念品吗？这简直令人不能容忍！要干你们就干吧，坏事情干开了头你们索性干下去好了！我们自有我们的手段！”街上正响起震耳的铃声，叫卖报导閣議决定在内閣中设置足尾矿毒调查会的号外新闻。

矿毒问题进入了新局面。农民们对于正造的发言和閣議的决定一无所知，冒着霜夜露宿的严寒，与宪兵警察的佩剑战斗，甚至有几个人负了伤。尽管多数人在中途被受到阻止，他们仍一直向前挺进。到达东京的代表在国会前面散发传单，二十七日，会见了榎本农商务大臣。榎本含泪倾听农民的陈诉，于第二天（二十八日）突然辞职，遺缺由大隈外相兼任。

以法制局局长神鞭知常为委员长，由有关各省（部）的局长

以及农、工、医各方面学者为委员的調查会作出結論以前的时期，是运动的最重要的时期。輿論也趋向活躍，譬如，用狂歌^①的形式譏諷說：

“說來說去，銅矿的毒，
比不过黄金的毒。
銅也罷，矿也罷，束手無策的农商务省，
还不如改名为銅商务省。”

（一八九七年四月二日“讀賣”）

此外还有的报刊發表“矿毒之詩”（作者或为岩野泡鳴）：

“如果天地真有神仙，
請傾听人們的嘆息。
从几百万只眼睛里，
流出了含毒的眼泪。
那憂伤普遍的情况，
讓渡良瀬川来反映吧！
虽然河水清瑩徹底，
却看不見跳动的小鮎魚。”

（一八九七年四月八日“讀賣”）

这些都是对受灾农民方面有利的动向。但是古河方面的收买和反宣傳很厉害，大肆宣傳說：“农民夸大灾害企圖勒索，田中正造是煽惑农民圖謀私利的騙子手。”現地的警察干涉愈見严厉，对闖进叛徒家中兴师問罪的人依侵入住宅罪予以逮捕，举行講演会时中途打断講演或强迫解散，并且特別从东京增派宪兵到該地来。田中正造及农民代表为了对調查会施加最后的压力，拚命地东奔西走。

① 狂歌是流行于江戶时代中期以后的通俗的民間歌謠，文風幽默滑稽。——譯者

五月二十七日，終於以東京礦山監督局局长的名义向古河市兵衛發出預防礦毒的命令。命令长达三十七項，相当严重，虽然这距离促使足尾礦業停歇的目标犹远，然而却使以往对“預防礦毒”問題明知不做的古河大感头痛。

于是，农民間产生了大为安心的情緒，对待始終坚持要求完全达到目的的田中正造稍有敬而远之的态度，也在意料之中。

“灾民已出發，达一万余人。”——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田中正造在東京宿舍的病榻上接到上述电报，刹时間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并不是意料外的事情。同年九月初的大洪水，非常严重，几乎夺去了对預防礦毒命令的效果空抱期望的灾民的全部收成。灾区里充滿了群情激昂的空氣。

田中正造連續接得报告前进情形的电报，深夜急忙乘人力車趕去迎接途中的灾民。二十七日清晨，在埼玉县渊江村外遇到队伍的先鋒。在上地庙集合起来的人数，从出發时的一万人，經過中途的艰苦斗争，已減至不足三千人。他們看到正造，历历目前地回忆起途中的苦难，流着泪控訴宪兵、警察怎样蛮横地用馬蹄踐踏露宿的人群。垂泪傾听了这些控訴以后，正造站在庙台上对群众說：“我很清楚地了解大家的痛苦。但是，为了顧全社会秩序，这許多人都到東京去是不妥当的。現任政府（一八九八年六月組成的宪政党大隈、板垣內閣）是民党政府，是我們的政府。因此，提出意見，政府就会明白。我一定在議會內外进行最大的努力。如果政府再不考虑，那时候我絕不再阻擋大家进京。不！到那时候，田中正造一定站在大家的前头一齐行动！”正造一面說一面落下眼泪，灾民們也哭泣了。临場監視的警官、宪兵的眼睛里也浮起了眼泪。灾民进京的念头虽然很难动摇，終於在正造的慰撫下选出五十名代表，其余都从这里折回

家乡。

田中正造是一位争取自由民权的卓越战士。当他的许多同志相继背叛人民趋赴权势的时候，他始终站在“人民的朋友”的立场。然而，他终未理解，只有人民的力量，只有人民的斗争才是促使自由、权利实现的保证；在矿毒问题上，保障农民利益的力量并不在议会和法律之中，而存在于农民大众自行组织起来的行动里面。他对于宪法、议会还抱有幻想。但是，现实却残酷地击碎了他的幻想。进京的代表们遭到“民党政府”大臣们的直截了当的拒绝，之后，正造的拚命奔走也毫无结果。他所寄予期待的“民党政府”发生内部纠纷以后，脆弱地垮了台，民党终于彻底投效了藩閥政府。田中正造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所依赖的一切都消灭了，遗留下的只有为穷困已极的灾地人民不息地进行斗争的斗志而已。

虽然在过度劳累里身心交疲，田中正造犹在议会中不息地进行着孤军奋斗。

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他在议会里大声呼吁：“因为有人接受恶人的钱，恶人才得利用最重要的军队和警察，滥用国库的钱阻挠请愿的道路。诸位，古河市兵卫在为所欲为地使用着我们国家的军队，为所欲为地使用着我们的警察。”就在这个时候，利根川畔正在进行矿毒事件发生以来最残酷的警宪弹压。明治三十年发布的修筑预防矿毒工程的命令，终于被故意延搁，矿毒灾害毫未减轻，忍无可忍的农民遂以空前的决心再次掀起暴动。十二日夜晚沿岸各村又敲起了警钟，云龙寺的院里几丛篝火立刻在严寒的夜空间高高地闪起了火焰。虽然警察已在夜里发出解散的命令，灾民并不理睬，大殿里发生了搏斗，甚至抛起了火盆，警察队无力抵抗，一度退却下去。次日十三日上午十时许，离开云龙寺向馆林町出发的时候，参加人数

已达一万二千名。指揮者是久野村长、稻村与一。堺村的村副野口春藏骑着馬，背上插着写有“南無阿弥陀佛”的白旗，率領了青年团两千五百人。鑒于前三次大举进京时，均在利根川被警察藏掉船只受到留难，这次用大車載河船两只，車前安装了几枝削尖的青竹。在館林警察署前一度發生冲突，其中数人負伤，正午到达利根川畔的川俣。这里守候着从附近一带集中起来的全部警察和数百名宪兵。农民方面企圖用載着河船的大車冲过去，但宪兵与警察猛然襲击农民队伍，掀翻大車，揮起佩劍，乱打乱踢，追赶逃散的人，口中罵着“这群土包子”，三、四个人群毆一个人，或把人扔进沟里，乱肆暴行。負伤者五十余人，連同站立不住的伤员，也都被他們用繩子捆起来，随身穿的衣服都沾滿了泥和血。虽然他們施行了这种暴行：“警官如此虐待人民的情况实为前所未聞”(下野新聞)，但六十八名农民却仍然以“暴徒嘯聚罪”被提起了公訴。

田中正造接获这个事件的消息，十五日又登上講台，滿面沉痛地說：“不懂得屠杀人民即等于自戕，这就是亡国的先兆。”政府仅用答辯書答复說：“質問内容不得要領，故不予答复。謹答辯如上。”

这次镇压打击了灾区的农民。古河方面占了上風，風傳凡是参加运动的人全部都囚入狱里，在农民中間丧失了斗争的意志。“事件”的被告被保釋以后避居家中再不出头露面，田中正造来到村里时，有人怕受牽連，甚至拒絕供給借宿的房間。

田中正造在“事件”后不久退出宪政党，次年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十月辞掉議員身份(其間，一九〇〇年末，“事件”第一次公审时，因为檢察官的公訴过分严厉，正造在旁听席上大声地打了一个呵欠，被控为侮辱官吏罪)。他对議會、宪法、民党寄托的幻想破灭了。甚至他所热爱不已的人民也被镇压得抬不

起头来。如今，可以信任的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了。

但是，“暴徒嘯聚事件”使那些原来以为矿毒問題由于一八九七年預防工程令的公布已告解决、其后只是田中正造故意滋事生非的人恍然大悟。当各种社会問題引起世間的注意、社会主义思想显著抬头的时候，矿毒問題广泛地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怀。許多著名律师担任了“事件”的辯护，赴現地視察的人亦見增多。学生們也开始举行視察运动，但是遭到政府的镇压。講演会的活动很多，其中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救济矿毒地区妇女会举行的第一次講演会盛况最为空前。而古河市兵衛之妻“为子”自杀的尸体被發現于神田川，正是講演会的第二天早晨。在举行第二次講演会时，当日犹是东大的学生的河上肇博士有感于被害地区的穷苦，尽数捐贈了自己的衣服（参見河上肇自傳第五卷）。变为資本原始积累对象的农民的情况自此广泛地傳遍四方，使許多人認識到現代社会的矛盾；它也成为培养当时逐渐活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温床之一。

第二次講演会不久，田中正造向天皇进行了直接控訴。十二月十日，幸临第十六届帝国議會開幕式的天皇一行走到日比谷时，他从参观队伍里跑出，喊叫說“有本啓奏”，向天皇的馬車冲过去。右手拿着的紙卷是前天夜里請求曾在“万朝报”上对矿毒問題抱着同情态度加以評論而文譽远揚的幸德秋水起草的直接上訴書。正造被赶来的警衛騎兵撞倒在道上，天皇的馬車若無其事地走过去。直接上訴是自感万策尽罄的正造想出的最后手段。这件事虽然使輿論更加沸騰，但是事情本身却未得到任何結果。作为自由民权战士的田中正造，虽然通过自己的斗争經驗和历史的發展，使自己的思想相应地得到不断發展，并且和逐渐認識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有着深摯的交誼，但是，在無产階級尚未展开正面斗争的历史阶段，他終于不能为自己热爱無

已的人民找到解放的正确道路而落于悲剧的下场。实行直接上訴的正造一度被拘押，但未被判处任何罪名，不久即被釋放。

正造直接上訴的次年，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的暴風雨，冲起渡良瀬川發源地的沃土，掩复下流沿岸的毒土，因而大大削弱了矿毒的毒害，十几年来，惊动全国的足尾矿毒事件無形消灭了。

直接上訴后的田中正造，不久因前次的侮辱官吏罪被囚入獄，在獄中閱讀“聖經”受到很大的影响，以后沉湎于宗教境界。尽管如此，他却定居在谷中村里，对于成为政府治理利根川的錯誤政策的牺牲和变为泛区的谷中村的廢村問題斗争到底，至死不疲地爭論治理利根川的問題。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九月四日，这位曾被河上肇博士誉为“看到如此义人真是畢生的幸福”的义人，以七十二岁的年紀离开了人世。

田中正造的“年譜”中，結尾处这样写道：

——“他泰然端坐在床上，由木下尙江托着背部，在夫人胜子的看守下，竭尽全身力量在喘息中逝去。时为午后零时五十分。有若太陽落入海面。当日黄昏雷雨交織，天地晦冥，稍后轉晴，星斗高耀，虫声唧唧。

遺物有管笠一頂、头陀袋一个，袋中收有‘新約聖經’一卷、日記三册、手紙和石砾少許。”

一三 “米 騷 动”

——威胁半封建地主制度的四十天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全国“期米”市場因米价暴漲停市。八月一日，东京蠣壳町交易所次月底交貨的期

貨暴漲七角七分，終以每石三十一元二角的高價而停市，公告停業五天。市內群情騷動。不僅逐日購糧維持生活的工人，連市民、農民也都陷于舉火待炊的境地。二日，寺內內閣宣布出兵西伯利亞干涉俄國革命，繼于三日向第十二師團發布動員令。同一天，美國也宣布出兵海參崴。這是日美兩國共同約定的行動。但是，在政府熱中于對蘇武裝干涉的時期，數月來繼續不斷上漲的米價，已成為國內激烈的內亂的導因。就在日美兩國于三日發布動員令的這一天，爆發了富山縣中新川郡西水橋町的漁民婦女的米騷動。第一次肯定米騷動在日本民主主義革命運動史中具有一定地位的，是片山潛。根據片山潛的論文“第一次大戰後日本革命運動的批判的總觀”，關於從富山縣漁民主婦們開頭引起的群眾行動，曾這樣寫道：“米騷動是在大正七年八月三日發生于富山，九月七日以大宮的騷動而告結束。在這三十六天里，延及東京、大阪、京都日本三大都市以及一百八十八個市町、三府三十三縣，達全國四分之三地區，至少有一千萬人口被卷入這一騷動中。日本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暴動。這次的米騷動顯然是日本民眾徹底覺悟的最初的激烈的開端，可以視為現代革命運動的爆發點。這一革命運動從米騷動的剎那間獲得了十倍的力量。”

這次騷動，的確是較之過去的一切自由民權運動以及所有的農民暴動和反抗超過數百倍的嚴重事件。這不論從它以城市勞動者為主體這一點或從它成為以後工農運動組織發展的基礎這一點看，均為劃時代的重大事件。

這裡，尽可能簡單地把從八月三日開始延續了一個多月的米騷動的情況介紹如下：

“時間是八月三日。酷熱的一天已近黃昏，炙人的夏季太陽沉入日本海的灰色海面。黃昏籠罩起家家戶戶時，街頭突然响

起惊人的警鐘声音。”——片山潜曾作了这样描写。早在七月二十二日，下新川郡魚津町的漁民主妇們，即認為米价上漲是受了粮食外运的影响，互相商議阻止把粮食装到汽船上去。二十三日，四十几名妇女“恳求”阻止載运粮食。这样不声不响地逐漸增加了人数，主妇們的行动，自發地扩展起来。富山县漁民之子細川嘉六回忆起米騷动的情形时說：“在我們那里，漁民妇女当粮价上漲的时候，随时集合起来采取阻止粮食搭船的集体行动。不仅在米騷动时她們这样做。长期以来她們都这样为保衛着生活而活下去。”他的这个談話深刻地說明了米騷动时群众行动的真实姿态。

这个在全国范围爆發的导火綫，终于在八月三日燃起来了。三日早晨，西水桥町三百多个妇女分三队去哀求資本家，或襲击粮店，交涉不准外运粮食，还有人提出警告說，“倘如运出即将施行火攻”。在警察署員的解散命令下，当日虽然收了兵，但是四日蔓延到隔岸的东水桥町。午后四时許，以妇女为中心，六七百人不約而同地在海岸集合起来，經過商量后拥到山崎町长家里，申訴了穷困情况請求采取应急办法。在町长慰撫下退出的人們，又三三五五地沿戶訪問了議員和資本家。已經陷于穷困中达半月之久的群众，在支支吾吾的回答下更为憤怒。入夜以后，她們襲击了粮店，發生了局部暴动。

“粮商高松长太郎在倉庫里囤积一千余袋糙米。当妇女們請求不要卖给別处时，长太郎之妻回答說，我們是生意人，卖与不卖随自己的便。长太郎之妻甚至粗暴地說，粮食貴，活不下去，你們就死罢。妇女們發出了呐喊声，搗毀了窗戶和家具。”（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第二卷）

六日午前零时，与雨水桥町相邻的滑川町的妇女們不約而同地集于里濱，高呼着“大婦子不参加嗎！”动員了全町。于是，三

百多人集体排队走过小胡同，喚起地主斋藤仁左衛門，大家坐在地上要求廉价出售粮食。这时候接到警报的滑川署长率领十几个警察急忙赶来，下令解散；但是，她们说“你们是吃得上饭的人，请回去睡觉吧！”迟迟不肯退去。六日午前，警察署趁群众解散机会，在水桥分署检举了几名发起人。妇女们得到这个消息后群拥而来说，“请处罚我们全体吧，这样下去我们都将饿死，入狱反而幸福些”。她们请求释放被捕的人。但是，六日正午时刻，负责运米的船“伊吹丸”为了搭载三百石糙米，在滑川港下锚。警戒不懈的妇女们拦挡装货工作，终于阻止了它。

这时候，男人也参加了，集体力量更形强大。町会从七日午前八时开会，争取到每升三角五分，外米一角六分的廉售价格的诺言，但是午后更进一步要求降为每升二角五分，交涉一直延续到八日上午。八日清晨就陷于逮捕和反逮捕的骚动里，从附近紧急召集来的警察队肆行镇压活动。

这是以地方报纸的报导为主的“富山妇女暴动”的实况。这次的渔村暴动立刻波及全县，进而蔓延至全国，发展为席卷一切劳动阶层长达四十天的大骚乱事件。

这里试以造成暴动的直接原因的粮价上涨为中心，回顾一下农民的状况。

有人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日本获得渔翁之利，人民都变得富有了。田山花袋在“逝去的日子”一文里曾这样写道：“从前农民过着几乎被疑为地主的富裕生活。他们已经不再耕种土地。穿着轻软的衣服每日悠闲地过活。有的人做了村会议员或郡会议员，穿着礼服坐了车子兜来兜去。住宅也考究得惊人。用檜木筑的新房子，庞大的石门，修起亭子的院子……。”（大正五年）但是，实际上那是地主、富农的生活，贫农生活不仅毫未改善，而且受到战争影响，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用品都涨了价。

并且粮价在农民出卖的时候下跌，等到經紀人提高粮价时，农民的粮倉里却連一粒充飢的粮食也沒有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高价来購買炊粮。大战期間和战后物价上漲的显著特征是农村需要的工業品的价格上漲，与此相比，米价却在下跌。加之，战争促使工業發展，不断地吸收农村的年青劳动力，因之大批农民离乡，造成农村劳动力的缺乏，耕作变得粗糙，每反收获量下降了。这种情况使中农贫农增加了債務。經高利貸之手夺走了土地，所謂土地兼并变得激烈化了。以一九〇八年与一九一六年相比較，持有耕地一町以下的农民从百分之七十三增为百分之七十六，持有一至三町土地的农民从百分之十九減为百分之十七，仅是一九一七年这一年，持有不足五反土地的农民即增加一千零七十四戶，而持有土地五反至五町的农民却减少了八百零四戶。这意味着农民失掉土地以后，不得不进城去做工人，或者不得不变为地主的佃戶。

虽然粮价从一九一七年开始上漲，但这对大多数农民却無任何利益。“去年年末(一九一七年)，空前高昂的粮价只使少数大地主感到兴奋，中农階級毫未得到好处。实际上，他們沒有力量支持到粮价上漲的时期，徒然眼巴巴地看着肥肉，却無法到口。贫苦农民的情况更不必提了，农村的疲憊已經陷于絕境，因此，尽管突然出現了好景，但并不能立刻恢复繁荣。”(大阪朝日新聞)这时候，农村里的地主与农民間的对立逐渐尖銳化，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尖銳地、激烈地發展起来。自然，农村中的这种对立，受到城市壟断性工商業發展的影响愈加激烈，农民的經濟要求也具有更广泛的性質。佃农組合的發展即是它真实的反映，即使根据农商务省發表的縮小了的数字也可以看出来。根据他們統計，佃农組合的数目从一八九七——一九〇六年为二十一个，从一九〇七——一一年为十九个，从一九

一二——一六年为三十七个，但从一九一七——二〇年却一躍为一百五十二个，特别是以反抗地主、改善佃耕条件为目的的组合突飞猛进地增加了（这项统计数字是被缩小了的，据说一九一八年时有三百七十六个组合）。再从佃农争議的件数上看，一九一六年为八十五件，而一九一八年即增为二百五十六件，争議内容也从根据歉收理由哀求减免佃租，一变而为积极要求降低佃租。而且尽管宪警用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对待争議，但是农民的觉悟却与城市的民主运动的发展遥相呼应，迅速提高起来。

农村里的这些情况，在米骚动时期也立刻引起了都市町村的工人、职员、小商贩的共鸣。贫农、町村的农业无产阶级、半失业者和这些阶层一道，共同积极地参加了米骚动。就無糊口之粮的农民来说，米骚动就是自己生死关头的行动。

米骚动的直接原因虽已明了，但是，它所以在全国范围广泛地吸引了各个阶层的理由，还应有所补充。必须了解，粮价为什么上涨，以及人民为什么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反抗它。

片山潜认为“引起暴动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日本勾結盟国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借口是为了援助留在西伯利亚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事实上是企图粉碎、破坏扩展至整个西伯利亚的俄国革命。日本工人阶级已经经历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十分清楚地曉得与外国进行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工业呈现了空前的繁荣，资本家的财富愈益增多；工人阶级与国家的繁荣相反，却愈加贫穷了。金幣源源不断地流入，而同时生活必需品却在不断地涨价，尤其是粮价的上涨已达極点……”，指出暴动的原因是由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在这前一年即一九一七年十月，占地球六分之一的俄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进入外国武装干涉的阶段。这一革命使日本工人感到非常激动，并使指望依靠战争

發財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大資本家遭到無可避免的致命打击。地球上六分之一的人口已不再是他們榨取的对象，那里由工人农民掌握了国家权力，帝国主义者在自己国家的工人农民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激發以前，先發动了战争。使他們感到最不利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深刻的觉悟下开始举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因此，列强不得不組織扑灭社会主义的十字軍。支援西伯利亚反革命軍队，日美帝国主义从东方参加反共十字軍乃是必然的。当时，寺內內閣按照日本資本家、地主的願望，企圖利用通貨膨脹降低国民生活，再从大战中取得巨大的利益，以此来解决激烈發展的矛盾。如果以一九一四年的物价为一百，一九一八年已躍至二百三十；以此折合工資，以同年度作为一百，一九一八年仅为一百五十七（东京工資指数）。实际工資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下降了32%。按同年度的罢工数字看，从五十件增为四百一十七件，即增加了七倍，参加的人数，也增加七倍以上。而且，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使社会問題愈来愈尖銳了。

这里談的虽然是粮价問題，間接也有关于粮食供求关系的若干原因在內，特別是一九一七年的冻灾使粮食比前一年减产，但輸出反而增加；同时，战后工業的發展使都市人口集中并增加了消費，再加上随着出兵西伯利亚增加了需要，于是，壟断的經紀人遂大肆囤积粮食。三月間每石十五元的粮价，六月里打破二十元大关。至米騷动爆發的八月三日前后，每石已超出四、五十元。政府虽然發布了調整物价的命令，但是也不能制止囤积商人和地主的拒售。其中，神戶的鈴木商店接受英国軍需品購買委員的合同，通过大阪、神戶的大商店壟断大量粮食。政府企圖从朝鮮輸入粮食以应急需，准备牺牲朝鮮人来照顧經紀人的利益，求得供求平衡，但是失敗了。这种粮价和进出口政策，是反映了派出侵略西伯利亚十字軍的政府表里如一的性格的措施。

米騷动不过是微小的导火綫，是富山县內的爆發点而已。以下繼富山暴动再縱觀一下全国的情况。

在京都，十日夜晚，下京区柳原的部落居民包括妇女、兒童在內約四百人吶喊着襲击了七条高瀬的粮店，大肆搗毀，增加起来的群众与警察队發生冲突，并襲击了柳原町警察派出所以及其他地方。騷动激烈起来扩展到全市，群众分成几队沿途吶喊着“減低米价！”竟而开始与保护富商的警察队發生正面冲突。十一日，軍隊出动了，但是在西陣，直到十二日騷动犹未平息，整日里貧苦人民率先斗争着。成群結队的应援的群众暗中掩护着示威队和襲击队。騷动从京都波及大阪，其規模愈見扩大。大阪市外今宮是所謂貧民住宅区。大多数都是生活受到威胁的部落居民。騷动的开端主要是日日提高粮价的奸商触發了人民累积起的恨怨。由今宮町一带四十八家粮商組織的粮業公会“米荣会”的会长天正商会，广告群众将时价五角五分的米依五角二分五厘的价格“廉价”出售。群众听說“特別低廉”紛紛赶来，当他們知曉价格为五角二分五厘的时候，立刻激憤起来，摘掉牌匾，搗毀大門。天正商店不得已減价为四角，再減为三角，到十点钟終于減至二角五分。妇女們在警察赶来以前爭先恐后地把这家粮店的粮食搶購一空。这样順序襲击了全町的粮店，报复了平日的暴利。这个时期，即八月十一日，民党在大阪天王寺公园举行了平衡粮价市民大会，午后七时三千人在严密的警备下通过了宣言和決議。決議要求追究农商务大臣仲小路廉的責任，要求取消外粮輸入稅，制止通貨膨脹。決議結尾提到，“希望乘机取得暴利的富豪，为了时局，先于其他富豪救济生活遭受威胁的同胞”。十二日，騷动变得更为凄惨。全市受到暴动激浪的影响，至十三日犹未停息，最后軍隊出动了。正如片山潜所指出，群众并没有什么組織，所謂領導，至多不过是地方性的領導站在

一部分群众的先列而已。而且許多場合都遭遇了警察、軍隊的暴力，結果在局部暴动的形式里被鎮压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和以往的民众暴动事件同样，群众和領導人对無罪之人并未加害。例如，在大阪搗毀了平素知名的鈴木商店的宿舍，但是对待平日誠实的商店絲毫未犯。从十三日至十四日，民众与軍隊展开交手战，有許多人負伤，發生了許多火灾事件，十四日午后三时市政府終于發布了命令說：“最近期間內，日出前、日落后，禁止五人以上聚集成群在街上行走”。中京、名古屋市九日黄昏在鶴舞公园举行的“粮价講演会”开始了騷动。这里的請願示威也在軍隊的攻击下，于十二日夜晚变为暴动。到十七日为止，連續八天，造成了全国都市騷动時間最长的記錄。神戶是聞名天下的奸商鈴木商店的根据地。十二日傍晚，示威队伍冲至东川崎町的鈴木商店。在这里与事先做好准备的警察队对峙起来，开始抛扔石头，最后两处起了火，木筑的三層樓的商店完全被燒光。同日，松方財閥經營的神戶新聞社也被燒毀，軍隊出动了。十三日繼續进行了拚死的示威斗争，据說軍隊受到民众用刺刀抗击。

这种騷动波及东京較迟于关西，始于八月十二日。

米騷动迄至八月中旬旬末达于高潮后，逐漸被軍隊鎮压下去。其中以八月十七日山口县宇部煤矿爆發的矿工暴动最为凄惨，被軍隊开枪击死十二人，七人受輕重伤，暴动持續到二十日为止，从这以后向各地农村特别是东北方面發展，十八日波及北海道函館地方。及至下旬，又在北九州的煤矿各处掀起暴动，二十六日，志免村海軍掘煤厂發生了三千人的暴动，并蔓延到同地的各煤矿，进入九月犹未平息。但是，这时，以地区为中心的人民斗争形式的暴动几乎完全靜止了。

这样，席卷三府三十三县，从大小都市以至漁村、农村，都为生活挺身而出，与政府、軍隊、警察进行了战斗。被逮捕的人数

至今犹無法正确統計。“仅就法院被审判的数字即有七千八百三十一人，初审时被判处騷扰罪的为四千二百二十一人、杀人伤害罪为六十一人、强盜罪为二百六十八人、恐吓罪为六百七十四人、放火罪为一百四十一人、破坏器物罪为四百三十一人、窃盜罪为二百四十八人、胁迫罪为二百零三人。”（片山潛）而且未从軍隊、警察中發現一个犯罪人，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通例。

全国米騷动的記錄，今天几乎还没有着手調查。因此，仅知道富山县以及主要大城市的事实的很小一部分。从而其經過与內容也不过知其梗概。例如，关于农村中的米騷动及其当时的影响，或者关于农民参加米騷动的情况，几乎未曾搜集材料，同时也無从了解。例如，信夫清三郎在“大正政治史”中曾提到一个例子說：“站在米騷动斗争前列的是工人。在农村中，时常有工人站在农民的一边。从八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爱知县爱知郡猪高村高針部落先于附近的部落掀起騷动的理由，除了那里存在着几个攫取苛重佃租的地主以外，据說还因为村内的煤矿有許多工人的緣故。”这个例子也說明了，断炊的农民，結合对地主、高利貸者、銀行家提出的要求，与工人采取共同行动，从当时的农村状况說，也是当然的。从八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大阪府被控的一千七百九十四人中有职工三百九十七人、碼頭工人一百十七人，大部分为無产階級，还包括农業漁業一百四十人，由此对于暴动的階級成份也可有所理解。米騷动虽然以工人为中心，动员了各个阶層，到全部被鎮压为止，經歷了近四十天的全国范围的斗争，但是因为运动本身的年輕、不够成熟和斗争的自發性，終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統治势力全部鎮压下去。尽管如此，当日本进入总危机时代的刹那間爆發的这第一大暴动，仍具有彻底改变日本社会运动的性質与方向的巨大影响。

“米騷动給予日本工人运动强烈的刺戟，使它踏上了广闊的

革命軌道。米騷動的經驗與偉大的罷工的浪潮也證明無產階級的群眾運動如果停留在自發階段是無法取得勝利的。構成革命鬥爭的基礎的是組織。這是日本無產階級從這一鬥爭里學到的教訓。”(片山潛, 前述論文)

米騷動給予工人的影響, 可從罷工的增加、工會組織的增加、革命團體的發展及其後不久全國水平社(大正十一年)和日本共產黨(同年)的建立等一系列的歷史得到證明, 但它給予農民的影響又如何呢?

佃農爭議的次數計為: 一九一七年八十五件, 一九一八年二百六十五件, 一九一九年三百二十六件, 一九二〇年四百零八件, 一九二一年一千六百八十件; 佃農組合一九二〇年為三百五十二個, 一九二一年六百八十一個, 而一九二二年發展為一千一百一十四個。一九二一年爭議的主要要求為佃租的臨時減免、廢除額外佃糧和反對增加佃租, 其中通過“降低高額佃租”逐漸把要求永久減免佃租作為中心問題; 通過尊重耕作權開始沿着“把土地交給農民”的思想方向發展。從地主方面講, 半封建的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被打開了一個大缺口。

另一方面, 九月二十一日, 寺內內閣為了米騷動的責任, 表面上以出兵西伯利亞的手續問題為借口下了台, 接着組成原內閣。原內閣雖然同屬帝國主義的內閣, 但是為人民力量所牽掣, 不得不採取標榜自由主義的政党内閣的讓步政策。而且繼續不斷的對外侵略和國內的矛盾, 又助長了來自俄國革命的思想的急速發展, 提高了工农的政治覺悟。米騷動的經驗和教訓扎下根去, 深深地在大地里伸延起來。

一四 必須使用實力

——第一次大戰後的佃農鬥爭

席卷城市和農村漁村、規模遍及全國的米騷動，給予日本的社会運動莫大影響。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日本歷史上未曾有的罷工的台風席卷了全國各地的大工廠、大礦山。特別是大戰後的經濟危機和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喚醒了日本人民的民主主義，使工人階級的單純經濟要求開始轉為爭取“人權”。世界史上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也來臨於日本。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運動中提出的保障“人權”的要求，經過三十年間酷寒的日子，稍見平靜，但是，又在全國範圍爆發了。

在這三十年酷寒的日子里，從農民中製造出許多僱傭工人。這個時代，是日本資本主義成長為帝國主義階段的時代，是日本資本主義與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對中國和俄國、德國的帝國主義進行搏鬥，從遠東的島國走向自稱為“大日本帝國”的幼年帝國主義的時代。

在外国帝國主義幫助下，日本的統治階級在侵略戰爭中獲得勝利，但在背後，不論自耕農或佃農，農民都逐年陷入貧困境地。佃農逐漸增多，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已占農戶百分之六十。佃農的孩子紛紛流入城市，有的做了商店和作坊的徒弟，有的成了工廠、礦山、鐵路、造船廠等現代工業的工人。紡織女工也在这个時期大量產生，有的人只利用農閑期到城市里去工作，從做侍女、做媒姆以至賣身為歌妓、妓女和酒館女侍的也很多。

隨着貧農子弟的無產階級化，作為現代人的“人權”的主張又被提起。這種主張首先從被迫度着非人生活的階級，即貧農

出身的城市工人中間提出来。这种主張也扩展到农村，一九二〇年代开始成为佃农的要求。中村孝助曾在他的白話歌集“土之歌”中，这样写出了非人的生活情况和农村青年思想的进步：

燒菜又做飯，
拂塵又扫地，
集日尽管熱鬧，
农妇們却得不到休息。

“穷种地的女人！”
村人們看到健壯而
不漂亮的姑娘，
也都喊出这样的称呼。

“市面太蕭条”，
沒錢寄回家，
出外做工的父亲，
却被母亲牽累。

原来臉色淺黑，
如今变得蒼白，
在工厂干活
的女兒回来了。

实力！实力！实力！
如果沒有它，在这个世界里，
自由、平等是
不会落在我們头上的。

地主，
只知結交官吏，
對我們的生活，
根本不放在眼里。

作者是千葉縣貧劣的佃農青年，這首歌是產生於他的生活中的。它十分明白地反映出，貧農青年無政府主義的憤怒怎樣成長為農民的覺悟。（“土之歌”後為蘇聯駐日本大使館秘書斯伯爾文譯為俄文。）

從這樣的佃農生活與覺悟爆發為佃農爭議，較米騷動的發生猶遲三年，較勞動爭議大爆發猶遲二年。佃農爭議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為二百五十六件，一九一九年（大正七年）為三百二十六件，到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突然增加四倍以上，達一千六百八十件。更於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增為二千二百零六件。

從地理的分布上看，從爆發地岐阜、愛知延及關西的兵庫、大阪、和歌山等地，並擴展到岡山、香川、鳥取、島根、福岡等日本西部一帶地方。日本東部雖然還停留在發生階段，從靜岡、神奈川、埼玉躍至北陸地區的新潟、福井，並波及北海道地方。這些地方大體上都是以經營大米為主的商業性農業發達的地方。這說明，佃農對“人權”的覺醒，與資本主義的侵入成為正比例地在產米地區高漲起來。

這一時期的佃農爭議的規模還很小。一九二四年，一起事件中平均有關的人數為地主十七人、佃農七十二人，有關土地面積約為四十六町步。發生爭議的土地的類別與從前一樣，主要是水田。爭議持續期間多為一個月至三個月。

佃農的要求大部分是“減低佃租”。提出這一要求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歉收，其比率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为百分之三十，一九二四年增至百分之六十六，仍然停留于自發的迫不得已的要求。这种要求从佃农方面提出，一般减低一成至三成后宣告解决。

爭議的主体多为以部落或町村为单位的佃农組合。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以前，采用“拒絕佃耕同盟”或“归还租地同盟”的战术取得胜利。但第一次大战后的經濟蕭条使希望佃种的人增多，使用以前的战术則佃农将失败，于是，一变而为“拒絕归还土地同盟”，采用在爭議解决以前拒絕向地主交納佃租的战术。地主方面为了与此对抗，提出要求佃租、要求归还土地的訴訟事件也随之增多。

米騷动前的佃农爭議，一般多在地主的“恩典”和佃农的“互相讓步”精神的协调主义下“圓滿解决”，但是以后这种色彩逐渐黯淡了。同时，在經濟上強調“耕种权”，在政治上佃农对地主提出“人权”的主張。有了这样的政治要求以后，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佃农的团结甚为重要，于是以部落及町村为单位紛紛成立了佃农組合。

据政府統計，發生米騷动那一年（一九一八年）全国仅有八十八个佃农組合，一九二一年增至三百七十三，一九二二年增至五百二十五个。佃农組合多的地方偏集于富有佃农爭議經驗的日本西部的岐阜、新潟、山梨、岡山、京都、长野、兵庫、德島等地方，但如长野县那样思想激进的地方也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产生的佃农組合都是孤立的，規模也很小，并且政治领导薄弱，战术也未統一。因此力量也很弱。斗争不外求得减低佃租即感滿足。在斗争中，佃农組合从自發的部落組織發展为村，从村發展为郡，从郡發展为县，从县發展为全国性組織，認識到發展自己的重要性。特别是从工会运动

的战术和組織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訓。

从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埼玉县与京都府已产生了佃农組合联合会。在埼玉县，由望月新太郎、木下茂等無政府主义者組織了“佃农社”，出版了机关刊物“佃农”。后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社名改为“农民运动同盟”，以埼玉县境的佃农为中心，号召岡山、茨城、爱知、富山、栃木、大阪、千叶等地的农民，領導了佃农运动，但未获得充分發展。因为，無政府主义者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致認為农民的穷困是由于城市榨取农村的結果，反对工人階級与农民結成同盟进行斗争。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京都府成立了南桑田佃农联合会。这是在当时友爱会的負責人高山义三领导下，于龟岡町动员南桑田郡十八个村的佃农所組成的。宣言說，“工業工人的地位时时見到改善。……但是占全国半数的小农階級的福利却为一般世間所忽略。……集結下層农民的力量，防备地主的橫暴”。因此，要組織一个大的佃农組合，“以期开展解放农民的大运动”。

埼玉县、京都府的佃农組合的联合运动成为鳥取县、岐阜县的联合体以及各地单独的佃农組合的典范。特別是一九二〇年的危机使国民購買力下降，尽管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歉收，粮价仍下跌，除减低佃租外，佃农已無活路。于是一九二一年佃农爭議較前一年增加了三倍，波及全国，形势發展得很严重。虽然恳求地主，但佃租也沒有减低。于是舍弃这种封建方法，出現以一个部落、一个村子的佃农的团結力量对地主进行实力談判的方式。不是临时性的集合或个人的恳求，而是永久性的佃农組合日見增加，各地佃农已感到發展同盟者的重要性了。

在工人运动方面，友爱会于第七次大会上（一九一九年）改名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繼于一九二一年取消“友爱

会”字样，改称为“日本劳动总同盟”。在这前一年曾有空前的八幡制铁所大罢工，并且庆祝了第一届五一劳动节（五月二日）。工人阶级目睹拒绝采纳普选法的原内阁的反动施政，愈益痛感加强组织、提高政治水平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这些发展，也不能不给予农民的斗争以深刻的影响。

“全国佃农团结起来！”、“建立全国统一的佃农组织！”——这种解放的新路标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才在各地佃农组合中变成了口号。

一五 “日本农民组合”的诞生

——创立经过

一九二二年，是日本社会运动在思想的、政治的发展上令人难忘的一年。日本的反动势力慑于工农力量的壮大，加紧施行各种各样镇压手段，而工人和农民却在对敌斗争中认识了团结的作用。七月十五日，对于这种团结的母体有如担负头脑作用的日本共产党宣告成立。在此以前，曾于二月和四月间先后成立了“日本农民总同盟”和“日本农民组合”。

日本农民总同盟，由“官业劳动总同盟”派的横田晃一（多们）和杉山弥助等人二月二十三日创立于东京。成立宣言引用列宁的话“不劳动者不得食”装点门面，宣称：“我们知道，只有依靠团结的力量，才能促使这几项神聖的要求获得实现。必须拯救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其决议为：“一、承认农民组合；一、改革税法（应根据累进税率）；一、改善佃耕条件；一、把国有森林适当地卖给民间；一、加紧修建铁路”等，这对一般农民或佃农，意义都很含混。正如决议本身所指出，组合的斗争除北海道上川郡的

皇室領地爭議外，并無特別引人注意的活動。

作為日本第一個全國統一組織出現的階級性的民主組織為“日本農民組合”。

“日農”的籌建，始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賀川丰彦與杉山元治郎兩人的會談。賀川和杉山都看到全國農民運動有必要統一，乃着手進行。兩人同是基督教徒，是教友。賀川生于神戶，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置身于神戶市葺合新川貧民街里。他在那里從事基督教慈善運動，曾任友愛會神戶制鋼所支所長。他領導過一九二〇——二一年神戶的工廠大罷工。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死里逃生”是當時引起“洛陽紙貴”的小說，就是描繪了他的前半生的人道主義熱情的小說。他的不抵抗主義早已遭到批評，當時，他退出了實際鬥爭，專門從事工人運動的宣傳活動。

杉山出身于大阪府泉南的佃農家庭，從大阪農學校畢業後，曾任和歌山縣農會技術員，其後，畢業于仙台東北學院，曾在仙台和福島縣教會做牧師，在工人運動激烈的一九二〇年，他為取得牙科醫生執照，返回大阪，一面在市弘濟會育兒部工作，一面研究農民運動。次年十月十七日，他訪問了設于神戶葺合新川的賀川家中的“耶穌團”。兩人在樓上討論了以前商談過的有關團結農民的問題，在組織農民組合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過了幾天，賀川和杉山又在耶穌團會晤，商討有關農民運動問題，這時由于賀川的友人“大阪每日新聞”記者村島歸之的參與，關於組織農民組合的問題又具體向前推進一步。第二天，村島在“大阪每日新聞”上刊載了農民組合的組織計劃，立刻從各地飛來要求加入組合的申請書。因此，賀川把臨時本部設于自家的耶穌團，推請杉山為理事長，次年一月二十七日創刊機關報“土地與自由”。杉山在大阪的孤兒院弘濟會開始處理組合工

作。同年三月，除賀川、杉山、村島外，還有仁科雄一、農學校教師出身的關於農業行政的記者古瀨傳藏、牧師小川渙三、基督徒和農民積極分子山上武雄、曾參加神戶川崎造船所爭議的行政長藏和岩內善作等人，集合一起進行討論。

召開成立大會以前，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杉山、仁科、古瀨、村島、小川等人集合於臨時本部，一致決定把本部遷至大阪西野田，並決定四月在神戶召開成立大會。成立大會，四月九日在神戶市山手基督教青年會舉行了。大部分雖為日本西部的代表，遠自福島、新潟等日本東部的代表也趕來參加，於六十八名代表出席下舉行了大會。

杉山當選為大會主席。大會規定“本組合原則上是以各地農民組合為基礎的聯盟”的組織原則，討論了佃農法案等當前的各種問題。討論中，賀川等人無條件地贊同了“不以地主為敵”的意見。大會決定了以下的綱領。

綱領——一、吾等農民應努力學習知識、提高技術、敦修品德、改善農村生活、建立農村文化；一、吾等以互相扶助的力量，互依互信，努力促進農村生活的提高；一、吾等農民通過穩健妥實合理合法的方法努力促進共同理想的實現。

同時決定的“創立宣言”帶有攻擊資本主義的濃厚的重農主義或所謂農村文化主義的色彩，宣言的結尾說：“日本農民們，團結起來！”宣言的主張有以下二十一項：一、耕地社會化；二、建立全國性的農民組合；三、保證農業日工的最低工資；四、訂立佃耕法；五、實施農業爭議調解法；六、實行普選；七、修改治安警察法；八、保障佃農生活；九、推行農民補習教育；十、普遍設立農民學校；十一、建立農村產業組合；十二、成立農民金融機關；十三、廢除契約形式的農業移民勞動；十四、改善農民住宅；十五、加強農村衛生工作；十六、施行農業保險；十七、提高農村婦女地位；

十八、促进农民艺术的发展；十九、建立理想的农村；二十、促进农民科学的发展；二十一、提高农民生活。

大会推杉山元治郎为组合长，选出贺川丰彦(兵庫)、村島归之(兵庫)、小川渙三(岐阜)、古瀬傳藏(东京)、岩内萍作(新潟)、山上武雄(岡山)、长村七郎(大阪)、小林隆(福島)、稻垣常三郎(爱知)等十人为理事。这些领导人以提高农民生活作为运动方针，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上。

日农的成立，因为基督徒、农村问题研究家等人的热心活动，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作为顾问的还有人道主义者有馬頼宁伯爵和森本厚吉博士等人，他们在初期的“土地与自由”上，与贺川共同撰文主张“地主与佃农应该合作”。但是他们还没有反动到拒绝登载革命主张的程度。在成立大会前的“土地与自由”上，尽管公式化，但也讲到“唯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共同耕作”、“解放全国农民”等农民的革命要求。这是日农的革命传统的开始。但是仅是这些未能使地方农民组合的代表感到满足，他们在实现这种改良主义的、文化主义的要求以外，还在减低佃租、建立佃农的全国性组织等要求上与领导者的方针明显地发生对立。

日农的成立，尽管其领导方针贯串着缓和的改良主义，但仍使地主阶级、资本家和政府感到非常危险。他们惧怕的不是日农的有代表性的领导人，而是害怕基层战斗的佃农们以团结的力量号召“全国农民团结起来”，开始活跃。

农村的革命力量由于是年七月十五日日本共产党的成立而增强。日本共产党于七月就创刊“农民运动”报，开始讨论农民问题并领导农民斗争。在它的纲领草案中关于农业问题，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没收天皇、大地主、教会的土地，即进行无代价没收并

移交給國家；二、設立扶植貧農的國家土地基金，特別是要把從前利用自己農具以佃農身份耕種過的一切土地，雖不作為私有財產，但應交給農民；三、規定累進所得稅，即按照所得課稅，使一切取得高額所得的階層負擔高率租稅；四、征收特別奢侈稅。”

這個綱領草案還規定，農業革命為日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為完成這一任務，必須建立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在農民運動中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共產國際第四屆大會上，日本代表片山潛報告了日本的農業農民問題的重點和農民運動的現狀，他說，日本農民是現在革命的力量，正在逐漸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

根據這一綱領草案，農民組織在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現了具備組織形式的“日農關東同盟”。這個關東同盟的成立，把城市工會運動的革命性格擴展到農村中；它不久後即與日農合併，同時促使日農發展為革命組織。創立當時，關東同盟的代表性的領導人為：“勞動總同盟”的鈴木文治、赤松克麿，“東大新人會”的庄原達、岡部完介，“早大建設者同盟”的和田岩、平野力三、大西俊夫、淺沼稻次郎、三宅正一，農民須永好（群馬）、名取二十郎、今井一郎、瀧澤要平、伊藤京助等人。

日農成立那一年，在它領導下進行的佃農爭議除岡山县藤田農場外，主要在日本西部地方；但增加了政治要求，規模很大，戰術也發展了。僅舉其具有代表性的大爭議，即有兵庫县的伊保村（四月）、志方村（五月）、置鹽和印南郡全部（六月）的爭議，岡山县的福田村（五月）、邑久、上道兩郡（九月）、金田村、福田村、藤田農場（十一月）的爭議，大阪府的菅野庄（十月）、永室（十一月）、山田村、九箇庄村（十二月）的爭議，京都府的祝田村（十二月）的爭議等等。

特別是岡山县藤田農場的佃農爭議，為日農值得紀念的第

一次流血大爭議，应与日本东部的群馬县强戶村的斗争一并记录在史册上。藤田农場設于兒島灣“干拓地”^①上，約有三千町步佃耕水田。这部分“干拓”是日本有数的大阪大高乡地主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公司所經營，其中一部分辟为同公司的直营农場，其余土地招納了佃戶。这个农場留給农民的稻米約为全部收获量的三成，农民对地主提出廢除“掟米制”的要求。所謂“掟米”就是：在德川封建制度下农民每年向領主繳納的租稅，到了天皇制的明治时期，意义一变而为应由土地所有人繳納的租稅；藤田农場理应从佃租所得中繳納租稅，却把相当于租稅額的佃租呼为“掟米”，另外取自佃农身上。地主利用民事裁判的假执行的手續，扣留了农民脱壳后的稻米，宣布禁止农民擅自进入水田。为此，农民方面大规模地动员了附近的日农支部的农民，与接济食粮的同时，还协同工会应援队，从共同脱壳發展为示威运动，在各地举行爭議批判講演会，坚持了延至第二年的长期战斗。这次斗争中，有四十余人被檢举，五名农民和小岩井淨律师因違反治安警察法被囚入獄。細迫兼光律师繼續小岩井的任务。国粹会被充当地主的工具，也始于这次爭議。这次爭議的中心領導人以山上武雄为首，包括从無政府主义派轉入共产党的仁科雄一、青年战士板野胜次和日农总本部的行政长藏等人。

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岡山县农民运动先覚者、純粹农民出身的山上武雄。他曾經因为研究丰产技术被县知事表彰为农民模范，但是他覺悟到佃农問題乃是农村問題中的根本問題，絕非依靠丰产之类的方式可以解决，于是参加了創立日农的活动，領導該县第一次佃农爭議——上道郡金田村的爭議，曾入獄三个月，是一位宣傳鼓动家。据說曾經当过警官的宮向国平被他的雄

① 干拓地是排除湖水或海水后进行耕作的土地。——譯者

辯所打動，從一個“無賴漢”轉變成了農民運動家。

談起當日的情況，提及西部的山上武雄的同時，不能忽略東部的須永好。他是村里的模範青年，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前往調查當時發生于岐阜的大野金五等佃農運動，還研究農村青年與思想問題，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以故鄉群馬縣邑樂郡強戶村為中心組織了強戶農民組合。這一年，這個村爆發了關東地方第一次佃農爭議，全村七百戶中有五百六十戶參加了鬥爭，提出了減低佃租三成的要求；地主方面也集結一百三十八人開始對抗，但是組合方面勝利了。其後，這個村年年不斷發生爭議，變為“爭議村”，還產生了佃農的村會議員，產業組合也為佃農所控制，以“佃農之村”知名于世。

從藤田農場爭議可以見到，在日農領導下，佃農爭議戰術也發展為動員群眾向地主直接進行實力交涉，採用講演會、農民大會、示威游行的形式，時而在地主住宅附近公開控訴地主的橫暴，張貼和散播標語、招貼畫等，均很普遍。其中還有採用更激烈的戰術的地方。一九一七年岐阜縣清水村、一九二一年埼玉縣大桑村、一九二二年同縣廣田村、大阪府津田村等地的爭議中，佃農的孩子們舉行了同盟罷課。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岡山县丰村、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群馬縣宮鄉村、山梨縣玉幡村的爭議中，大批佃農退出了消防組、衛生組合和產業組合。一九二一年的群馬縣強戶村、一九二二年大阪府可用村，以實力停止交納公租公課。一九二二年大阪府津田村、一九二三年埼玉縣御正村出現與地主絕交的戰術，結成同盟拒絕購買與地主發生關係的商店的貨物，有的地方完全拒絕同地主來往。

這樣，隨著佃農爭議的逐漸激烈和擴展，日農從創立當時加入的十五個支部和僅有二百五十三名組合員，至第一屆大會後，如大河奔流一般增長起來，在第二屆大會上報告說，據第二年二

月十一日的調查，支部数为三百、組合員达一万人之多，而实际的数字将比这多数倍。岛国日本从日农这一火山脉向全国各地噴出佃农爭議的火焰。在德川封建时代的农民暴动和明治初年的暴动中只知道利用简单的斗争方式的佃农們，有了“日农”这一全国性的永久組織，坚强地标榜着“把土地交給农民”、“解放佃农的人格”的革命目标(綱領)，展开了斗争。

在这样的佃农斗争中，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一起一周間，在大阪府北河内郡联合会主持下初次創辦全国性的农民学校。其目的在于改造农民的思想，以培养具有必須改良农村的“坚决信念”的干部。讲义内容从农业学校式的“稻谷栽培法”、“实用农具”等直到“生物进化論”、“气象学”等涉及全盘农业技术，也涉及“組合运动史”、“飢饉中的俄罗斯”等政治問題。听講的學員中对于当时受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封鎖和进攻的苏联，發出“援助俄罗斯”的呼声，向苏联捐贈救济金。

从表面上看来，日农领导方針是中农的改良主义乃至可以称之为进步的重农主义，而干部中間正在这个方針下爭論“与地主协调是否正确”，但就在这个中間，佃农的实际斗争却得到工人階級的思想、战术的领导，使革命的火山脉从日本西部蔓延至日本东部。日农第二届大会上，这一火山脉使日农的地圖和历史方向显出“佃农斗争組合”的色彩。

日农第二届大会于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二月二日揭幕于神戶。日农一年来的历史使日农的基础建立在战斗的佃农身上，变为全国性的統一組織。报告中指出“加入組合的支部几乎没有不掀起过爭議的”。大会上，摆脱成立大会当时的改良主义、协调主义的地方代表，占绝对多数。从創立之初即以战斗姿态出現的关东同盟会，曾在大会前一天于群馬、千叶、茨城、福島、新潟、山形等地五十余名代表参加下，在东京日本劳动总同

盟本部举行大会，虽然没有作出决议，但是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到讨论“承认工农苏联”的问题。来自工会的许多旁听者，已代替成立大会上露面的那些资产阶级学者和佃农的同情者。

这次讨论的特点有以下三点：一、从佃耕问题联系到土地问题的解决；二、集中讨论了和工会运动有共通性的问题——废除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反对“取缔过激社会活动法案”、反对“佃耕调解法案”、对普选应采取的态度等等；三、变佃农组合的联盟体为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组织。有马、森本等同情地主、资产阶级的顾问和古瀬、村岛、小川等知识分子出身的理事不见了。推选杉山元治郎为组合长，仁科雄一、行政长藏、吉山胜次郎、小林隆为主事，贺川丰彦、长村七郎、山上武雄、北川重吉、铃木文治、须永好、瀧澤要平等人为理事。

这样，日本的农民运动终于胜利地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使阶级斗争的革命步伐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

一六 “全国水平社”

——创立经过

日本农民不仅限于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由于站在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自觉上，进行了为争取“人权”的民主革命的明确斗争，同时也给予未获得身分解放的特殊部落民莫大鼓励。

特殊部落民的解放问题是恢复全国三百万部落民的基本人权的問題。他们在德川幕府封建时代被称为“贱民”，明治以后被称为“新平民”，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道理上，资本主义社会应建立于废除这种人格差别的基础上，但是，日本资本主义却经历了特殊的发展道路，多方面保存了封建制度。因此，在

日本，关于人权受到漠視和歧視这一点，不仅是部落民，从佃农直到自耕农和工人階級都陷于严重的地步。这种封建階級制度下的社会的差別待遇發生了喚醒农民和工人的階級覺悟的作用。因此，工人和农民为了推进新的斗争更有必要鏟除日本社会上这种特殊的落后状态。

以取消对部落民的差別待遇为目的的“水平运动”發生于奈良县。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春季，由該县掖上村柏原的青年、西光寺的西光万吉(本名为清原一隆)、坂本清一郎、駒井喜作等人發起；他們因欲赴南洋未遂，創立了“燕子会”。該会与过去政府、公共团体、热心人士等举办的賜恩式的改善部落活动并不相同，它是通过同族的集团，进行部落民間的慰問、敦睦和經濟上的互相扶助，办理生活协同組合——当时称为消費組合(即消費合作社)——共同購進日用品，通过自下的民主选举形式廢除农村封建制、設置新区制。同时还成立了部落問題研究部。进而在于次年六月十日議定向全国推广这一計劃。长期悉力領導青年的、京都市上京区鷹野北町乐只青年团长南梅吉听到这个消息，大为贊成，京都市下京区东北条北部青年团长櫻田規三也相繼参加。他們在美西各地征求同志，当年十一月在駒井家中設立“全国水平社創立事務所”。水平社的名称是根据坂本的提案本乎“人类最高理想在于建立平等社会”的思想而决定的。發行以“为了美好的未来”为題的成立意旨書的小册子，在第二年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一月傳及全国。这个小册子里載有日本共产党創始人之一佐野学^①的“解放的原則”一文。运动从开始就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指導原則为依据。它的兩項原則，第一是，以部落民自己的力量从不公正的社会地位下求得解放；第二是，部

^① 一九三三年变为叛徒。——譯者

落民和苦于资本主义榨取的工人、农民一样，受着同样的榨取的痛苦，因此，应与这些阶级共同致力于解放运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三日，约在日农成立一个月以后，全国水平社在京都岡崎公会堂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约二千人，大部分为京都府代表，其中也有许多人是五年前站在米骚动前列的田中、东七条的部落民，此外以奈良、大阪、滋贺、三重、和歌山、兵庫为首，东自爱知、静岡、东京、埼玉，西自岡山、广岛、山口、福岡等地均有人前来参加。大会以南梅吉的开幕词开始，于全场掌声中通过了纲领、宣言和决议。

纲领中包括以下内容：一、特殊部落民以自己的行动争取彻底解放；一、吾等特殊部落民坚决要求和争取在社会上享有经济的自由和职业的自由；一、吾等了解到人性原则，为实现人类最高理想奋斗到底。

继之，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以“散在全国的特殊部落民们，团结起来罢！长时期遭受凌辱的兄弟们！”开始；结尾处写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是自由、平等的追求者和实践者。是卑劣的阶级政策的牺牲者和为职业而勇敢殉难的人！剥取兽皮换来的报酬只是被剥去活生生的人的皮，剥取兽类心脏换来的代价只是被割碎温暖的活人的心，甚至还遭到恶意嘲笑的唾水。在可诅咒的噩梦中还有并未枯竭的值得骄傲的人类的血。……殉教者的荆冠赢得祝福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以‘贱民’的身份而骄傲的时代到来了。我们绝不允许以卑屈的语言和怯懦的行为加辱祖先、冒渎人的尊严。……为此，成立了水平社。愿世间有热力！愿人类有光明！”这项激昂的宣言表示了对运动远景的悲壮的决心。

决议为以下三点：一、坚决回击侮辱我们的人；二、为加强团结与统一，出版机关刊物“水平”月刊；三、我们大部分为东西两

本願寺的門徒，由于西本願寺对待部落解放的态度，决定拒絕接受它的照顧(捐助)。

接着举行的講演会十分热烈，不断的掌声震动屋瓦。以东京代表平野小劍(本名重吉)等二十余名地方代表为首，少年代表山田孝次郎、家屬代表增田久枝等相繼起立，高呼差別待遇的不公平，迫切要求自主解放，每位代表的呼声中都充滿长期积累的部落民的痛苦經歷，不仅参加大会的人，甚至使傳聞的人也受到感动。

最后，大会推选南梅吉为中央委員長，駒井喜作、西光万吉、阪本清一郎、米田富(以上屬奈良县)、平野小劍(东京)、櫻田規矩三(京都)为中央执行委員，决定設本部于京都的南方，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水平社成立大会才宣告閉幕。

其后，三月二十一日首先在大阪府烏本村，繼在全国各地举行了講演会，發行“水平”杂志和活叶宣傳文件，进行了积极的宣傳运动，結果，在四月成立了京都田中水平社、奈良县高田水平社、埼玉县箕田水平社、三重县松阪水平社等地方性水平社。八月，以往反对水平运动的大阪市的西濱町也成立大阪水平社，增强了运动的信心。全国水平社成立后一年期間，三府五县数达六十个社之多。

在这种發展形势下，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于奈良县大正村小学校一兒童的失言，引起差別待遇抗議运动。小林水平社員冲进学校，因为校长的不誠懇的回答触怒了社員，造成校长及一名教員被毆伤的事件。小問題在全国各地發生，还發生了名古屋市平野町水平社員冲进江川町警察署的事件。

在这种斗争和組織的發展下，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三月二、三两日又在前次举行成立大会的京都市岡崎公会堂召开第二届大会。会前，二月十七日在大阪举行的筹备會議上制定

了有名的社旗“黑色荆冠旗”。关于这个旗子的由来，第二届大会召集書中曾有如下暗示：“恰如埃及的賤民……使人忆起白天在雪山下、夜晚在火炬的引导下向柏拉諾进軍的以色列人民。……部落，三百万兄弟在荆冠旗帜下团结起来吧！在漆黑中用血的顏色染起的荆冠旗帜，正是我們受难与殉教的象征。到追吊长眠地下的千千万万的祖灵的祭壇前来参加吧！过去我們是賤民。今天我們是选民。为了‘美好的日子’，亲爱的三百万弟兄們，团结起来吧！”

荆冠旗是無政府主义的黑地子——大地和基督殉教者的荆冠結合在一起的“人权宣言”的标帜。

高举荆冠旗的地方代表紛紛涌来参加第二届大会，参加者有三千余人。宿于京都車站前的旅館中的近一千名代表，借拜庙之名往东西本願寺示威游行，然后进入会场。大会收到日本劳动总同盟、無政府派的关西自由劳动組合及其他三十多个团体的賀詞。決議中，由地方提出的問題“抗議德川一門議案”等达三十五件之多。虽然“廢止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的議案被否決，斥当局为侵略者、反对軍国主义的“广泛宣傳和平运动”、“無条件承認苏联”、“水平社与朝鮮人团结互助”等議案被保留，但这也显示出作为階級斗争的水平社运动，一年間进行了怎样的斗争。

大会后，三月八日，联盟本部中央执行委員长南梅吉、中央执行委員栗須七郎、平野小劍三人进京，謁見內务大臣水野練太郎、宮內大臣牧野伸显，陈述大会決議。同时，經部落民的亲睦团体同爱会会长有馬頼宁伯爵的斡旋，在华族会館与众議院各派代表会晤，交換有关部落民解放問題的意見。这些活动每天和照片一同在报纸上發表，結果使其組織也在全国范围获得發展。五月一日劳动节，在福岡县成立全九州水平社，推該地知名人士

松本治一郎为委员长。是年九月一日，發生关东大地震，反动势力利用这个机会对工人阶级发动大规模的镇压；但尽管如此，十一月一日高桥贞树、岸野重吉、松田喜一等人仍然在大阪市组织了全国水平社青年同盟。十二月十日向文部省提出了“关于国民教育的意见书”。其重点为要求实行民主主义教育，取消对外的人种差别教育，应以培养“真实的人”为目的，树立歌颂人种平等的“人类爱精神”的教育方针。

水平运动初期的特征，是本着从廢除差别待遇出发的人权平等的要求的立场而展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运动。为了实现这一要求，通过决议：在特殊部落成立农民组合与消费组合；支援取消对朝鲜人歧视的运动，同朝鲜人团结互助；同持有人权平等的经济的要求的一般农民及朝鲜被压迫民众结成同盟战线。在这里显示出运动的高度的政治性。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对德川一門提出抗议以及反本願寺运动的展开。他们由于德川幕府政策制定的贱民制度受到苦痛，他们对如今还施展贵族特权的德川一門能够进行抗议，抗议的背后同时潜伏着廢除天皇统治的要求。此外，亲鸞倡导的真宗的平等精神使他们中的門徒向本願寺捐献了许多钱财，而结果他们并未得到解放，只是增加了本願寺的财富。因此，开始提醒大家今后不要再受欺騙，发动反对向本願寺进行捐献的运动。

第二届大会期中，岡崎公会堂会场前发生了毆打警察的事件。三月十八、十九两日发生了当时作为最大事件而报导的奈良县川西村乱毆事件。事件导源于追究侮蔑性的言辞；水平社与对此無礼的国粹会、田原木町在乡軍人会、青年团之間發生以日本刀、竹槍、猎槍进行乱毆的事件。关西水平社員被紧急集合起来。在县警察局长指揮下被解除武装，军队也做好了出发准备。在这一事件中，体重二十貫^①的巨汉泉野利喜藏及宣傳积极

分子坂本清一郎等，因为很活躍，被逮捕入獄。繼于六月發生福岡縣下中村役場事件，群馬縣里見村高崎區裁判所事件，八月發生兵庫縣寺前村威脅小學教員事件，九月發生櫛木縣犬伏町青年團事件，熊本縣菊池郡內暴行事件等等。

這樣，部落解放運動從開始即樹立起對統治勢力進行勇敢鬥爭的傳統。其後，它與廣泛開展的農民運動緊密相結合，繼續擔負戰鬥的任務。

一七 大爭議的風暴

——大正末期的農民鬥爭

自日本共產黨創立以後，工人農民的組織認清了階級鬥爭的方向，同時，由於關東大地震後的白色恐怖以及屢次對社會運動大肆鎮壓，促進了日本的社会運動在思想方面的迅速發展。其中以兵庫、岡山、岐阜、香川、愛知為首的農民運動先進的各县，運動在行動方面和理論方面，都開始提高了。隨着從理論上認識日本佃農制度本身的封建剝削性，不再進行臨時減免佃租的鬥爭，而提出了永久減削三成佃租的要求。同時還採取了在取得減租的決定以前，不送佃糧給地主的戰術。地主針對這一點，先動起手來，根據土地所有權，開始提出歸還或讓出土地的要求。特別是狡猾的地主，利用法院的權力，通過假處分，在租地上立起“禁止擅入”的公告牌，以便禁止佃農進入租地。刻薄的地主借口過去拖欠佃租，利用法院的權力在稻子尚未成熟的時候，進行“查封青苗”。這樣猶不滿足的地主，還從谷糠直到家

① 日本重量單位，一貫等於三·七五公斤。——譯者

財農具，採取“查封動產”的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組合一方面為維護自己的存在，也開始研究了行使實力的政治戰術。要求制定佃耕法，修改民法中的佃耕權，積極參加農會代表選舉，凡是通過立法手段在當時的封建的資產階級法律中可望實現的政治要求，都開始去爭取。另一方面，它還開始採取通過群眾行動用實力來推進“永久減低三成佃租”、“全國農民團結起來”的要求的戰術。

農民組合以激烈的情勢增長起來。據統計，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組合數目為四百九十八個、組合員為三萬九千人，而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組合數目為五百九十一個、組合員為五萬五千人，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組合數目為六百五十五個、組合員為六萬人。為了破壞如此發展的農民運動，產生了地主組合，一九二四年末，“大日本地主協會”成立了。

此外，以天皇制官僚為後盾的地主，組織了土地公司和地方地主協會，一方面企圖利用法院、警察等國家權力攫取佃租和抽還租地，另一方面進行地主合伙的農業經營，販賣租地和通融資金。同時，在消極方面，還組織了協調組合，軟化佃農鬥爭的鋒芒。於是，政府根據地主的要求，首先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實行佃耕調解法。這是片面地根據民法絕對肯定了地主對土地和佃糧的所有權，用地主無需負擔訴訟費的調解法來處理爭執。不僅如此，這項法律還可以使法官假借公平調解的名義，以國家權力來保護地主利益和壓迫佃農。

其次是“自耕創設維持法”。這個法律是企圖出售土地給渴望無已的佃農，以此來軟化佃農對地主的鬥爭的工具。

第三是“暴力行為取締法”及其他法律。以這項法律壓制農民運動，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第四，通過“系統農會”“產業組合”“青年團”“在鄉軍人會”

等半官半民团体，直接間接地对农民运动施加压力。

地主方面通过这样的陣容向佃农挑战，索取佃租和要求收回土地的訴訟惊人地增加。索取佃租的訴訟从一九二五年的一千八百八十二件增至一九二六年的二千五百八十二件、一九二七年的二千零七十三件，要求抽还土地的訴訟从一九二五年的三百六十七件增至一九二六年的一千三百四十六件、一九二七年的二千一百四十三件。

农民对此怎样进行了斗争呢？佃农爭議已經变为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的长期斗争。时代已轉为大規模佃农爭議时代。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三年間，仅是流血、入獄的人就很多。其中最知名的是新潟县木崎村爭議，这里試举代表这一大規模爭議时代的二三爭議如下。

熊本县的郡筑爭議

始于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的这一爭議，起因于四百三十名組合員因为歉收，向地主的八代郡提出減低五成佃租、免除五年租稅、分讓七成所有权給耕种者等要求。八代郡經營一千二百町步干拓地，一向用它的佃租补助作为郡經費的很大一部分。这一爭議与其它爭議不相同之点，在于佃农与国家統治机构的基層郡公所發生冲突。地主的郡公所以違反县令为理由，不仅通告要放逐佃农，而且还提出控告，要求交还出租土地、索取余欠的土地出租費（即佃租），用“查封青苗”的手段施加压力。此外还組織黄色的耕作者团体，进行破坏爭議的活动，实行禁止“擅入耕地”和“查封动产”，最后动员郡下町村在乡軍人会、青年团二千四百人，准备搶割稻子。对此，爭議团方面，有妇女团五百人走訪郡厅和郡立中学，在水平社支援下举行批評講演会，終于組織了青年部，并动员了应援团，搶先收割稻子。此外还有五

十多名代表訪問了郡長，進行談判，但是郡長命令農民組合的幹部退出，組合幹部表示反對，因而遭到逮捕。儘管如此，農民組合方面仍堅持鬥爭，因此，郡當局邀請日農總部出面調解爭議。於是，當年九月，爭議大致獲得解決。解決的條件是，減少三成佃租，積欠佃租分十年繳納，自一九二四年起五年內繳納三成，如數繳納後，郡方將提出一萬五千元為肥料費。但是，因為無法完納佃租，第二年七月遭到臨時查封，組合方面慘敗，終於解散。

岡山县的石生丰田村爭議

這一爭議是從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持續到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的知名的長期大爭議。農民組合方面的要求為減低三成佃租，這雖是十九個組合員與五個地主之間的小規模的爭議，但是內容卻很重要。對此，地主第一年使用查封動產的手段，第二年實行查封青苗和變價拍賣稻子，第三年在繳納佃租期前使出查封青苗的伎倆，逐年傾力肆行暴虐手段。於是，組合結成拒繳佃租同盟；在進行變價拍賣稻子時，動員全部組合員，阻撓拍賣；還組織“紅帶隊”到岡山市中販賣劈材，宣傳地主的橫暴和組合鬥爭的艱苦；婦女到地主家裏去談判，以至於發展到小學校兒童實行同盟罷課。這一農民組合在四年中間，未為地主及國家統治勢力的阻撓、干涉、逮捕、投獄等一切政治壓迫所屈服，利用各種手段進行了鬥爭，最後，終於在法院的調解下宣告妥協。

香川县的伏石爭議

西部的伏石爭議是與東部的新潟縣木崎村爭議同具有歷史意義的大爭議。從這一爭議可以看出佃農在政治上的顯著進步，特別是鬥爭中體現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同盟這一點尤為重要。

這一爭議，在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香川郡大內村伏石

的日农伏石支部由二百名組合員向三十个地主提出永久削減三成佃租的要求时，开始爆發。香川县大地主較少，平均耕种面积是日本最小的，池沼最多，单位面积产量最高而农業的商業化也最發达，同时，在这里佃租也很高。即使佃农提出了維持最低生活的經濟要求，地主因为經濟上很少富裕，势必使双方激烈地对立起来。于是，地主組織了地主組合，采取了查封动产、控告索取佃租、查封青苗、拍卖等手段。对此，組合方面决定只繳納前一年佃租的七成，关于本年佃租，則結成同盟拒絕繳納，同时援引民法的“事务管理”条款，收割地主拍卖掉的稻子，实行集体脫谷，保管稻米。地主虽然要求無償交出，但是組合拒絕這項要求。日农創立前已經組織了三千組合員的香川县日农，动员县內的組合員和应援团，与地主进行了斗争。地主和法院認為依“事务管理”收割稻子为窃盜罪，对該县組合的二十四名领导人提起控訴，他們被投进未决獄达三个月之久。担当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是該县社会运动开拓者、以雄辯知名的前川正一。他認為“唯有曾与藩主松平斗争的伏石的义民的坟墓，才是我們的祖先”，因此从高松来到这里，把这里作为舞台。被提起控訴的干部們本来都沒有割稻，但是屈服于威逼之下，除了和前川正一同担当领导的平野市太郎以外，都供称“割了”；前川以教唆割稻的罪名被起訴。

越年，进行公审。主任律师是当时同花井卓藏、岩田宙造、今井力三郎等律师在法律界知名的“自由法曹团”的松谷与二郎。松谷曾于京都野村电气爭議时，以不为三千暴徒的日本刀所屈服一事，大显名声。而布施辰治、上村进等五十多名律师也参与辯护。其中包括花村四郎、橋桥渡等人。因感到割稻問題的責任，律师若林三郎曾于火車中自杀，未遂。獄中被告，有一人發狂。

动员全县农民组合员组成的六百人的示威队，参谒义民墓，向地主、警察示威，在全县各地举行演说会，报告了非法镇压的真相。不仅要求法院撤销预审，并在法庭上提出解除两千警察的武装的要求，主任律师发表了“不解除这些警察的包围，就无法进行辩护”的声明书，结果全部律师集体退庭。这一斗争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工农运动，使香川的农民运动扬名天下。在这次公审时，松谷律师的激辩和布施律师长达六小时的辩护，使被告、旁听人全体起立，终于哭泣起来。就是担当这一事件的检察官大平，事后也私下承认这次捏造的诬告全无理由。结果，除平野一人无罪外，余人悉数被判罪（缓期执行）。

继这一争议之后，香川县于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又发生金藏寺事件，在拍卖佃粮时四千五百名农民集合起来殴打了警察，被控为骚扰罪。因这一事件被判三年徒刑的畑中虎吉，后来被称为香川的“东部的平野、西部的畑中”。同时，据说攀登在树梢上指挥暴动的山神种一和沼田市郎二人，也被起诉，假释期间赴苏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在这些事件的先后时期，从香川县的农民运动中陆续培养出不少年青的战士。其中有些人是从东京、大阪派到这里进行锻炼的。朝仓菊雄（岛木健作）、宫井进一、宫井清香、西原佐喜市、谷健藏等人都曾以县联合会书记身分活躍过，大林千太郎、沟渊松太郎、古川为吉等人也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

新潟县的木崎村争议

香川县是小地主地带与高度商业化的日本西部具有代表性的佃农争议县，而新潟县则是大地主地带与水稻单季作物的日本东部具有代表性的佃农争议县。

长期以来苦于大地主的封建压迫的新潟农民之间，很久以

前就發生了农民运动。最初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据調解会的調查为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須貝快天以該县北部的北蒲原郡、岩船郡的佃农組合組織了下越农民协会。这个組合以須貝提出的“自耕农化”为行动綱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中、西、南的蒲原四郡与佐渡郡的佃农組合合并，組織了“日本北部农民組合同盟”，但是，北蒲原郡木崎村的爭議不是由日本北部农民組合領導，而是由日农总部直接領導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农的組織干部三宅正一在新發田町一所据說是大杉荣少年时代住过的房子里办了一个“新潟县青年农民学校”。他与稻村隆一、石山寅吉等在中蒲原郡各地講演，从中出露头角的有石田宥全、井伊誠一及佐藤佐藤治、佐藤和藤治、佐藤九藤治三兄弟和农民出身的領導者佐藤彦七等人。

这一爭議，是三宅、稻村等人进入雪之新潟的第二年因为要求廢除額外租粮而爆發的。这个村子是佐藤佐藤治弟兄的出身地。一九二四年二月，有名的大地主真島桂次郎把六十町步的出租地圈起，禁止入內，为此感到責任的佃农組合长的长子佐藤喜和太自杀。这一事件使地主方面害怕起来，一时解除圈地的办法；但在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四月的假处分判决中，佃农仍然敗訴了。因此，日农方面提出上訴，向东京高等法院办理了停止执行圈地禁止入內的手續。在他們事情終了后回村以前的几个小时，地主动員数百名警察，使执行吏执行了三十余町步土地的圈地禁止入內的手續。請求阻拦执行的三十四名农民，被控为妨碍执行公务罪。

忍無可忍的越后农民燃起怒火，从印有地主肖像的面包店直發展到四百名小学生同盟罢課，随后發展为北蒲原全郡农民組合兒童的总罢課运动。是年七月，因足尾銅山爭議触犯治安警察法被判刑入獄的淺沼稻次郎，于出獄后第二天赶到木崎村，

登上爭議批評講演會的講台。其後不久，為罷課兒童創办的“木崎無產小學校”（通稱為農民學校）舉行上梁式那天，被動員起來的一千五百名農民群眾的示威隊與警察隊發生衝突，發展為混戰的久平橋事件。因此二百人被檢舉，其中心領導人三宅被投入獄，淺沼、稻村等繼續領導鬥爭。此外，婦女團還進京講演，向官府請願。接着，成立階級組織產業工會，開辦高等農民學校，拒交捐稅，這時期還同自衛團發生過衝突事件。結果，淺沼等人不顧佐藤、石田、稻村等人的反對，接受縣當局以停辦農民學校為條件的調解。土地被收回，爭議遭到了慘敗。但是，地主方面由於這三年間的爭議也受到無法恢復的挫傷。這一爭議顯示出農民潛在的堅強的鬥爭力量，鼓舞了全國農民，給予地主陣營很大的打擊。擔任與這一爭議有關的各種事件的辯護律師，是上村進、布施辰治等人。

不過，當時的農民運動，大體上是處在連戰連捷的上坡路上。在下面，例舉其中最先進的幾個縣的插曲。

一九二五年秋天三重縣松坂市發生佃農爭議的時候，縣內無產階級團體總動員起來，在皎潔的月光照耀下，一千多名農民攜帶鐵鍬、鐮刀向地主和法院進行示威。全國水平社無產者同盟委員長、日農領導幹部上田音市腰佩短刀站在最前列，地主在這種氣勢下低頭屈服，無條件解除了查封青苗的措施。

秋田縣的川俣清音，在一九二三年領導“要求小坂礦山煙害賠償爭議”，开辟了秋田縣的農民運動。他在和礦山公司進行交涉中曾遭受一百多名暴徒的毆打而負傷，這一農民爭議發展到礦工也發動了同情罷工。四名起領導作用的農民被公司方面的暴徒狙擊身負重傷，農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擊鼓集合數百人，這些男女老幼手持竹槍、鐮刀，衝向礦山。公司在礦區周圍敷設

电网进行抵抗。紧急集合起来的警察乘坐加班火车匆匆赶来，在警察的调解下解决了这次争议，但是，川俣和十七名农民一同被控告妨碍公务执行罪。

森英吉于一九二一年在京都府与国领伍一郎、辻井民之助、奥村甚之助、水谷长三郎等组织工农同盟并担任该盟委员长，这是不应被遗忘的。这个同盟虽然在日农成立的同时宣告解散，加入日农，但是森英吉作为日农的元老经常站在左派立场，领导山城一带所有佃农争议，并且拒绝参与后日水谷等人的叛卖集团。

这里也有必要述及农民运动的发祥地、曾经诞生平野、三宅等人的岐阜县美浓平野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由横田英夫组织的中部农民组合是拥有二百五十个支部和五千组合员的大组合，横田死后，中泽弁次郎担任组合长，但是他倾向于阶级协调主义与天皇主义，在农民运动中，很长时期没有抛弃他的中间立场。

在这大规模佃农争议的时代里，全国水平社与日本农民组合有了显著的接近。从水平社的阶级性质来看，它已变成“准农民组合”的性质，其中有的就是农民组合的别名，全国范围的农民组合与水平社的共同斗争，已经在意识上联系起来。而水平社出身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和行动队员也出现了很多。在全国水平社第三届大会时期，涌现了米田富(奈良)、田中佐武郎(三重)、松本治一郎(福岡、九州水平社)、村岡静五郎(群馬)、前田平一(神戶)、鈴木信(东海联盟)、寺田清四郎(京都)、北村庄次郎、上田音市(三重)、坂本清作(群馬)、松本长八(奈良)、三木静次郎、野崎清二(岡山)、清水弥三郎(栃木)等地方干部。在青年同盟中有木村京太郎、下坂正英、高桥贞树等人。位居全国水平社理论领导地位的高桥，曾于一九二五年第四届大会上，被“反共自由青年联盟”攻击他的出身不是部落民。然而高桥与上田

音市等人，后日以左派立場組織了“全国水平社無产者同盟”，由上田担任委員長。此外，由北原泰作(岐阜)、朝倉重吉、小山紋太郎、深川武(熊本)等人組織無政府主义的水平社解放联盟，也是这个时期的事。北原是在名古屋兵团时期曾以向天皇进行直接控訴而被投獄的“行动派”。

同时，这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尚有無政府派的分子，农民运动中也有很多这种出身的分子。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倡导非政治主义、农民自治主义、反资本主义，站在無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思想立場上的自由联合的“农民自治会”产生了。这是由中西伊之助、下中弥三郎、鍾田研一、犬田卯、澁谷定輔、住井末、石川三四郎、加藤一夫等人發起，在关东中心的东京、埼玉等地成立的組織。虽然創刊了半农民文艺性杂志“农民”，但經過两三年就自生自灭了。

日本农民运动已經进入清算無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时期了。

一八 日本农民組合和劳动农民党

——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的發展

日农五年的历史，不仅使佃农而且使許多农民在政治上得到了提高。

减低佃租的要求，發展为要求把佃租永远減掉三成。佃农与地主进行斗争，已經有必要事先做好斗争准备，以应付严陣以待的警察、法院等国家权力以及它們下面的暴力团、村公所、小学校、农会、产业組合、消防队、青年团等的压迫和暴力行动。因此，佃农除了必須广泛团结全体农民以外，也迫切需要与工人共

同斗争，并且向地方议会、国会、村会、农会等处设法选送自己的代表。

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后举行的全国府县议会議員选举是第一次的普选，日农提出十三名候选人，认为“胜败乃次要问题”，以此作为与农民团结合作的宣传，与三十三名佃农候选人共同战斗，群馬、新潟、岡山各当选一人。

这次选举斗争以后，十一月三日，召开了日农关东同盟理事会。理事会受到工人阶级的“改变路线”影响。这里提到的改变路线是指日本共产党决定“对工团主义和议会主义进行斗争，作为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必须在群众斗争中把共产党锻炼成为一个在集中领导下的有组织纪律的阶级队伍”的战术改变而言。这最初在劳动总同盟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主张。继之，日农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山川均^①的论文观点模糊，缺乏阶级观点，遂流于社会民主主义。这时候关东同盟组织了农民政治研究会，着手进行组织政党的准备。一面开始了同关东同盟理论领导人赤松克麿等的“农民应加入农民党”的议会主义主张进行斗争。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和三月一日两天，于大阪召开日农第三届大会，通过“农民是组合的主人”的民主规约，决定以四月九日为“农民节”。

四月九日，第一次农民节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斗争。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口号，却集中力量在未建立组织的地区进行活动和宣传。大阪、兵庫出动了自行车示威队，香川县动员了一万人，此外，山梨、群馬、岡山、千叶等地均有活动。各地利用这一纪念日的机会，举办政治性的講演会和講習会。特别是四月三十日的

^① 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主张解党论，于一九二四年脱党。——译者

千叶县印幡郡农民大会，集結了抵制郡村統治勢力的农民的政治力量，开始从思想上引起重視。

慑于农民运动的政治發展的地主及其政府，揚言产业組合是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农村疲敝的組織，極力加以扶持，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开始了产业組合中央金庫的業務。这是向农村貸款，以便切斷中农階層与崛起的貧农階層之間的联系，使中农靠攏地主的政策。

日农在政治上的發展，特别是受到俄国革命后共产国际以及日本共产党發展的影响。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农业展覽会时，創立了国际农民协会，日本方面由片山潜和大西俊夫二人出席。大西繞道德国回国后，以日农書記身份，積極进行組党活动。一九二四年，国际农民协会寄給日本一份很长的文件，向农民运动家解釋运动的国际意义和农民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这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来自四十多个民族的号召。号召的重点有如下五項：

- 一、为保衛农民階級的利益，必須貫徹中心思想；
- 二、为了摆脱地主階級长期压迫的农民运动，应广泛团結农民群众；
- 三、农民应与共同进行解放运动的城市工人結成同盟；
- 四、为了未来的斗争，应制定最适当的战略；
- 五、創造預先防止重新爆發世界大战的条件。

日农在这样的进展中，于一九二五年一月至七月間举行市町村會議員选举时，提出“增設公共設施”以及其他統一口号，在全国范围積極进行活动。当选者共有佃农五百多人，其中日农占三百三十九名。

自二月二十七日开始連續三天的第四届大会，初次在东京举行。在确定耕作权、由中央統一領導爭議、建党等基本問題

上，改良主义者与进步的农民代表間展开尖銳的爭論，揭露了地方領導在爭議中的叛卖行徑。

在这样的进展中，由于伏石、木崎村大爭議，积累了对国家統治势力进行斗争的丰富經驗。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日农的“無产政党組織准备委员会”向工农团体号召召开“促进筹建全国性無产政党協議会”。日本农民以佃农为首五年来团結于日农之下，开辟了自己的道路，終于提出建立单一的無产階級政党。

市川正一認為，“我們切忌在無产政党是我們的理想政党的幻想下活动。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党。”（“日本共产党小史”）高桥貞树^①說：“日本共产党應該是巩固的、逐漸發展的巨大的蓄水池，党以采取最大的有利条件为方針，党組織对于建党問題就是采取这种方針。总之，党組織的这一方針取得了成效，当年六月，日本农民組合提出建立全国性的单一的無产政党，于是，举行了可以視為最初的农民劳动党的組織的綱領審議會，然后，进一步进行党組織的具体化。”（法庭發言）建立单一的無产政党組織乃是日本共产党的方針。

就在日农提倡建立单一的無产政党时，十月六日，出現了“大日本地主协会”。协会的宗旨为“从农村驅逐左傾的激进分子……消灭佃农爭議，实现农村的和平”，本部設于大阪。

在日农提倡单一的無产政党以前，五月間，日本劳动总同盟开除了革命工人結成的总同盟革新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革新派为中心組織了“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从此，工人战綫分裂为左右两派。九月，創刊革命無产階級政治性的鼓动群众的报纸“無产者新聞”，以“促进全国無产階級先鋒队的結合”为任务。日农提出的建立無产政党的号召得到二十八個团体的反应，以

① 一九三三年变为叛徒。——譯者

这个評議會为首的十六个团体表示贊成。表示反对的一般是无政府主义团体以及工团主义团体。九月十七、十八日第一次綱領章程調查委員會上，代表評議會方面出席的渡边政之輔述說了农業問題的重要性，提出建立耕种权和民主革命的要求。对此，总同盟的西尾末广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張。总同盟攻击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和它的政治研究会，提出条件說如果評議會、研究会参加，总同盟就不参加。組党前一日，总同盟政治部长麻生久声明总同盟退出这个筹备会。为了坚决保衛統一的方針，决定研究会會員以个人身分参加。这样，单一的政党才轉入誕生阶段。

撇开孤立的总同盟，日本最初的群众性的全国单一的無产政党“农民劳动党”的建党大会，于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在东京神田区明治会館开幕。“無产政党誕生了”的标語撒遍全市。会场处于警察的紧密包围之下。設置了严密的警戒网。从全国工厂、农村匯集前来的三十五个团体十八万組合員的代表們，公推須永好（群馬农民組合）为大会主席，川村保太郎（官業）为副主席，然后开始进行議程。小岩井淨朗讀了报告、党綱、党章和党的名称，最后三呼“农民劳动党万岁”，集結工人、农民、無产群众的政治力量的建党大会宣告閉会。会上，选出淺沼稻次郎为書記长，細野三千雄为會計。

不論从宣言中“以直接在政治上反映几千万工人以及無产群众的思想为目的”，或从政治綱領的“廢除無产階級彈压法，滿二十岁以上的男女应享有無限制的选举权，徹底裁减軍备……”等內容来看，这个党本身絕不是革命的先鋒党。尽管如此，政府因为总同盟既沒有加入，就認定它显然是“以實現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政党，遂以内务大臣若槻礼次郎的名义，在建党三小吋以后，無視事实，發布了禁止結社的命令。連一向反共的淺沼也因

此激憤地率先向內務省提出抗議。為資本家、地主服務的天皇政府本能地害怕無產階級的統一力量。當時有些認識的人都痛恨總同盟背叛工人階級而蛻化為天皇政府的走狗。

對於這次禁止結社的命令，評議會發出呼喚說：“絕不允許分裂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響應這一號召，日農立刻召開中央委員會，再度通過組織全國單一的無產政黨的決議。推選山上武雄、松本積善、庄原達、三宅正一、森英吉為籌備委員，並推山上為委員長。十二月十九日，以山上與川村保太郎的名義發出召開第一次建黨協議會的請柬。在它的第二次座談會上，儘管評議會、政治研究會、無產青年同盟自動放棄以團體資格參加，右派仍在賀川豐彥的帶頭下秘密通過決議，“排斥共產黨，組織現實的政黨”。這樣，丟開左派，以總同盟、日農、全國水平會為主，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三月五日在大阪建立了勞動農民黨。將評議會、政治研究會、無產青年同盟、全國水平社青年同盟等左派四個團體排斥於門外的勞動農民黨，選舉川村保太郎和山上武雄為主席，制定帶有議會主義、改良主義色彩的社会民主主義的“順乎國情”的綱領。

政府對於這個以杉山元治郎為委員長、由庄原達代行書記職務的新黨的結社活動，並未加以禁止。政府看清楚它的生來的社会民主主義的本質。只有在不超出社会民主主義的範圍下，天皇政府才會承認政黨結社的自由。

因為總同盟背叛了工人農民，從成立一直與總同盟合作的日農關東同盟，與總同盟斷絕了友好關係。岡部完介與平野力三在日農內部贊同總同盟鈴木文治、赤松克麿的論調。日農內部，以貧農、佃民、青年為中心的從基層進行統一活動的左派勢力和以中農為中心的根據幹部利益自上強行貫徹政策的右派勢力之間的對立，從這個時期起開始表面化了。但是，實際的領導

权已經轉到貧农、佃农手上。

第五届大会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起連續三天在京都举行。大会前一天，举行青年部成立大会，决定了“十七岁以上的男女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应享有集会、信仰、出版及其他政治上的自由”的綱領。而日农大会本身，也决定把“农民节”与“五一劳动节”合一，在綱領中提出了“建立耕种权”的号召，比創立当时有了显著的进步。

一、反对把全国人民粮食来源的土地濫用于投机、营利等目的，爭取制定保障实际耕作的农民使用土地的一切权利的土地制度。

一、通过組合的組織与活动，使农村無产群众摆脱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奴隶思想独立起来，与城市無产階級共同协力建設新文化。

大会通过了包括前項要求的宣言。接着，大会的审查委员会对于和总同盟进行联系、背叛了日农組合員、企圖建立右派政党的平野、岡部等人进行了审查。中間派的調解未能生效，他們終于率領山梨县、福岡县的一部分人退出会场，与日农分裂了。

其后，他們与北日本农民組合、大和农民組合、日本佃农同盟、能义八束佃农联合会等地方农民組合进行協議，于四月十一日創立了“全日本农民組合同盟”。北日本农民組合为下越农民协会一九二四年改組后成立的，是由須貝快天、玉井潤次领导控制新潟县北部和山形县的自耕农主义的組合。大和农民組合是中部日本农民組合的創立人横田英夫死后，当时与他共同花費了數万元組合費的森义一等人从該組合分裂出来，以岐阜县为中心組織的組合。能义八束佃农联合会是一九二五年以山崎丰定为中心产生的烏根县的組合。佃农同盟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在群馬、栃木县的农民間組織的，以坂本利乡为代表，它

是以后加入的。十月十七日，平野等为了迎接第一次普选，高唱“农民参加农民党”，創立了“日本农民党”。

这一分裂在組織上虽然損失不大，左派对于中間派提出的“造成分裂的借口的左派也有責任”的意見不得不表示妥協。其結果，产生了将日农实际領導权移到中間派手上的后果。但是，工人农民群众知道日农分裂的策动者是总同盟的干部，因此，不論在第五届大会上或在后来的行动中，絕大多數人都支持統一的方針。这一事实，尽管有統治階級的分裂政策作祟，一九二六年的佃农爭議仍可以作为它的实际証明。

一九二六年爭議事件达二千七百五十一件，十分之一的事件是地主收回出租土地，近半数为圈地禁止入內、查封青苗和查封动产，由此，也可以看出爭議情况的激烈。

日农在总部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新潟县木崎村爭議以及京都美豆村爭議、兵庫县加古川爭議、三重松坂裁判所包圍斗争、秋田小坂矿山烟害賠償爭議等斗争。在这激烈的全国性的斗争中，八月三十一日，除全日本农民組合同盟外，中部日本农民組合、神田农民組合、島根县佃农組合会和日本农民組合的代表們，在大阪举行了“佃农立法对策、全国农民团体協議会”。協議会反对政府的佃耕法案，議决制定以日农的“建立耕种权”为主的佃耕法。在这一运动中，神田农民組合改为日农广島县联合会，島根县佃农組合会改为日农島根县联合会，日农在全国范围的統一向前进展了。

繼这一成就之后，九月二十八日向全国發布了“發动建立耕种权示威游行”的指示。政府向全国警察局长發出电报說，“此乃企圖挑起內乱的不穩行动”。在大阪市，拘捕了日农中央常任委員以下直到支部干部一百七十余人，但是在中之島公会堂仍然举行了建立耕种权的講演会。在香川县，全部日农干部都遭

到拘捕，在通向高松的道路上，每不到两丈远就派置警察一名，向高松前进的农民到处与警察冲突，冲破了阻拦。在新潟县，结合木崎爭議發展成为大规模的示威；在米子市，发生了小学校的同盟罢课，滋贺、岡山、爱知、德島等較大的联合会几乎全部于同日发动示威，进行了斗争。

在全国性的示威以后，十月二十四日，在东京协调会馆的中央委员会上，劳动农民党分裂了。以三輪書記长为首的中間派和西尾等为首的总同盟，以及其他右派宣布退出，剩余的团体只有日农和制陶同盟。这一分裂活动引起日农的第二次分裂。杉山委员长在十二月十二日党大会上辞职。于是，劳动农民党推选早稻田大学教授大山郁夫为委员长，細迫兼光为書記长，重整陣容。

为了回答建立耕种权示威运动所遭到的全国性镇压，日农和劳动农民党于十二月一日与“解散国会請願运动全国協議会”合作，举行“解散第十届国会請願日”。这正是“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开始开展为群众性的运动，奠定了工农联盟基础”（高桥真树：“論日本无产阶级”）的运动。这一“請願日”遭到了禁止，但是，各地都掀起要求建立耕种权、团结权，要求言論、集会、結社自由的示威和集会。第二次“請願日”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十八日举行，第三次“請願日”于二月十一日举行，請願签名堆积如山。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从劳动农民党分裂出去的安部磯雄、吉野作造、堀江归一、赤松克麿等人，于十二月五日創立了“社会民众党”。看到無望列为社会民众党领导人的麻生、石山、三宅、須永等四人，組織了所謂“摒弃幼稚病的运动、恪守真正的阶级立場并真正掌握日本社会的现实”的“日本劳农党”。日农中的三宅、淺沼、三輪、須永等人参与筹划，細野、行政、河合义一、吉岡八十一、澤田清兵衛、吉田賢一、石桥源四

郎、藤本金助、宮川伊太郎等人轉入該黨。他們拒絕日農中央委員會的再三忠告，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于日農內部組織了“堅實派同盟”的分派。於是，日農不得已除石橋外，將淺沼等十二名堅實同盟派幹部以及聲明支持日本勞農黨的山形縣聯合會開除。這樣，日農又發生第二次分裂。

日本勞農黨三月一日在大阪創立“全日本農民組合”。其綱領一字不移地借用日農第五屆大會的綱領。這說明，他們并無自己的理論和政策，幹部們只為個人的利己打算而分裂出去；他們的目的就想使奮起的農民群眾感到迷惑，不知投靠哪個組合和哪個政黨。據說參加者有二府十二縣、五千人。原擬參加日農的島根縣佃農聯合會也參加了全日本農民組合。至此，日本的全國性的農民戰綫分裂為日農、農民總同盟和全日本農民組合這三部分。日本農民運動到了準備邁向新的政治階段的前夜。

一九 憤怒的火焰

——從“三·一五”到“四·一六”時期

——被賣掉的女孩挾着冷落的衣包，跟在人販子身後，被帶走了。母親哭腫了眼睛，穿着磨穿了的草鞋，佇立在寒風里眼睜睜地望着。東北地方各個火車站，每天都成為這類悲劇的劇場。同時，每逢火車經過，望眼欲穿地希望旅客把剩飯扔出來的孩子們的姿影，使人看了，悲哀無已。……這就是万象更新的“昭和御世”的初期農村的征象。

大正年間，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頂點，歌頌繁榮的日本資本主義，已為製造這樣農村的災難播下了種子。這就是經濟危機。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這一年，也是走在全面危機前面的

为金融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骚乱的序曲。

作为欧洲大战后果大为膨胀的信用贷款，由于贸易萎缩以及生产过剩，一九二六年末，使渡边银行和赤地银行宣告歇业。金融危机由此开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铃木商店宣告破产，台湾银行发生挤兑，东西二十八家银行也一律倒闭；最后，在四月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全国银行一致歇业，并连续三周停付普通存款。若槻宪政会内阁，虽然采取补偿震灾证券、接济台湾银行等措施，仍未能制止危机，于是把内阁让给政友会田中义一大将。政府贷款二十亿元给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第一等五家银行。国家与财阀彻底勾结起来了。为寻找解决这一危机的途径，五月间，在保护日本侨民的口实下开始向中国出兵。

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并未照顾破产的地方性小银行。因此，大、小地主在经济上遭到沉重打击，其中甚至有不少人生活都受到威胁。地主在这种打击下，企图用对农民征收苛酷的佃租和收回土地的手段来把自己所受的损失转嫁到农民身上。中农阶层的生活也逐渐恶化了。首先从新潟的三十町土地的圈地禁止入内揭起了暴动的火焰，香川、岡山、福岡、奈良、兵庫各地，未经一次口头辩论，地主即动员暴徒团、警察和执行吏实行圈地禁止入内，向佃农展开攻势。

在鸟取县，二月间举行欢送参加日农第六届大会代表的示威运动后，一千数百名农民冲进地主厩仪三家中，与警察冲突起来，全县的农民组合领导人遭到拘捕，三十余人以骚扰罪名被起诉。这就是山阴淀江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正是一九二七年不得不采取实力斗争的农民运动的序幕。得到鸟取四千农民支持的大山初太郎、松本积善等人，在全国声名显赫。五月，兵库县神户村的农民不顾圈地禁止入内的措施，实行集体插秧，与警察发生冲突，袭击地主的家，有一百六十名农民被逮捕，二十一人被

投獄。在鳥取县还發生了箕蚊屋爭議，因为地主查封蚕茧，組合充分動員了全体家屬，掀起了与警察、执行吏进行肉搏的斗争。香川县發生了因圈地禁止入内而举行示威、襲击了地主之家的土器爭議。在奈良县，地主会会长黑松利用正义团、白龙会等暴力团破坏組合，用圈地禁止入内进行威胁，打算暗杀爭議部长米田，使罹重伤后自己逃走，对此，組合以有条不紊的队伍进行斗争，终于取得一九二五——二六年减低四成佃租的胜利。以小林多喜二的作品“离乡地主”而知名的北海道富良野村磯野农場，也爆發了爭議。农民組合与小樽市工会联合組成“劳农爭議共同斗争委员会”，工人掀起抵制磯野的罢工运动。劳动农民党号召小樽全市市民起来保衛人权与言論自由，以反抗警察的镇压。把斗争的重点移于小樽市的佃农，坚持斗争达三十七天，在工人的支援和劳动农民党的統一领导下，终于获得胜利。这次爭議的領導人是北海道工农运动的先驅、建立日农北海道联合会的小学教員出身的荒岡庄太郎。长野县因为桑田霜灾和茧价暴跌提出了救济灾害、減免佃租的要求。新潟、岡山、秋田、宮城等县也掀起了廢除粮食檢查制度的运动。农民的要求已不限于佃租問題，逐漸向多方面發展。

日农进入了改变路綫的时期。日农經過一九二六年平野等右派与三宅、淺沼等中間派前后两次退出的經驗，拋开了机会主义；关于佃农爭議的組織与战术，号召“不要依賴訴訟，不要依賴法律”、“用統一的群众力量来解决”，站在全国农民运动的前列。这样，自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起三日間，在大阪举行第六届大会。大会宣言中提到“构成我国無产階級运动一环的农民运动面临着最重大的轉变期”，指出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日农还确定了新路綫的具体方針：使一切日常的經濟斗争和工人階級的一切斗争一同集中于“爭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在农民唯一的真正

政党……劳动农民党的领导下反抗专制压迫，积极参加全国的地方性的政治斗争，……与假无产阶级、日本农民党、社会民众党、日本劳农党……进行斗争”，促进全国工农总联合的阶级组织的成立，建立青年、妇女部和开展消费组合运动等等。在结尾中这样说：“如今才走上能够使农民得到真正解放的……斗争的第一步”。杉山委员长经过五年的辛劳，在群众称谢中辞职，改选了山上武雄。

农民运动转向全面政治斗争的路线，是由于对以往的“山川理论”的实践的批判而产生的。山川均的理论是这样：“尽管佃农从外表上看，可以视为一种企业者，但至少在被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即在佃农组合与工会之间，包含工人和农民的无产阶级意识，越来越鲜明。”他模糊了工人与农民的阶级性。因此，他企图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跳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要求来建立革命理论。针对此点，“我们的无产阶级党不应成为由各组合凑拢的政党，必须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战线的党。……必须把一切局部的要求最后转向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加以发展和统一。在以往由各组合为主体进行政治斗争的运动中，它的政治斗争总要为组合运动本身的利害所约束，很难进行真正的政治运动，因此，必须以政党为政治运动的主体，从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运动转向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运动，从以组合为中心的运动转向以政党为中心的运动”（“农民运动”十二号）。这一理论，是受到“福本理论”的影响，强迫群众团体支持政党的利己主义和弄不清所谓政党究竟指劳动农民党还是指共产党而言的“左”倾机会主义。

虽然，存在着究竟是劳动农民党或是共产党的混乱思想，但是，集结在日农下的农民群众，在思想上、战术上，都明显地转向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斗争路线，得到革命的进展。第六届

大会以后，七月間共产国际發表了“一九二七年綱領”，不仅山川理論与福本理論的“左”右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得到糾正，而且一九二二年的“使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直接轉为無產階級革命的序曲”的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也轉为“从民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迅速轉化”的路綫。关于农業問題也指出了“廢除君主制，沒收地主、政府、神社寺院的土地，制定累进所得税”的行动綱領。

在此以前，日本农民运动的指导理論發表于建設社出版的农民运动家的同人杂志“無产农民”上。但是，在日劳党分裂后，与三宅、川俣、淺沼、田所輝明等人分手的稻村隆一、安原剛、青木惠一郎、川村桓一等左派，从日农大会改为采用全面政治斗争的路綫时，即改用“农民运动”刊名出版。为了从同人組織走向大众化，为了使农民运动“从組合主义的政治斗争轉向全無產階級的政治斗争的方向”，筹划了这种理論杂志，它从当年四月开始，繼續出版至一九二八年底。这个杂志本身虽然受到福本理論的控制，却是日农組合員暢讀的左派理論的宣傳杂志。

“改变路綫”后的劳动农民党和日农，都把全面的政治斗争統一于“建立耕种权”的要求上，通过共同耕作、村民大会、农民代表者會議等群众实力斗争进行領導。这样，迎接了秋季的府县議會議員选举。日农在这次选举斗争中支持了劳动农民党的竞选綱領。劳动农民党的綱領集中一切斗争于“爭取政治自由”；它主張，一、把府县等自治組織从中央专制下解放出来，实行民主化；二、都市工人与农村貧农站在全体民众前列領導斗争，从政治上啓發群众。劳动农民党提出一百五十名公認的候选人，以十一万余票当选了十三名。較之日劳党的三名、社民党的二名、农民党的三名遙遙占先，得票数也較三党合計票数多二万余票。这一选举結果，从日农中有井伊誠一(新潟)、入江五郎(秋田)、长尾有(兵庫)、平野市太郎(香川)、沟渊松太郎(香川)、中

村光三(香川)、古川为吉(香川)、富吉荣二(鹿兒島) 八人当选。

秋季斗争中，爆發了当年被称为典型的爭議的北海道月形村爭議。六十五名組合員中十五名被查封青苗，于是采取了集中战术，拒絕村长的調解，借軍隊駐扎問題与未参加組織的农民結合起来，动员各家全部家屬，使妇女向地主提出抗議，由于对兒童的差別待遇进行同教員的斗争，在劳动农民党领导下举行村民大会，反抗村长、警察、小学校长、地主的協議会的侵犯和压迫，与大地主进行斗争。并且在减低电费、取消苛捐杂稅、取消小学校保护者会費、修改农产品檢查制度等要求上，同鼓动未参加組織的农民的农民大会和工会进行了共同斗争，这种系統的領導与战术發生了效果，获得了胜利。此外，北海道淺野农場、鳩山农場、岡山县船穗村的爭議也通过全面战术获得胜利。

显示了改变路綫的效果的政治斗争，积极支持“無产者新聞”，以劳动农民党作为农民的唯一政党，相繼發动了斗争。在支援工厂罢工方面，日农向海上全体炊事員的罢工輸送了食粮和战士。并且支持反对“国鉄”解雇六十五名人員的斗争，支持全日本鐵道职工組合的反压迫的斗争以及相繼發生的秋田和青森的罢工。同时还支持了加古川誠和会、撫养盐田、小樽的大罢工，在全国范围發动了要求团结权和政治自由的斗争。对于“太平洋工会會議”，决定派代表长尾有参加，但因政府拘捕了代表未能实现。关于反对干涉中国的运动，曾于第六届大会上決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中国革命，承認国民政府”，并决定派遣訪华团，但这受到政府的阻撓，未得出国。对于苏联革命十周年紀念，日农接到了苏联农業协会联盟邀請派四位代表参加的請柬，只能在复函申謝說，“現無出国自由，願与苏联結成兄弟同盟，为开展农民运动而奋斗”。同时，日农还在台灣开基地問題

上与日本政府进行斗争，与台湾农民组合加强合作。同时，对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五两日召开的台湾全岛农民大会，派遣山上委员长前往参加。对于朝鲜农民运动，也派出仁科一雄与色川幸太郎二人，支援全罗南道西南端荷永岛反抗地主压迫的农民暴动。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从年初就展开了日本最初根据普选举行的众议院选举的斗争。

一月二十二日，议会被解散，规定二月二十日为投票日期。日农以“减免佃租！建立耕作权！立即取消农民负担的苛捐杂税！”为中心口号，与劳动农民党一道，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劳动农民党提出了四十名候选人。

保障人权平等的最初的普选，经田中反动内阁之手，从开始就被沾污了。它成为彻底剥夺了工人、农民、无产群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反民主选举。从这时起，通过内相铃木喜三郎之手开始施行暴力政治，使革命运动进入长时期的风暴里。

政友会以暴力操纵选举，它的焦点集中于以大山委员长和上村进为候选人的香川县。上村作为一区的候选人，大山作为二区的候选人，与藏相三上忠造进行竞选。柳濑正梦制作的标语“选地主三上呢？还是选农民的朋友大山呢？”，深深印入农民的眼帘，有力地呼吁着。一月八日，大山决定到当时的内阁、政友会的根据地香川去！一月二十六日，刚刚到达香川，就来到琴平町劳动农民党县联大会上致祝辞，但是还没有讲到十分钟，即被临场监视的警官勒令停止。可是举出了四位县议员的香川农民，情绪很高涨，开始了并不愉快的前哨战。大山在东京与大阪号召“把自由给一切人民”的政见演说，未能讲到最后。在数百名劳动农民党员送别下离开东京车站，重新赶到香川战场时，发现形势更加恶化。政友会三名候选人中有一名放弃竞选，被政

友会收买的藤本金助由日本劳农党提为候选人。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群众之手，准备与三上进行正面决战。

有的講演人剛剛开口說“諸位！”就遭到制止。候选人上村只是因为向臨場監視的警官質問制止的理由，即被拘捕。赶来应援的长谷川如是閑和河上肇，也都对于这种殘暴的压制大为憤怒。無法講演的講演会，被一一勒令解散。五百多名参加运动的人被傳到警察署和檢察厅，仿佛封建制度下的白色恐怖时代又出現了。因伏石爭議被投獄的前川正一，二月十八日剛从刑务所釋出，立刻就去支援大山，被驅逐出县境。上村終于被起訴。

“……‘那一天終于来到了。专制政府的本質已暴露無遺。逆激流而行愈益壯烈。同志們，向下一个斗争猛进吧！大山。’

給留在东京党本部、致力于后方工作的同志們拍出以上的电报后，我在琴平町某旅館的房間独自靜坐，心里仔細回顧了最近几周間我們經歷过的苦战苦斗的选举战的道路。

关于我落选的最后消息傳到我的选举事务所，已是前一天夜晚（二月二十二日）深更的时候。在四壁貼滿标語、口号、講演会的程序、报告、应援書等的事务所的二楼，撤掉两室間的隔扇，几十名参加运动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席地而坐。当他們知道从当天早晨他們就預感不安的消息被肯定地証实了的时候，大家的坚强的面孔上都流露出墮入万丈深渊的表情。严肃的沉默，繼續了数分鐘。……不知从哪里，依稀傳來近似哽咽的声音。……这反映出农民灵魂的形象，他們对野兽一般的官宪的暴行和反对党的陰險卑劣的陰謀活动……蘊藏着無限深刻而持久的憤怒与詛

咒。我甚至感到，从他们眉间刻着的几条皱纹也可以看出这种沉痛的决心。

‘现在斗争刚刚开始！’

……我的心只是浸沉于无法形容的激动里，甚至充满景仰的感情。”（大山郁夫：“斗争的足迹”）

大山、上村都落选了。官宪表面上说检举到选举热潮过去以后为止，但是，到了三月还继续检举参加斗争的农民。劳动农民党县联委员长真屋卯吉和对被告上村作了有利证言的藤泽平太郎，都在审判庭上被检举。朝仓、宫井、羽原、杉泽、为广等年青的农民组合书记也被检举。患病的朝仓、宫井等在监牢中开始同盟绝食。被检举的人被强迫退出劳动农民党。前川被禁止踏上故乡的土地。这样，这一年对日本共产党进行的“三·一五”全国大检举，已自香川暴力选举时开始。

劳动农民党在京都地区当选了山本宣治和水谷长三郎二人。它在全国得票数为十八万九千七百五十票，据说其中农民票为十四万，工人票为五万。其余四个无产政党合计得票数为九万，远不及劳动农民党。

三·一五镇压时，借口违反治安维持法镇压了一千多名工人、农民、共产主义者的田中反动内阁，接着对劳动农民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等团体，以它们在日本共产党的指示下进行活动、纲领相同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理由，于四月十日，片面地勒令解散。并且用天皇大权的紧急敕令的形式将“治安维持法”修改加重为死刑的法律。资本家、地主的天皇制政府把共产党与国家统治势力的斗争视为“破坏国体”，企图破坏共产党。

三·一五镇压以后，每年两千余件的佃农争议下降为一千八百六十六件。借此机会气焰高涨的地主，强行收回土地、圈地

禁止入內、查封青苗和查封动产。

日农向全組合發出号召說：“回顧总选举的結果，使我們痛感战綫的分裂使無产階級的斗争力量被削弱到如何程度，而全国农民团体的及时合并乃是目前最紧急的任务。”四月二十、二十一日的第七届大会上也強調了农民組合的合并。日本农民組合与全日本农民組合两組合，經過一年半的分裂局面，复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大阪举行合并大会。这一合并，是战斗的农民群众通过斗争实践体会到战綫的分裂何等不利后才促成的。新組合命名为“全国农民組合”。重新选出杉山元次郎为委員長。其綱領、主張与前日农时無甚差异。

七月七日，全农的“建立全国性的农民組合”的方针經岐阜的中部日本农民組合(中間派)的提議，踏上实现的第一步。經過这一提議，在东海农民組合(爱知、中間派)、日本农民組合总同盟(东京、社民系)、中央农民組合(爱知、中間派)和全农参加下，举行了“全国农民团体會議”。但是，會議仅限于对圈地禁止入內的風暴商量提出抗議而已。傳聞全日本农民組合同盟接受了宇垣陆相和有馬伯爵的援助，它們沒有参加这一會議。

在全农內部，旧劳农党派的爭取政治自由劳农同盟派和日劳党派的团结很有困难。这种原因使总部里繼續存在着机会主义，就在这时候，政府借口将举行天皇大典，在全国檢举了七千余名工人、农民，利用东京地区的大演習杀害了十余名工农运动家。在这暴虐的镇压中，岐阜七千余名农民闖进县厅，与宪兵、警察进行战斗，掀起了反对切断犀川的斗争；作镇压佃农爭議暴动的假想演習，宮城县登米警察署向日农前谷地村丰里支部發出挑战書，引起了十一月四日的斗争；遭到破坏的香川县联合会为恢复这一組織也掀起了斗争……尤其是在香川，六月里拘捕了四名县議員，强行迫使辞职。对运动战士的檢举和驅逐出县，相

繼發生，強迫脫離勞動農民黨或日農支部和經常跟踪干部的手段，也加強了。加之，通信被剝奪，土地被剝奪，提高佃租，限制得人們不得轉動。甚至為恢復香川縣聯合會而派出的農民組合和工會的代價，在武裝警察戒備森嚴的高松登陸後，也不能與農民交談。這樣，以一萬二千有組織的農民見稱于世的日農香川縣聯合會徹底被警察的暴力摧毀了。於是，農民運動乘着與警察進行實力鬥爭的機會，集中到土地問題的解決上，公開宣傳“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和“建立工人農民的政府”的要求。

十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這三天里，在東京本部公會堂舉行了“新勞農黨”的建黨大會。大山郁夫議長致詞說“我們的出路不是戰勝，就是戰死！”；河上肇博士吶喊說，“我們比一百個合法的政黨多幾十倍的力量”，使整個會場沸騰起來。第三天，大會被命令解散。對新黨也發出了禁止結社的命令了。至此，階級的政黨只剩下唯一的共產黨，而合法的政治活動只有依靠“爭取政治自由勞農同盟”進行鬥爭了。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在狂風暴雨里召開的全農第二屆大會上，由小畷井淨、前川正一就運動方針作了報告，其中提到：“目前的特徵為一部分領導人的右傾退卻和與此相反的工人農民的普遍左傾。農民群眾為要求把土地交給農民、建立工人農民的政府而鬥爭。”對合併後的全農的機會主義進行了批評和報告。大會重新提出“把土地交給農民”的主張，顯示出戰鬥的全農在政治上的進展。

這個時期，實川清之（千葉）、町田惣一郎、山本虎雄（長野）、田邊納、西納楠太郎（大阪）、河合秀夫（三重）、守田道輔（山口）、林田哲雄（愛媛）、山口勘一（兵庫）、野崎清二（岡山）、石田樹心（福佐）等人被選入全農中央。

當年三月五日，國會上唯一的工人農民的代價山本宣治議

員，被辱罵為“國賊”，在神田光榮館被無賴漢刺死。四月十六日，又吹起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檢舉日本共產黨員的風暴。與全農有關的也被起訴了三十餘名。八月八日，由於稻村隆一等人的計劃，大山、細迫、上村等以共產黨已被破壞為理由，突然宣布“建立新勞農黨”。爭取政治自由勞農同盟開除了大山、上村、細迫、河上、小岩井等人。無產階級各政黨的分裂頻繁發生。全農左派集團擔心新黨的建立將導致全農的分裂，主張“不以組合立場支持任何政黨，個人可以自由支持政黨，反對因政黨關係造成組合內部的對立，組合應擴大加強，全農第一”。這種全農第一的思想即是“工會主義”的秘密輸入，後日受到日本共產黨的批判。

新勞農黨受到全農關東地方協會和三重、島根、鳥取、千葉、新潟等縣縣聯合會以及青年部的反對。在這種混亂狀態中，青森、山口、大阪、兵庫發生反對收回土地的激烈鬥爭。特別是秋田縣的前田村爭議發生於當年十一月，成為一九三〇年的鬥爭的出發點。地主是只限於這個地方的大地主村長。六十戶佃農從一九二五年以來五年間團結在日農的旗幟下堅持着鬥爭。鬥爭已歷五年以上。十一月二十六日，米內澤警察署準備逮捕屯駐於五味堀部落中的爭議團員。消息傳來以後，團員用日本刀、棍棒、竹槍武裝起來，婦女用蛋壳裝了灰做成迷目彈，把準備拋擊的石子堆積成山。陣地設於前臨大又川的丘陵上。爭議團本部前面的水田放滿了水，本部築起了工事。在露天準備了四個洗澡用木桶，燒起沸騰的水。設置了臨時搭起的火警瞭望樓。夜間也安排了崗哨。警察隊與爭議團員對峙了兩日，終於警察隊發動了進攻，展開了混戰。爭議團吶喊着血戰了一小時，計有八名警察負重傷，其中一人被削掉一臂，三名團員負重傷。領導這次爭議的是岐阜出身的可兒義雄，他於足尾銅山罷工中受到鍛

練，在假釋中，一面支持秋田縣尾去澤礦山罷工，一面投身于農民運動。他不忍犧牲更多的人，遂在警察包圍下洗了澡，與村民舉杯告別，挺身自首，被投于大館監獄中。之後，爭議得到了勝利，取得一萬元爭議費用，解除被查封的稻子、土地和動產，還重新商定了佃租。

這樣，反抗鎮壓的工人農民的吶喊逐漸地悲壯起來。

你為黨光榮犧牲，
我們向你宣誓：
“三·一五”燃燒起怒火，
白色恐怖必須冲破。
血債血還，
以劍還劍，
工人農民，要為保衛共產黨奮鬥到底！

（吊渡邊、山宣之歌）

燃燒着憤怒之火的這樣歌聲，漸漸低沉下去，從農民群眾的身邊消逝了。

二〇 走向戰爭的道路

——全農全國會議的鬥爭

黃價下降，跌到每貫兩日元以下。收入不夠抵償生產費。一年間的辛苦勞動，仿佛只是為了向種籽店、肥料店等商人欠下巨額的債款。“不景氣”的沉重感覺日日夜夜壓在心头。不僅是成年人有如此感覺，連兒童的心境也非常沉重。這就是每個農村的實際情況。所謂“獎勵國產”、“緊縮政策”的標語，貼在官廳

里，写在小学校的黑板上。因为，当时政府被迫执行的政策是：如果不厉行节约、积累国家黄金储备、解除黄金输出禁止令，这种不景气将要无限期继续下去。日本从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起，从号称“咱家大将”的田中义一换为号称“狮子首相”的滨口雄幸执政，已面临深刻化的世界农业危机。

滨口内阁在一月十一日解除黄金输出的限制，把货币储备引入国际自由经济中，使资本极端集中到垄断资本手里；另一方面，用彻底的“产业合理化”，即实行低工资和大规模解雇办法压迫工人阶级的生活。宪政会的紧缩政策就是忠实地奉行着这种金融资本的要求的。

政府标榜这种政策，以“举国一致，共赴国难”为口号，举行大选，征求国民的信任。这时，全农总部的注意力，完全为内部分裂的危机夺去，对于这次选举漠不关心。

日本共产党以“把土地交给人民”为中心口号，从农村有关方面提出平贺寅松（千叶）、上田音市（三重）、山田有干（冲绳）三人为候选人。其中缴纳了竞选保证金的只有上田一人。

解除黄金输出禁令以后，都市中由于实行“产业合理化”的结果，工人被解雇，失业增加，危机全面地扩展和加深，工人的罢工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

就在这种迅速地不断加深的农业危机中，于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三日间，在大阪天王寺公会堂举行了全农第三次大会。全农左派团体的“全农有志者团”提出“把土地交给人民”、“全农第一主义”的口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斗争，在埼玉、滋贺、富山、岐阜、长野等县，已经出现暴动化的倾向。因此在“农民代表会议和农民委员会的活动”这一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一切要求，主张有必要动员大众进行斗争。劳农党反对这个主张，大众党党员也采取同样论调。虽然大会陷于混乱状态，但是左派势力壮大

了，前川正一、吉岡八十一、河合秀夫、西納楠太郎(大阪)当选为总部常任委員。

蔬菜 and 茧的价格暴跌。紡織女工的工資大大被減低，而且有许多人失業，还乡就农。还乡就农的不只是女工，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不用說，連某些大地主也开始淪落了。农会、农業組合及其他农業团体向县政府及中央政府請求給予“农村救济”，开始举行群众性的村民大会和县民大会。共产党和全农左派团体的政策和战术的正确性，逐渐获得了証明。

山梨县的奥野田、落合，新潟县的王番田、黑川、大蒲原，山形县的大寺，熊本县的郡筑，秋田县的下井河、沼館，北海道的蜂須賀农場，大阪的下瓦屋等地的斗争，标志着这一年斗争的特点是流血斗争。

在奥野田，为了死守被法庭判决归还地主的仅仅一反八亩的土地，十八名佃农坚持了斗争。暴力团要来强种谷子，被全农方面用鉄鍬、鎌刀、石头驅逐回去，地主被打了头，昏倒了，警察实行了紧急召集。全农县联合会也向全县的农民組合發出号召：“到奥野田去！”动员七百人，终于夺回土地。

在王番田，十六家农户襲击了提出收回土地訴訟的地主，宰杀鷄犬作血祭，讓地主盖血印盟誓，撤回訴訟。因此，三十多人被控告犯了刑事罪。

大浦原爭議是涉及村松乡的一个町^①和四个村的反对地主收回二百六十町步土地的大規模斗争。

在郡筑地方，借着續訂租佃契約的机会，为反对提高五成佃租展开斗争。在总部直接领导下，清洗了运动把头，从五月起坚持斗争到年底的反对查封稻子为止。

① 町是日本行政区划单位之一，約相当于中国的鎮。——譯者

养蚕农家也起来斗争。政府虽然对紡絲资本家伸出了救济的手，但是对于因茧价暴跌到一文不值連生活都难以維持的养蚕农家，却始終缺少对策。所以，在长野、山梨、山形等县，发出了呼声，要求全部豁免旱田錢粮和債款、稅款，要求国家保証生活，要求政府給予無利息無限期的貸款，反对农会，要求产业組合自主化；并且在各地召开了农民大会。

失業归农者和农村工人的問題也發生了。失業者还乡归农，促使收回土地的事件增多，佃农和失業归农者、农村工人的对立不断加深。为了消灭这种对立和加强工农联盟，在长野县，紡絲女工因为拖欠工資的問題和农民組織了共同斗争；在兵庫、福岡、富山、新潟、北海道、广島，农民同工会进行了共同斗争。农村工人組織化的問題被提到議程上来了。

这样激烈的血战，大部分不是全农总部领导的，而是青年部和地方協議会领导的。小林多喜二的小說“离乡地主”以及油画“奥野田爭議”，是从这种农民的斗争中产生的作品。中西伊之助的“一个农夫的家”、中野重治的“鉄的故事”、藤森成吉的“十字架上的茂左衛門”等，鼓舞了这个时期的农民斗争。

一九三〇年被称为近年来稀有的丰收年。但是在这样时代，連丰收也給农民增添了不幸。在作为消費者的工人的手中沒有購買力的紧縮政策下，米价暴跌，农户的經濟周轉陷入無法拯救的凄惨状态。由于这种痛恨，十一月十四日，濱口雄幸在东京車站遭到了狙击。

第二年即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四月，濱口內閣下台，換上了第二次若槻內閣。紧縮政策的破綻越来越扩大了。虽然各种行业陸續地成立了統制銷售的卡特尔、托拉斯，但是这不过使日本經濟的壟断化愈益强化，沒有买主的生产产品越来越增多。这种过剩的商品只有通过“向大陆擴張”去找出路。九月十八日，

終于公然燃起“侵略滿洲”的火把。

战争一开始，軍需工業就活躍起来，形成通貨膨脹。由宪政会內閣之手已經造成了財閥壟斷，这时候需要的是能使壟斷資本的腰包更加肥滿的政府。到十二月，政友会犬养內閣出現了，不久后再度实行禁止黄金輸出。

这一年的歉收使米价上漲。战争、軍需工業和通貨膨脹，开始把农村的失業者吸收到軍隊和都市里来。于是，开辟了农村被拖进战争政策的道路。

反映着这种历史的现实，农民运动中左右两派的色彩和对立，也从这一年起变得極其鮮明。随着代表資本家、地主利益的軍閥、官僚的天皇政府法西斯統治的加强，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轉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已經看清楚新劳农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化的細迫、小岩井、河上、上村、神道寬次等人，發表了“發展的解消論”；还有維護左派傳統的人和他們一起脫党。这样，在农民运动中也出現了左派革命势力对于極右派法西斯主义者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对立。

当时日本共产党主張，“無产階級党的具有革命方針的細胞組織，对于农村中最有力的战斗部队‘全农’，應該承担它的革命化的任务”，批判了全农內部的“有志者团”主張的“全农第一主义”，明确了同社会民主主义者斗争的基本要点。

这种批判實現为行动，組織了“全农战斗化協議会”。由稻岡暹、伊东三郎、涩谷定輔、青木惠一郎、岡山四郎等創刊全农战斗化協議会的政治性宣傳杂志“农民斗争”。从三月七日起四日間，在大阪举行了第四次全农大会。大会从第一天就以左右两派的激烈爭論和对立开始。在大会上，右派向战斗化協議会进行有計劃的攻击，他們在会場內安排了暴力团，看到討論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向左派代表施加暴行。警察以这种混乱情况为借

口，拘捕了四十多名左派代表，阻止左派当选为負責干部。但是左派的認真的討論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通过了战斗性的运动方針。这个方針的内容就是：全农“作为以貧农为基础、广泛动员中小农的組織，要求把土地交給农民，一笔勾銷欠款，^并反对稅款和壟断价格，加强农民組合的統一战綫和战斗性，工农进行联合战斗，徹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資本家地主的政府，树立工农政府，为維護日本农民組合成立十年来的革命傳統和反对合法政党而斗争”。一九三二年的新行动綱領指示了农民的要求和今后农民运动的方向。战斗的农民在左派的理論和政策中找到了自己的解放道路。

在大会上，右派想完全逐出左派的計劃失敗了。四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的全农扩大中央委员会就是做好充分准备的右派对左派的宣战布告。全国大众党农村对策委员会，四月二日在东京的田所輝明、平野学等人参加之下，以吉田賢一为主席决定：“全农总部由合法政党方面控制；通过決議支持合法政党；对大会决定的运动方針加以大修改，強調在合法政党下的工农联盟；由大众党的三宅、田所和劳农党的稻村担任起草工作；夺取总部，把地方活动集中于大众党农村对策委員和律师团”。由于大众党和劳农党的右派联合陣綫的攻势，左派在會議的第二天全体退出会场。这样，全农总部完全被右派所控制。

左派另行举行會議，以山梨、千叶、长野、爱知、三重、奈良、兵庫、宮城、大阪（志願者）、山形等十县县联的名义發表声明說：“右派以反动的策略夺取了总部；为了發动广大农民参加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为了按照农民委员会的活动方針排除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斗争。”全农青年部也發表了声明書，抨击右派干部的非法行徑。

对此，右派合法主义的岡山、德島、京都、和歌山、群馬、宮

城、秋田、新潟、青森、静岡、大阪等十一县的县联，也發表了使自己行动合理化的反对声明。岩手、青森、秋田、宫城、新潟的东北地方協議会也与此同一步調。趁着这种形势，右派說西納楠太郎(大阪)、石田树心(福岡、佐賀)、町田惣一郎(长野)、柴田末治(爱知)这四个中央委員是組織临时总部的主謀者，把他們从全农开除出去。

五月一日劳动节那天，全农山梨县县联执行委員八木庄吉和其他两名書記提出“全农分裂的危机和我們的任务”的提案。它的内容主張保衛全农；不要形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独裁，要求全农内部的左派在全国范围团结起来。贊成这个提案的全农青年部和近畿地方協議会在七月三日和六日聚在一起，通过決議，召开“改革全农、反对强制支持劳农政党的全国會議”，謀求全国性的左派的团结。

这个會議于八月十五、十六两日在琵琶湖畔举行了。會議規定为改革全农的斗争組織，为了领导它的日常斗争設立了書記局。以后在十一月七日，全国書記局把这个全国會議規定为“全农内部革命的反对派”。

决定全农全国會議的性質的第二次代表會議，于第二年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十五、十六两日，在千叶县东葛飾郡国分村举行。

全农全国會議作为全农内部的革命的反对派具有自己的运动方針、規章和組織。一般运动方針的要点如下：“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对立、资本主义国家經濟危机的加深，使阶级斗争尖锐化起来，农民的貧穷和对立也尖锐化了。全农全国會議不仅是具有革命傳統的全农内的多数派，而且把無产阶级的朋友貧农組織起来。这个广大的階層是摺弃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組織化的。全农全国會議是以半無产阶级的貧农为

主要构成部分的劳动农民的組織。它不仅仅是维护佃农利益的团体。它不但对地主进行佃耕斗争，还进行反对债款、壟断价格的斗争等，并向资产阶级的反动統治进行斗争，是农村中唯一的革命組織，领导日益激烈的农村革命斗争，具有争取农民向无产阶级靠攏的任务。这是一种群众性組織，成为农民委员会活动的核心；进行这种組織工作，組織农村无产阶级也是我们的任务。在这种基本的任务之上，必须广泛組織争取农村劳动群众的日常利益的斗争，大力开展反对法西斯独裁的危害的斗争，要求立即从中国撤兵，为保护苏联和中国革命，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把维护资本家、地主的利益的战争轉化为反对资本家地主的阶级战争而斗争。”

这样，农民运动不論在政策上或組織上都提出了巨大的轉变方針。

在这以前的农民組合是佃农組合，它的运动是佃农运动；这次把它發展为以贫农为中心的整个农民的組織和运动。特别是提出了农村工人組織化的問題，不仅指出了像以前那样对地主斗争的方向而且指出了对资本家斗争的方向。“农民委员会活动”被提出作为农村的群众性的实力斗争的基本战术，規定必须以农民組合、特别是以全农全国會議为它的核心。这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發生之前，在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机之中，进行流血斗争的日本农民运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轉变。

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共产国际西欧局發表“关于日本情勢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綱領”（“三二年綱領”）以前，全农全国會議是对強調土地革命已經完成的“劳农派”理論的積極的批判者。这个功績归于以“二七年綱領”的理論与行动而培养起来的野呂荣太郎的光輝的理論领导。“三二年綱領”指出，“天皇制度国家机构成为現在剝削阶级独裁的有力的支柱”，規定日本

革命为“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轉化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全农全国會議第二次全国大会把日常斗争的指揮部設于地方協議会和县評議會，它的統一領導由全国委員會执行。这是在敌人的激烈的攻势之中所采取的非常体制，分散領導工作，以便可以机动地行动。

同时，选出了上田晋市(三重)为全国委員長，石田树心(福佐)为常任全国委員，篠原源吉(宮城)、若林忠一(长野)、斋藤国定(新潟)、城宝光(富山)、柴田末治(爱知)、叶凸(大阪)、森胜治(兵庫)、藤本忠良(奈良)、野崎清二(岡山)、上瀧繁(福佐)等为全国委員，决定創刊机关报“农民新聞”。

在这里，有必要就新采用的“农民委員會活动”加以叙述。

农民委員會活动是为爭取农村的广泛的民主要求的斗争形式，它本身不是特別的組織。因此，全农全国會議的部落和町村組織是以貧农为中心的农民組織，以这个組織为主体展开农民委員會活动。它是这样一种实力斗争形式，动员全农全国會議以外的广大的無組織的农民参加一切农民运动。这是以前的农民大会、村民大会發展起来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它在大众規定的範圍內拥有执行权，但是并不是用以代替町村自治团体等权力机关的、另行組成的永久性的自主权力机关。用这种斗争方式进行了爭取农民各种要求的斗争：从以前的要求减租的斗争，以至反对拖欠工資，反对壟断肥料、电灯費、日用品价格的斗争；从还債問題，整理欠繳稅款問題，以至政治上、教育上的民主要求。部落解放运动也提到全农全国會議上来。

在宮城县丰里村进行了救济失業的斗争。說明救济失業的修路工程不是仅仅有关失業者的問題而是有关全部村民死活的問題，征集了三百五十个人的签名，由其中选出委員，組成了农

民委员会。五十多名委员拥到村公所去。村公所看到新选出的这班人与以前农民组合的人不同，感到惊讶。经过几次交涉，他们才接受了“把工作移交农民委员会管理”的要求。这个农民委员会还选出工程处理委员会，担当工程管理工作。

长野县箕轮村反对拖欠工资的斗争情况是这样的：小林纺织工场拖欠工资达两年半。在全农上伊那地区协议会的支持下，大家召开了职工父兄大会，一齐拥到工厂厂主的家里，交涉的结果使厂主发了一成工资。接着又举行了有全体职工父兄参加的大会，再度向工厂厂主交涉。这个斗争还扩展到中箕轮和西箕轮村的其他拖欠工资的工厂。

在长野县西箕轮村，进行了借款斗争。贫农欠着高利贷银会公司的款。在照例按年取息的时候，全农西箕轮支部召开了“欠款人会议”，通过决议，延期付息，拥向其中最大的一家公司“德有社”进行了交涉斗争。

在秋田县西尾村，为清理欠缴税款问题展开了斗争。关于清理这个村的贫农欠缴税款问题，全农仙北地区协议会在三天间动员了一百五十名农民，拥到正在开会的村议会，同时举行了农民大会，选出执行委员，迫使停征欠缴税款，并且豁免杂项捐税一万七千日元。

农民委员会“必须由斗争委员会、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组织而成；主要是把农民中的反地主、反资本家的势力组织起来，采取直接的群众行动来解决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根据农民的自主的要求团结起来。……农民委员会所以采取全国的形式，是因为在开始用直接行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和采取全国的农业革命形式的时候，它将成为群众行动的组织。这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业革命的实践，意味着农民参加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的斗争中去”。（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农民新聞”第一号)

在全农全国会議派的这种进展中，全农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在东京协调会館举行了。議長杉山元治郎在开会时說：“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坚决打击左翼派系，坚持斗争，……树立正确的方針，結合实际情况对地主斗争……。”在这个大会开始以前，脱离总部或被总部除名的如下：在府县联合会中有宮城、山梨、富山、茨城、福岡、爱知、长野、大阪、兵庫、千叶、三重、埼玉；在地方協議会中有关东、北陆青年部总部；在中央委員中有湯淺次作、三枝一保(山梨)、西納楠太郎、石田树心、町田惣一郎、柴田末治等。这个时候，曾經是鼓动家和旧劳农党同志的前川正一的理論，也極端曖昧不清，招致了理論上的分裂。結局把全农全国会議派逐出会外，“农賊”控制了会場，为反动統治服务。这个时期，向全农中央部提名的有佐佐木更三、大屋政夫、八百板正、平工喜市、江田三郎、师岡将雄等。

事实上，全农和全农全国会議完全分离了。赤松克鷹、平野力三等“基于一君万民之国民精神”，組成了“国民社会党”。一九三一年，由新劳农党和全国大众党合并成立的全国劳农大众党，通过了反对战争的決議；但終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与社会民众党合并，产生了社会大众党。它声称“为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日本，必須保衛日本在滿洲的权益”，支持侵略战争。

为什么合法政党和全农这样向右轉并且社会法西斯主义化呢？这是因为，一九三二年是日本資本主义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一年。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东北地方和北海道大歉收，缺粮的农民、鬻卖女兒的农民陸續出現。农业危机的不断加深，給社会带来了不安。农民的斗争随着革命的浪潮高漲起来。要求救济农村的呼声遍于朝野。二月九日民政党的前任大藏大臣井上准

之助、三月五日三井財閥巨頭岡塚磨，被“血盟團”團員暗殺。五月十五日，發生了“五·一五”事件，陸海軍的青年軍官和一隊農村青年敢死隊，槍殺了犬養首相。血腥的暗殺事件相繼發生。這一切都是要求打倒反日本國體的自由主義，要求救濟農村和展開侵略中國的軍事行動的擁護天皇制度的侵略主義恐怖行動。

六月，東京向島六千名陷於飢餓狀態的失業者開始示威請願，要求政府配給官米。在七月二日舉行的第六次國際合作社日，由於關東消費合作社聯盟的倡導，五百人的示威遊行隊伍，擁到農林省要求按每升一角七分的价格發放政府官米。在八月一日的國際反戰日，各地舉行了突擊隊的示威，不論在城市或鄉村，都熱烈地展開了“要求大米”的運動。

接替犬養內閣上台的齋藤重臣內閣，八月召開了救濟農村國會臨時會議，勸導農民自力更生，九月使農林省作出了農村、山村、漁村的經濟更生計劃，發表了由政府收買國內四百九十萬石大米以安定米价的辦法和以工代賑的土木工程計劃。一方面，它相繼逮捕和監禁了日本共產黨的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幹部。

全農全國會議計劃於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三日間在東京召開全國委員會，但是因為被鎮壓的緣故沒有召開成功。非合法派於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日間秘密地舉行了第一次全國委員會。合法派認為這個會議不是正式的會議。合法派與非合法派的對立在“五·一五”事件以後，逐漸加深起來。

非合法派的全國委員會重新討論了農民委員會活動的方針，使它易于具體理解。同時，決定以“部落發起人活動”作為這種活動的原動力，並提出創刊“部落新聞”的問題。為了加強東京的合法本部，解除石田樹心本部常任委員的職務，由山口勘一（兵庫）、福田（群馬，全會青年部長）擔任常任委員到京就任，並且由倉木達一（岡山）、伊達信、土門拳等任書記。

因为軍事通貨膨脹开始，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是危机已經达到最后阶段的一年。产业組合按照政府的經濟更生計劃訂立了产业組合扩充五年計劃。与此同时，各地产生了“产业組合青年联盟”，还誕生了产业組合青年联盟全国联合会，它自居为“农民合作运动中产业組合的实践的批判者”。西尾爱治(鳥取)到东京担任这个全国联合会的委員長。在长野、福岡、山口、靜岡、爱知、千叶、北海道等地，这个活动活躍起来。“大日本青年团”的活动在全国範圍内也很活躍。这些組織都是半官半民的極权主义的强制性的农村青年团体。农村自治性質的同盟發展成为“农本主义联盟”。从一九三一年掀起政治运动的长野县的长野朗等人的“日本农民协会”与和合恒男等人，再加上极右翼皇道主义的恐怖主义者权藤成乡、橘孝三郎等人，組織了“自治农民协会”。他們發起了向国会請願运动，“要求救济农村，实行延期償付令”。請願的内容是以下三条：“农家的負債延期三年后償还；补助肥料資金每反地一元；补助向滿蒙迁移費五千万元。”

在这种反动化的趋势中，以广大农民为基础，全农全国会議进行了农民委员会活动。例如，在长野县五加村成立了赤色消防团；在千叶县，于一九三二年底把糯米送到关东消費合作社联合会，动员群众舂成“工农团结餅”。各地的斗争逐漸移向群众性的直接行动。全农全国会議于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二月五日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委员会，但是立即被迫解散。第二年四月五日在东京龟有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全部被逮捕。在本部方面，事前知道要發生这种事情，在地下召开了第三次全会全国代表會議。全会在各地被視为共产党的外圍組織，志士被捕入獄和以破坏組織为目的的檢举事件相繼發生。

这个时期，在东京麴町櫻田大楼中的合法本部，以山口勘一为中心，倉本达一、服部知治等人以書記身份留在那里，每天和

來訪的警視廳的特高刑事打交道。其他的書記都是非合法的了。後來，福田在這年八月因結核病逝世，山口被投入獄中，服部轉入地下，事實上合法本部已被封閉。

由於六月間佐野學、鍋山真親的轉向，七月間三田村四郎、高橋貞樹的轉向和對全會的一次接着一次的鎮壓等，全會合法派決心要清除非合法派。九月二十二日佐倉町的千葉縣聯合會通過了“排除採取非合法的立場的人、清除作為共產黨外圍團體的決議”。為了考慮如何重建被破壞的組織和維持合法性，西納楠太郎、石田樹心、町田惣一郎等在青木惠一郎的策劃之下，同合法派採取同一行動。松本三益、宮內勇、森憲隆、永原幸男、隅山四朗、種村善匡等地下領導幹部反對這種合法化。由於青木的活動，終於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在千葉縣市川町召開了全國代表會議，討論了“重建合法的全會”。這次會議在警視廳特高刑事監視之下，討論了如何合法化的問題，從全會第二次代表會議的運動方針中，削去了革命的方針，大大地倒退了。

這種倒退，因為這年年底非合法書記局多半被逮捕，更加擴大。第二年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五月，全會俱樂部的宮內勇等組織了日本共產黨的支派——“多數派準備委員會”。他們十月間被檢舉，全會事實上已經消滅了。

合法派的倒退已經是沒有限度的向右轉，這種傾向也發生在全農內部，在這年十二月甚至有人聲明“以基於皇道精神完成農村共同體為目標”，脫離全農，組成了“皇道農民聯盟”。因此，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東京召開的全農第七次全國大會，是剩下了僅有一點點農民自主性的最後的合法性大會。黑田壽男在開會的時候說：“地主們的自私自利對於使農村陷於今日貧窮狀態應負一部分重大責任，中農的法西斯運動毫無建設性計劃而且純粹是破壞性的。處在這樣雜亂無章的運動之中，

只有我們全农作为唯一無二的以貧农为中心的組織，为了保衛貧农土地和生活，为了階級任务而繼續进行斗争……这次大会……被賦予扩大和巩固階級战綫并且解决統一农民战綫问题的任务……”。这次大会接受了全会派大阪府联合会田边納的祝辞，同意全会派大阪府联合会和奈良县联合会重新回到全农中来。

但是，全农大会的決議被視同具文，合法的领导干部并不想进行斗争。并且誰斗争，誰就会被捕入獄，只要想維持合法性就不能够斗争。失去领导干部的全会派，将以单独組合維持下去呢，还是重新回到全农里来呢，还是轉化为法西斯农民团体呢，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道路。許多县联合会重新回到全农中来。

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东北地方又一次遭到歉收。卖青苗、甚至卖女兒还不能糊口的貧农，自己种米却吃不到米飯的农民，在这准备即将到来的毀灭性战争的所謂“非常时期”之下，作如何想法和希求什么呢？

猪俣津南雄在当时到农村調查后的报告“貧困的农村”中这样写道：“这是个只有五反地的佃农，但是有一天，他酒醉之后，憤懣不平，大發牢騷說：‘我把女兒卖了，連××也卖了。过去，我为組合辛辛苦苦地劳动，但是組合并没有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給我。我要燒飯用的米，要田地，不能給我这些东西的組合是沒有用处的。’这个人住的村的‘全农’支部是自耕和佃耕貧农的上層分子領導着。

这仿佛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問題。要求大米运动，近年来在各地展开，收有成效的地方也不少。但是对于像这样坦率地被組合員提出了要土地的要求，‘全农’是不能不感到無法应付的。”

这是在农業危机加深和为了摆脱这种危机而进行战争准备

的通貨膨脹日益進展的情況下，失掉農業革命領導的农民的混亂與絕望的聲音。

當時因為日本共產黨力量薄弱，日本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有如失掉了理論上和行動上的領導似的，陷于混亂狀態。領導極端軟弱，使群众运动事实上和失掉了領航員的船隻一樣，隨波逐浪在大海上飄流。

农民运动，也終於出現了這種情況。

全農全國會議，由於受到外部的鎮壓，失掉了許多能干的領導者，全國的聯繫斷絕；在內部出現了日本共產黨多數派集團的分派，共產黨的領導分成兩部分。這樣，失掉鬥爭理論的农民群众，只好根據當時的感情以及以往的經驗，訂出行動的方針來進行活動。這種活動勢必陷入暴動主義，甚至經常要發生农民暴動。這種鬥爭最後雖然造成了犧牲，但結果並不是向勝利的前方前進而是在失敗的道路上流出很多的血。

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栃木縣上都賀郡阿久津村發生的所謂阿久津事件是最典型的。

這個地方的农民运动从很早以前就受到了足尾銅山工會的影響，為麻生久等日本勞農黨系的社会民主主義者所領導。在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農業危機加深、農產物價格暴跌、农民生活痛苦到極點的時候，南犬飼村發生了砍倒電纜杆的違犯電氣事業法的事件。因為東京電燈公司剪斷欠繳電燈費的農家的電燈纜，所以农民組合組成了“關東要求減低電費聯盟”。年輕的組合員們認為既不送電給農村，電纜杆是沒有用的，就把它們這些電纜杆砍倒；憤懣之餘，乘勢把用戶只付低廉的損害補償費的高壓纜的電纜杆也一起砍倒了。因此，造成了違犯電氣事業法的犧牲者，但同時也取得了使電燈公司重新接通電纜的勝利經驗。

當時，這個地方的全國农民組合支部受着社會大眾黨的領

导。在阿久津村，从一九三三年秋天起发生了要求减租的佃农争议，把应交佃租的大米一千数百包储藏在产业组合的农业仓库内，把它托交给法院，向地主进行减租的交涉。地主方面顽固地不肯让步。农民组合方面怕结果于自己不利，全农支部长带着这个佃粮的仓库保管单，躲藏起来。地主方面买动了大日本生产党，在宇都宫市举行“扑灭农民组合演说会”，开始了攻势。他们每天领取七角钱的津贴，挨户访问农民组合的组合员，威胁农民赶紧缴纳租粮。不仅如此，警察还站在地主方面，把在地主瀧久吾家中进行交涉的领导者大尾政夫和池崎二十男二人当场逮捕了。全农支部长的住宅被警察和暴力团的团员所占据。

过了年，一月八日在宇都宫市，麻生久也来到县内参加为提名他作候选人而举行的社会大众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在这个会上有人提出了这个报告。由于田代松吉的建议，选举对策委员会改为阿久津事件对策委员会，麻生久等人退到别的房间。于是，订出了袭击生产党的动员计划，派联络员立即到各村的全农支部去。同天晚上，乘卡车或火车到温田村的组合员上野久家里来集合的有一百七十三人。二十岁左右血气方刚的青年们编成三队，选出大塚宫明为第一队队长，伊藤义广为第二队队长，野口菊太为后卫队队长。他们拿着日本刀、竹枪、猎枪，在九日破晓，向生产党和警察占据的全农支部长的住宅前进。他们跨过冬日水田中薄薄的冰层，一直冲向支部长的住宅。暴力团方面也惊慌地扎起白头巾来迎战。一时双方相持不下，由于一方是守势，一方是攻势，胜负在战斗开始之先就已经决定了。

终于因为农民组合方面的猛攻，在水田上展开了野战，农民组合方面遥遥取得了胜利，无赖们大败。生产党员中有四名当场死亡，十二、三名受了重伤，还有许多名受了轻伤。在日出前的黎明时候，农民组合方面唱着“红旗歌”胜利归来。但是兴奋的

高潮过去以后，想起敢死队所造成的事体重大，大家害怕起来，赶紧讓負責人及凶手逃往各地。农民組合方面在訂立作战計劃的时候，对于站在地主和生产党背后的警察势力这种政府統治力量沒有作出正确的估計。大規模的檢举开始了，終于有一百零九个人被起訴，被下獄的达三十三人。大塚宮明因为用日本刀杀人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伊藤义广因为用竹槍刺杀了退伍軍人某中尉也被判了十五年。开枪的人都被判处八年徒刑。伊藤后来死于獄中。

这样，阿久津事件作为失掉政治領導的农民运动的暴动悲剧而傳終。尽管它的战斗力留下了不灭的光輝，但是它的結果使日本农民更加丧失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二一 “背陰村”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战火一天比一天扩大。随之，沉重的生活紧压到工人和农民的身上。在世界各国資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的情況下，財閥和寄生地主为了維持天皇制度这个統治机构，需要一种能够最有效地压制工人、农民以及各阶層市民的不滿情緒的統治形式。

日本的統治阶级不可能像德国法西斯那样，先組織一个大众政党，在壟断資本掩护之下，把政治制度以及国民的思想内容全部放在它的独裁統治下面。它把担当法西斯統治的任务讓給了軍部这个最危险的势力。

毫無疑問，一方面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者在壟断資本和寄生地主的掩护之下，开始登場了。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日

本法西斯主义联盟成立；接着，藏相井上准之助遭到血盟团的暗杀（二月）、三井無限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被暗杀（三月）以及枪杀犬养首相的“五·一五事件”等，相繼發生；不久后又發展为一九三三年七月的“神兵队事件”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件”。

同时，在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化也有所进展。社会民众党（以后成为社会大众党）的領導者們認為九·一八事变是“进步的”战争，把拥护天皇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两者联系到一起。他們公然在工人、农民中間煽动排外的爱国主义。

但是，所有这些势力都不得不接受軍部以及和軍部相勾結的官僚們的軍国主义的独裁統治。軍部的軍国主义独裁逐渐加强，成为世界法西斯主义統治的一环，确立了比德国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更加凶暴的極端野蛮的法西斯統治体制。

就是在这种“黑暗的时代”里，国民中也并没有息灭了向往革命的灯火。“反对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工人、农民中間清楚地掀起，反帝同盟（反对帝国主义支持民族独立同盟）的活动深入于军队之中。不消說，是日本共产党給予了这种正确的方向和領導。因此，共产党遭到反复徹底的镇压。接着，工人、农民、学生、文化人士的一切群众組織也都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本来剩余無几、有如風前殘烛的徒具形式的言論、集会、結社的自由，也完全被剝夺了。但是尽管这样，这并未能完全消灭共产主义，同时，国民大众的斗争力量，也未能剝夺淨尽。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二月在莫斯科發出的“給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中，曾經引用了下面的一段話，这是前一年三月八日，当时的法务大臣小原就恶劣修改治安維持法問題在国会演說中所說的：

“为了徹底消灭共产主义运动，从昭和三年以来，政府

用尽一切手段，但是共产主义运动扎下了深深的根，所以尽管经过数次对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全部领导干部的检举并且破坏了共产党的组织，而逃脱了检举的共产主义分子仍然继续活动，直到今天政府还没有能够完全消灭共产主义。”

这封“信”，对于日本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初次指示了关于采用“人民战线战术”的方针。也就是说，这是号召针对当时的法西斯军部、金融财阀、地主的黑暗的反动和战争的阵营，结成民主、和平、劳动的阵营的广泛的人民战线。作为共产党当前的口号，它揭示了以下的項目：

- 一、为反对反动统治和军部法西斯的独裁危险而斗争。
- 二、剥夺军部的特权；扩大自由民权，维护人权；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主张男女平权；扩大选举权。
- 三、削减军费，以之充当失业者和贫民的救济资金。
- 四、制定解雇津贴法和废除临时工制度；保证工会的组织 and 行动的自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每周有一次照发工资的假日。
- 五、准予农民、消费合作社、小商人、职工延期偿付贷款，要求给他们免息贷款。
- 六、制定以减低佃租和禁止地主收回土地为基本内容的租佃法；把土地交给农民。
- 七、实行和平政策；立即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立即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这封“信”还进一步对于日本的农民运动指示了如下的方针：

“我们认为，为了完全符合我党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农业革命的方针，有必要修正农村的战术使它更加切合实际。

我們在农村中的主要支持者是农村無产階級，是貧农；农民中反对地主的部分几乎完全是佃农或半佃农。这种說法是正确的。但是，尽管这是某个同志的意見，而这和主張全部农民进行共同斗争在日本是可能的的論点并不矛盾。在这所謂全部农民中，不仅包括佃农和半佃农，而且把某些部分的有产农民包括富农以及拥有極少土地的小地主也算在內。为了反对使农民奴隶化的負債和重稅以及肥料、电費等方面掠夺性的壟断价格，为了要求国库火速救济苦于飢餓和貧穷的农民，采取全体农民的战术，現在已經完全可能，并且極其必要。我們的任务是，發展农村無产階級的斗争和要求減低佃租、反对收回佃农土地的斗争等等，并且發展一切爭取农民一般要求的斗争。我們的任务是爭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为反对反动統治、法西斯主义和要求土地、和平、自由而斗争的統一的人民战綫。

例如，請願运动在农村中虽然是全农民运动的最初步的形式，但也不应忽視，这是特別重要的。不仅如此，我們为了帮助农民运动積極的發展，必須用一切方法来支持它，使它获得發展。”

“为了加强佃农的斗争，首先必須把現在極度分散的小規模的佃农爭議化为統一的大規模的斗争，同时爭取与这种爭議沒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广泛的农民大众的同情，使他們站在斗争这方面。特別是，我們必須为了創立支持佃农爭議的全体农民委員會而努力。”

“在农民运动的現阶段，我們認為，反对寄生性的土地所有制的活动，必須特別严峻地对待大地主。不过，在耕种小地主的土地的佃农對他們的地主發生斗争的时候，我們自然应当站在佃农方面給予支持。”

“我們必須執行我們的主要任務，這就是：參加到農民的以及為進行農民運動而成立的一切形式的團體中去，在反對反動統治和軍事法西斯獨裁的危險的城鄉勞動人民之間建立統一戰綫。

同時，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必須積極支持農民的要求，它自己也應該悉力提出勞動農民的主要要求。”

現在看來，這個大膽而具有豐富內容的方針特別令人感到它的正確性，而關於它在日本為什麼沒有結出碩果來，可以舉出種種理由。例如，日本的軍事法西斯主義的統治特別猖狂，因而日本共產黨受到很大的傷害，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徹底的背叛等等。但是，成為最嚴重的障礙是：從政黨以至群眾團體，受嚴重的宗派主義的影響，一次一次地分裂，經過多少次的分散和聚合，視野越來越狹窄，喪失了政治性。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膚淺，還不能成功地在思想上掌握群眾。從而，壯大而鞏固的工人階級的領導並未能成為中心的支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各方面把持着領導，因此，在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的攻勢前面，它就徹底成為主觀主義的俘虜，發生動搖，以至於脫離了群眾的要求，而不得不局限於狹窄的視野之內。不論在工人運動方面，在農民運動方面以及在文化運動方面，人民戰綫戰術，並未能擊破日本革命運動中的嚴重的宗派主義。就在這個時期，戰爭向前進展，軍部法西斯的獨裁確立起來了。

當然，人民群眾擴展了接受人民戰綫戰術的基礎。甚至可以這樣說，他們如飢如渴地期待着正確的政治領導。

例如，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佃農爭議事件發生的次數也與年俱增。一九三五年創造了六、八二四件的最高紀錄，一九三六年有六、八〇四件，甚至在一九三七年還高達六、一七〇件。這表明，佃農對地主的鬥爭越來越高漲，地主制度的矛盾擴大起來

了。

但是，遭受接連不斷的鎮壓的結果，農民組合的組織率下降了。以一九三三年的組合四、八一〇個和組合員三十萬人為最高峰，以後逐漸顯出減少的傾向。不過在一九三七年還有三、八七九個農民組合，組織了農民二十二萬六千人。

當我們想到這種驚人的群眾的力量時候，農民們的沉默的屈從和深切的悲痛，到現在宛然猶在目前，他們後來逐漸失却有組織的領導和支持，親身成為愈益深刻化的戰爭政策的犧牲。同時，我們應當對於革命的政治力的責任加以重新檢查。

不管怎樣，這個時期的農民鬥爭表現了黯淡絕望然而決不屈服的群眾力量。作為它的典型之一，我們可以舉出那個因“背陰村”的名字而著名的東京都小河內村的鬥爭。當時吸引廣大讀者的注意的石川達三的小說，描述當時的情況如下：

“從十二月十二日下午起，在河內村的小學校的院子裡召開村民大會。

村民好像帶著盼望已久似的情緒，接連不斷地來到了會場。他們的態度同前次大會相比較是充滿著不可同日而語的認真氣氛。那天是一個微陰的寒冷的日子。大會還沒有開始時，校院中就點起了兩堆篝火。火的溫暖使人們的感情火似地燃燒起來……。

‘那麼從現在開始，讓我把最近的情況報告一下。’

但是，誰也沒有轉過頭來看村長這方面。圍繞在火的周圍的無數的集團，自己隨便地進行激烈的爭論，沒有一個人理會村長市平的談話。村長和對策委員會完全被漠視了。他們每個人都自己在尋找自己的解決辦法。听憑別人來替自己解決問題的想法，完全沒有了。這是進一步接近了重大危機的可怕徵兆。……

村长对前排的少数的人，講講願的經過，报告官厅方面的情况說：

‘因为这种情况，同神奈川县之間不久就可妥协，只要能做好这步……’

剛說到这里，从群众中部迸發了大声的詰难，

‘說不久，是多久？’

群众心理的变化是不可思議的。一直沒有听村长講話的那些群众，听到从同伴中發出了一声質問，突然停止了自己相互間的討論，一齐轉过头来。

‘只說不久，不懂！’又有一个人这样說。

于是，群众的感情朝着講台来了。根本沒有讓报告繼續下去的意思，只是想把事情鬧起来。

誰能用一句最巧妙的話把事情鬧起来，誰就是当場的英雄。这样一来，七百个人的感情的激流就很难控制了。村民大会明显地遭遇了危机。

‘說清楚是到哪个月、哪一天？’

‘十天也是不久，半年也是不久！’

爆發了嘩然大笑的声音。这个笑声証明群众的感情融合成为一个巨流。

‘我們听說不久，但是讓我們已經等待五年了。’

‘我們是为誰等待呢？我們沒有等待的必要！干吧！’

究竟是干什么，意义很模糊。但是村民对此并不感得模糊，而感到强烈的煽动。已經很难鎮撫下去了。……”

为了人口日益增加的东京市的自来水的需要，要在小河內村修建水庫的計劃，从五年前就开始进行，小河內村許多农家和土地将来都要淪于湖底。村民被村中有势力的人所說服，贊成了这个計劃。問題只剩了决定撤退时期和撤退的时候領取补偿

費。由于神奈川县是从多摩川引取用水的，它反对这个水庫修建計劃，因此計劃的实施一天天拖延下来，村民空空地等待了五年的时光而不能再忍受了。

据“背陰村”的描写，村中的荒廢情况如下：

“村民所有的土地在問題發生以前有四、四五七町步，現在只剩了一半。其余的一半典押死契了，被收买了，随着所有权人的变更，無人耕种扔在一边，春天野草芊綿，恣意生长。同时，在村中不管走到哪里也听不見牛的吼声了。但是村民們一直保持着沉默。

村中每年生产七万包左右的木炭。去年只生产了三万包。生产出来的这三万包批卖给冰川部落。用卡車运送，每包二分錢的運費就够了，但是因为路中的道路缺乏修补，卡車不通。用载貨馬車每包就得六分錢的運費。只因此，就有一千二百元的損失。

生茧每年产量是两万貫，去年只收成了一万三千貫。今年茧的行市更慘了。从前每貫值三十三元，現在只不过值两元五角錢。

蒟蒻^①是大家合伙从村中向外批發的，前一年还是每包三元左右，近来行市倒漲得很大。

有人說它可用以塗飞机翅膀，也有人說它可以混在火藥里供軍隊使用。也許是因为这种关系，現在每包卖六元錢。但是全部售額不过四千元左右，并不能使每个农民有多大收入。

以前运木炭到冰川去的車，一定是滿載大米而归，現在只是空車回来。大米吃不起只好吃麦子，从麦子改为黃米，改为小米。

① 植物名，根部可食，又名鬼芋。——譯者

河內的小學校缺少教師。這是因為月薪逐漸拖欠到過月才發給的緣故。由於移居調查、村民貸款的無法收回、稅款的欠繳，村公所的金庫陷於枯竭狀態。

高利貸橫行，農民所有的土地日益被削減。

東京的資本家插進手來，開始收買土地。部落的土地估價不斷上漲，地主們拍手高興起來。”（以上是小說的摘錄。）

向官廳請願，絲毫未能改善情況。

村民大會的結論歸結於這樣一點：東京市、東京府、內務省的誠意根本不足置信。與小河內村遭遇同一命運的山梨縣的丹波山和小菅兩村也得出同樣的結論。這些村不期而然地相互取得了聯繫，順利地商量好了要採取統一行動。一直忍受着壓迫的貧農、雇農的鬥爭力量完全發揮出來，村民大會逐漸達於高潮，終於成為不得不表現為行動的洶湧洪流的地步。讓我們再一次引用“背陰村”吧：

“‘村長，已經不是停下不動的時候了。應當干啊！’

市平沉默地分開人群，拖着沉重的腳步走上講台。群眾黑壓壓地一片，等待他發言。

‘諸位’，他開口說了。這時眼淚從他的臉頰流下。‘……從昭和六年以來的五年里，大家真是忍耐吃苦了。市平在這裡表示感謝。但是我再不要求諸位忍耐了。到能夠解除心中的愁恨為止，請盡量地行動起來吧！’

‘村長！’有人發出了尖銳的聲音。村上巡官跳上了講台。‘村長，你說那樣的話怎麼行呢？你不能進行煽動呀！’

村長既沒有驚慌的樣子，也沒有表現動搖不安的神色。七十二歲的老人，泰然自若，寬寬的肩膀上像是整個地充滿了鎮靜。”

十三日夜半，按部落編成了許多個小隊，打起了席子旗，

数达六百人的农民排成一个长队，浩浩荡荡向东京前进。

警視厅接到小河内村發生“情势不稳”的报告，从两天以前的夜里就动员了青梅警察署或五日市警察署进行了警戒部署。示威队伍在天亮的时候，慷慨激昂涌进了冰川部落，受到埋伏在要害所在的警察的阻止，双方乱殴起来。可悲的是，示威队伍方面，既沒有有組織的領導也沒有有計劃的準備。

他們中了警察队的誘敌之計，被圈在冰川神社的院子里，在那里被迫解散了。

但是，农民并未因此屈服。伪装解散后回往村庄的样子而逃出去的农民們，在各处企圖突破警戒綫，追过去又被追过来，一再發生小冲突。农民的目标是向东京，向东京拥去。五十名农民突破了警察队死守的防綫，潜入了东京。他們和二十名公認的代表匯合一起，又和四十名山梨县的代表匯合起来。当他們到了东京以后，警視厅的特別警备队出动了新选拔出来的小組，来監視和取締他們的行动，限制他們行动的自由。他們虽然进行了請願，但是并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事件，从开始到結束，不一定直接帶有階級斗争的性質。这是孤立而沒有組織的农民的自發的斗争，是农民不滿情緒的爆發的表現。这里缺少組織性和計劃性，同时也沒有受到正确的指导。从而，这个事件只有以失敗而告終。

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可以清楚看出：最受压迫的雇农和貧农具有巨大的斗争力量；它一有机会爆發的时候，会使一切农民卷入斗争，發揮出意外强大的力量。

这场暴动促进了問題的解决。計劃正式决定了，問題得到解决，决定从东京市付出补偿費。村中接到东京市的通知說，在第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协商會議。可是，到了那一天，适值大雪紛飞，突然爆發了二·二六事件，岡田內閣垮台，协商的消息

延期了。

結果，虽然达成了協議，但是因为第二年爆發了卢沟桥事变的緣故，計劃的實施又再延期下去。

工程真正的开始是在朝鮮战争發生的昭和二十五年。工程的計劃修改为更大規模的，依賴美国的胡佛水壩的廢品进行建設工事。直到这时为止，小河內村一直半死不活、忍气吞声地活着。

二二 流离失所

——战火的扩大和“滿洲移民”

随着战争政策的进展，地主制度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是对于貧农已成为不能忍受的了。农业遭到破坏。农业劳动力被大批地抽調去当兵和做軍需工厂的临时工。肥料以及农业用的資料器材的生产和供給，受到軍事需要的压迫，一天天减少。其中粮食增产的責任越發加重地压到农民的肩头上來。軍費的負担，結局轉嫁到工人和农民的身上。寄生地主还騎在农民头上，榨取苛重的佃租，絲毫也不想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农民的反抗首先不得不朝着地主开火。

壟断資本和寄生地主为了推进最后發財的事業——战争，一方面从农民的攻击下努力保护地主制度，同时不得不改变地主制度以适应战争政策和防止战时經濟的破产。

因此，他們表面上伪装迎合农民的利益，非常小心地进行着改变地主制度的外形而加以修正的政策。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八月，实施“农地調整法”，用法律保护农民的耕种权。第二年十二月又实施“佃租統制令”，采取滿足佃农的部分要求的

政策。

这些政策表面上也可以說是达到了它們的目的，但是却进一步加深了地主制度的矛盾，使地主間發生內訌。

农民組合的政治活动，以前每逢市町村議會、府县議会的議員选举和众議院选举，在鎮压与干涉之下活潑地进行；但是随着战时体制的进展，政党被解散，选举的自由被剝夺，成为所謂“协助选举”，农民組合的政治活动也停滞下来。农民組合的議會斗争，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領導，在卢沟桥事变發生后还繼續进行；可是随着議會已变成軟弱無能和軍部法西斯独裁的确立，这也不再成为斗争的手段了。

从一九三三——三五年这三年中間，連續歉收，农村非常貧困。农民不容易从这种严重的灾害中得到恢复。因此，直至一九三七年前半期以前，向議會进行了种种打开蕭条的斗争。例如：对貧穷农民無偿配給或低价供应官粮；無偿給予肥料和种子；立即用免息和长期按年归还的办法貸給农民复兴資金；減輕或豁免劳动农民負担的稅款；农民延期償付債款；保証入伍兵士的家族的生活；反对檢查租粮、要求增加奖励米的数量；制定“佃租法”和“禁止沒收法”；立即实施农民保險；确立国民保健制度；反对防止佃农爭議委员会；排斥土地掮客等等。

可是，卢沟桥事变爆發以后，發生了所謂巩固后方防綫的排外的“爱国运动”，有階級意識的領導者因鎮压而被捕入獄，农民組合也在社会法西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領導下被引入“爱国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者告訴农民說，应当避免国内的冲突，甚至連組合大会都要停止举行，引导农民走向支援战争的方向。他們只請求政府对出征的佃农予以保护。一方面，他們为了慰問出征的軍人積極地活动，当“产业报国联盟”在法西斯的領導下成立的时候，他們立即率領当时的大日本农民組合、日本农民組

合、日本农民联盟加入了这个組織。

那么，佃农爭議的情况曾經怎样呢？讓我們从一九三七年担当調停租佃糾紛的官吏會議上的發言，来研究它的实际情况吧。

“高知县內調停租佃糾紛的事件是比較少的，但这些事件都和农民組合有关。爭議尽管是屬於个人性質，然而佃农常常是以农民組合为背景的。同时，在地主这一方面也組織了‘地主会’向这些佃农对抗。而且随着近年社会情势的轉变，地主有进一步加强团結以对抗佃农的傾向。

在高知县內沒有很大的地主組合，但是一向就有所謂‘高知东部地主会’的組織，非常活躍，直至最近才解散了。目前，有所謂‘五月会’的地主組合代替了这个組織，人数不多，內容也不是有組織的，不过它的团結很巩固，就是对于純粹个人性質的爭議也加以支援，成为爭議中地主的后援，使他們强硬地对抗佃农。并且，最近在地主之中，有許多人只要看到佃农与农民組合有关，就絕對不答应佃农的要求。”（高知县）

“地主的势力和佃农的势力不像昔日那样均衡，因此調解不能落于我們所希望那样的公平点上，而偏袒地主方面。因为地主也知道佃农力量的薄弱，故意强詞夺理，所以想要按照公平合理的想法来解决，似乎需要某种程度的強制力。我是常常感到这一点的一个个人。”（香川县）

“因为时局的緣故，爭議不再表面化了，但是并不見得被抑止住。由于应征当兵的关系，人心尖銳化，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到，以前一直受压迫的佃农在这个时局下反而像是更加具有反抗性似的。本来是應該互相認識时局，容易进行調解，但反而成为更加困难的状态。因为爭議沉到下面去，令人担心会不会在內部發酵起来。”（富山县）

“以福井县的例子來說，以不允許地主的任性妄为为理由，今立郡中河村一百九十名佃农成立了农民組合。他們在今年八月召开了全体大会，通过決議說，今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从自己这方面引起問題。”（福井县）

“說是兵农一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越是貫徹都市計劃方針，越發生摩擦。我認為根本問題在于忽視了土地和农民。”（爱知县）

“由于战时經濟的影响，最近（农地价格）高漲了一成至一成五，有的地方漲得还要高。于是借着这个机会，大地主中特别是离乡地主等發生了这样傾向，或者是把土地卖掉远走，或者是把土地押給信托公司，請求信托公司处分抵押物品。信托公司这类地方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所以决不肯相讓。即使对方是佃农，如果不出相当的价格，它也絕不出卖，这样倒像是采取了一种挑战的态度。”（三重县）

“由于新建工厂等，發生退佃費^①的問題，每反地付給二百五十元至三百元。原来有佃种权的地方还要高三成左右，普通每反地从三百元多至六百元。困难的問題是，这种农耕地的买卖，使無力購買的貧农愈益受到压迫。”（富山县）

时局的影响，的确对地主有利地展开着。对农民組合的鎮压压抑了佃农的立場，使佃农起来斗争感到困难。很明显，从战争得到利益的是地主。

但是，貧农和佃农的不滿不断增加，禁不住要时常爆發出来。这种爆發的力量，統治階級如果不警戒的話，就不能够高枕無憂。尽管他們用尽了一切鎮压和防止的手段，但是佃农爭議具有长生不死的頑强性，通过整个战争期間一直繼續着。

① 地主收回租地时給予佃农的补偿費。——譯者

从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秋季召开的有关調停租佃糾紛官員的事务联系会的記錄,可以看出以后的佃农爭議的情况:

“本县受到旱灾的占耕地的六成。大米減收,为平年收成的百分之三十六·九,同前一年昭和十三年度相比較,約为百分之三十六·二。

而且在租佃关系比較复杂的本县南部,受害尤甚。今后将会發生佃租及水利問題。”(岡山县)

“使农民委员会調停水利爭議,在許多情形下是困难的。香川县今年發生的水利爭議达一百五十起,但沒有一起和农民委员会有关。通常由警察和耕地科处理。”(香川县)

在金澤市曾經有过下面这样一个插話。申請調停的人本来是爭議的土地的所有者,后来他把这块地卖给別人而自己繼續租种。后来买主又把这块地轉卖了,新的买主要把它填平,在这里修建工厂,运了沙石来。于是佃农發慌了,打算繼續耕种下去,申請調停。調停开始了,但对方坚持不肯同意。可是就在进行第二次調停那天早晨,有通知說,那个佃农的长子被征去当陆軍航空上等兵因去轟炸中国东北而战死了。据說,对方痛切感到維護光荣家屬的生活是后方国民的义务,同意讓佃农繼續耕种,調停得到圓滿解决。

一九三九年的旱灾广泛地普及日本西部各地。

“我們召集受灾最严重的四十个町村的町长、村长、农地委员会会长、农会会长、农会的技術員集会在五处,說明县方的方針,要求他們支持。但是大多数的出席者都是或大或小拥有土地的人,多数的意向是反对我們的方針的。甚至还有人露骨地說,听憑受灾者自己去想办法好了。不过,在本县,从来沒有减免佃租的習慣。”(大分县)

“天草郡的旱灾也很严重。这里發生了一件爭議,有一个地

主有五十名佃戶，佃地約七町步。這些地的收成一向是地主和佃戶按比例分配，因此不了解它的收成是多少。我們把農地委員會請來了，委託他們調查一下收穫量，然後由法院根據佃租調停法第二十五條發出命令，規定本年度所有按比例分租的土地，一律地主拿四成佃戶得六成。”（熊本縣）

軍部對農民的作法也是十分嚴苛的。

“最近我們的地方，修建了很大的飛機場。有一個村莊的十分之九的耕地被征用了。因為軍部方面絲毫沒有考慮補償佃戶損失的問題就規定了征用價格，所以該村的村長和佃農都非常驚訝，請求我們設法給他們領取少數的補償費。管佃農事務的官員向軍部交涉，幸而那個村有二十幾個人应征入伍，他就以此為理由進行了強硬的談判，結果总算取得了少許的錢，權當補償費用，問題算是得到解決。如果不前往交涉，軍部是一文錢也不肯拿出來。只要軍部說不給，縣長也不肯前往交涉去讓軍部拿出錢來。”（熊本縣）

歐洲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趁着這個機會，日本也進一步加強了戰爭體制。第二年六月，樞密院議長近衛文麿辭職，着手進行“新體制運動”，同年十月，成立了“大政翼贊會”。

通過這個期間，農民組合的領導權落入社會民主主義者手中。繼無產階級政黨解散之後，一九三九年，一切全國性的農民組合都被解散了。反映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動搖，農民組合的離合集散加劇，不久後相繼被解散，最後只剩下了一個全國性組織“農地制度改革同盟”。

這個同盟，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東京新橋的藏前工業會館召開了預備會議以後，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參加這次預備會議的有，大日本農民組合的三輪壽壯、三宅正一、

杉山元治郎、角田藤三郎，日本农民总同盟的片山哲，日本农民組合的平野力三、恒次东洋雄，日本农民联盟的杉野武雄、田中养达、由谷森治、大石大等。同盟成立后，分别选出大石大、杉山元治郎、鈴木文治为顧問，由谷森治为会长，三宅正一为副会长，平野力三为主事兼會計，杉野武雄、三輪寿壮、片山哲、須永好为常任理事，佐竹晴記为會計監督。

这个同盟發表成立宣言說：

“我們为了确保粮食的增产，为了扩大农業生产力，應該合理地改革土地制度，結成农地制度改革同盟。”

同时，提出了以下四項改革土地制度的方針：

一、为了扫除农村土地的不安，树立“不耕种者不得有土地”的原則。

二、为了对土地利用实行国家統制，树立土地管理制度，以便消灭地主进行土地投机和消灭土地的投机性，使农業不至于成为工業的牺牲。

三、为了使全部的耕种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租地国有，力謀佃租的合理化。

四、为了使农家充分得到农業利潤，尽力培育“家产制度合理規模自耕农”。

那么，改革同盟認为什么是这些主張的具体內容呢？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缺乏农業机器用具的供給，这些恶劣条件变得更加严重了。事变后三年間，耕地减少了三万町步。許多比較平坦的良田或熟田，已經变成了工厂。因为，土地已經成为地主进行投机买卖的对象。他們所謂土地的国家管理，就是說，不管是耕地也好，农業用的林野也好，統統由后来所成立的农業会那样可以称为町村农業組合的組織，在国家的委任之下，进行公益性的管理。

只是这样还不够，国家必须用适当价格收买佃耕的田地，發行土地証券，交給地主。目前，政府的設立自耕农的政策是一种利用小农的土地私有欲望，讓地主私自卖掉的办法，以不合理的高額佃租作为估計地价的标准。改革同盟反对这样的政策。

他們主張，佃租應該是整个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應該以建立二町步至三町步的合理規模的經營为目标。而且，为了維持这样健全的合理規模的农户，必須用法律加以保护，不許以土地作为負債的抵押品或沒收的对象，并且必須当作世襲的土地留給子孙繼承。

这就是所謂創設“家产制度合理規模自耕农”。

以上是他們的主張的主要部分。

他們不想廢除地主制度，不想給农民土地，反而提出了这种欺騙性的农地改革方案，要把貧农赶出土地，給予中农和富农土地，企圖加强地主和中农富农階層的联盟。他們協助軍部，打算把失掉土地的雇农和貧农移民到中国东北部的原野去。

在这里，清楚地表現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本質；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們和法西斯合作的政策上的根据。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軍部表現了忠誠，但是农地制度改革同盟随着新体制运动的进展，也在这种漩渦之中解散了而与之合流起来。軍部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协助下，更加露骨地推进了压迫农民的政策。

据說在日俄战争之后就开始了“滿洲移民”，不过，作为一种政策来进行集体移民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

第一次集体开拓团是在一九一八年由日本东北地区六个县及其他地区的农民組成的，他們进入中国东北部伪滿的“三江省”，成立了弥荣村。第二次一九一九年进入“三江省”，成立了千振村。第三次一九二〇年进入“濱江省”，成立了瑞穗村。开拓团

就这样逐年增加，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这种政策迅速地向前发展。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内劳动力感到显著的不足为止，政府始终没有停止把土地较少的农民驱往中国东北部的原野。开拓民中有各种各样的。专门从事农业的开拓农民，兼营林业、畜牧、渔业的半农业性质的开拓民，从事商业、工业、矿业的开拓民以及青年开拓义勇队，这些都是以国内农民为主体。此外，还进行了把朝鲜人送往前去的计划，同时还采取了把中国东北当地居民移往开拓地区的方针。

但是，构成开拓民的中心的是由日本国内农民编成的集体开拓民。最初，这有如主要具有军事上的意义的屯田兵，后来逐渐在“满洲国”的开发和日本国内农地政策的关联上具有重要意义。

“满洲的开发”，对于确立日本在东亚的军事霸权，是必要的。把没有土地的农民和土地少的农民移到中国东北去居住，这为了转移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和维持地主的土地制度，都是必要的政策。

一九一八年初，决定了满洲移民计划大纲以后，在十一月就有日本东北六县和新潟、长野、茨城、栃木、群馬等合计十一个县的退伍军人四百九十二名组成了佳木斯屯垦队，被送到中国东北。这是第一次移民，是武装移民。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发展为二十年間送出一百万户和五百万名开拓民的计划。此外还奖励分村移民计划。

于是，成立了“拓务省”，扩充了“满洲移住协会”的组织。这些是日本方面的机关，在“满洲国”方面成立了“开拓总局”和“满洲拓殖公社”。拓殖公社是具有日“满”两国国籍的特殊法人，资金五千万元，其中日本政府和“满洲国”政府各出资一千五百万元，剩余的二千万元由三井、三菱、住友、东拓等财阀公司

出資。

到一九二五年，“滿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綱”決定以後，政策的內容逐漸修改完備。因為沒收當地居民耕種的土地以給予开拓民的強奪政策，已經行不通，原則上採取了由國家經營來開發未利用土地的方針。從而，認為在开拓地區採取自由的私有权制度不適當，擬訂了一種建設“理想農村”的目標。

在“理想農村”中設立街村制、开拓團和合作社三種機構。從集體开拓民移住後五年內，施行街村制這種特殊的地方制度。這是包括警察權的自治制度。

為了建設事業和开拓地的經營，成立了开拓團。團長是由“滿洲國”政府任命的，他根據獨裁領導的原則，以獨裁的領導者的身份，統轄着开拓團。开拓團也購買建設器材，但由“滿洲拓殖公社”供給。財閥公司甚至從开拓團身上，也要榨取利潤。

最後還有合作社。這除了搞信用、販賣、購買、利用和指導生產而外，還辦理代償开拓民的負債以及代繳稅款的事務。街村長擔任社長，和“滿洲拓殖公社”進行交易。

开拓地的農業經營，在建設時期的三年間，即從先遣隊遷入至开拓隊正式遷入約一年間，以及從开拓隊正式遷入至轉變為個人經營的準備完了的二年間，實行共同經營，以後就轉變為個人經營。开拓農家每戶的耕地，普通以水田一町步、旱田九町步合計十町步的土地為中心，另外，每戶還附有五町步至十町步的土地，作為共有的牧場和採草地。因而，按照日本國內的農家那樣，以家族勞動為中心的農業經營方法，在這裡是不成功的，而採用了北海道所實行的犁耕法的方法。受過加藤完治主持的內原訓練所所倡導的“一根鋤頭的農業”和勤勞主義的教育的農民，在這裡不得不採用新的農業經營方法。有成績的开拓民或者雇用苦力，變成企業家，或者把土地租給中國人耕種，變成了

地主。这种做法，当然同作为国策的开拓方针是不相符合的。但是，这个方法只有有财力的人才能够采用。邻国苏联所实行的集体农庄的办法和日本统治阶级竭力排斥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经常徘徊在开拓农民的脑海中，不能忘怀。

农民跟恶劣的土壤和严寒等自然条件作斗争，在缺乏医疗设备和教育机关的环境中，为了生活，只是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进行斗争。太平洋战争失败的迹象越来越显著，日本近海的航行失掉安全，开拓民终于被抛弃在大海的彼岸，在孤立无援之中，在“满洲”的旷野上迎接了战争的失败。

最近回国的开拓农民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队员们详细描述：战争期中开拓团长们是如何成为小独裁者横行跋扈；一旦战败后他们又如何成为懦弱无能的废物，当他们回到日本内地之后又如何擅作威福起来。

提到青少年义勇军的训练所，不能忘记的是加藤完治的内原训练所。这个训练所不仅给予“满洲”开拓农民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国内的农民生活上也发生了鼓吹法西斯农民精神的巨大作用。但是，内原训练所在今天还变象地存在着。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六月三日的“朝日画刊”上刊载了照片，并附有如下的说明：

“曾经把许多青年当做满蒙开拓义勇军送往大陆的内原训练所的名字，战败以来已经从每个人的脑海中忘掉了。但是，战后第九年的今天，在茨原县中妻村内原地方，昔日的训练所长加藤完治依然以七十岁的老躯担任校长，在国民高等学校的名义下，标榜着‘培养皇国农民的中坚领导干部’，采取像昔日一样的全部住宿制度，对一百五十多名男女青年施行‘身心锻炼’。加藤在战后被整肃，从事那须山麓的开垦等，一度隐身于福岛县的深

山中；整肃解除后立即着手‘重建农民教育’，从今年四月又如以往一样重新出任校长。十七名职员几乎全部是义勇军出身，受过开拓精神的锻炼；学生是中学毕业程度的中农子弟，学费每月两千元或一千元，外加大米一斗，主要是与昔日毕业生有关系的人介绍入学的，当地茨城不用说，也有从东北、关西、山阴等地区远道而来的。每天早晨五点半钟起床，由合唱皇国国歌‘君之代’开始，然后听校长讲大和魂，进行‘反对机械化、主张一根锄头主义’的实习，在这种生活中，纯朴的青年们丝毫不怀疑是否找到青春的出路，专心致意地学习着。”

可见，在相繼不断扩大的战争期间，陷于极端贫穷、曾经表示抵抗的农村，同时也是产生军队、助长军部统治的温床。从这个温床中特别产生了极端右翼的国家主义者，这在表面上或暗地里都是由于受到各地寄生地主的庇护。战后，因为寄生地主的势力受到挫折，右翼势力一时呈现了衰弱。最近被称为逆道而行的右翼势力的抬头，这可以说表示，不彻底的农地改革，使农村中寄生地主势力又重新复活和加强了。

二三 河山依旧

——走向战败的道路

“……欧洲和东亚的战局对日本军部的不利状态和大規模战争的长期化，给予日本国内外以深刻的影响。日本经济力的损耗将达于极点。国内及占领地区的物资几乎全部被动员了。老人、妇女、儿童也被动员了。国民生活的痛苦也将达于极点。尽管如此，有如大藏大臣所感嘆的，生产力并未提高。经济破产的危险增大了。再者，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纷争。这

是从六月召开的临时議会的混乱和‘翼贊政治会’的分裂，就能够看出的。东条內閣开始动搖了。

一般国民的情緒也和开战的当初不同了。疲劳困窘、不平不滿、对前途感到不安、动搖、厭战……，这样的气氛普遍于工人、农民、知識分子、中小工商業者等广泛的范围。‘恶性的流言蜚語’到处傳播着。不顧政府的鎮压，工人的罢工运动不断發生。这些事实表明，人民群众逐渐从軍部的欺騙下开始觉醒了，他們开始發動群众斗争。”

这段话是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七月，野坂参三在中国延安發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告日本国民書”中，对当时日本局势所作的估計。

在决战阶段加在农民身上的首要任务是增产粮食。但是增产粮食不能順利进行，而且深刻地显示出减产傾向。米的收获量，一九四三年是六、二八八万石，比前一年减少三八八万石，以七、一五九万石的生产目标來說，减产了八七〇万石。一九四四年的收获量是五、八六六万石，比一九四三年减少四二一万石，以七、一五九万石的生产目标來說，大大地减产了一、二九二万石。

劳动力、肥料、农業机器工具及其他生产材料的缺乏越来越严重，因为不加肥料强行增产，地力的消耗加剧。阻碍增产的恶劣条件只有逐渐加大，而对增产的要求却越来越急迫。政府的增产政策加重了农民的負担，結局形成使农民像奴隶般劳动的情况。

徹底地掌握农民成为重要的問題。一九四三年中，从中央到市町村的农業会的机构健全了，政府的方針一直貫徹到町村农業会，但是并不能充分掌握各个农户。为了抵补这种缺点，利用了部落制度，关于粮食的增产和征購、强制儲蓄、分配公債及其他一切行政事务都作为部落的連带責任强制执行。根据“农業

生产統制令”，实行战时农業重要人員的指定，甚至禁止农民脱离农業生产和移动的自由。半工半农戶不断增加。因为食粮不够，非农戶为了获得租粮的目的，購買农地的傾向日益显著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实行限制农地轉卖，半工半农戶和低生产力的农戶也不得購買土地了。

政府打算讓生产力較高的中等以上的农家耕种农地来达成增产的目的，但反而失敗了。这种政策不但沒有实现，相反引起了全面减产。

为了打下低工資政策的基础，政府强制貫徹执行低米价政策。和軍事工業資本家莫大的利潤的增加相比，农家的农業經營的收支情况远为可怜。甚至“日本經濟年報”（一九四四年第一輯）也不得不承認这种情况：

“而且要求农業經營的公益事業化的种种統制愈益加强，因此农業經營逐漸困难起来。虽然是一种十分抽象的說法，我們可以这样說，因为分散經營受到轉換期的很大打击，目前的农家有如下述，正受着这种影响和增产重担两方面的压迫，左右为难。”

为了筹措战争費用，奖励强制性的儲蓄，农家出卖农产物所得的款項一部分留在农民手中，大部分通过农業会被政府吸收去了。

农林中央金庫把农家卖得的款項轉賬为存款，用这种方法使农業会聚集了二百二十亿元，其中一百三十亿元被吸收去了。一百三十亿元中，七十二亿变为公債，十二亿撥充向朝鮮和中国东北的投資。农林中央金庫聚集的款項的百分之六十四，直接用于侵略战争的目的。

对殖民地的投資，除农林中央金庫的十二亿元之外，府县农業会十八亿，市町村农業会二亿，合計达三十二亿元。战敗后由

于軍事补偿的停止，这些投資完全不能收回，成为农民的損失。

随着战争失敗情形的加深和空襲扩及日本全国各地，尽管有宪兵、警察的威吓性的取締，国内生产和生活的混乱越来越严重；黑市交易和物資的隱匿公然橫行；农民的不滿情緒接近爆發边缘。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七月，当时的战时农業团(农業会的中央組織)總裁千石兴太郎被任命为行政檢查使，进行了最后一次的行政檢查。在他的报告書中有如下的几段：

“主食用粮由于这次減低一成的結果，每人每日的配給量，軍用方面是陸軍六三五公分(四·五三日合^①)、海軍五七五公分(四·一〇日合)，普通民用方面則是三〇〇公分(二·一四日合)。对于随着战局的紧迫日益加重劳动負擔的一般国民，現在的配給量可以說已經降低到最低必需限量以下。可以看出目前普遍地对主食用粮配給的前途感到不安。”

“因为蔬菜、肉类、魚类等副食品的供应非常缺乏，軍用和民用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据实际調查結果，虽然因地而异，大体上，供应的情况表明如下：蔬菜，軍用百分之八十——九十，民用量很少；肉类，軍用百分之三十，民用量为零；魚类，軍用百分之七十，民用量很少。有关方面努力于优先滿足軍用虽然是值得称赞的，但是結果民用量被压縮得很厉害。这种現状从維持国民体力的观点來說甚为遺憾。”

“大醬和醬油，按照陆海軍給养令，士兵每人每月的配給量是大醬五九八日錢^②、醬油九·九合。这和七月改訂的民用配給量大醬一二〇至二四〇日錢、醬油二至三·七合相比，大醬为

① 日本容量单位，每合約等于我国一·八〇三九市合。 譯者

② 日錢原文为“匁”，重量单位，为一“貫”的千分之一，約等于三·七五公分。
——譯者

二·五倍至五倍，醬油為二·七倍至五倍，軍用量和民用量二者相差懸殊。而且，因為軍用有優先權的緣故，供應計劃的出入立即影響民用；由於駐紮部队的增加、路過部队的駐紮等，民用方面的規定顯難於保證。”

此外，在這個報告書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下面的三個政策：

第一，要求對主食用糧及其他物資的軍民配給分量重新考慮，以期公平。例如，建議民用量總平均每人每月為大醬三三〇日錢，醬油五合。

第二，希望正確地掌握受食糧配給的人口數。例如，據說一九四五年三月全國普查的結果，福島縣食糧經營團體發現有浮報人口四萬七千人，達配給人口的百分之五·四。

第三，要求發放軍備儲藏糧米。建議在估計一九四五年度糧食不足達一千二百万石的情況下，把以往沒有動用的軍備儲藏糧米發放出來。

包括農民在內國民生活的實際情況，比起行政檢查使的報告，是更加嚴重的。對於軍部、官僚以及作為他們的部下統治着農村的勢力，農民的不信任和不满情緒越來越強烈，農民表面上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任憑這些勢力隨意擺布。因為他們充分知道，如果誰有意見誰就要遭到鎮壓，所以他們在心中醞釀着不满，愈益變得沉默，實行不合作的抵抗，憤怒與斗争力量在內部逐漸充滿起來。“流言蜚語”在沉默的農民之間很快地傳播着。他們帶着複雜的心境注視着蘇聯的勝利和希特勒德國的投降。使他們的心境變得複雜的，是因為在中國東北沉重的壓迫正加在他們的子弟所組成的日本軍的身上。

“晚餐用罢心憂煎，來朝無米何為餐！

相對語無言，闔家抱愁眠。”

这是长野县的一首农民的歌。他们之中也有断粮户，不久以后他们就发现了对抗政府强夺政策的手段。农民始终具有生存下去的信心。他们没有斗争的组织，也没得到正确的领导，在分散孤立的状态中，期望着某种事物的来临。

宫本百合子的小說“播州平野”中写道：

“人们的生活早就被破坏了。难于抵抗的暴力横冲直闯，撞翻了居民的生活，搅乱了直捷的大道，而且什么事情一样也不让完成。突然间这种狂暴的力量虚脱了。只有使所有的人看了感到绝望的欺騙兒童的玩具似的龐大的建筑物，跟虚張声势的沒有尾巴的蜻蜓一样。十二丈寬瀝青馬路，变得毫無意义，只显得空虛。路边的法国梧桐的綠叶子，倒在地上也沒有人去把它扶起来。楼房修建得虽然很大，却不能全部使用，只在第一層有个邮局死气沉沉地在办公。

这里聚集着很多的人，生活着。但是并没有像样的生活。从五月起就在街上流傳着这样的一首歌：

‘日本是个好国家，花兒的国，
七月、八月，变成灰烬的国，
九月、十月，是别人家的国。’

每輛公共汽車上，一定有一个宪兵坐在上面，跟着跑。就在这街道上流行着这首歌，人们在唱着。因强加在生活上面的愚弄和侮辱而忿懣不平的感觉，使每个人中間都对于这首歌的辛辣的諷刺抱有同感。”

这段小說，是描写矗立在农村中間的工厂因为空襲变成巨大的廢墟后的情景。

正确的领导开始敲开农民的坚固的心扉。早在“中日战争六周年告日本国民書”中，野坂参三就发出了下面的号召。虽然为时稍晚，这个呼声感人心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我們向諸位号召：

工人要恢复工会。农民要恢复农民組合。学生要恢复学生团体。工商業者要重新組織自主的同業公会。軍人要組織軍人委员会。同时，要組織以上各种組織的联合委员会。

工人应發起罢工。农民应發起租佃爭議。学生应發起罢課。工商業者应發起对政府的抗議运动。軍人应發起群众性的請願运动！……

全国各个角落，为了貫徹共同的目的，要組織町内大会、村民大会、区民大会、市民大会以及全国国民大会！

这样，当全国人民群众發起巨大的行动，像怒濤似地冲向軍部及其同伙的时候，那么这时，他們究竟还能把他們的命运延續几天呢？軍部的垮台是必然的。新的民主日本的出現也是必然的。

以这种巨大的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为基础，才能建立人民政府！”

但是，在这种声音越过大海还没有广泛达到大众的心里的时候，“八·一五”就到来了。天皇制政府直接在美国和苏联的軍事力量的面前屈服了，無条件投降了。对于日本統治階級來說，这是空前巨大的打击。

荒廢的田地，永远不回来的丈夫和兒子！——給农民手中剩下的只有这些。而且还是不得不照旧劳动的今天和明天。在大“背叛”的憤怒真正燃燒起来以前，农民正埋头于夏末秋初的收获季节的繁忙里。

二四 憤怒的爆發

——反對強征和檢舉舞弊。改革村政的鬥爭

這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長時期的戰爭終於以日本帝國主義的淒慘失敗而告終。

完全被燒光的都市的荒涼情況是不用說的，沒有受到轟炸的農村的荒廢的樣子也很嚴重。有勞動力的人完全被軍隊、軍需工廠征去了，並且其中有許多人死在那里，不能再回到村里來。到田地裏工作的，幾乎已經只剩下了腰折背弓的老年人和婦女。既沒有肥料，也沒有農藥。馬也被征用了，牛、豬因缺乏飼料被殺光了。護山治水的工程完全被放在一邊，無人過問，結果造成了戰後大水災的不斷發生。在“為了戰勝”的名義下，忍受着勞動力和物資器材的缺乏，以粉身碎骨的心境種得的米糧，最後被政府用低於成本的价格征收去了。在农村，戰爭的創傷雖然不像都市那樣表現在外面，但是它所受的伤害也很深。

天真純朴的農民認真地信賴政府所說的一切，忍受了各種痛苦。但是，操縱着村政府和農業會的地主、富農等，通過糧食征購數量的分配和物資器材的配給，想盡方法從中盤剝。對上邊指派下來的分配量又添上個“帽子”再指派到下邊去，把增添的那部分流到黑市中去的現象以及盜用配給農民的肥料和膠鞋、工作服的現象，說不清有多少。趁着戰後的混亂，各地在毫無秩序的情況下分得了大量的軍用物資，更使這種舞弊行為大規模地橫行起來。但是，老實的農民已經不再沉默下去了。雖然他們在戰爭期間，因為害怕憲兵和警察的可怕的監視眼睛，惟恐被加上“不協助戰爭”的罪名，不得不對於村政的腐敗和舞弊

現象沉默地裝着看不見；但是今天受政府欺騙的結果，他們一般已經認清，正直人倒反像是變成了傻子，再也不能听其自然而不加過問了。

這樣，戰敗後的暫時性的虛脫狀態結束了，從空前歉收的一九四五年稻米收穫終了之時起，——也正是都市的工人運動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像風暴似地開始擴展的時候，——農村中檢舉村政的紊亂、要求改革村政的鬥爭高漲起來了。這種檢舉舞弊和改革村政的鬥爭，意味着對於地主階級農村統治體制的鬥爭和反對地主收回土地的鬥爭同時進行。地主收回土地的事件從停戰後，特別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政府明確了農地改革的方針以後不斷增多。這個鬥爭在走向徹底的土地革命的展望下向前發展着。

一方面，美國占領軍和日本政府為了從疲敝到極點的農村亂征糧食而施行的強征政策，更加促進了這種農民運動的高漲。從一九四五年底到四六年、四七年，日本農民運動幾乎和工人運動同一步調，邁上空前未有的高漲的上升階段。同時這從它最初重新開始的時候起，就展開了複雜而錯綜的戰綫，反對地主、壟斷資本和美國占領軍這三個互相緊密勾結的農民的基本敵人。

關於這種高漲的情況，讓我們從栃木縣的反對強征的鬥爭，來加以理解吧。以青森、秋田、山形、新潟、富山、茨城、長野、山梨、三重、石川、岡山、福岡等關東和東北地方為主，在全國範圍內所進行的鬥爭，經常成為超過萬人以上的農民的大規模示威運動和集會，形成威脅政府和美國占領軍的反對強征的鬥爭浪潮。栃木縣的鬥爭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浪頭。

太平洋戰爭結束那年，一九四五年，全國稻米的生产量據稱還不到五千萬石。農民們因為氣候不調、勞動力和肥料嚴重缺乏，加上受了“為戰勝而獻出糧食”的口號的欺騙，長時期被政

府和軍部把糧食勒索淨盡；與“八·一五”投降的同時，他們發現自己一直受欺騙了，感到失望和驚訝，失掉了勞動積極性，一時連地裏都不去了。直到九月初，約有三個星期，農民沒有到田里拔一棵草，讓田地隨意荒蕪，茫然成為虛脫的狀態。這種情況使平時的收成就不是好的地方更加歉收了。

與此同時，麥克阿瑟司令部勒索糧食的方法是非常苛刻的。它不顧各地的實際情況，按每個縣，從上面強行規定了荒唐的分攤數量。再加上縣政府和地方事務所的官員們具有日本官僚特有的奴隸根性，慣於“向長者低頭”，以戰爭期間追隨軍部的同樣想法，追隨麥克阿瑟，不管是多麼為難的事，也完全照辦，同時，不問理由就拿來強加在農民身上。所以，關於征購稻米的分攤數量，只以耕種的面積為計算標準，根本就不問家族的人口數或勞動力的多少，強迫農民拿出米來。儘管這樣，芳賀郡的大內村僅僅能交出分攤量的百分之二十，山前村僅僅能交出分攤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他的村，大體也一樣，沒有任何一個村能按照縣方規定的分攤量交足。於是，縣方終於發動了強征。地方事務所的官員帶着警察闖入交糧不足的農家，從衣櫃的抽屜到床底下以及堆房內部，翻遍了全家的每個角落。此外，還用鐵棍刺探院子和肥料堆。鐵棍上有特殊裝置，鐵棍碰到米以後，米就被棍尖吸引出來。同時，即使藏米無几，也只給留下僅夠吃到五月底的存糧，其餘部分不論是馬料或者種糧，統統一掃而光。然而另一方面，大地主和城鎮的有錢人的倉庫中以及與軍事有關的工廠的倉庫中，隱藏的大米堆積如山。官員或警察絲毫都不過問。

到了一九四六年，在栃木縣的各個農村，食糧顯著地缺少起來。加上配給物資幾乎不來。酒只配給了一次，衣服不用說，連農具和膠底鞋也沒有。最後，在芳賀郡，農民組合帶頭組成了糧食對策協議會，二月七日，派代表到宇都宮市的栃木縣政府去，

适值县政府在举行特殊物品处理委员会，代表們請求参加旁听，要求了公正的配給。但是，县政府方面的回答極其缺乏誠意。

接着，从同月十二日下午一时，由栃木县合作社促进会主持，在县政府的大礼堂召开了“突破粮食危机县民大会”。有共产党、社会党、各农民組合、工会、农業会、农業青年联盟、粮食經營团体、制盐業协会、各种文化团体以及各町村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另外还有芳賀郡的粮食对策協議会前来参加，总計各团体出席代表超过了二百名。根据共产党的鈴木賢二的建議，通过了用民主方式組成“隱匿物資檢举队”的決議。

甚至在这种情势之中，地方事务所对于交粮不足的人施行强征越来越加厉害。农民实在無法忍受下去，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不得不进行反对强征的斗争，終于站起来了。

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的是上述的芳賀郡粮食对策協議会。为什么芳賀郡最先站起来呢？这是因为芳賀郡一带是大米单季作地区，当时食粮問題严重，而且是强征搞得最厉害的地方。以这个協議会为主体，向各个町村展开了动员网，通过町内或部落內的居民街坊小組，利用傳閱板来进行这种号召。傳閱板上这样写道：“以农民为首，一切劳动人民一齐地站起来，在三月二十二日大举拥向宇都宮市的县政府去。用我們大众的力量制止不合理的强征。一定要从各戶派出一个人来。”

三月二十二日早晨，芳賀和宇都宮之間的街道上挤滿了拥向县政府去的农民的巨大人群。在队伍的最前头，是一幅一公尺寬、六公尺长的标語，用白布写着战斗性的紅色大字：“停止强征！”这是以前的“战旗社”的画家村田元写的。跟在标語后面，从芳賀郡全境聚集来的龐大的农民团体，浩浩蕩蕩，向前进行。到处紅旗随着北風飄揚，席旗嘩啦嘩啦作响。在席旗上黑黝黝地写着“停止征購粮食！”“反对强征！”“檢举隱匿物資！”等字样。

他們還吹着海螺，打着大鼓。站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示威隊伍的前頭的是大內村的柳正一。他穿了一身破外套，腰上捆着一根草繩，手里拿着一根粗手杖，瀟灑地前進着。

各町村的領導人員和動員人數如下：

大內村(柳正一，一、七〇〇人)；真岡町(冰室三吉、管野直義，八〇〇人)；益子町(神田大作、磯部常雄，三〇〇人)；七井村(矢口鉄男，二〇〇人)；山前村(飯塚大東，一、〇〇〇人)；水橋村(大根田兼松，五〇〇人)；水穗野村(長谷川宗一，六〇〇人)；物部村(谷畑泰介，四〇〇人)；祖母井(真江光三，三、六〇〇人)以及田野村、中村、清原、市羽、逆川等等；實際總數據稱有七千人。

在美國憲兵和警察隊的警戒下，這個巨大的示威隊伍浩浩蕩蕩地進入縣政府的大門之後，立即改變為栃木縣農民大會。柳正一擔任大會主席，各町村代表，一個接着一個到講台上講話。其中從東京共產黨總部來參加大會的松本三益的號召最強烈地感動了農民的心。

“這種虐待農民的強征是由天皇的代理人縣長執行的。與其像這樣來榨取我們農民的血汗，不如去檢舉軍閥財閥的多得無處收藏的隱匿大米。政府拋掉他們不管，而對我們農民施行強征，這成什麼體統！諸位，這就是天皇制度。我們日本共產黨誓必和這人民的敵人天皇制度作鬥爭，堅決保衛諸位的生活。諸位，和我們攜起手來，在堅強的團結之下奮鬥到底罷！”

在暴風雨般的鼓掌聲中松本三益走下了講台後，突破糧食危機協議會的鈴木賢二站起來，社會黨代表岡田宗司也站起來，他們大聲疾呼說：

“要求給農民肥料！農民組合絕對不能對這種無法無天的強征熟視無睹。打倒幣原內閣！”坐在廣場上的七千名農民的熱

狂逐渐达于极点。这个时候选出了以下的人作为反对强征的交涉代表：

松本三益（共党产）、大屋政夫（日农县联合会）、程島武夫（县工会会叢）以及江口渙、柳正一、冰室三吉、濱野清、鈴木賢二 等一共十六人。从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开始向县当局进行交涉，提出具有以下要求的声明書。

“声明書：（一）要求停止强征；（二）要求給劳动农民留下最低限度的食粮；（三）确定自主的粮食征購制度；（四）由人民檢举和管理停战当时的軍粮六百万石及資本家和大地主隱匿的粮米和物資；（五）要求幣原內閣总辞职；（六）树立民主的人民政府；（七）即时發表各市町村的米谷儲藏量和納粮的分摊量；（八）公布米谷檢查員名单”等等。

因为适值县长小川已經前往东京，由經濟局长寺內出面代為应付。交涉絲毫沒有进展。經濟局长寺內以县长不在为口实，含糊其詞，用官僚常用的手法，“玉顧左右而言他”，不肯作明确答复。時間逐渐拖延下去，外面农民們开始急躁起来。各个农民組合的领导人輪流登上講台，激烈地抨击县方的态度。农民的愤怒不时爆發出来，声音震动着县政府的大楼。

下午四时，經過短時間的休息以后又繼續交涉，这次內务局长中川也加入談判。双方意見互相接近，一度好像达到妥协点，但是因为，一两句語言上的齟齬以至于引起感情上的对立，双方意見始終不能取得一致。代表們終于停止了交涉，他們說：“同这样不負責任的屬官們打交道沒有用处。等待县长回来之后，二十五日再重新举行一次大会。”

外面的廣場上逐渐黑暗起来了。虽說是三月底，一到夜里，下野原地方特有的寒冷，侵入骨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到处燃起了篝火。臉色被火光照紅了的七千名农民群众，在雷鳴般的

鼓掌声和呐喊的呼声中，带着沸腾般的愤怒，通过了以下的决议：

“决议：我们反对不顾农民实际情况的强征；要求颁布这种法令的最高负责当局原内阁总辞职。”

决定下次大会在二十五日举行，全体农民唱着悲壮的革命歌，动身回去了。这时已经七点多钟，天色完全黑了。到了二十五日早晨，农民们从四面八方宇都宫市涌来。这次不仅来自芳贺郡，来自盐谷、河内，甚至来自下都贺、上都贺的各郡。到上午十一时，县政府前的广场上已经充满了农民。人数比上次约多一倍，有人说有一万二千人，也有人说有一万五千人。红旗远比上次为多。

将近中午，在共产党栃木县委员会总书记程岛武夫主持之下，召开了第二次栃木县农民大会。掌声像雷鸣一般，红旗像火焰似地飘扬。在广场的正面，正门的檐下，像横幕似的挂着两幅大标语，在白布上写着红字：“停止强征！”“由人民管理粮食！”农民们想通过这次斗争，一举而击溃无限横暴的强征，他们的坚决意志，已经压倒了整个广场。

像前次一样，被推为大会主席的柳正一首先高呼说：

“诸位，我们完全正当的要求，在前次开大会的时候，被毫无诚意的经济局长拒绝了。但是，那时我们曾经把我们作为耕种农民所能忍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留给县长了。今天应该从县长方面得到具有诚意的答复。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广场上当着大众的面前听听这个答复吧！”

在群众的“对！对！”“同意！”的呼声中，江口渕、程岛武夫、岡田宗司、柳正一、冰室三吉等十余代表，为了要求县长答复，走进县政府的内部。送走代表以后，广场上，各町村的代表和从东京来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伊藤律举行演说，一阵阵引起农民们暴

風雨般的鼓掌和欢呼的聲音。

不久后，小川县长在农民代表們包圍之下站到正面大門扩音器的前面，在說明了櫛木县內的食粮恐慌情况之后，斬釘截鉄地答复說：

“絕對不停止强征。但是可以給农民留下到五月三十一日为止的七十天的食粮，以每人每天二合三勺为标准，一家有三口人的留下一包米作存粮，三口人到六口人的留两包，七口人以上的留三包，其余部分要全部交出。如果食粮将来有不够情形，另行配給。对頑劣的农家将毫不寬容地施行强征。”

自己的誠摯的要求遭到了冷酷的拒絕，农民們不甘罢休。立即喧嚷吵鬧起来，憤怒的火焰大大爆發。全体农民站起来揮着紅旗，杀气騰騰，轉瞬間弥漫整个廣場。县长惊慌失措，想退出會場，但是有几个青年臂挽着臂，擋住去路。美国宪兵慌忙地跑过来。一时周圍騷然大乱，县长有如虎口逃生似地好容易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

但是，这样結局并不是大家所能同意的。他們又鼓励代表团，再一次去向县长交涉。于是代表团在县政府三楼东厅的會議室，以程島武夫为主席，商討新的对策。在这个時間，伊藤律和另一位从共产党本部来的粮食对策部长岡田文吉，以个人名义会見了县长，向县长劝說應該停止强征。大約有一个小时。可是县长終于沒有一句明确的答复。因为他不能够答复了。

代表团的協議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見。一味坚持最初的要求，当然交涉就会决裂。如果接受县长的答复，那么举行县民大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使人难于理解。問題的焦点在于，对于县长的答复，可以讓步到怎样的程度？在怎样的程度以上必須严加拒絕？同时这方面的要求应当坚持到怎样的地步？而且，最关紧要的这些焦点，并不容易简单地找到。大家的意見看来

剛要取得一致，但是又乱了，又要取得一致，又乱了。

终于时鐘过了五点了。外面农民等得不耐煩，發生了吶喊声。一个接着一个走到講台上講話。抑止不住的憤怒的火焰逐漸蔓延了整个廣場之上。

等得不耐煩的江口渙把程島武夫叫出到廊下来，用严厉的話調，要求會議迅速进行，劝告他們早一刻作出对策，不管怎样，先对县长攻击一下。

協議好不容易有了进展，作出对策的方案的时候，已經过了六点钟了。代表团带着这个方案重新同县长开始交涉。把县长的答复和这个方案相对照，用逐条申議的形式进行了討論。

要求——停止强征！

答复——絕對不能够停止。

要求——强征的对象，应由担当的官員和部落常会决定。但是要使农民組織的代表也参加。

答复——尊重部落常会的意見。因为农民組合是自由組織，不能以县长的命令使它参加。但是欢迎它提出積極的意見。

要求——不管交出的比率如何，存粮应按照每人二合三勺，留下到六月底的部分，七月以后用还原的办法另行配給。

答复——允許給受到强征的农户留下到六月底的存粮。“还原配給”一定要实行，但是如果有一般消費者也得不到配給的情况發生时，則当別論。

要求——交出的大米，除掉向都市交出的一定数量之外，剩余部分应在町村内保管，以备七月以后作还原配給之用。插秧的时候要求增加配給米。

答复——以县长的权限只能够把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部分留在町村内保管，这以內的部分，农林大臣有决定权。关于在插秧时候增加配給米，一定照办。

要求——要求每反地留下一斗种籽。

答复——照办。

要求——不許强制征用馬飼料。

答复——照办。

要求——要求同意人民协助来檢举隱匿物資。

答复——不能同意直接行使实力，但希望人民协助，提供情报。

要求——要求立刻公布檢举物資的内容。

答复——每次将通过报纸公布。

县长也比原案作了很大的讓步，代表团也作了很大的讓步，最后在这条綫上妥协了。只願进行商談，天色已黑，县长室和走廊下电灯通明。

农民們在逐渐濃深的黑夜中繼續坐在那里，今天也是到处点起了火把，以頑强的耐心等待着答复。

柳正一报告了今天交涉的經過，就代表团的要求和县长的答复作了說明，同时，就交涉所以达成这样的結果征求农民大众的諒解。接着，伊藤律、程烏武夫、江口渙輪流站起来致詞，鼓励农民們，督促他們将来重新斗争。特别是最后站起来江口渙，坦率地告訴大家說，代表团軟弱無力，沒能够阻止县长的强征，由衷地向农民道歉。

最后，大家三呼櫛木县农民运动万岁，解散的时候已經是七点半鐘了。周圍变成了一片漆黑。

如果說这种反对强征的斗争，是农民对于战争期中一直欺騙、压迫、剝削他們而且今后还要欺騙、压迫、剝削他們的政府的憤怒的爆發的話，那么，在各村进行的檢举舞弊和要求改革村政的斗争，正是农民对于一向在村中欺騙、压迫、剝削他們的地主的憤怒的爆發。

有如在茨城县的新宮村，已經早在日本投降后的八月三十一日，就由对于村政的专制腐敗感到憤慨的志同道合者五十人，組成了以改革村政为目的的名为“正論会”的团体。他們第二天向村会議員交涉，要求同意村长辞职，立刻使村长提出了辞职書，并且由全体村会議員和与此同数的“正論会”代表召开了“村政共同協議会”，决定推选村中的正直人士为村长。这个村就是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实行了村政改革。但是，村政改革运动像燎原之火似地开始扩展，是在秋收結束、在空前的歉收和粮食恐慌的情况下，征購粮食分摊办法發生了重大問題之后。后来在农地改革的过程中，給予全国巨大影响的长野县的盐尻村农民委员会的产生，也是由于一九四五年底分摊量的問題，当时暴露了額外多加二成的事件，因而召开了村民大会。

要求改革村政的斗争，不論在什么地方大体上都經過和这同样的过程。讓我們看看奈良县磯城郡都村的情况，作为其中之一例。这个悠靜的村庄位于奈良盆地当中是盛产大米和西瓜的名地。尽管怕人知道，但是农業会和村公所的舞弊行为已經成为村民中間談論的材料。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的共产党小組，追溯到一九四三年度調查这个村的征購粮食分摊量和实际的交出量，掌握了农業会确实进行了額外分摊或空头交出的舞弊行为的証据。共产党小組把这个問題提交青年团。青年們憤慨万分。但是只用青年們的力量想来推翻根深蒂固的地主的村政，并不是容易的。青年們研究作战方法，决定自己写个剧本演出。内容在上演以前絕對秘密。村民們听說村中的年青小伙子們自己要演剧，引起了兴趣，都前来看戏，但是在他們面前演出的是巧妙地以乡村的农業会和村公所的舞弊行为为題材的諷刺剧。不顧那些被当作模特兒的那些人的难堪的面孔，村民們哄然大笑起来。他們在笑声中想起过去受到的欺騙和無情的冷

眼，像火焰似的憤怒涌上了心头，再也抑止不住了。

这次演剧的影响很大。村民对于检举舞弊问题的关心非常高涨。共产党小组和青年们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组织了行动队，查封了农业会的全部仓库，彻底加以检查。果然，从仓库中查出了四百包隐匿的小麦。立刻把这些小麦还原配给农民，使青黄不接时期的厨房因而沾光。检举舞弊的斗争收了这样实际的成效，受到全体村民的感谢。在这个鼓励之下，青年们每逢农业会的理事会举行会议，就大家一起去旁听，施加压力，并且还常常召开部落大会，平行地进行改革村政和反对强制征粮的斗争，而结成农民组合的方向迈进。八月终于成立了农民组合。因为这种压力，九月初农业会旧干部全体辞职，新干部全部从农民组合的组员中选出。农业会被控制到农民组合的手中以后，村公所、各部落会会长、合作社的社长等的舞弊行为一件接着一件地暴露出来。这样，掌握了许多新的舞弊行为的事实以后，十月在青年共产同盟、农民组合、农业会的共同主持之下，召开了村民大会，全场一致，决定开除村长、前农业会的会长和理事、村公所的配给员的公职，要求渎职者赔偿损失，设立村政革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农业会、农民组合、青年共产同盟和非农户各出五名委员），作为今后革新村政的机关。

劳动人民如果不能掌握国家权力，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化的政治，从而也不可能有村政的民主化。在资本主义形将崩溃的时期，在殖民地的掠夺开始加剧而且封建的统治关系根深蒂固地残存着的日本农村，执掌村的权力机构的统治者们进行各种舞弊行为去填塞自己的腰包，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这以后，检举舞弊和要求改革村政的斗争也在各个地方继续进行了很久。例如，在征购粮食分摊数量上的舞弊、配给物资的冒领和转卖、在学校建筑捐款上的舞弊或在工程上的舞弊、私自

盜賣町村的財產、徵繳捐稅時的舞弊以及農業會(後來成為農業協會)的舞弊行為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無暇枚舉。從四六年到四七年特別熱烈地進行了檢舉舞弊和要求改革村政的鬥爭，揭露了一部分舞弊行為，打擊了一部分搞過舞弊行為的人，也起了牽制他們不敢再像戰時戰後那樣公開進行舞弊的作用(當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村民受了農賊們相互間的勢力之爭的利用)。但是，並沒有因此而粉碎了舞弊的根源。地主制度的封建壓迫、壟斷資本的瘋狂榨取以及成為它們的基礎的殖民統治，由這些東西所形成的舞弊的根源在不斷地產生着新的舞弊行為。農民們對於村的統治者的許許多多的舞弊行為，不再像以往那樣沉默地置之不理，而毫不躊躇地起來加以攻擊了。他們的憤怒今後必須針對着粉碎這個舞弊的根源的方向。

二五 把土地交給農民

——圍繞農地改革的鬥爭

“把土地交給農民!”——

這是在地主制度的枷鎖下，一直遭受痛苦壓迫的沒有土地或者僅有極少土地的日本農民從心底發出來的呼聲。在他們的祖父的心中曾經燃燒過這種呼聲，從他們的父親的喉嚨中也曾經爆發出來過這種呼聲。九·一八事變以來蠻橫的鎮壓雖然在表面上彈壓了這種呼聲，但是這種呼聲決沒有消失而仍繼續燃燒在農民的心中。

由於戰敗而變得軟弱無力的統治階級，重新容許“把土地交給農民”的响亮呼聲公然高漲起來。第一次公開出現在群眾面前的共產黨，已經在十月二十日的“赤旗”報復刊第一號上响亮

地号召：“無代价地沒收寄生地主的土地以及以山林原野为主的荒閑土地。”并且，十月底在山形县下条町还發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以高級軍官为中心的复員軍人强占了战争期中被征用为練兵場的五十町步的田地，打算从此經營农業。这惹起了原来的耕种者們的憤怒，他們在雨天中披簑戴笠举行群众性的請願：“要求归还祖先傳留下來的土地。”在問題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軍人方面雇了一些人开始耕种起来，因此，农民方面也动員了八十头牛实行共同耕种。像这样的在各地开始發生了收回战争期間被軍部霸占的土地的斗争。当然，想从明治以来长时期处在天皇制度的压迫和地主統治的紧紧束縛下受尽凌辱和屈辱的状态中站起来，决不是件简单的事。农民的奋起决不是迅速敏捷、大張旗鼓的。但是，它使人清楚地看出，从胸臆深处發出的这种呼声，好像海潮在上漲似的沉靜然而具有难于控制的力量，将广泛地捉住农民，向地主制度挑起最后的决斗。

而且另一方面，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得非常强大的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民主势力，强烈希望日本轉变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不許可成为日本軍国主义的根源之一的农村封建制度原封不动地繼續存在下去。实行日本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可以說已經成为一种国际輿論。

过去整个一个世紀統治着日本农村的地主制度，很明显，現在受到来自內外各方面的重大危机的襲击。同时，地主制度被徹底粉碎，意味着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进一步的發展。为了挽救地主制度的生命，为了避免爆發革命，統治階級不得不赶紧采取一些办法。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政府發表了“农地制度改革”綱要。这个綱要的要点是：（一）訂出五年計劃，讓离乡地主把全部所有土地、讓居住在村中的地主把平均在五町以上的所有土

地强制地卖给佃农(根据这个办法,約有一百〇三万町步的土地被“解放”,这不够全部佃耕地的四成);(二)地主最近預定耕种的土地不得作为“解放”的对象;(三)用現金繳納佃租。这不过是把以前政府所采取的設立自耕农政策加以扩大而已。政府一面允許地主收回出租的土地以后依然还可以保持这些土地,同时又把佃耕地的三分之一左右卖给佃农,企圖用这个办法来消灭“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呼声。

这种騙人的“改革”方案使农民感到憤慨。共产党从正面加以反对;还在重建途上的日本农民組合的扩大准备委员会,也要求把它撤回(与此相反,社会党原則上表示贊成)。但是,尽管是这样不徹底的改革,在地主拥有强大势力的“帝国議會”上,反对者仍很多,不容易簡單获得通过。

就是在这个时候。盟軍总部在十二月九日發出了后来被称为“农民解放指令”的“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鞭策政府,要它更进一步进行农地改革。

美帝国主义者比日本的地主、官僚多少还聪明一些。为了挽救地主制度的生命,最好是在农民的土地斗争高漲起来以前,先进行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来騙住农民。——美帝国主义者充分了解这一点。日本政府那种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改革”方案,到底是不能抑制农民的不滿。如果在“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口号之下,农民像風暴似地站起来,同时这个斗争和工人的斗争携起手来共同进行的話,那么,一切将不可收拾。如果那样,日本的地主将連根带叶一起被消灭,美国占領軍想把日本变成它的殖民地的計劃也将难于实现。因此,在人民打倒天皇制度的斗争高漲到能够推翻天皇的程度以前,赶紧地使天皇出现在人民面前,使他宣称“事实上我不过是个普通人”(見一九四六年元旦“年初詔書”),同时还修改了天皇制度的旧宪法,制訂了在

口头上承認人民主权的“民主宪法”，这对于維護天皇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样情形，为了維護地主制度，在农民站起来要用实力打倒地主以前，先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装扮出如何要廢止地主制度和解放农民的姿态，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正是因为这样，麦克阿瑟發出了“解放指令”，在它的开头就用得意的装腔作势和夸張的美丽辞句說：“为了排除对于促进民主化的經濟上的障碍，尊重人权，并且打破数世紀以来在封建压迫下一直使日本农民奴隶化的經濟的枷鎖，命令日本帝国政府应当保障它的耕种农民在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方面，受到比现状更好的均等的机会。”在日本农民面前，他是漂亮地作为一个虛伪的解放者而出現。在麦克阿瑟总部担当农地改革的推进工作的拉底金斯基，一九五一年在威斯康星大学于美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世界土地制度會議上說：“如果农地改革不是自上而下，即由拥有土地而且握有政权的人相机实行的話，那么，共产党就将代替他們出来进行改革。到那个时候，地主在土地以外还要失却更多的东西。”他这样說，以威胁那些还没有着手进行自上而下的农地改革的落后国家的政府代表。有如在这些話中所清楚表現出来的，美国的主要目的，当然不是在于打倒地主、解放农民，而是在于防止威胁占領体制的农民革命斗争（和工人及其他斗争携手）的高漲，扶植地主势力，在农村中筑起防御“共产主义的壁壘”。

不管怎样，由于这个“备忘录”的压力，估計会遭到很多困难的第一次农地改革法，总算在議会上通过了。但是，貪求無厭的地主階級的議員們沒有忘記了加上一項修正說，“如果佃戶提出，地主同意的話，”佃租也可以用实物繳納。由于“备忘录”而受命提出第二次改革計劃的农林省，慌忙地又着手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这个期間，农村里地主收回土地的事件以惊人的形势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这个数字，虽然不确实知道，但是据说即使作最低的估计，从停战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已达二十五万件以上。

农民们的土地，甚至在战争期中那种劳动力不足、资料器材不足的最恶劣情况下，还一直咬紧牙根耕种到今天——即使说那是一块面积不够一反的极小的土地，如果被收回，也是关系到农民今后一家的生命的；而且被征去当兵的兒子也回来了，到军需工厂作工的姑娘也被解雇回来了。为了使增添的丁口能够糊口，连耕种现在这些土地还感到不够，那么，土地被收回的时候，又如何能过活下去呢！而且地主总是借口说，改用现金缴纳佃租以后，因为这是按照消费价格计算的，约等于生产价格四分之一，吃亏了，没办法。（例如，以前收获两石米的田地，一石是佃租，即将收获量的一半交给地主，现在因为米的消费价格每石是七十五元，所以只向地主交七十五元就可以了。而一九四五年米的生产价格每石是三百元，那么两石就是六百元，佃租约为生产价格的百分之十二。）所以，他们就对佃户提出种种的难题，或者说要求像过去那样缴纳实物地租，或者说要求用黑市每反两万元或三万元的惊人高价卖给佃户，虽然当时公定价格水田平均每反才不过七百五十元左右。如果不听他们这些话，他们就威胁说要收回土地。

但是，农民也不能完全相信地主的言而默不作声。同时，跟地主的蛮横作斗争的道路，只有一条：农民自己团结起来，自己进行斗争。在许多村中，以地主收回土地为开端，组织了农民组合。为了反对收回土地，他们到地主的家里示威和实行集体交涉。除了这些方式以外，还有一部分地区遇到地主有圈地禁止入内以及在收回的土地上已经播种等情况时，农民组合员就共同翻掘土地，进行重新播种的共同耕种的斗争。对于地主的要

求黑市佃租，佃农停止了以前的每个人单独向地主繳納地租的办法，由农民組合把佃租收到一起，向銀行一笔付到地主的农業会的存款戶上，使地主沒有征收黑市佃租的余地。

当然，处在长期地主統治的枷鎖之下，农民要下定决心同地主进行正面的斗争，决不是件容易的事。农村的封建制度是根深蒂固的。农民对斗争躊躇不前，忍痛流泪，把土地还给地主的，也不稀奇。因此，一方面有进步的村庄，例如长野县的盐尻村，組成了土地管理委员会，把全部佃租地（后来连自耕地也在內）置于农民的共同管理之下，沒有这个管理委员会的同意，不論任何土地也不許动，几乎完全防止了地主收回土地。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村庄，地主随意收回土地，勒索黑市地租。像这样，地主的攻势和农民的反击，农民的攻势和地主的反击，形成了激烈的漩渦，互相排挤。就在这个期間，日本政府在麦克阿瑟总部的鞭策之下，匆匆进行第二次农地改革的起草工作。

所謂第二次农地改革法，即“創設自耕农特别措施法”和“修改农地調整法”，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經国会貴族院和众議院两院通过的。那时，只有共产党明确指出它們是充滿欺騙性質的。这两項法律提出的經過是这样的：根据前述麦克阿瑟总部的“备忘录”，农林省提出的地主保有土地限于三町步的方案被总部批駁以后，在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上，苏联代表提出了全部佃租地解放方案（而且是徹底的方案，主張超过六町步以上的土地無条件沒收，卖给佃农的土地須按当时的公定农地价格三分之一左右的廉价进行），并且英国代表提出了地主保有土地以一町步为限为方案，而結局以英国的方案为基础制成了这两項法律。

当这两項法案在国会上通过的时候，麦克阿瑟照例装腔作勢地說：“如果，它的文字和精神能够忠实实行的話，日本农民将

在这个改革法之中找到自己长时期盼望的人权宣言。”但是，如果把所謂“这个法律，以安定佃农的地位，为了使他們能够公正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迅速而广泛地創設自耕农，以便圖謀农業生产力的發展和农村中民主傾向的促进为目的”（“創設自耕农特別措施法”第一条），这种抽象的言辞，以及前述“解放指令”的美丽辞句，拿来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和新中国的“土地法”的“直截了当”的明确表現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在“土地法令”的开头說，“立刻無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法”清楚表示，“廢除地主阶级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差別，而是清楚地表示了本質上的不同：一个是以徹底廢除封建制度和农民的完全解放为目的的真正的改革，一个是有如麦克阿瑟声明的末尾所說的，“为了对抗过激的思想的压力，沒有比它再确实的防衛了”那样，或者有如占領軍屢次所說的，这是在农村中建筑“防禦共产主义的壁垒”那样，对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漲澆冷水，以便使地主不要失尽他們所有的一切。

第二次农地改革，首先是承認全国地主平均可以保有一町步的土地。不是連根鏟除地主制度，而是把它的根还留了下来。其次，这个“改革”对于日本农民生活所不能缺的山林原野及水利的問題几乎沒有提到。它們还仍然保留在地主的手中，因此，农民要想利用它們，就不得不向地主低头。同时，因为适于开垦的土地的解放完全不徹底，农民耕种的土地絲毫沒有增加，不但許多农民繼續和从前一样，处在仅靠自己的土地上的农業無法糊口的状态，而且被收回土地的农民，土地更加减少了。第三，这次“改革”在各村实际执行改革的农地委员会中，有三名本来早就应当打倒的地主参加，不仅地主能够处处对“改革”置喙，而且在农民方面力量薄弱的情形下地主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

行“改革”。农村革命本来就“必須把一切紳权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毛澤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这个必須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的人，却大模大样地在实行“改革”中担任一个脚色。并且，这些地主委員威胁或哄騙自耕农委員和佃农委員，甚至有許多人取得了会长的地位。一九四六年年底举行的第一次农地委員选举，作为判断在如何程度上选出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委員以及在如何程度上阻止地主尽量选出唯命是从的人物的陰謀的选举，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借着这次选举的机会許多地方成立了农民組合）。但是，由于这个选举的結果所产生的农地委員会的会长选举中，地主占百分之三十九·一，超过自耕农和佃农，成为第一位。應該受审判的人倒反站到审判的席位上，这如何能够推翻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地主势力呢！

不管怎样，进入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以后，在二月举行了都、道、府、县农地委員会的选举，在三月决定了第一次收买土地計劃。农地改革就要开始进行了。

这样的话，地主就不得不失掉以前长时期随意支配农民的最大依据——农地——的大部分。地主利用仍然被許可保有的对山林和水利的控制，利用所有的在农村或部落中的特权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了能給自己尽量更多地保持土地、尽量更多地保持特权地位，竭尽了一切力量。收回土地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化了。地主們因此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同时，中央和地方的統治势力在表面或背后帮助地主阶级的挣扎。农民只是为了获得这个“改革”所規定給予的土地，也必須进行激烈的斗争。

对于实际在村中拥有巩固的势力，并且完全把持住地方統治势力的地主阶级，如果农民不进行斗争，尽管如何修改法律或者采取其他任何办法，也是不發生效力的。在岩手县閉伊郡的

某村曾經有過這樣的情況：“實行交納實物佃租和收回土地，根本就沒把農地調整法放在眼里。儘管農地委員們知道這種情況，但是因為地主勢力強大，也不得不裝做不知道。佃農要求交納現金地租，被地主拒絕了，向辦事處控訴，但結果在那裡也是被調解按收成分配。”在青森縣北郡的某村，村公所根本不把關於農地改革的事情告訴農民，所以關於這個複雜的法律內容，農民絲毫也不清楚，地主為所欲為；而且對農地改革根本沒有任何權限的村長（當然也是地主階級）批閱一切有關的文件，獨斷地處理農地委員會的事務。在岩手縣的農村也有這樣例子：發生了收回土地的事件，儘管因違反農地調整法被檢舉了，但是受理這一事件的檢察廳支部的代理檢察官將地主和佃農傳來後，對佃農進行恫吓，替地主收回了土地。在青森縣的某村，駐在當地的警察對地主進行收回土地的指導；在熊本縣的天草的某村，警察到農地委員會壓制佃農方面委員的發言，大聲喊叫說：“你對地主作了多麼壞的事！你是村中和平的破壞者，是共產黨！”就像這樣情況，地主和地方統治勢力勾結在一起壓迫着佃耕農民。

地主用收回土地或黑市地租、黑市賣價的辦法來逼迫農民。交納黑市地租，不然，就要把土地歸還。把土地歸還，不然，就要按照黑市價格把土地買下。如果農民說哪一樣都不同意的話，那麼，他們就威脅說，今後不再像以往那樣寬大了，不許再到某個山上去拾落葉，不許割樹下的草，馬也不再借給使用了。對於控制着農民整個生活的地主來說，他們可以借種種口實，千方百計向農民進攻，如果農民對此不能鞏固團結進行鬥爭的話，不管法律上怎樣禁止，他們也能夠隨意擺布農民。因此，例如在德島縣美馬郡的某村，有一個大地主占有了一個部落的幾乎全部的農地和一半以上的房屋以及房屋用地，擁有龐大面積的山林，成為部

落的拥有绝对势力的统治者。他把出租的土地的几乎全部改为自耕地，照旧征收五成的实物佃租，至于出租的那部分极小的土地则按每反三万元向佃农索价，后来又由农地委员会联系加以“解放”，假装仁慈，减价为一万元，以表示“恩德”。这种事例，此外还有很多。因此，农地委员会不过是在地主千方百计向佃农进逼之后，只来加以承认的一种傀儡机构而已。

由于这种情况，即使在地主势力不如此强大的地方，在农地委员会上提到解放地主某些土地的时候，总是听从地主的主张的时候较多。地主把好地留下，把坏地卖出。以交换调整合并为口实，他们把地主的好地集中在一个地方，佃种贫农就成了牺牲品，分得了比以前更加不方便的零碎的耕地。

有的农地委员会比较好，不完全按照地主的意思办事。在那样地方，地主就使用暴力。佃农和佃农农地委员中，被地主或地主雇用的暴力团打伤的，决不止是几个人。不仅如此，在青森县甚至还有的佃农农地委员因遭遇暗害而丧失了生命。地主利用暴力团向不听话的佃农的井中投倒粪尿，砍伐果树，或者说“叫你知道地主的好处”，故意打开地主的用水池的堤坝，把水放尽，使插秧无法进行，他们用尽了一切强暴的手段。

地主为了对抗农民方面成立组合，或者在农民组合成立之先，就有自己的组织。起初只是限于一个村的地主团体，逐渐互相取得联系，由郡而县扩大组织，和反动学者及保守政客相勾结，不久后在各地相继发起了“违宪诉讼”，说什么“农地改革侵犯了宪法上所保障的财产权，所以是违反宪法的”。

但是，农民也进行斗争。有如上述，通过反对收回土地和反对黑市地租的斗争，农民像雨后春笋似地组成了农民组合，到一九四七年春，全国已经成立了七千多个农民组合，将近二百万的农民组织起来了。当然，这些并不全部都是稳实可靠的阶级的

战斗性的組合。也有一些是富农同地主串通，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而組成的，或者是有名無实的。真正能反映最認真考虑土地問題的貧农的声音的、貧农的意見最受尊重的組合，并不多。不过从战前的組織率来看，这是惊人的。

在农民的势力强大的地方，地主收回土地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新潟县一带，一向就是农民組合运动很热烈的地方，有的村甚至不許可地主持有法定数量的土地，要求全面解放。长野县的五加村，和其他村不同，以貧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讓耕种面积在平均規模以下的貧农，买下全部的卖地，以便完全成为自耕农；对平均規模以上的农家則給它多留下佃耕地。同样在长野县的盐尻村，使富农大体上按同样比例留下佃耕地，使貧农不至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对于地主势力恃为最大依据的山林原野，农民也进行了斗争。在茨城县的要村，已經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向山林地主提出了解放山林共計約六十町步的要求，以便作为复員軍人、被疏散者以及当地农家增加耕种面积所必需的开垦地，和为了維持这种經營而必需的薪炭用林。这块山林本来属于邻村的一个拥有大山林的地主所有，他把这块山林委托要村的十几个地主代为管理。因此，农民不得不同这些地主的联合战綫进行斗争。农民組合員分头进行，每日数次向每个地主交涉，进行波浪式的攻击。激烈的交涉連續坚持了五天，两方都弄得精疲力尽，地主方面终于害怕起来，离村逃走。約隔了两个月，又开始了第二次攻击战。从属于要村的常东农民組合总部选拔出来的勇士参加了斗争，附近的村也派来了应援队伍。在斗争本部預备了馬匹，一團騎着馬的农民一个接着一个到地主的家里交涉。终于地主方面屈服，比要求的只少五町、解放了五十五町步的山林。以这次斗争为开端，在常东地方，后来在各村，相繼發生了要求解放未

并垦地和要求确立共同使用山林权的激烈斗争。以茨城县内最大的地主为对手进行斗争时，一千名群众被动员起来了，他们走过十二公里的路，并且为了捉住成为斗争目标的这个大地主，他们由骑马的山口武秀委员长带头，不顾路途困难，越过山野，勇猛前进，终于捉住地主，使他接受要求，用这样机动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像这样，是和战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多数的农民同地主进行了斗争。在有农民斗争的地方，地主的权威或多或少地受到打击。在那些地方，地主不能像以往那样大模大样，擅作威福，他们和新发迹起来的富农携手，勉强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同时，农民一旦能够明白同地主斗争，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信心，他们就不再向地主低头。这表明农民的力量显著地成长了。

但是，地主的势力并没有连根铲除。在地主还依然任意跋扈的村是不用说的，甚至在农民方面进行过激烈斗争的村，地主还保有根深蒂固的势力。这是因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进行彻底铲除根深蒂固的地主势力的伟大事业的时期，按普通尺度认为是“过分”的、彻底打倒地主的行动，是必要的。在日本的农地改革中，甚至被认为是搞得最熾烈的村，也没有看到这样“过分”的行动。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斗争，是以麦克阿瑟的“解放指令”为挡箭牌，在农地改革法的范围内，合法地、和平地进行了的。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最初的目标。这就是说，只要农民不是用实力而是规规矩矩地按照法律

取得土地，农村就是“和平”的，地主的势力也不会連根鏟除，他們可以和农民方面的土豪劣紳勾結一起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至于成为像毛澤东所竭力主張的“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的人“站在一切人之上”的状态，或者使村的秩序完全顛倒过来的状态。

遺憾的是，日本农民在这个农地改革的当时，还没有充分看穿美帝国主义的狡猾陰謀。农民在許多村中进行土地斗争的結果，虽然用自己的手保衛了土地，抗拒了地主的攻击，但是因为被“农民解放”的夸大的言辞所欺騙，他們沒有清楚了解，“农民解放”的真正力量藏于农民自己的身上，唯有在把地主“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的实力斗争中，才有这种力量。所以这又給地主留下了余地，使地主能够找到种种藏身之处，在其中牢实地从新长起了支配农民的根。“把土地交給农民！”——日本农民从心底的这个願望，这决不是麦克阿瑟的“改革”所能滿足的。

二六 全国农民統一起来

——日本农民組合的組成和分裂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三百多名老資格的农民运动家，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的藏前工業会館。他們相別多年，或十多年，在鎮压和战争的風暴下面活了过来，能够重新看到昔日熟識的同志們的顏面，高兴得拍着彼此的肩头。在这里召开了組成单一农民組合的全国悬談会。

这时被“解放”的共产党已經开始了積極的活动。在这个悬談会召开的前一天，还举行了社会党的成立大会。战后，开劳資

爭議的先聲的“讀賣新聞”的爭議事件，逐漸進入正式鬥爭的階段，接着在各地，勞資爭議和工會的成立正以驚人的速度向前進展。農村也開始活動起來。我們的時代就要到來了。在出席這個懸談會的人們中間，也充滿着對這樣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光明的期待，認為，農村也不應該落后。但是，這決不是說大家的心情都自然結合起來朝着同一方向。在與會者的心中，各人抱着各自不同的想法。

日本的農民組合運動，到這時已經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出席這次大會的，有許多人是用自己的鬥爭寫下了日本農民組合運動史的一些篇頁的；但是在這些人中間，也有不少人是運動的過程中脫離了農民群眾的生活以及他們的苦樂，以農民群眾為踏腳石，和保守勢力討價還價，進行妥協，終於成為農賊。這些人在戰爭期間，或者揚起“基於勸農報公的精神”（大日本農民組合綱領）及“基於建設日本的精神改革資本主義，以期完成國民共同體”（日本農民聯盟綱領）的幌子，或者同中野正剛的東方會那樣的極右派的政黨保持聯繫，為了動員農民參加戰時體制，大大地竭盡了忠誠。在全世界正在發生徹底變化的今天，他們又想變換幌子，轉變方向，以農民群眾為踏腳石，成為農民組合的農賊，借以加強自己的政治地位。

因此，這個懸談會召開於社會黨成立大會的第二天，決不是偶然的。前來出席社會黨大會的和農村有關係的人們，打算利用非社會黨員的農民運動家，製造社會黨的農村版，來加強自己的地位。這些人急于早日組成全國單一組合的形式。

然而，戰前以來的農民運動家並不一定都是後來變成農賊（或者最初就是農賊）的人。也有不少勤勤懇懇的農民運動家，他們認真地考慮農民的解放，考慮擴大和加強作為農民解放不可缺少的武器的農民組織。前一部分人，急于首先掛起全國單

一农民組合的大招牌，甚至最好就把这个悬談会改为筹备会，情緒非常緊張。与此相反，后一部分認真的农民运动家則認為，即使立即組成那样只有头脑部分的組織，实际上也沒有什么用处；他們主張，首先發展村中的具体斗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統一全国的組織。

这两种意見在悬談会上，發生正面冲突，終于沒有得出任何一致的結論而閉会。但是，在这里表現出来的两个派系預示了后来农民組合运动中的两派，这实在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

战前的农民組合运动，因为政治見解的不同，一再分裂；随着組合所支持的無产階級政党反复进行离合聚散，組合也反复进行离合聚散。認真的农民运动家誰都認為，不可以再重演这种愚蠢行为，以免削弱农民的力量。但是，战后也有过重演这种痛苦的分裂历史的征兆。在所述悬談会上，主張早日組成全国单一組合的人中，社会党系的人数較多。这些人把农民組合視为自己的选举地盘，硬要組合支持社会党。他們具有这样一种强烈傾向；排除所謂共产党系的組合，組織社会党尾巴的县联合会。在共产党方面，当时的方針是：不把重点放在組成全国单一农民組合上，主張按照战后的新形势，摆脱战前的佃农組合的狭窄的框子，在对全体农民所面临的一切問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組成作为斗争組織的农民委员会；这在郡、县，采取农民团体協議会的形式，在全国則采取农民代表會議的形式，而不去組織固定的、全国单一农民組合。因此，随着地方情况的不同，有些地方，社会党系的农民組合的联合会和共产党系的农民团体協議会同时并存，互相竞争。

但是，尽管政治見解不同，認真的农民运动家要求全国农民的統一的呼声，农民群众在背后支持他們的呼声，極其壯闊。作为全国单一农民組合，社会党系的人正在节节进行組成“日本农

民組合”的准备工作。担心这个“日农”成为社会党的尾巴組合，并且担心因此导致农民战綫的分裂的人們，热烈支持在日农成立大会前，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以黑田寿男、伊藤实、藤田勇三个人联名發表的希望农民战綫的統一的所謂“黑田声明”。

共产党处在日本农業革命成功或失敗的重要关头，也認為农民战綫的統一最为重要。从这个立場上，它贊成“黑田声明”的意旨，表示支持一切农民組織在有支持政党自由的原則上統一于“日农”。社会党右派已經不能独自把持作为社会党尾巴的“日农”了。

这样，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东京芝区的紅十字会礼堂，在承認有支持政党自由的原則上，产生了“日本农民組合”。作为全国的統一农民組合，这是一九二六年旧日本农民組合分裂后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这个日本农民組合的成立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坚持維持統一而斗争的力量的光輝胜利，是为了想爭取选举地盘而利用农民的农賊势力的凄慘的失敗。

但是，走向农民战綫的統一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大道。

随着高漲的形勢，农民組合的組織惊人地向前进展。如果想起甚至在战前“全农”的最盛时期，参加組織的人員还不足三十万，那么，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第二次大会召开时已經有将近二百五十万的农民組織起来，这件事真令人大有隔世之感。不过，战前的組織尽管是偏重于佃农的範圍狹小的組織，但是处在激烈的鎮压之下并不屈服，一直打着农民解放的旗帜，表现了英勇的气概。而与此相比，战后，并且在这还没有充分認清麦克阿瑟的“解放农民”的欺騙性甚至仍然幻想当年皇軍錦旗的“光荣”的时期，尽管叫做农民組合，但有不少組合，却把真正困难的貧农弃之不理，而成为只領導富农、中农的非革命的組織。在这些

富农組合里，从前的农民組合的农賊盘踞在上。他們常常揚言說，不許共产党的“破坏分子”扰乱組合或者搞什么过分激烈的斗争，企圖把他們从組合里赶出去。

社会党右派的要人、臭名远揚同西尾末广恰好成为一对的平野力三，就是这样的农賊之一。平野从前就以反共为兜售的貨色，战争期間和东方会、皇道会等右翼政党相勾結，搞过法西斯式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等。战后因为搞得过分露骨，或者贊成强征，或者策动同吉田自由党联合，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早稻田大学大隈礼堂召开日农第二次大会的时候，他遭到了几乎全体代表的攻击，終于暴露出分裂主义者的本色，結果从日农中被驅逐出去。尽管平野派的暴力团体在會議进行的时候跳上講台，摘下日本农民組合的旗帜，撕破大会的标語，作出了挑撥性的暴力行为，但是大会并没有被打乱，一千多名的代表在严冬二月暴風雪的寒夜，热心討論提案，直至夜半以后，維護了农民战綫的統一。这次日农第二次大会，的确是动人的大会，是在日本农民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大会。

但是，隱藏在农民战綫中的分裂主义者并不仅仅是平野力三一个人。从平野被农民战綫赶出后第二天起，又开始了新的分裂活动。（平野被日农开除后，他那一派組成了全国农民組合。）曾經接近政权边緣的社会党左派的鈴木茂三郎和加藤勘十声明同共产党断絕关系以来，火上加油，由野沟胜和岡田宗司等人組成了相当于工人运动中的“民同”似的日农主体性同盟。在这以后的日农，完全陷入激烈的斗争、鬧开除和互相發表声明書的爭吵之中，一方面是要抛开共产党的“主体性派”，另一方面是想維護日农的統一的“統一派”及“正統派同志会”。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上，日农本身終于分裂为“統一派”和“主体性派”，愈益加强了分裂的趋势。

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源，还是在于最基层的村的組織的薄弱。中央方面的統一，虽由于組織部部长大西俊夫(第二次大会后任書記长，不久后死亡)等人的努力，不管怎样总算维护住了，但最終仍不得不崩潰的原因，还是在于缺少从下面来巩固广大农民战綫的强大力量。同时，在日农分裂的背后，在农地改革时期尚且进行过积极活动的組織，也像进入睡眠状态似地变成为徒具形式。以生活富裕的富农为中心的那些組合毫無例外地都是这样。以惊人的形势膨胀起来的日本农民运动，像气球似地不知在什么时候泄了气了，开始瘪起来。因此，在日农分裂以后，为了农民战綫的統一，坚持不屈不挠的努力的日农統一派，也不得不在进行統一运动的同时，或者在这以前，首先設法巩固自己的立足点，从以前一向以中农、富农为中心的組織，重新改組为以貧农为中心的穩固的組織。不过在涉及这种动向之先，我們必須再研究一下那以后的农民斗争的情况。

二七 种米的人还得买米吃

——反对低米价和强制征購粮食

“农家簡直发了战败財。既沒受到空襲，又因卖黑市米大發其財。近来农家的景气不是很惊人的嗎？听說，举行婚礼的时候，用的帷幕等于是用百元一張的大鈔糊的。”

在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时候，美国把豆餅和老玉米等本来是給牲口做飼料用的东西运来日本，讓日本人一面憤懣不平一面又不得不吃；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不管怎样进行，也赶不上扶搖直上的物价，每天每天由于高漲的黑市米价，人們怨声載道。就在那个时期，都市里很容易听到这种声音。

究竟真是农家發了“战敗財”了嗎？那个时期經常被提到的农村的景气，果然是真实的嗎？不，并不是这样。不过在农村中仅仅極少数的一部的人的情况，可以說是这样。如果把它片面地加以夸張，这就变成有意在都市劳动者和农村劳动农民之間掘起一条鴻沟来。当时常常可以听到这种說法：“城市的家伙們，真是沒有办法。只管搞什么罢工，却不工作。因此鬧得我們完全买不到肥料和农業机械工具。这样，尽管米价上漲，也是沒有用的。”这就是很好的証据。

的确，战后米价以及各种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漲。其中特别是黑市大米上漲得令人可怕。但是，农家購買的日用品、肥料、农業机械工具和工作服，比米价上漲得还要多。按照政府規定的米价，实在不够补偿耕种大米实际需要的費用。这个时期，肥料和工作服几乎不用黑市价格就买不到手，而农家耕作的大米和小麦却受征購制度的严格限制，几乎是用很低的卖价被收买了去。如果不按照較高的黑市价格出卖的話，来年末也無法种，生活也無法維持。此外还有比战前还繁重的苛重的稅款。因此，要能够設法减少征粮分攤数量，多留些向黑市出售，巧妙地逃避稅款，的确能够賺得好多錢。但是，不会作这些事情的一般农民，不但談不到發什么“战敗財”，而且为了勉强維持温飽，不得不竭尽一切力量对过重的征粮和苛捐重稅进行斗争。

另一方面，政府（及其背后的占領軍）竭力想用廉价从农民手中征購米粮。有如前述，麦克阿瑟一面發出了充滿美丽辞句的“农民解放指令”，墨迹未干，同时他又唆使日本政府施行强征，从农民手中强行夺取米粮，并且遭到了农民强有力的反击。

战后，貫穿在占領軍及日本政府的农業政策中的基本方針是，如何用較低的价格征購多量的米。日本人民生活的中心，不管怎样說，就是米。大米漲价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威胁人民生

活。如果是严重的話，就会引起像“米騷动”那样激烈的全国人民的斗争。战后的粮食危机，已經在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五月爆發为“要求粮食劳动节”。这曾經使麦克阿瑟惊惶失措，發表声明，把参加示威的人称为“暴民”，开始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因此，無論如何，必得要使米价尽量低廉，必須尽多配給食粮，以便防止發生足以威胁占領体制的粮食暴动。而且，仅仅渡过一时的危机是不够的。要是米价漲得很高，那么就难于控制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攻势。那样一来，世界聞名的日本工人的低工資，战败了的日本壟断資本紧紧依賴当作今后复兴的唯一門徑的低工資，以及美国壟断資本垂涎三尺打算今后随心所欲加以利用的低工資，——这低工資的基础将要破坏了。

所以，無論如何，米价就不得不被大大地压低。如果农家說米价低，不肯拿出来，那么就必須动用武力搶夺过来。

在一九四六年初施行强征的时候，政府对于农民方面动员广大群众的可怕的压力，感到惊恐不安；但是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征購产米的时候，它在占領軍的支持之下，表现了这一年决不肯輕易放过的气焰。不过，在农民方面，虽然去年的斗争由于动员广大群众，在某种程度上收到了阻止强征的效果，可是因为那时缺少事前的准备，結局还是受到从上面命令式的摊派办法所欺騙。由于这种痛苦的經驗，他們今年在“自主分摊，自主交粮”和“交粮的自主管理”的口号下，請求政府方面同意在各村自主地决定交粮数量，拒絕从上面决定的摊派办法。因此，征粮工作迟迟沒有进展。同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十月斗争到二·一罢工，显示了显著的高漲，所以政府不敢輕易地玩起强征的把戏。农民精神大为振作。

然而，为了反对从上面命令式的摊派，以及为了同施行强征、征購粮食的国家統治势力作斗争，仅仅召开大会，通过宣言

和決議以及跟官員交涉，是不夠的。要想能夠把這種從上面決定下來的攤派和國家統治勢力抗拒回去，必須在農民方面有堅固可靠的實力基礎，有不因任何的鎮壓而驚恐不安的、從下面巩固起來的部落或農村的組織，而且還要有不是一個個單獨分散的鬥爭而是各個村緊密地攜起手來的廣大戰綫。

二·一罷工的鬥爭由於麥克阿瑟的直接干涉遭到了挫折。與此同一步調，農村中美軍吉普車縱橫奔馳督促征糧（那個時候在各縣的占領軍的軍政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這督促征糧工作）；政府不斷利用權力，強征糧食，以違反糧食管理法的名義逮捕了很多農民。農民戰綫經不起這種強烈的打擊。當然，農民在各地盡力鬥爭。但是，一直堅持鬥爭到最後的，是那些如果按照分攤數量交出糧食的話就沒有米吃的貧農。打算盡量增加自己向黑市出賣的部分而喊叫“自主分攤”的富農們，只聽到美軍吉普車來到的風聲就已經脫離鬥爭逃走了。從一九四七年冬到第二年春進行的征糧鬥爭，和前一年不同，是農民方面失敗了。如在三重縣的花岡町，雖然以農民組合為中心，訂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自主分攤量，全體農民不顧種種威脅，一直堅持鬥爭到底，但是甚至在這個地方，也因為孤立作戰，最後終於受挫，在“妨礙繳糧罪”的罪名下，組合的幹部幾乎全部遭到被逮捕的慘痛打擊。

工人階級二·一罷工失敗後，取得了寶貴的經驗，他們認識到：只靠工人階級自己的力量來鬥爭是不行的；不同廣大的全國人民，特別是同農民攜起手來是不行的。一度被強征的暴風雨挫敗的農民也取得了寶貴的經驗，認識到：不把美軍吉普車抗拒回去是不行的；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薄弱無力的鬥爭是不行的；如果不進行更加堅韌的鬥爭並和工人階級一道鬥爭是不行的。這些都是真正寶貴的經驗。但是在這種經驗真正變成整個工人

階級和農民自己的經驗以前，還必須通過許多許多的痛苦體驗。

內閣首相從吉田換為片山、換為蘆田，征糧的沉重負擔，毫無不同，反而更加重了。而且，起初是在當年的收穫情況清楚了以後再按照具體情況來規定征糧數量，但是後來因為怕這樣做，農民將不喜歡去耕種難于耕種的稻米和小麥，使大米和小麥逐漸無人耕種，所以從片山內閣的時候起，改變了方針，規定在當年耕種以前就事前規定出這一年的征糧分攤量；這樣一來，農民即使不高興也不得不耕種分攤數量的大米。這和戰爭期間一樣，連耕種也受到了統制。這種所謂“臨時農業生產調整法”雖然在國會上一度被否決了，但是，無論如何也要從農民手中強征糧食的占領軍，無視這種情況，從一九四八年度起，使日本政府採取官僚的行政措施，對產米強行事前分攤辦法。這是當時由國家公務員用一紙政令奪去爭議權的法西斯辦法的一種表現。從一九四八年年底起，根據麥克阿瑟總部指示的命令所謂“經濟九原則”，連政府最初答應絕對不予實行的強制的超額交糧辦法也實行了。

不斷加重的征購產米，使“出血交糧”一語成為農村中流行的口號。由於征糧分攤量過分苛酷，甚至法律上明確承認的自家用存糧也不得不拿出來。種米的農家被迫用帶有中間剝削費用的高昂的消費價格去買米吃，嚴重的时候（如受到災害的時候），為了不致因拒交公糧遭受逮捕，甚至不得不從黑市上買米來交出。例如，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在千葉縣君津郡某村，由於蒙受了激烈台風和蟲災，收成比事前規定的交出數量減少四成，但後來調整結果只准許少交一成，軍政部和縣當局下了嚴格命令說，即使向別的地方去買也好，一定要交足。因此農民連第二年的稻種也都打掃出來，不夠的還爬山越嶺到別處去買，才算交足了。但是，為了彌補以後吃糧的不足，農民們就濫用野

艾和海草，在部落中实行合伙。因为谁家也没有米可以装饭盒，学校只好到中午就放学。发生火警了，消防队的年青小伙子饿着肚子跑不动，情景令人啼笑皆非。以产早稻而著名的埼玉县的二合半领地方，继大台风之后，又受到这种“征粮台风”的袭击，农民们有的放弃耕种，有的卖身，甚至还有有的自杀，造成凄惨悲剧，以至于被提到国会的考查委员会上。产生这样种种悲剧的强制征粮，有如“吉普车逼迫下的交粮”这句话所象征的一样，不外是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背景的占领制度的产物。农民在同残余的封建势力斗争之外，还不得不同这种新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巨大势力作斗争。

同时，这两个农民的敌人，决不是彼此分离而没有联系的。农民从一九四六——四七年的征粮斗争的失败经验中痛切地懂得了这点。

战后农民斗争爆发的一个开端，本来是由于农民对于征粮时额外附加分摊数量的不满以及与征粮分摊有关的种种舞弊事件的揭发。但是，征粮分摊办法的不公平，正是因为起源于农村的封建阶级关系，所以决不是简单地可以消灭的。伪装为富农的地主以及和地主勾结在一起的富农，充分利用部落和村庄的封建统治势力，企图尽量减轻自己的分摊数量。为了多少能够减轻沉重的征粮分摊量，作为对征粮制度的一种消极抵抗，谁都或多或少地要有一些黑地，特别是地主和由地主转变的富农，利用自己的地位拥有更多的黑地。加上，他们的田地比普通农民的田地肥沃，生产力较高，单位面积的收获在村平均量以上。所以，对他们的分摊，相对地就显得很低了。因此，他们看到情况对自己不利时，能够不加争执地就接受上面派下来的分摊量。与此相反，对于那些既没有黑地而只有贫瘠的田地的中农，特别是贫农，分摊量是如此沉重，终究不是他们的力量所能承担的。

在担任征購粮食的責任的村长及粮食調整委員之中，很多是地主或富农。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謀求利益。如果因为催促交粮被县当局或軍政部少加威吓，他們就为維持自己的地位而發慌，不但恬然背叛农民的利益，而且成为督促交粮的走狗，強逼貧無立錐之地的貧农；就是去买，也必須繳足分攤量。

因此，在一九四六——四七年的时候，反对征粮斗争主要是采取了动员群众反对县政府和地方事务所的形式，而在一九四八——四九年的时候，則把重点移到調整分攤量的高低、揭發黑地以及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概括調查（調查面积和土地生产力）等不甚激烈的斗争方面。当然，征粮的負担只有越来越加重，所以，村长也站到群众动员的前头同县当局交涉分攤量和調整办法，“农协”也同农民組合結成共同战綫，这都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征粮斗争的战綫的而越来越扩大了。例如，一九四九年，在德島县大野村、福岡县赤間町、新潟县曾野木村、秋田县沼田町等，曾經有过这样情况：町长、村长以及町村当局，和农民一道向县当局交涉，要求确保食用粮米和調整分攤数量。另外在各县，于农民組合之外，还有农协联合会、农业調整委員協議会等农民团体共同召开郡或县的农民大会。同年七月，包括有三十五个府县的四十五个团体的代表約两千名农民参加之下，举行了“全国农民突破危机大会”，表现了反对吉田內閣的雄壮气势。这些情况都說明，極其广泛的农民以反对征粮和反对征稅問題为中心，参加到反政府斗争中来。但是，为了使这样的斗争成为强而有力的真正的階級斗争，人們从过去的斗争經驗中逐漸認識到，平日必須在村中不断积累反对封建的斗争，——具体說来，即調整分攤量的高低、揭發黑地、要求公正的地力評定等斗争以及反对收回土地、要求解放山林未开基地等斗争，并且必須通过这样根深蒂固的斗争把斗争的領導权从富农和中农手中

轉移到貧农的手中。

这样，在一九四九年，各地頻繁地發生了揭發黑地的斗争。这是一項困难工作。本来，动员群众，拥向官厅去同官員交涉这件事，只要产生了这种气势，就比較容易进行。但是，日常不断面对面，同地主和富农势力进行斗争，这必須有能够引起在封建統治下受压迫的貧农的革命动力的优秀領導以及貧农們非常坚强的决心和团结。而这种地主和富农势力像蜘蛛网似地伸張着統治之网到生活的每个角落里。为了不至于使貧农突出前进，脱离群众，陷于孤立，不至于把本来可以充分携手进行的人們，轉向敌人方面，即令不是轉向敌人方面，但也难以拉进統一战綫里来，不至于只埋头村中的斗争而丧失寬广的政治远見，这同时还必須有富有彈性的不失掉政治重点的作风。

最初不能够希望一下子就作到这些事的。斗争遇到了种种挫折，例如，只是宣傳而沒有实行，仅仅限于一部分人从事活动，把农賊的黑地和一般农民的黑地混淆了因而遭受譴責等等。但是，和这同时，决不應該忘記这种意义：由于这个斗争，把反对欺瞞性的农地改革所扶植的封建势力的斗争，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在战争結束后不久的特殊条件下，一向是搖摆不定的农民运动，明确認清以貧农为中心广泛团结全体农民的目标，走向重建整个农民运动的第一步的准备过程。

二八 “征稅旋風”

——农民生活的贫困化

过了旧历新正，在冬天的爐边，人們談話的題目主要都集中在稅款的問題上。这是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的事情。那

真是逼得人的眼珠子都要跳出来的苛酷捐稅。战前也沒听說过要付什么所得稅这种闊气的稅，但現在却不得不一下子就付出几万元的稅款。因为这个数字跟自己最初申报的数字相差太远，最先大家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把数字弄錯了一位，三番五次地仔細看。大家本来已經被征粮搞得很苦，这样一来，如果不去借債或者把馬匹卖掉，是繳不起稅款的。究竟为什么要征收这样多的稅款呢？这是每家的爐边都在反复談論着的話題。

当时的政府是在片山首相領導下的社会党和民主党的联合內閣。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亟力听从壟断資本的意旨，向肥料、鋼鐵、煤等类產業部門，撥以数目龐大的補助金和貸以复兴金融金庫的特別貸款。因为这个緣故，政府需要款項。这当然必須从国民身上去榨取来。他們認為农民因黑市交易發了很大的財，主張从农民身上多多征斂，所以就向农村課征惊人的重稅。

农民受到稅款的苦恼，早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那时，追加所得稅和企業稅已經变得十分可观。但是同这次的“征稅旋風”相比，那不过是小巫見大巫。因为，这次用的办法和从上面命令式的征粮分攤办法一样，不管农家的实际收支情况如何，只是从上面按照交出粮食所得的款項的多寡，大体上認為可能在黑市出卖多少成，然后就以此为根据估計能够征繳多少以及必須征繳多少稅款，把它分派到各个稅务局，稅务局再按照大体的估計分攤到各个农户身上。因此，这就几乎完全無視农民的申报数字，成为不符合农户实际情况的杀人的重稅。

如果誰要認真地按照这个数字来繳稅，那么，他就会变得一貧如洗。农民們已經具有同上面派下來的征粮分攤量斗争的經驗，不可能再来简单地接受这种橫征暴斂。果然，从一九四八年冬至第二年春，全国农村涌起了反对征稅的斗争。

各地，成千的农民举行示威拥向税务局去，对税务局关于征税的“更正决定”提出异议。在青森县等地，共计十三次，前后动员了达两万八千人次，申述异议的达一万件以上。像反对征粮的斗争在一开始的时候，群众动员的威力极其强大一样，在反对征税的斗争中，群众动员的效果也非常显著。为什么要征收这样高额的税款呢？对于农民这种诘问，税务局方面说不出足以令人信服的根据。当那种只是凭着随意估计而作出的“更正决定”在群众的压力下受到了尖锐的追究的时候，税务局方面意外地显得脆弱。在各地，不断地取得了一个村就减税数百万元的具体成果，这又成为新的刺激，使以前一直保持沉静的村也站起来了。

反对征粮的斗争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暂时出现了受挫折的情况，农地改革出现了，农民组合的组织扩大多少也迟缓下来，其中有的地方甚至完全沉睡了似的。这次“征税旋风”给予农民组合以新的活力。“征税旋风”不仅吹在农民身上，而且也影响了农村的小工商业者，所以有许多地方，和这些非农户在一起，成立了“纳税民主化同盟”或“拥护生活同盟”等反对征税斗争的组织。以前极端嫉恨农民组合的中农和富农中间，也有些人完全被这种旋风吹动了，重新认识了农民组合。

这样，这一年的反对征税的斗争曾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但是，尽管如此，受到从上而派下来的课税的迫害、为了缴税去举债或出卖牛马的农家，也决不是少数。

第二年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又到了纳税的季节。在前一年年底，当时的第三次吉田内阁被麦克阿瑟命令实行所谓“经济安定九原则”。有如前述，它首先就提出了实行强制征粮。这个“九原则”的目的在于，使日本经济完全从属于美国的扩军经济，以大垄断资本为中心重新改组为殖民地经济。像后

来由美国公使道奇編制的一九四九年度国家預算（所謂道奇預算）所清楚表現的那樣，这是想从国民身上掠夺苛酷的稅款和削減与民生有关的政府开支来謀求国家財政收支平衡。因此对农民的橫征暴斂只有越来越加重。对农民來說成为切身問題的护山治水、恢复灾害以及改良土地等費用愈益被削減，而繳納的稅款却不断增加。所以农民憤恨地說，当前的政府簡直是予取予求的强盜，这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由于一九四八年的群众动員而受到教訓的政府，一面依然实行从上面分派課稅的办法，同时搬出了所謂違反國稅取締法的陈腐的法律，对去稅务署交涉的群众采取鎮压的态度。其結果，在爱媛县的西条市等地發生了六十个人同时被逮捕的事件。不过这一年，像前一年那样采取大規模群众动員的形式的斗争减少了。这主要是因为农民方面从去年的經驗吸取了很多教訓，这次，事前充分准备了材料，然后同稅务署进行交涉，使他們不至于作出过分無理的“更正决定”。

但是，不仅如此。关于农民和稅款这种新問題，稅务署和村中的封建豪紳势力之間逐漸建立了关系。在他們之間，进行磋商决定，大体上應該分派給全村稅款总額多少（虽然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違反稅法的）。借口說村中农民如果鬧得过凶反而会吃亏，他們压制斗争，当然还要請稅务署的人吃喝一番。稅务署方面也因为怕交涉决裂时吵鬧会变得更凶，那就不易收拾，所以也适可而止，进行妥協。于是，农賊等豪紳之流在农民面前摆出一付得意的样子，仿佛因为他們而减免了許多稅，至于自己应繳的稅款，則利用情面向稅务署交涉从中舞弊。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勾結。而因此受到損害的，只是一般的农民。

遺憾的是，在农民組合之中，有很多組合只不过是干部同稅务署进行一下交涉，而忽略了把貧农群众的力量組織起来加以

發展的重要工作。在这样完全听任組合干部进行斗争的地方，結果斗争在进行某种程度以后就陷于停顿，最后不过使上面分派下来的征稅額获得極輕微程度的改正而已。

像反征粮的斗争一样，从最初的雄壮的群众动员和群众交涉的形式，后来逐渐转变为反对村中封建势力的斗争和反对政府的斗争結合在一起的形式，反对征稅的斗争也逐渐改变了它的形式。

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了蕭普稅制改革方案^①，根据这个方案，农民繳納的稅款，虽然所得稅在表面上多少減輕，但是地方稅却大大地加重了。过着底層生活的貧农，有許多人因为收入在免稅点以下，可以不用繳納所得稅。可是，根据新的地方稅制，不管人們生活怎样困难或者沒有工作、缺乏收入来源，对那仅少的所有，都要毫不客气地加以征稅，并且还要征收与封建时代的人头稅完全同样性質的平等均攤的住民稅。一切东西都成为征稅的对象了，弄得农民們目瞪口呆，他們把这种平均分攤的住民稅当作笑話，称之为“空气稅”。当然对于貧农來說，这并不是一笑所能了事的。而且，另一方面，使大山林地主以及大工厂厂主等人繳納的稅款相对地減輕；这种上輕下重、反映农村封建統治关系的不公平的分攤办法实行的机会，無限增加了。因此，在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进行的反对征稅的斗争中，反对地方稅的斗争增多起来了。这在要求地方稅的一般減稅之外，还竭力于要求把上輕下重的征稅办法顛倒过来改为上重下輕的高度累进征稅办法的斗争，要求对困穷者和失业者免稅。争取实行高度累进征稅率的斗争，从在香川县琴平町取得成效以来，在全

^① 蕭普是美国哥倫比亚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八月，以蕭普为团长組成的稅制視察团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项改革日本稅制的“劝告”，这就是所謂蕭普稅制改革方案。——譯者

国各地不断进行，有许多地方成功了。如在岐阜县上宝村，这种要求真正贯彻到村民中间，从部落的聚会提出到村民大会上，要求村民大会同意这个要求。这是群众性斗争的例子。另外也常有这样的情况：进步的村会议员始终为这个斗争而从事个人的活动。

反对地方税的斗争也是反对征税斗争的一种新的形式。最重要的是，用群众的力量开始进行了击退税务署查封处分的激烈斗争。由于农贼和税务署的勾结交涉的结果，大体上以这个村每反地的平均收入若干为标准，计算出来应缴的税额。因此，按照这个办法，即使富农可以有办法缴税，而贫农因为没有够上标准的收入，不管怎样也付不起税款。起初他们还可以勉强借债或把牲口卖掉去缴税，到后来既无处告贷，又无物可卖，滞欠的税款只有不断增多起来。于是税务署大批加以查封实行公开拍卖。尽管农民对于“更生决定”提出异议，他们完全置之不理，仍然开着卡车前来进行查封。

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农民们，用自己的身体对此进行抵抗。在埼玉县所泽市的富岡部落，农民组合员在重要地点把守站岗，一发现查封队到来，立即撞起钟来，号召全体动员，用这种压力击退了查封队数次。又在福冈市城原，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八百户农家中有四百五十户遭到突然的袭击，被查封了，因此在第二天大家举行示威游行拥到税务署。几天以后查封队再来的时候，由于四十名青年行动队员的快报，敲起警鼓，有三百五十名农民跑来（其中一百二十名是妇女），把查封队赶回去。在这以后三天里，他们还等待在公会堂内，以便税务署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立即驱逐回去。另外，他们还将每家的门牌摘掉，使税务署不能辨认出谁的家在哪里。有如煤矿的妇女和青年躺在运煤的货车前面阻止它的运出一样，农村的妇女和青年躺在查封

队的卡車前面，用自己的身体同武装的国家統治势力斗争。从这样激烈的同国家統治势力的尖銳斗争中，自然形成了反抗一切掠夺和镇压、徹底维护农民生活的自衛形势。

二九 新的萌芽

——南佐久和龜田乡的斗争

“从来没有真正从心底笑过的人，从来不懂得从心底笑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山彦学校”^①中的小学生江口江一这样写着。可是不懂得从心底的笑的，决不止是江一君的母亲。这是或多或少受到痛苦生活压迫的贫农的父亲、母亲以及孩子们共通的命运。同时，麦克阿瑟所号称的农地改革并没有给农村带来明朗的笑，相反更加夺去了人们的欢笑。

江一君家中只有三反的土地。从这块土地所得到的烟叶的收入是维持一家生活的生命线。在农地改革告一段落的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江一君的家中，还掉了借款之后，就是从政府领到的生活补助费计算在内，也已经不够一年中购买粮食的费用。最后又得借债。江一君看出来不管怎样精打细算，不借债就没有方法活下去，他这样写道：“只靠三反的土地来维持五口家活下去，这不是怎样也没有办法的事么？”

对于没有土地或者只有极少土地的贫农来说，尽管怎样努力辛苦劳动，结局“怎样也没有办法”的生活，在农地改革以后仍没有丝毫改变。由于农地改革，地主收回土地，只有使农民的土地减少，决没有使农民的土地增加(除了争取未开垦地的解放的

^① “山彦学校”是無着成恭編的一本关于山村小学生的生活记录。——譯者

斗争取得成功的情况以外)。虽然佃租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代替它的是征粮和税款的重担。加上,从一九四九年起农产物价格普遍的猛跌,愈益严重化;随着城市工人解雇,农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增多;由于护山治水工程的疏忽的结果,灾害频繁发生;农民生活受到的压迫只有加重了。特别是以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开端,日本将要完全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农民的生活突然变得更痛苦了。为了修建军事基地、军用道路等军事目的的綜合开发计划等而实行的土地征用;为了运往朝鲜前线,以空前未有的苛酷手段强制征购小麦(一九五〇年);为了重整军备而征收重税和护山治水事业的荒废;对于农民运动加强军事法西斯的镇压;在全面的“反动路线”的风潮支持下地主的猖狂反攻;——这些都重重地压在农民的肩头上。

这种对农民掠夺的强化的一个反映是,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突然明显表现出来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农协等反政府的活动。可是,自由党等方面充分了解,把地方的土豪劣绅也转到敌对方面,无论如何对自己不利。他们一方面用武装警察毫不留情地镇压贫农迫不得已而发起的斗争,同时怀柔那些农民中的上层和地主,努力分化农民战线。他们或者摆出减轻农村征税的姿态,或者把征粮的超额交出部分的米价订得很高,或者以微不足道的几个钱给予今后将成为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势力的新的物质基础的土地改良事业和救济灾害事业,而这些钱最后都不外落到农贼们的腰包里去。他们就是用这些方法进行怀柔,对农民进行欺骗。这些政策以及为了建设军事基地而实行的蛮横无理的土地征用、加强镇压、以复活地主制度为目的的种种政策,都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经过旧金山单独媾和、走向日本的殖民地化和军事基地化时期的农业政策的新表现。

由于这些政策，农村中貧富之差越来越显著。当然，所謂“富”的在殖民地条件下受着种种压迫，也呈现出極萎縮的状态；不过这与一直墮入穷苦深渊的“貧”的相比，貧富悬殊越来越大。当时为了爭取民族独立和保衛和平，統一日本的反对殖民地化和軍事基地化的一切力量，逐漸成为最重要的問題。但是，形成这个統一战綫的基础力量，不論怎样說，必須是最受压迫并且愈益受到压迫的貧农。同时事实上，在农地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之后，許多农民組合的組織發生动摇，几乎成为若有若無的状态。正在它們紛紛討論动摇的原因以及其重新恢复的对策的时候，用实际斗争指出如何摆脱战后农民运动一时陷入混迷状态的方向的，也是貧农們的斗争。过着“怎样也沒有办法”的生活，貧农們越来越被迫处于“怎样也沒有办法”的境地，已經到了不能繼續甘心“怎样也沒有办法”和屈辱的生活而不得不奋然站起来的地步。这在农民运动史上开始展开了新的篇頁。

受冻灾和稻热病的襲击，一九五一年（昭和二十六年）的收成，不及平年收成的一半。这年秋天，当連綿不絕的八岳山的山峰上降下初雪的时候，南佐久的各个村中相繼准备召开村民大会。事情的發生是这样的：以南佐久郡各村的民主議員团为中心，成立了包括八个町村长和二百名村会議員、农業委員、农协干部的“地方自治研究会”，开始进行了要求領取平衡补助金^①的請願运动。这个請願运动被县当局气势汹汹地駁斥了。民主議員团大为憤慨，向群众呼吁召开村民大会和部落大会，要求通过決議，如果不發給平衡补助金就不納稅。响应这个号召，各个村相繼召开了村民的群众性集会。

① 平衡补助金原文为“平衡交付金”，即地方財政的需要額超过收入額时，其不足部分由中央国庫予以补助。这项办法已廢除，改为“地方交付稅”。

——譯者

这些村中有一个叫田口村，响应上级号召，出动了由村中的各农民团体（日农、土地管理组合、开拓组合、森林组合、牛奶场组合、农协）和社会党、共产党的支部组成的村民主统一协议会，以各个部落的大会为基础，举行了村民大会。在村民心中蕴藏着种种要求，都在大会上提了出来。主要的是：（一）补偿灾害损失，（二）调整减轻征粮数量，（三）减免税款，（四）立即支給平衡补助金，（五）开放国有林。其他的村，大体上也决定了同样的要求。

但是，要求只通过决议是没有用的。同时，经验表明，只进行请愿运动并不具有实现要求的力量。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就要指示出以贫农的斗争作为全村村民斗争的基础、用实力来争取农民的要求的方向。根据这种方针，在南佐久的各村，根据各自具体的情况发动了贫农的斗争。这个斗争的三大支柱是要求开放国有林，要求勾销负债，要求给予工作。在田口、川上、荣等村，以前就成立了土地管理组合，进行了反对收回土地、揭发黑地和采伐枝树等斗争，这次更加积极的展开了争取把山林和土地交给农民的开放国有林的斗争，有的还用实力实行了采伐。勾销负债的斗争，是用全部退回开垦资金借据书、要求勾销为修理池沼而从县方借用的款项以及要求勾销农业定期贷款等形式进行了的。在这样的斗争不断进行的基础上，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全郡农民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推进要求开放国有林的斗争和加强工农联盟。反对村内封建势力和国家统治势力的激烈斗争的结果，预料一定会受到镇压，为了抵抗这种镇压，青年中间以及妇女和少年中间都组成了自卫组织。

县当局由于泛滥在南佐久一带的贫农的这种气魄感到惊恐，不得不对于征粮问题和征税问题大加考虑。

从南佐久的群山中流出来的水，滋养着千曲川，它和犀川合

流以后，改名为信濃川，流过善光寺平野，再通过蒲原平野的一望千里的辽阔的水田地帯而注入日本海；就在这个地方，夹在信濃川和稍偏西北方同样流入日本海的阿賀川之間，有一群町村，叫做龟田乡。这里的水田，水浸过胸部，搬运肥料和收获物时必须使用小船。战后，龟田和曾木、两川、横越以及包括新潟市一部分在内的五个町村八千九百另八町步的土地，正在进行着号称日本第一大規模的土地改良事業。这个地方一向以日本最大的大地主地帯出名，而担当这个土地改良事業的龟田乡耕地整理組合，正成为这个地方的地主們的新的据点。

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成立的耕地整理組合的主要干部中，多数是地主。耕地整理事業的經費預算是十二亿五千万日元，其中除了对等基金以及由政府农林漁業特別會計长期貸款三亿四千万日元之外，下余的九亿多元由六千名組合員的分摊款筹出。組合員每反地的負担款額，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度是五千元，一九五〇年度是八千元，一九五一—年度是一万二千元，逐年上漲。这种負担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从組合員中間不断喊叫要求全部經費由国库負担，这是自然的。而且，这种耕种农民的血汗結晶經常为掌握組合实权的农賊和地主所并吞了去。当这种事实被發現的时候，农民对这些地主势力的斗争不能不勃然爆發起来。

揭發舞弊事件的火焰，先从曾木村燃起。一九五一年春，發現了与同村第三工区、第二工区的一部分一百二十町步的工程有关，工区长深井源六和會計西川米一郎二人侵占和貪污了工事費三百五十万元的三成，約一百万元以及对組合員工資所得的課稅部分約八百元。村中立即由农民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以此开端，各村紛紛成立調查委員會，要求會計公开。并且大江山村西山部落要求提高雇工工資、要求工資由部落管理（在这以前，支出的工資都經過部落的农賊包办，其中留下了拖欠工資和

舞弊的余地)；大江山和曾木村拒絕交納組合分攤金；對於農賊舞弊事件感到激憤的貧農的鬥爭，風起雲湧地出現了。

日農新潟縣聯合會也重視這個問題，設立了對策委員會進行調查工作。到了一九五二年一月，根據上述的曾木村調查委員會的揭發，龜田村農業委員會會長佐藤武以及組合的幹部數人被檢舉，組合本部和幹部的住宅被搜查，問題更加擴大了。從一月開始進行的召開臨時代表會議的簽名運動立刻獲得了必要多數，二月四日，召開了臨時代表會議。二百多名農民乘坐包租公共汽車來到會場，阻止了組合本部預定審議的議程，使他們通過了召開發表真相大會和成立由每個町村各出十名代表組成的舞弊調查委員會的決議。這樣，在三月十六日召開的有三千人參加的組合員大會上，暴露出來農賊幹部許多舞弊事件，他們終於被逐出了幹部的職位。

其中有一個人是龜田町丸瀨部落的佐藤武，他原來是擁有六十町步土地的地主，現在還有兩個雇農，他擔任耕地整理組合理事和農業委員會會長，掌握部落的水利，向部落交付的錢也全部都經他的手。從調查中發現這個人和其他部落的農賊一樣，扣留發給部落農民的工資，並且和包工商人互相勾結，偷工減料，共侵佔了二百多萬元。由於農民群眾的追究，耕地整理組合承認負擔一半責任，決定退給部落九十五萬元。八月七日召開的丸瀨的部落總會上通過決議說：那樣的話，下余的一百另五萬元就向佐藤武追索；並且立刻開始進行交涉。對這種強硬的交涉，佐藤武感到恐懼，在三名警察的庇護之下，從部落逃跑了。於是，馬上又召開了部落總會，通過決議，今後不許放走盜竊分子佐藤武的那些警察進入部落，同時立刻商討了逮捕佐藤武的計劃。當時制成兩千張傳單，上面寫道：“二百萬元的大盜竊犯佐藤武逃走了。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丸瀨部落。”傳單由青

年們分头出發貼在各个地方。出發到新潟市的一队，立即巧妙地發現了佐藤武的下落。佐藤武被裝在租用汽車上，青年們的自行車队前护后拥把他帶回部落里來。在前面的傳单旁边立刻又貼上了一個傳单，写道：“在諸位町民的协助之下已經逮捕了佐藤武，深致謝意。——丸瀨部落。”被帶到部落总会來的佐藤武具結說，“为了賠償，甘願拿出全部財產”，这才被釋放。

在信濃川上游和下游分別進行的南佐久的斗争和龟田乡的斗争，不管哪一个斗争直到最后阶段，都不得不同大量的武装警察的镇压进行斗争。这一事实表明，农民特别是贫农争取生存的要求，已经不是用普通的手段所能取得的了。因此，必须推翻使用手槍和警棍的暴力政治。同时，根据这种斗争的经验，一九五二年八月举行的日农（统一派）第六次大会，亟力贊揚在同年五月一日“流血劳动节”的工人、学生的斗争，強調了加强工农联盟和以贫农为中心、組織广大农民参加到反封建反殖民地的斗争中去的重要性。

三〇 要求开放山林

——栃木县金田村的斗争

这些以贫农为中心的斗争首先争取的对象是土地。麦克阿瑟的农地改革并没有給农民增加土地，仅仅給他們以持有土地的名义；农業經營上不可缺少的和可以成为未来的耕地的山林原野，几乎全部仍然留在地主手中。缺少土地的贫农的斗争，自然要指向这个作为地主制度的据点的山林。

一九五二年夏，在日本要求开放山林的斗争中率先站起来的，是栃木县那須郡金田村的农民。那須郡位于栃木县的东北

隅，与茨城县、福島县的边境相接。在那須郡中，金田村也稍偏于北方，按鉄路的东北干綫来説，位于黑磯站的西南。人口一万六千人。有十三个部落，其中又分为八十二个小部落。南北长十六公里，东西寬十二公里，形成一个近似菱形的村庄。

从地形来説，它位于那須野平原的中央，是半高原的平地。北部有些丘陵的波浪起伏，但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山的山。居民百分之八十是耕种稻米的农户，耕地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土質不好，收获量小。特别是从中央部分的乙連澤部落到西北的佐野开垦区，因为那須火山的关系，成为火山灰地带。在这一带，收获量每反地水稻不过三草袋，麦子不过两草袋，名副其实地是貧农部落。如乙連澤的千秋分等部落，甚至在“农地解放”后的今天，还有三家农户住在窩棚似的小房里，沒有电灯，也沒有被褥，盖着稻草睡觉。全村未开垦的土地才不过解放了六町步。尽管有許多杂树林，地主并不許可随便去拾落叶，所以农民們有时只好到西面的那須山麓的高林村，或者到东面福島县、茨城县边界的八沟山下去拾。“要求有更多的土地！無論如何，要求有可以拾草打柴的山！”这从很早以前就是农民的迫切願望。

农民本来是極其富于忍耐性的。不管生活上有如何迫切的要求，他們总是要忍受难于忍受的东西。他們最后忍無可忍地站起来，一定有其成为开端的原因。在許多情況下，是对于村中农賊的舞弊行为和領導階層的不道德行为的憤怒的爆發。金田村的情况也决不例外。

最初使农民感到激怒的是同村农業委员会委員长室井貞（自由党）的許許多多的舞弊行为。例如，同村的农賊有把土地卖给佃农，趁着那个佃农还没有完成登記的手續，他和农賊合謀又卖轉給別人，因此甚至伪造文書，發給許可。

室井貞从这样暗中进行农地交易中索取佣錢和伪造文書的

事件，已經發現的就有十多起。并且，当佃戶和地主之間發生糾紛的時候，他一定要向雙方勒索金錢和貪圖酒食。有一次，他还向村中朝鮮人进行特务行动，被迫写下謝罪書。从这件事發生后三个月的某夜，有人把两个滿盛糞尿的大瓶扔进他家的爐边和客厅里去。不久后，伪造文書的事件受到审判，室井輸了，終于辞掉农業委员会委員长的职务。

当时，另外还發生了所謂农协的盜卖稻种事件。金田村稻米的年产量每年都在六万草袋以上。村中为了謀求稻米品种的改良，在每个部落設立种籽圃，从这里采取种籽交給协同組合，再由农業委员会分配給每个农戶。同时，把本村剩下的部分，分配給邻近町村的农戶。一九五二年春天，气候失調，秧田蒙受了雹灾，所以剩余的种籽决定暫不配給邻近町村，要在村中保管到五月底。可是，农协的常务理事植木龟男在四月中旬把剩余的五百三十袋稻种按官定的“公价”卖給自己的部下。那些买的人，借此机会，把买到的稻种算做征粮的額外交出米，每石米索取两千元的奖励金。有一个理事因此賺得二万五千元。而警察方面看到这种情况却故意装着沒有看見。此外，植木常务理事还擅自处理农协的貸款，只貸款給能繳起征粮的农戶，对于繳不起征粮的貧农請求的貸款，从来不予批准。

在这样的农村的空气中，从缺乏耕地的人、缺乏落叶和薪柴的人之間，当然要提出了开放山林的要求。最先开始行动的，是以火山灰地带出名的乙連澤之中貧农特別多的千秋分部落。这里在战后农地解放的时候也一直沒有解放，从那以后的四年間，經過多方交涉的結果，好不容易才有了解放的头緒。尽管有了解放的头緒，但是那时，部落北部的树林不顧地主渡边昌已經答应加以解放，經營的人却私自随意卖掉了。这就成了問題。虽然如此，交涉的結果，終于談妥按每反三千元的價格把那塊山林买

下。但是，只靠这块山林，每户仅仅只能分得五反。就是当作耕地用，面积也过分狭窄，所以大家就研究把位于部落南部的“銀行山”也加以解放的問題。

这个叫做銀行山的，本来是村长小松兼藏的产业，因为当作借款的抵押品用，过期未能还款，被足利銀行所沒收，所以人們称它为銀行山。現在所有权属于小山町的一个人。山岡上是一片面积达十七町步的杂树繁茂的平地林，是完全可以开垦的土地。

日本共产党的金田小组赶紧提出了这个問題。渡边猛带头在农民中間到处进行号召。于是，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底，以乙連澤的菊池光雄为首的要求解放銀行山的四十八人，聚集在小瀧部落的渡边猛的家里，举行了第一次討論。出席这次會議的，有共产党的橈木县北部地区委員长藤原成之和地区委員大竹、宮澤等人。同时还邀請村的农业委員林田义雄（共产党）、平岡藤平（劳农党）二人出席，进行了关于农地法的說明。因此才了解，如果农地委員会認為是“适于开垦的土地”，那就能够解放。

看到了山林有获得解放的希望，农民突然活躍起来。三、四年来几乎像已經垮台似的金田村农民組合又开始重新成立起来，五月五日，在市野澤中学校举行了重新成立組合的大会。农民大約聚集了一百名左右。推选平岡藤平为組合长，并且通过了“要求解放未开垦的土地”、“要求解放离乡地主的山林”、“廢止农业定期貸款的五人連帶偿还制”、“揭發农协副会长兼常务理事植木龟男盜卖稻种的舞弊行为”等決議。在傍晚五点钟大会结束后，全体組合員一起拥向中田原的村公所，捉住在农协事务所的植木龟男，紛紛質問他的舞弊行为。析澤菊千代朗讀了劝告辞职的決議書，用大家的力量坚决要求他辞职。

另外，还向村长小松兼藏和农业委員会副委員长荒井助遜

了劝告辞职書。看到这种集体斗争收了相当的效果，大家才高呼着“万岁”解散，唱着紅旗歌回家。

金田村农民組合的重建和解放山林的消息傳遍了村中以后，加入农民組合的人数迅速增加，轉瞬間达到二百名。人数逐漸增加了，应该被解放的山林的面积成了問題。甚至以最初呼喊解放而起来斗争的四十八个人，来均分銀行山那十七町步，每户不过只有三反半地。因此，感到沒有办法，相繼又提出了好几处可以作为解放目标的候补地，立刻就达到四十町步。

五月八日，农業委員会在村公所开会。农民組合員全都一齐拥到村公所，提出要求解放山林的申請書，要求为此进行实地調查，并且还傍听了农業委員会的會議。但是，这一天的會議只以受到审判的室井貞的辞职問題而告終。这也是因为許多人傍听的压力的緣故才辞职的。接着，大高昌臣担任农業委員会委員長，終于接受农民的要求，决定改日进行各个山林的实地調查。

那是五月十日的早晨。农民从各个部落陸續来到經過銀行山东面的鍋挂街道的聚会地点。人数大約超过了二百名。从农民組合發出指示說：“因为要带农業委員上山，各人要准备开辟山路障碍物用的工具。”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手中都拿着弯刀和鉄鍬，甚至在自行車上还带着飯盒前来。其中有的人持着柄长三尺多的镰刀。他們一面沿着山路向上走，一面用弯刀砍伐树枝或者用镰刀割掉茅草梢。在五月的晴朗天空的日光反射之下，刀刃閃閃發光。只是这些，也尽够使自由党系的农業委員們感觉到某种的压力了。

銀行山是在三年前才采伐过的。因此，新生长出来的杂树的枝梢，长得很整齐，不过高达人的胸部，在十七町步的广闊的面积上，一望無边。这真正是理想的山岡上的平地林。也不知

是誰說出的：“這的確是适于開墾的地方！”農業委員們結局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想到了“這塊山林就要解放，毫無疑問地成為自己的東西”，農民們的意氣更加高漲了。

不久，在銀行山繞了一個彎以後，人們來到同一地區內的菊池秀勝和阿久津秀夫的山，還到羽田地區和奧澤地區內的菊池秀勝的山去調查了一下。調查結果，農業委員們承認任何一個山都是适于開墾的地方，並且答應說，“既然這樣，一定要為解放這些山林而努力”。這樣，被認為适于作開墾地用的山林比最初的估計顯然增加了很多，肯定銀行山和別的山等三十町步有了解放的希望。

那天，實地調查完了以後，大家都來到北金丸部落的伊藤信義的家里，商量今后的對策。其中也有中途參加進來的農民提出疑問說：“誰要不加入農民組合，山林解放的時候，分不到地嗎？”“不，不是那樣。”當他聽到答復說：“誰都可以獲得解放果實”，他又質問說：“那麼，農民組合和這個山林解放運動有什麼關係呢？”同時，提出這樣問題的人陸續多起來。進行種種商討的結果，決定在農民組合之外，另行組成所謂金田村增加田畝組合，進一步廣泛地號召希望參加解放運動的人。與此同時，預先決定了新的組合的幹部。此外還選出了十五名解放促進委員。被請求解放的山林，到這時已超過一百町步。

解放山林的浪潮在全村高漲，隨着這種浪潮的進展逐步加速，村中的統治勢力方面也不能坐視不理。他們開始千方百計進行阻礙。最先開始活動的是村會的副議長松本良知。他揚言說，余瀨部落的阿久津秀夫的山是不适于解放的地方。他到各個農家中說，解放是做不到的事；他還到地主的地方說，一切解放的請求都不要接受。這在五月十七日的農業委員會上的傍聽者之間引起問題。枋澤菊千代在休息的時間把松本良知叫到村

公所后面严加斥責。荒卷义夫用議員席的三角牌敲打桌子，菊池光雄用椅子敲地板作响，在会上进行究問(这后来被捏造为强詞逼迫的行为，三人都被起訴)。

接着活动的是村公所的庶务主任岩瀬孝。他在村公所中管理有关“团体規制令”和外国人登記的事务。利用这种关系，在这以前，他就暗探村中的共产党小组、农民組合和朝鮮人的活动，把这些情况出卖給警察。特别是最近故意歪曲村中成立的自由工会的“衛护生活会”为政治团体，进行威胁說，如果不按照“团体規制令”进行登記，就要提起控告。他还把出席农业委员会的山林解放会議的傍听者的名字秘密地报告給警察。于是在五月二十二日夜晚發生了这样一件事：有几个人割断了岩瀬所住宿的富池部落的神社办事处的电灯綫，进到房子里把岩瀬痛打了一頓。据說，当时他的臉上受到了許多伤，血流滿面。这个事件和山林解放活动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誰也不十分了解。但是对于內疚不安的統治势力方面，这是个很大的威胁。

看到山林确有解放的希望，这种波动立刻傳遍了全村。貧农部落的乙連澤和羽田是不用說的，同时还扩展到北金丸、小瀧、奥澤以及中田原、廉畑、市野澤、練貫、舟山、富池等部落。

同时，“要求解放那个山”，“要求解放这个山”的声音，作为农民本身的要求，有力地高漲起来。金田村中最大的山林地主、县南小山町的江部順治的山林三十町步成为第一个目标。江部順治从前在金田村經營造酒業，卖酒給农民，农民付不起款，他就沒收他們的田地或山林。因此，这次解放的时候，他的山成为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以前請求解放的山林地是一百町步，現在超过了二百町步，組合員也从二百名增加为四百名。六月二十二日，进行第二次实地調查。在晴朗的夏天的陽光下，約有一百七十人参加，同农

業委員一道在山中走了一天。回來的路上，參加的全体農民到大田原警察署舉行了示威，為的是在日朝親善的精神下，把以前被該署非法拘留的朝鮮人車鎔讚奪回來。並且這還含有抗議近來警察對增加田畝運動的逐漸露骨的干涉的意思。警察研究山林調查隊走過的路綫，挨戶到農家去阻撓參加組合，他們巧妙地問：“你這裡已經加入增加田畝組合了么？”或者說：“還沒有加入么？”所以，在這次示威中也含有對這種非法干涉的憤怒。但是，警察方面不知從何處動員了兩卡車的警察前來，森嚴地把守警察署，不許農民走進一步去。經過兩小時左右的爭執，農民們終於未能達到奪回的目的而返回。

因為組合員已經達到四百人，終於要正式成立“要求增加田畝組合”。七月初在市野澤中學校舉行了成立大會。全体組合員都來了。選舉的結果，組合長是渡邊猛（共產黨），副組合長是后藤巳作、橫關正男，會計是戶上一郎、渡邊力。還選出四十名促進委員和一名專任秘書。同時，決定了規約綱領，並且要出版用腊紙油印的機關報“聯絡”。

這個時候，大田原町成立了自由工人的工會，在舉行成立大會的時候，負責人真庭遭到大田原警察署的逮捕。聽到這個消息，要求增加田畝組合的組合員開完大會以後，本着工农聯盟的精神，為了援救真庭，立即又往大田原警察署去舉行示威。大田原警察署慌張失措，緊閉大門，警察在門里排成一列防備示威隊伍。與此同時，從川西、矢板、宇都宮的警察署調來四輛滿載全部武裝警察隊的卡車，阻止示威，好像就要發生什麼重大事情似的。正在這時下起了一陣暴雨，這個對峙形勢自然崩潰了，成為不分勝敗的局面。示威隊伍也就回去了。不過，從這以後，“要求增加田畝組合”和警察的對立越來越尖銳化起來。

不久後，金田村的農業委員會因為必須取得“解放土地資格

审查会”的批准，把有关文件送交给地方事务所。于是，地方事务所方面回答说，十町步以上的解放由地方事务所的“解放土地适格审查委员会”加以审查，而十町步以下的部分，应由村的农业委员会方面处理。但是，把十町步以上的和以下的区分以后，十町步以下的数字占绝对多数。这也就是说，解放地的大部分必须由村的农业委员会处理。而且因为它的笔数非常多，处理很不容易，所以，林田义雄（共产党）建议，在村的农业委员会中成立“促进解放委员会”。林田义雄、平冈藤平等五人担任委员。同时，和要求增加田亩组合中的促进解放委员会取得联系，愈益加速了解放的步调。结果，村的农地委员会八月八日不得不出决定，出卖十町步以下的山林。然而，实际上并不想实行。以数目多为口实，工作丝毫没有进展。地方事务所方面，也是一样，根本不去进行实地调查。两方面都是用种种借口拖延时日。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要求增加田亩组合的促进委员们等得不耐烦，拥到村公所去向农业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荒井助进行强烈的交涉，同时要求早一天催促地方事务所进行实地调查。但是，荒井助只管左右支吾其词，不肯作明确答复。并且，他还说，为了出卖山林早先制好的乙连泽地区内千秋分部落的地图，已经丢失了。

“因为没有地图，所以无法进行解放工作。”“既然是农业委员会弄丢的，农业委员会就要负责重新制作地图。”“不行，没有那笔预算。”“一定要作，必须赔偿！”“要作也没有办法。没有钱啊！”这样激烈争辩的结果，最后吵闹起来，不欢而散。过了两天，在七月二十三日晚间十一点钟以后，荒井助的家从后面投来了雨点般的石子，窗玻璃打碎了十九块。以前发生了岩瀬孝挨打的事件，这次又发生了荒井助家的窗玻璃被捣毁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接连发生，村中突然变得杀气腾腾。

在地方事务所和村的农业委员会这样故意停滞不前的时候，要求增加田亩组合方面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开始停滞起来。这是因为在促进解放委员会内部，关于解放的战术问题发生了对立的意见的缘故。以橘泽为首的一派认为那样放开手去做，反而会招致镇压，使解放不能顺利进展。他们主张：与其那样做，还不如首先解放确实能够解放的银行山，在那里造成解放的既成事实；然后，面积尽管小，在这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再一步一步前进；同时零星地造成这样既成事实，用积累许多这样既成事实的办法来促进全面的解放的实现，这才稳固可靠。针对这种主张，以荒卷和宫泽为首的一派则认为那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因为组合的力量不够，解放才停滞不前；如果增加更多的组合员，增加更多的解放面积，全面地向前推进的话，一定会胜利。这样，正值橘泽在部落的筑路工程中的舞弊事件发生，他们以此为理由，要求从组合开除橘泽，同时主张进一步伸出解放之手，强硬要求把邻近的川西町的橘木县北部首屈一指的大山林地主植竹春彦的侄子的山也加以解放。

另外，在组合员群众中间也开始发生了动摇。这是因为，要求增加田亩组合的指导部在工作半途缺乏考虑地提到“解放地的分配应该给予贫农优先权”。从最初就一起进行斗争的中农和小农之中有人出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努力斗争到今天，反而让后来参加的贫农拿去好的地方。”另一个问题是：运动的核心究竟在哪里？是共产党呢，还是劳农党呢，还是在群众自己的手中呢？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不同意见。这就是说对于领导权属于谁有了疑问。结果，劳农党的平岡藤平辞职了。但是，指导部仍然本着最初规定的方针，以贫农优先主义和全面击破主义大大地扩展运动的范围，一意前进。

然而，村的农业委员会和地方事务所总不肯着手进行实行

調查。他們說七月二十日去搞，又說八月四日去搞，但兩次都沒有搞成。因此，要求增加田畝組合严厉地对他們說：無論如何要在預定的八月八日召開農業委員會，在会上決定舉行实地調查；如果那一天不進行实地調查的話就請解散農業委員會。同時決定在八日早晨，總動員全體組合員擁到村公所去。

櫛木縣警察本部注意到這種情況，在這天早晨三點鐘，動員全縣警察將近半數的五百名，全副武裝，用卡車一齊運到了金田村。趁着大家還在酣睡的時候，施行了全面的大鎮壓。被檢舉的包括朝鮮人在內共三十一名。有三名逃走了。

由於這次鎮壓，鬥爭陷於停滯狀態。被逮捕的人里，菊池光雄、櫛澤菊千代、平岡藤平、藤原成之、宮澤己之吉等十三人被起訴。

我們特別詳細追述了這個鬥爭。從这里面，不是可以令人生動地感覺到今天日本農民充滿苦難的鬥爭的問題和方向么？真正要求為了活下去的土地，真正為這個目標而鬥爭的，是誰呢？為了使鬥爭取得勝利，必須採取怎樣的態度和方法呢？同時，日本的反動勢力懼怕真正革命鬥爭的萌芽，他們是多麼瘋狂地揮用武力？不僅金田村是這樣。在充滿山野的日本國土上的每個山溝里，也都滲透着這種高昂的鬥爭情緒。貧農有了自覺，以貧農為中心不屈不撓的堅強組織建立起來了。但是，地主勢力，今天調用了武裝警察部隊到關東地區窮鄉僻壤的山村去，他們還正在準備不久後，把美國裝備的保安隊也派出來。日本農民爭取真正解放的道路，恐怕今後必須展開新的一頁。

但這新的一頁，現在就要展開了。

三一 “金錢一年，土地万年”

——反对軍事基地的斗争

旧金山和約把日本美丽的国土出賣給外国了。

在絨毯轟炸的火焰和原子彈的轟炸之下，漫长的战争宣告結束，虽然生活艰苦但和平的日子总算到来了。可是人們還沒得到喘息的机会，飞机又从飞机場上載着为了破坏和平人民生活的凝固汽油彈起飞，港灣中拥挤着运输船只，車站里堆滿了軍用器材。而且，这些都是別的国家。

根据日美“安全条約”和日美行政协定，在日本国内建立了为数七百、面积十五万町步以上的軍事基地。这个数字比“独立”前远远增多了。这些軍事基地是日本民族身上丑恶地張开着的伤口。这种創伤的痛苦，使日本民族的心灵顛栗。农民被夺去了祖先留下的或是自己剛剛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漁民被禁止到海上去捕魚，失掉生活唯一的依据。他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險，鑽进鉄絲网去拾炮彈壳。遍地皆是“柳柳女郎”的房子，使兒童們的心灵受到伤害；美丽的日本的自然風景凄慘地遭到玷污。不断發生的暴行事件和蹂躪人权的行為剝夺了日本民族的尊严。但最为深刻而且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伤口破坏了日本人民謹慎而和平的生活。

同时，另一方面脑滿腸肥的买办势力正在吮吸着从这个伤口滴下来的鮮血。但是不管他們对外多么卑躬屈节，对内多么傲慢橫行，只要日本民族灵魂在劳动人民階級中間并未完全腐蝕、仍然在燃燒着，那么，对于这伤口的微弱的詛咒声音，有一天总会变成公然的憤怒和斗争的歌声。

石川县内滩村反对設立軍事射击場的斗争，就是这种歌声的一个巨大浪头的高漲。

松树、洋槐树、合欢树疏疏零零地排立着，另一面是一片广阔的沙丘，沙丘的尽处，日本海的平静的波浪拍击着岸边。就在这沙丘和河北潟灣之間，約有六千五百居民和九百多戶的内滩村的一排排簡陋的房屋站在那里，只依靠在日本海和河北潟灣的零星捕魚、河北潟灣附近的小規模的水田以及沙丘边缘的一刮風就鋪滿沙土的旱地，無論如何还是不能生活下去的。因此，到北海道、九州和中部日本去謀生，成为内滩村居民一直賴以支持生活的手段。

这个地方像是北陆和山陰的海岸一带到处都可以看到的村庄，而且是其中最貧寒的村庄，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起，它对于日本形将全国軍事基地化的姿态，已成为爆發民族憤怒的噴火口。

在这以前，同年九月，村民就接到消息說，这个内滩的海濱六百町步和海面四百町步，共計一千町步，将被接收作为炮彈的練習射击場使用。村会通过決議，絕對反对接收；由村长带头，村會議員、青年团、妇女会的代表等四十人向县政府举行反对請願。因为那时正是普选期中，連自由党的候选人都采取反对接收的态度。政府也許是担心选举的結果，在选举就要投票的前夕，恬然声明說“前議一笔勾消”。这是以后政府屢次玩弄两面派手法的开始。發表这种說法以后不久，十一月十一日，政府看到选举果然像預料那样，成为有利于自己的形势，又發表了要接收内滩的方針。村代表赶紧进京請願。他們前往請願本来指望借助石川县选出的参議院議員林屋龟次郎的力量，林屋在大选后成立的第四次吉田内閣担任国务大臣。但是，問題并不是通

过吉田左近的随员的简单请愿所能解决的。

斗争的推动力是家庭主妇和青年。富山、石川这些北陆地区的沿海农村的主妇们，在大正九年“米骚动”事件之前就进行过许多次小规模抢米暴动的斗争，有着所谓革命的傳統。这一带是半农半渔的，种地的工作几乎全由妇女担当，而且耕地狭窄，渔场缺乏，所以男人都出外到北海道、九州和中部地区去工作。主妇们把家中的主要人物送到远处去，自己肩起艰苦的劳动生活，也许是由于在这种艰苦的条件，她们获得了坚强的锻炼。总之，在这次内滩的斗争中的主妇们，对于那些掀起米骚动之火的母亲们毫无愧色，都是勇敢的斗士。这些主妇们从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斗争力和青年的血气方刚的斗争力结合起来。十一月二十日，当接收内滩的问题就要提到内閣会议的时候，他们数千人头上紧紧地缠起白头巾，组成了示威大队，打着草席旗帜，向石川县县政府拥去。

在内滩设立射击场，这决不只是内滩的问题。邻近的七塚町也由于海面的接收而立刻在渔业上受到影响。因为政府说的话总是变化无常，被接收的地区将来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扩大；可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让大炮不分昼夜地在内滩的和平的沙丘上轰轰作响，这将使日本又增加一个痛心的伤口。每次新的伤口一个一个增多的时候，日本民族的血就越来越枯竭，不久后将失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金泽市市民对于内滩的示威队伍的席旗所以热烈鼓掌衷心地加以支援，决不是因为长久以来没看到席旗而存的好奇心理，而是因为这种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自动发生作用的缘故。反对接收内滩的运动，以惊人的形势扩展起来。从示威的第二天起，内滩的主妇们每天在金泽市的街头上，开始了“为了保卫儿童”、“为了不许可破坏大海和海滨”的签名运动。过路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响应这个号召。县议会正

在这时举行会议，也全体一致通过了反对接收的决议。

但是，那时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接收内滩作为射击场。二十五日，内阁会议上决定了接收内滩的方针，并且还决定由当地出身的林屋国务大臣到现地去进行说服工作。第二天，二十六日，内滩的妇女们几乎全部出动，在金泽市中举行示威游行，表明坚决反对接收的意志。于是，县工会评议会也通过决议和内滩村民一道进行共同斗争，布置了逐回林屋国务大臣的准备工作。这时内滩斗争，加强了以工人为核心的全县性的民族斗争的色彩。

在二十七日林屋国务大臣到达金泽车站的时候，红旗和席旗的森林以及“滚回去！”“卖国贼！”的辱骂声，团团地包围了他。第二天，当他带着外务省国际协力局局长伊关等往内滩去说服的时候，情形也是一样。当时村民大会正在开会，通过绝对反对接收的决议，根本不理睬林屋说的话。妇女、青年和村民都一齐把极端愤怒的言语，投向想夺去自己的土地和海洋的林屋身上。林屋等人在武装警察森严的警备之下，只好悄悄地走开，并且在临行前说一句什么：“不听话是不民主的”。

但是，村内也有卖国之徒。

内滩村民大部分是贫穷的半农半渔户，有如上述，他们出外工作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出外谋生的道路战后逐渐狭窄，村中充满了将来也没有找到工作希望的次子、三子^①和半失业者。对此，村中曾经想到一种自力更生的办法：在预定今后将被接收的沙丘地带，造植防沙林，把在以前因为沙多而未能开垦的土地（国有地）加以解放，把它改为旱田，使现在一户平均还不到两反地的狭小的耕田面积多少有所增加。不过，这个计划，如果内滩

^① 日本封建的农村家庭中由长子继承家业，次子、三子等是不能同长子均分家产的，因此他们经常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另找工作。——译者

变成射击场的話，也将成为泡影。在官僚的眼中尽管是如同荒地一样的沙丘，但是在内滩村的居民看来，这是不久后或多或少总可以生产粮食的重要土地。村民坚决反对接收的一个理由就在这里。但是，統治着内滩村的几个漁船主們的想法却別有用心。他們的心中認為：最近海濱捕魚量不断减少，不如抛开这里，多多領取一些补偿費，然后拿这个作本錢另行經營深海漁業，这不是最妥善的嗎？所以，在他們看来，如果能尽量取得补偿費，那么表示同意将是最聪明的办法。村中的封建統治势力在这里也想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

村民大会开完后，傍晚，村长中山和二十名村会議員偷偷地在林屋的家中和林屋会見（其中有的被注意这件事的青年在途中發見）。由于在武装警察严重警备下的林屋家中的秘密会談，他們接受了以一月至四月四个月为使用期限的妥协方案。村方領取了五千五百万日元的慰問金、五百万元的托兒所設備費、一千五百万元的道路修补費。村当局說，“只不过是忍耐到四月而已”，“还可以得到这么多的錢”，想用这些話来平息村民們对村长等的妥协和叛变的憤慨不平。在斗争半途受到挫折，村民們对于所謂四个月的約定，半信半疑，暂时归于平静。

但是，一旦被伤害了的伤口是很不容易医治好的。它不断等待机会要傳播它的毒素。

二月，——到四月为止的使用期限也已經过了一半，但是还没有發出一棵炮彈，连美国兵的影子也没有看見。村民們有些狐疑起来。但是，这种寂静不过是准备徹底破坏内滩的和平的前夕。从二月中旬就开始了正式的設備工程。鋪在沙丘上的森严的铁板道路、用混凝土筑成的設備，这些东西，不管怎样看来都不像是只为今后一个月或两个月使用的。所謂四个月的期限原来是欺騙么？——村民心中，这种不安逐渐扩大起来。终于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內灘射擊場發出了第一响演習的炮声。震人心腑的轟隆声音告訴人們：內灘沙丘的和平已被破坏了；在日本的身上又有一个深深的創伤張开了新鮮的伤口。

炮击声一天比一天变得激烈起来。像在任何一个射擊場周边所可見到的那样，这里的鷄也不生卵了，嬰兒抽起風来。村民們都抱着祈禱的心情一心在想：反正这种痛苦最多不过到四月底。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国务大臣林屋完全推翻前言，發表声明說：“所謂四个月的期限是从开始演習射擊起算四个月。因为射擊开始晚了两个月，所以使用的停止也将晚两个月。”

被林屋欺騙了，被吉田政府欺騙了，村民們恨得咬牙切齿。政府把撒謊根本視同兒戏。这样下去，是不是会弄到永久接收，也很难說。但是，不管怎样，政府清楚地說明是从一月到四月，大家一定要使它遵守諾言。村民下定坚强的决心，在時間到了四月三十日的終了以后，决不許在內灘的海濱再响起一發炮响。政府的謊言重新激起了石川县广大群众的憤怒。恰值这是參議院議員的改选时期。內灘問題的一方面的角色林屋，以称为金澤番町会的石川地方的財界为后援又被提名为候选人。与此同时，改进党的县联合会会长井村德二由在野党联合推出为候选人。經過激烈斗争的結果，最初認為占絕對优势的林屋終於落选了。这不外是石川县民对于內灘問題的憤怒的判決。

林屋的落选大大地鼓舞了夺还內灘的斗争。在这次选举斗争中，县工会評議會是在野党联合势力的核心，为打倒林屋而作出了显著努力；以这县工会評議會为中心，广泛的民主力量团結起来，組成了“反对接收內灘行动委员会”。实行委员会的代表在四月二十九日到东京，要求政府履行諾言。对于从下面广泛爆發起来的这种活动，政府也不能够简单地推置不理。外务省的伊关局长答复說，从五月一日起停止射擊演習一个月，重新和

县方进行繼續使用的交涉。尽管只是一个月，能够恢复了内滩的和平，这是和平力量的巨大胜利。胜利的消息傳到了县内的工人正在举行的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会场上。工人把劳动节的示威卡車开到内滩村，和内滩村的村民一起分享这种喜悦。这在彼此的心中培养了宝贵的坚强心：只要斗争，就能战胜；如果工人和农民携手前进，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但是，这不过仅仅是斗争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还必须繼續斗争下去！

政府（以及其背后的美軍），不用說，从最初就打算繼續占用下去。政府还想利用补偿費的誘餌，籠絡漁船主等封建势力。但是，村民有了以前在十一月的痛苦經驗，并不那样容易受騙。

在村民中間响亮地喊出“金錢一年，土地万年”的口号。不要受一时的欺騙！得到那为数無几的补偿費，对于此外別無生活出路的群众來說，只是杯水車薪，立刻就会花光。但是土地就不同了。祖国日本的大地，尽管那是长不好庄稼的沙地，但是永远和我們在一起，多少总会給我們带来維持生命的粮食。村民群众明确地反对漁船主們的妥協路綫，把这个从日本农民心底迸發出来的口号，用鮮明的墨迹写在席旗上。

群众的决心非常坚强。他們用实力割断划分接收地区的鉄絲圍柵，把内滩的海濱在被占用了四个月以后，夺回到自己的手里。在数次召开的村民大会上，主張采取妥協路綫的村长和村会的一部分人遭到了徹底的攻击。共同斗争的波浪掀起了越来越壯闊的浪潮。邻近的七塚、宇之氣、高松等街鎮的居民也动起来了。金澤市市会和石川县县会都明确表示反对接收的态度。运动越出了县的范圍成为全国性的問題。清水几太郎以及許多文化界人士和学生，也都参加了这个斗争。在国会上也提出了内滩問題，各个和平团体和工会組織也都派来調查团，声援内滩

的斗争。可是，其中具有最深刻的意义的是，通向射击场的北陆铁路的工会通过了拒绝运送军用物资的决议，以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采取了直接援助内滩斗争的态度。这是工农联盟的巨大进展。

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面前，内滩村内的妥协派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叛变了。在五月十五日的村民大会上，村长也立誓绝对反对接收，并且通过决议：抛弃村当局以往不同外部团体一起行动、只由本村单独进行反对运动的方针，不论是工会也好，共产党也好，要和一切支援反对接收的团体及个人携手，共同进行斗争。内滩站到全国和平和独立的战线的前列。

在这样声势壮阔的反对运动面前，政府也发慌了。但是，由于不能进行射击演习，军需资本家也不能交货了，从而遭受很大的损失，因此他们和美军一道逼迫政府强行接收内滩。政府终于按照既定方针，在六月二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实行永久接收，发出通告说，从六月十日到十五日期间重新开始射击演习。“死亡商人”们和他们的政府，想把内滩的沙丘永远变成军事基地日本的丑恶的伤口。

内滩村民，特别是成为斗争的推动力的家庭主妇们，接到了这个消息，立刻跑到村公所要求召开村民大会。几乎全部村民聚到一起，举行了三天的村民大会。会上明确规定绝对反对接收的基本方针，组织了反对接收的行动委员会。斗争的组织，由村民群众自己的手组成了。

重新开始射击演习的日期迫在眉睫。现在在没有炮声、寂静的和平的内滩沙丘上，飘荡着紧张的气氛。十日，政府重新派遣内阁官房副长官田中来来进行说服。金泽车站，摆动波浪似的红旗和席旗，比前次“欢迎”林屋说服使节时还要多一倍。田中等害怕起来，半路下了火车，坐汽车往石川县政府去。于是，

示威队伍也立刻赶到县政府，在县政府，为了想把警察队保护下的汽车驱逐回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农民、渔民、工人和席旗、红旗结合成为一体，进行了斗争。政府代表和村及县的代表之间的谈判仅仅三十分鐘就决裂了，政府代表像逃跑似地坐上美国军用飞机返回东京。

在十五日这重新开始射击演习的日期迫近之前，内滩村民从十三日清晨就开始在打靶场内临时搭起的小屋中实行“静坐”抗议。这个沙丘不是别人的，是生在这个沙丘并且在这里游戏过、在这里劳动过的我们自己的东西。村民们用这活生生的肉体行动来表示他们坚定不移的意志。警察远自关西地区也动员前来，数目将近两千人。不过，应援的工人、学生也从全国各地动员前来。在半年以前还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北陆地区的这个小寒村，现在全日本的爱国、和平力量和卖国、战争势力正在这里进行着面对面的斗争。

但是，十五日上午八时四分，在内滩村民和应援的工人、学生充满愤怒注视之下，重新开始射击演习的第一弹终于射出。沙丘的和平又被打破了。本来要在落弹地点坚持到底的村民，因为听信十四日傍晚赶来的国会议员辻政信的话，把进行静坐的地点挪开了落弹地点。辻政信推翻了他以前的“同村民一起在落弹地点静坐”的说法，说什么“我是准备成为佐仓宗五郎^①而前来的，所以我要一个人在这里静坐。不过大家可以退回到民有地以内”。但是辻并没有当成佐仓宗五郎。他只同美军司令会见一面，然后说问题将移交国会处理，就回东京去了。村民对于乡土出身的而且时常玩弄反美言辞的辻政信的个人信赖，完全被背弃了。射击演习的第一发炮弹，经过退到安全地带的

^① 即佐仓宗吾，见本书第一章。——译者

人們的头上打过去。

当然，內滩的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村民移到权現森林的新的静坐地点，仍然用轮流办法踴躍前来，繼續呼喊：“美国佬，滾回去！”应援的工人和学生帮助农民割麦或者組織医疗队，同时同村民一道进行了斗争。

现在，以主妇为主力的静坐队，为了迎接冬天的到来修建了静坐小屋，組織了托兒站和售貨小組，作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样，甚至使人以为，直到內滩的沙濱和海洋回到村民手中的那一天，斗争决不甘罢休。

然而，美軍、炮彈制造業者、吉田政府这三方面利用金錢和陰謀詭計对这个激烈的反对运动，开始了各种方法的进攻。因为，如果在这里被村民的反对所吓退的話，那么，今后在所有的地方展开的接收軍事基地的計劃都将全部失掉希望。他們首先使用的手段是，要分裂村民的团結。“搞反对运动的是赤色分子”，“共产党利用內滩村民作为进行武力斗争的手段”。——这些宣傳从各个方面送进村民的耳朵里。特别是在前来应援反对运动的学生团所住的大根布部落，集中了这种分裂策动。七月底，不知从何处流傳說，这个部落正在举行贊成接收的委员会。特别是反对运动比較强烈的北部地区的村民激昂起来，拥到这个部落的园照寺。于是，發生了最初的部落对部落之間的裂痕。有人說产生这种部落的对立的根源在于“外部人插足进来的緣故”，因此开始驅逐学生团。这还进一步要求撤走医疗队，形成了反对行动委员会的分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还無中生有地散布了一些謠言，說什么“学生强奸了村中的姑娘啦”或者“偷吃西瓜啦”。

其次，与进行这种分裂策动的同时，还采用了利誘村民的手段。七月底，流傳一个消息說，內閣會議上决定要干拓河北潟这

个海湾地带。八月下旬，又散布出一个消息说，政府已收买宫坂部落四十六户的共有地权现森（静坐地点）。实际上，宫坂部落的居民中有人听说是“为了加强反对运动的签名”，受了骗，终于弄成全部落居民都签了名接受收买。

第三，在村内组成了暴力团。八月七日，左派社会党的淡谷悠藏前来出席黑津船的常会，解说北部部落居民的出海捕鱼是合法的，于是大家强行出海捕鱼。这次捕鱼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就在庆祝捕鱼丰收的那一天，在大根布部落发生了驱逐外部团体的种种暴动行动。共产党员所住的小屋的屋顶被拆毁，柱子也被推倒。接着，在八月十五日民主团体主办的和平促进大会上，发生闯进会场的殴打事件。以中央农协的副组合长、从苏联遣返回来的竹本升为首，组成了大根布爱村同志会，甚至驶出带有漂亮的扩音喇叭的卡车，开始宣传说：“驱逐赤魔”、“不要上了日共的当”。好像故意与此相呼应，在东京，国家警察长官斋藤声称：“爱村同志会的成立是村的成就。……对这种活动寄以希望。”针对这种情况，举行静坐抗议的家庭主妇和儿童们愤怒地说：“那么，大家都要当共产党”，在部落的入口，就把卡车赶回去了。

在这中间，右派社会党的中村高一等当地出身的保守党议员们，亟力想把问题提到中央去，局限为国会内部的斗争。

从美军到日本警察，从吉田首相到暴力团和右翼的堕落干部，所有这些反动势力，有如表示日本殖民地化的卖国行动的缩影似的，在内滩交错在一起，蛮横地阻挡在集结在这里的爱国力量的肉体抵抗的前面。由于这种阴惨的斗争，九月八日，外务省的伊关局长这次仿佛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金泽。他又重新提出了六月时他曾经被红旗吓跑过那时所提出的政府补偿条件。他得意地叫嚣说“完全没有问题了”，并且说正式交涉将在东京

举行，然后就离开了。村长和村会議員害怕反对这个交涉的村民的压力，故意避开人們的耳目，从石动車站上火車，追赶在局长后面。

这样，村长接受了政府的补偿条件。关于美軍的駐留时期的問題，也决定听憑当地出身的議員处理，“信任政府的誠意”。九月十五日，决定停止靜坐。第二天又成立了租借权現森的契約。在有如当地报纸評論中所說的“刀折矢尽”的形势下，斗争結束了。不过，农民的余憤形成了罢免村长中山的运动，十七日已經收集到超过法定人数的签名。于是十月十四日，在根据罢免的要求即将举行改选之前，从来沒有一次到村民靜坐的現場去过的村长，自动辞职了。

在表面上，宣告这样結果的内滩是丧失了民族独立的日本身体上剝掘出来的一个伤口。像这样伤口，現在被剝掘了很多。同时，在这周圍，为了夺回被夺去的祖国土地的斗争，尽管它的幅度和深度有种种不同，在頑强地进行着；对于将被新剝掘的伤口，也展开了强而有力的斗争。不，就是在内滩村内部，現在也在燃燒着熾烈的抵抗火焰。

这种火焰推翻了淺間山演習場的接收計劃。反对妙义山軍事基地化的斗争，甚至使农民武装起来。接着，是伊良湖崎的斗争，是富士山的斗争。不如說，斗争的火焰蔓延到全日本农民的每一个不屈的人的胸中。美帝国主义者虽然攻陷了一个小城，可以苟安一时，但是却充滿了喚起整个日本民族的憤怒的巨大不安。抗日战争下的中国农民，由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强暴的敌人，曾經怀有不論是誰都不得不联系在一起的共通憤怒。就是这种共通的憤怒，起了有如电綫似的敏感的作用。在局部地方举行的小規模的解放土地的斗争也好，对于一个地主或一个舞弊事件的斗争也好，以及反对米价或納稅的經濟方面

的憤怒也好，一旦觸到這個電綫，立刻相繼敏感地傳播開來。喘息在封建制度的沉重枷鎖下的日本農民，以驚人的速度，實現在全國性的鬥爭中的團結。這條道路，現在正在開展着。

“爭取民族獨立”已成日本農民運動的軸心。

三二 明朗的農村

——農民覺悟的提高

戰後八年間，日本農民的鬥爭以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幅度和深度撼動了全國的農村和農民。沒有一個村莊沒進行過圍繞農地改革的或大或小的土地鬥爭；沒有一個農民沒體驗過圍繞反對不合理的米價和稅款的鬥爭。

雖然這樣，在反動路綫公然活動、日本重整軍備的步驟開始以後，表面上，好像一陣狂風吹過，各個村莊陷於極端寂靜的狀態。被水災和歉收所摧毀的農村中，令人想起昭和初年蕭條時期的情景，發生了鬻賣女兒的事件。在村公所的公告牌上貼着招募保安隊隊員的招貼畫。同時，在每次選舉的時候，仍然是從這些農村中，把那些擁有勢力和金錢的保守黨議員選送出來。其結果，不願被稱為有史以來空前的賣國政府的臭名，吉田自由黨繼任了五次內閣。

僅僅憑一個個鬥爭的積累，會建立起光明的農村么？要想通過經濟的鬥爭來產生政治意識的變革，究竟應當怎樣做呢？只用佃農組合性質的鬥爭方式，能够使貧農階層的種種要求取得勝利么？這些雖然都是當然的問題，現在重新促進人們深刻的反省。

從這種反省之中，提出了以前的土地鬥爭中的教條主義和

組合主義的問題。因為農地改革是“從上面”提出來的緣故，不知在什麼時候，“土地管理組合”只起農地改革法的民主的代行機關的作用。農地改革告一段落以後，“農民組合”成了僅僅是佃農的組合。同時，只有關於征糧、征稅等經濟的要求，以及從地方財政到學校教育方面等政治的要求，作為全農民的鬥爭廣泛地展開，用貧農的要求密切地支持這個廣泛鬥爭的基礎，才能使整個農民的眼光朝着反對政府、反對壟斷資本、反對殖民地化的方向。只有參加到這種鬥爭中來，貧農的要求才能取得勝利。但是，如今喪失了日常群眾性活動，以致人們幾乎無法着手進行這樣的鬥爭。經過艱苦奮鬥的土地鬥爭，使村內的階級對立尖銳化之後，孤零零地僅僅產生了孤立的佃農組合。許多地方的情況都是這樣。雖然有一觸即發似的全農民的要求的高漲，農村青年們迫切的政治的、文化的要求在醞釀，但是應當站在前面的活動，卻陷於無法着手的孤立狀態。

一方面，在相繼掀起全農民鬥爭的各個村中，動輒被當面的統一行動絆住了腳，使村內的階級對立“徒然尖銳化”的土地鬥爭停滯不前，從而以貧農為中心的堅強組織或者被忘記了，或者被解散了。因此，在一個鬥爭過去以後看來，不論是征糧問題或征稅問題，如果只按照對地主或富農有利的方向去解決的話，那麼貧農就要被拋棄了。這樣，不以村內的階級鬥爭為基礎，不站在貧農的要求上的鬥爭，儘管如何廣泛地進行，根本不會向革命的方向成長。

像這樣，經過了左右搖擺的經驗，現在日本農村迎接了特別的反省期。所謂特別的反省期，並不是像戰前那樣，進行了某種特別鬥爭的村，就其鬥爭作為本村特別的問題加以反省。而是，日本全國的農村進行鬥爭，所有的村認識共通的敵人，這些村在全國範圍內迎接反省期。這種反省本身表現了某種不可估計的

力量。这种反省,在某一角落发现了新的前进,立即可以成为所有的村的新的前进。一个村的问题立即可以成为全国农村的问题。用这种形式,农民们对新的指导变得敏感,对共通的敌人的活动变得敏感,冷静地观察敌我交错的国内外的各种形势。这里产生了空前未有的力量。

内滩、浅间、九十九里滨的问题,已经在这敏感的农民们的心底,燃起了愤怒的火焰。现在,这决不能视为只是形将军事基地化的特别的村的问题。这是对于全国农民,有关儿女前途的问题,与米价和肥料的价格有关,与税款有关,结局要追究到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以及自然要追究到这个日本国家将怎样变革的问题。

同样,美国“共同安全援助”的问题起了一定的影响,改善日中、日苏外交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也深入到村会内部。人们开始觉悟到殖民地化的痛苦。以前揭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进行斗争的农民,现在痛切地觉悟到“一切都是政治问题”。不要成为外国走狗的政府,不要地主的政府,要求“自己的政府”。这种觉悟正式产生了。

这个全民族规模的政治自觉的高涨,给正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提供了基础。以往不过是在个别的斗争的局面,经常号召工农团结,部分地得到实现。但是,这次要求的不是那种仅仅一时性的统一行动,而是作为心底的要求,明确地要求为了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政治联盟。从农民运动建立在战后八年的成果上的这个“反省期”的准备时期,形将有力地产生出来的东西,正是向“工农联盟”的强而有力的前进。

一九五一年,日本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宣布了它的新纲领,明显地揭示出争取民族解放的“工农联盟”的旗帜。接着发生的内滩和浅间等斗争把这个纲领广泛地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间。一

九五三年，总評和日农也揭起了这个“工农联盟”的旗帜。同时，池田勇人^①以“吉田个人的代表”的身分到美国請示；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要求日本成立三十五万人的地上部队；根据日美“安全条約”的“义务”，日本将重整軍备；公然討論征兵制度；日本經濟結構不得不加以改变，把国家預算的百分之七十撥充軍事費用；……此外，吉田、李承晚、蔣介石和麦克賽賽还要組織太平洋同盟，向美国誓表忠誠。在这种日本反动势力的卖国政策的旗帜变得日益鮮明的情況下，也正是要求和平、独立与民主的工农联盟的旗帜必須高高举起的时候。

另一方面，工人在生产的崗位上，过着共同的生活，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組織巩固，拥有罢工和示威的武器。一九五三年以后，例如在赤羽的日本炼鋼那样軍需工場，包括战斗的工人在內，有三分之二的人員被解雇，国营企業部門也准备进行大量裁員。在这种情势之下，工人以工厂和工会为学校，迅速地使自己的意識革命化。但是，农民們以小塊土地为对手，各自拥有生产手段，从事耕种，他們并不具有这样迅速組織起来、迅速走向革命道路的条件。

为了使农民面向高举着的工农联盟的旗帜，具有自觉的政治認識并且培养新的革命意識，究竟什么样的活动将是这种思想改造的“学校”呢？

各种斗争确实使农民受到鍛炼，應該說，这是鍛炼农民的基础。可是，反对征稅、征粮的斗争和土地斗争等，如果仅限于暂时性的斗争，那就只不过使农民在表面上朝着革命的方向而已。要使表面上朝着革命方向的人的思想真正鍛炼到具有“革命的思想”的地步，还必須在一个个斗争之外，进行踏实耐心的

^① 池田勇人屢任前吉田內閣大藏大臣和通商產業大臣，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任石桥內閣大藏大臣。——譯者

教育工作。因此农民中的深入的啓蒙活动，必須重新受到人們的認識。

当然，在这以前，也向农民中間、向农村派遣了各式各样的文工队，还举行过許多文化人士的講演会。不过，这种文工队工作，在这以前，它本身是以一种斗争的形式进行的，仅仅止于作为使农民的表面朝向工人阶级和革命的方向的一时性的宣傳活动而已。

連續而頑強地、在衣食住的日常生活中去教育农民的工作，是真正必要的。如今从心底認識到这一点，那个在战前的暴風雨中由全农全国會議創立的、不久后又根据战后的广泛的农民斗争的創造性經驗加深內容的“农民委员会活动”，重新發出了新的光彩。“农民委员会”时常被誤認爲仅仅是范围广泛的农民組合，还有时被当做仅仅是經濟斗争的組織活动。但是，“农民委员会活动”不正是全体农民学习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学校”嗎？不正是使貧农和农民組合的要求向群众中生长的最初的“关键”嗎？

战后，以长野县盐尻村为首，在各地成长起来的“农民委员会”，在这种意义上，由于农民的創造性成长为具有很高的內容。盐尻村农民委员会是由每个部落各选出七人、三个部落共选出二十一人組成的。这个委员会成为这样一种地方：对于从土地管理組合提出的农地改革方式等进行民主的討論，使全体村民能够徹底理解。在这里还举行通訊調查。不久还設立了診療所和农忙期托兒所。学校教育問題也提到这里，非农戶的粮食等配給問題也提到这里。研究会和节日的庆祝也在农民委员会上加以討論。由貧农和佃农組成的土地管理組合，是产生农民委员会的原动力。农民委员会本身，由于它拥有这样的土地管理組合，所以才能够展开民主的活动。

但是，随着土地管理組合本身逐渐成为经济主义的俘虏，农民委员会也逐渐变成了仅仅就征粮和征税分摊量问题进行协商的组织。现在，以贫农为中心的农民要求争取民族解放的工农联盟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们的斗争意识重新燃烧起来，因而对于以往的斗争进行深刻的反省。为了在全体农民的胸中，促进保卫和平的决心；在全体农民的心中照耀民族独立的光辉；在全体农民的胸中培养反对重整军备的认识以及走向民主革命的思想上的成长；这不是仅仅用单纯的经济斗争所能成功的。作为全体农民的这种思想成长的“学校”，农民委员会的活动现在到了应当重新以新的创造性和广泛深入地向多方面展开的时候。

在军事基地附近的各个农村，早已组织了反对军事基地联盟和反对委员会。也有的村，在反对招募保安队队员的签名运动方面取得成功。或者在培植树苗和生产蚕种的村，产生了促进中日贸易同盟。……这样多方面发展的斗争，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运动的根本性质都可以了解是农民委员会的活动。在它作为培养革命意识的“农民的学校”，耐心地继续地向前扩展的时候，黎明的光辉射到日本的农村。停滞被打破，觉悟和进步产生出来。

这样，表面上看来像是很寂静的农村，它的底部开始培养出不屈的政治成长的萌芽。在这许多的嫩芽之中，特别是最近迅速引起世人注意的日本米丘林农业的进展，将说明它的最显著和最明朗的一个方面。

日本米丘林运动是从“春化法”着手，然后推广起来的。这个事情本身就说明搞这个运动的“农民委员会活动”的性质。如果把它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增产运动或单纯的技术改良运动，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这个运动的暴风雨般急剧展开的意义。

長野縣伊那米丘林會是這個運動最先進、最有力的據點。它的領導人菊池謙一就自己的體驗發表談話如下：

“我既不是技術家，也不是專家。因此，我就把這個農作物栽培法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簡單地加以整理，同大家談一下，以便像我這樣外行的人也可以實行。這樣一來，在專家中也許要有人要斥責說：‘菊池太不像話。他想使米丘林栽培技術庸俗化，硬裝在單純的增產運動的框子裏。……’我想更進一步向專家學習，還希望許多專家把他們的高度技術不斷地深入推廣到農民中來。不過，我認為，專家們動輒忽視了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正是因為我是個外行，我對於這個問題，倒十分清楚。

例如，專家來到農民中間。因為他總帶着技師或博士一類的頭銜，所以在農協方面的幫助之下，他很容易有機會出席為他準備的群眾集會。在這樣會上，一般都有熱心於農業的人和富農們參加，並且常常提出程度很深的問題。專家對於程度深的問題漂亮地加以解答。於是，這些農民們欽佩專家，按照他的指示進行實驗。有不懂的地方，再向他請教。實驗的結果萬一失敗了，專家再加以檢查，指出哪些地方‘同教導的方法’不同。……以上這是普通的情況。

然而，如果這個會有貧農參加，他們大抵並不發言，靜默傾聽，然後考慮，‘說法雖好，但是我可做不到’。即使是極初步的理論，只听听那些化學藥品以及器材的名字，貧農就認為自己吃不消了。……不論說的話具有多么進步的內容，利用這種形式，這和以往‘從上面給予的’官廳技術體系，在性質上是相同的。

可是，我說的話，誰也不把它當作專家的話來聽。同時，平素心中忖量‘沒有肥料果真就不能種地嗎？’的那些貧農，也快活地前來。因為我只談一些極其簡單的話，所以他們好像認為，如

果那样的話，我也可以办到似的。后来調查一看，果然貧农們自己都进行着实验。貧农們一段說来不存在关于技术的秘密問題，一边和任何人商談，一边就开始有組織地活动起来。这样，到处产生了‘春化栽培技术会’。

但是，这种简单的經驗对貧农來說，具有很大的意义。他們有生以来第一次地自己研究新的技术，进行实验，同时产生了一定的成果，于是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議的力量充滿在自己的体内。农民自己去研究，自己去实践……尽管成果不大，但自己初次掌握了技术，这种喜悅是很大的。他們非常热心起来，开始努力用功起来，很深奥的書，他們也去訂購閱讀。出現了这种精神以后，以往無意識之間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創造性，开始不断發生作用。他們帶着好像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似的驕傲看守着自己的工作。”

菊池如上所說的春化栽培技术，在各地不論有無指导人，都已經推广了。据說，一九五三年在冷藏庫中实行处理的麦种达三千石。同时，比什么都更重大的收获是，这个运动使农民在生产方面改变了認識，使他們成长为徹底的对旧日本农業和技术体系的批判者。他們从根深蒂固的官僚統治之下在思想上解放出来。并且随着普遍的关注，許多农民群众团結在这个运动的周圍；以这种团結为中心，談起了农民生活的所有的問題。过去一直在沉睡不醒的各个农村的农民运动家們，也由于和群众的新的联系而振作起来。

“我們不能等待科学的恩惠。使科学成为我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們的任务。”这种論調使人們的眼睛閃爍光輝。“使日本成为一个花朵美丽而收成富足的国家！”——这种呼声产生了由衷的鼓舞。这些农民們決不是做着烏托邦的梦，不只是因为收成增多而驕傲。他們認識到，由于自己的覺醒，自己的生活以及

思想都能够得到提高。由于生产方面而提高起来的思想，已經不能使他們后退一步。他們对于其他的許多事物，也都以新成长起来的农民的立場来应付了。

現在，不論对于和平运动或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米丘林运动都給予很多的啓發。并且对于和自己密切相关的村内农民生活的改善問題，以及对于各种的文化运动等，这也暗示着很大的希望。

現在一九五三年底即将迫近，我們把本書写到这里为止。这个时候，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正来日本訪問，祖国日本的殖民地化和重整軍备步驟进一步加深，仿佛墜入無底深渊似的危險感觉更加深刻了。在这种濃重的陰云的帳幕面前，令人不能不感到黎明还很遙远。但是，尽管如此，黎明的前兆已悄悄地接近了。这本書是否能够把这种隱約的足声报告給讀者呢？或許，将有待于日本的各位讀者，将来用自己的决心和行动来給这部充滿忍耐和屈从的日本农民运动史，添写上“黎明”的一頁。

日本农民运动年表（战前部分）

公元	日本年号	农民运动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备考
1868	明治元	会津“改革世間”暴动	东北歉收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18
1869	2	农民起义运动高涨	奉还藩籍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44
1870	3	松代、善光寺暴动，越中暴动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32
1871	4	土佐“熬油”暴动	廢藩置县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23
1872	5	山梨县“大小切”暴动	頒布征兵令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38
1873	6	筑前竹槍暴动，各地反对征兵暴动	地租改革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15
1874	7	山形暴动	設立民选国会建議書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3
1875	8		划分官有地和民有地，开始征收林野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5
1876	9	茨城及三毛、爱知、岐阜、大阪反对地租改革大暴动		农民暴动发生次数 5
1877	10	富山县礪波郡暴动	西南战争，減輕地租	以上根据土屋乔雄、小野道雄著“明治初年农民骚乱录”

公元	日本 年号	农民运动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备考
1878	11	神奈川真土村事件		
1879	12			
1880	13	群馬县株场暴动	开设国会请愿书，自由民权运动高涨	
1881	14		颁布开设国会诏书	
1882	15	福岛事件	朝鲜事变，走向扩张军备道路	
1883	16		萧条加深，农民破产严重	
1884	17	群马事件，秩父暴动	决定限制地价，地主制度加强	
1885	18			自一八六八年以来暴动事件合计约二五〇起（森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
1886	19	大井宪太郎的均田论		
1887	20		棉花耕作开始雕落	
1888	21			
1889	22	神代复古请愿运动	制定宪法和皇室典范，设置皇室领地	

公元	日本号	农民运动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备考
1890	23	三重县川口村佃农组合	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 各地发生米騒动	
1891	24			
1892	25			
1893	26			
1894	27		中日战争, 成立全国农事会	
1895	28	佃租条令请愿(岐阜)		
1896	29	岛根县川崎村佃农组合	制定民法	
1897	30	尾尾矿毒事件严重化, 各地开始租佃争议	米价高涨, 各地发生米騒动	
1898	31			
1899	32	大井亮太郎发起“要求颁布佃租条令同盟会”		
1900	33		农会法, 工会法	
1901	34	田中正造“直诉”	社会民主党成立	

公元	日本 年号	农民运动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备考
1902	35			
1903	36			
1904	37		日俄战争爆发	
1905	38		东北地区歉收	
1906	39	宫崎民藏的土地均享论，土地复权同盟会成立		
1907	40	新潟北蒲原的“三升同盟”佃农争议	确立米谷検査	
1908	41	佃农争议扩大		
1909	42		工会中央会成立	
1910	43	谷中村事件	幸德秋水事件，帝国农会成立，朝鲜合并	
1911	44			
1912	大正 元		友爱会成立	
1913	2			

公元	日本 年号	农民运动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备考
1914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以下統計据“农地改革顛末概要”
1915	4			
1916	5			
1917	6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佃农爭議件数 85
1918	7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米價 动，出兵西伯利亚	256
1919	8		友愛会改称总同盟	326
1920	9	租佃爭議正式化	租佃制度調查委員会	408
1921	10	藤田农場爭議，上川皇室領 地爭議		佃农組合数 681 1,680
1922	11	日本农民組合成立，全国水 平社成立	日本共产党成立	1,114 1,578
1923	12	新潟木崎爭議开始	地震灾害恐慌	組合員人数 1,530 163,931 1,917
1924	13	香川伏石爭議，熊本郡筑 議	佃租調解法	2,337 232,125 1,532
1925	14	金藏寺爭議，大日本地主协 会成立	治安維持法，普通选举法，总 同盟分裂	3,496 307,106 2,206

公元	日本 年号	农 民 运 动	一般政治經濟情况	备 考
1926	昭和 元	日农分裂, 木崎事件	劳农党成立	3,926 346,693 2,751
1927	2		金融危机發生	4,582 365,332 2,053
1928	3	全国农民組合成立	三·一五事件	4,353 330,406 1,866
1929	4		四·一六事件	4,156 315,771 2,434
1930	5		农業危机开始	4,208 301,436 2,478
1931	6	佃农爭議最盛期	九·一八事变, 东北地区大 歉收	4,414 306,301 3,410
1932	7		五·一五事件, 調整經濟运动	4,650 296,839 2,414
1933	8	全农全国会議派組成		4,810 302,736 4,000
1934	9		东北地区歉收	4,800 276,119 5,898
1935	10			4,011 242,422 6,824
1936	11		二·二六事件	3,915 229,209 6,804
1937	12		卢沟桥事变爆發	3,879 226,919 6,170

公元	日本 年号	农民运动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备 考
1938	13	大日本农民组合和日本农民 联盟成立	农地调整法	3,643 217,883 4,615
1939	14	改革农地制度同盟成立		3,509 210,203 3,578
1940	15		佃租统制令	1,029 75,930 3,165
1941	16		太平洋战争爆发	293 23,595 3,308
1942	17	改革农地制度同盟解散	食粮管理法	2,756
1943	18		农业团体法	2,424
1944	19			2,160
1945	20		波茨坦宣言	894 (至八·一五为止)

日本农民运动年表（战后部分）

年	月	农民运动	月	一般政治经济情况
1945	11	山形县要求解放旧军用地斗争	12	第一次农地改革法案
	12	盐尻村农民委员会成立 各地发生要求村政民主化和反对收回土地斗争	12	麦克阿瑟盟军总部关于农地改革备忘录
1946	2—3	各地发生反对强征斗争	2	食粮紧急措施令
	2	日本农民组合成立 各地反对收回土地斗争高涨	5—6	盟国远东委员会讨论农地改革问题
1947			5	粮食劳动节
	12	农地委员会选举	10	第二次农地改革法公布
	2	日农第二次大会、开除平野派	2	二·一六罢工中止
	2—3	各地发动强权	5	新宪法颁布，片山内閣成立
	5	花冈事件	9	利根川泛滥，关东大水灾
	8	日农議員团發表反共声明	11	农業协同組合法成立

年	月	农 民 运 动	月	一 般 政 治 經 济 情 况
1948	3	确立日农主体性同盟成立 各地拒繳稅款斗争尖锐化	3	芦田内閣成立
			8	反对修改国家公务员法斗争
			10	第二次吉田内閣成立
1949			12	經濟九原則
	5	日农分裂	3	道奇方案
	4—5	各地調整征粮額和爭取食米斗争	7—8	下山事件,三鷹事件,松川事件
1950	7	突破危机全国农民大会	8	稅制改革
	1	为反对征稅查封各地發生自衛行动	1	共产党情报局对日共进行批判
	7	日农(統一派)施行新綱領	6	朝鮮战争,日共領導干部被整肃
	8	各地反对衛麥斗争尖锐化 反对地方稅斗争高涨	7	設立警察預备队
1951			11	“清洗赤党”
		要求工作、保衛和平等斗争进展	4	麥克阿瑟司令被免职

年	月	农 民 运 动	月	一 般 政 治 經 济 情 况
1951	9—10	反对撤废大米统制斗争	7	朝鮮停战談判开始
	11	斗争扩展到南佐久地方	9	旧金山和約
	2	田口村事件	1	修改森林法
1952	4	龟田乡檢举舞弊斗争 各地要求解放山林斗争进展	5	五一劳动节流血事件
			7	新农地法、“防止破坏活动法”公布
	10	农民組合同盟产生	12	电力工会、煤炭工会罢工
1953	5	内灘反軍事基地斗争激烈化 各地發生反对軍事基地斗争	5	第五次吉田內閣成立
			6	北九州水灾
	11	突破歉收全国青年和平大会	7	朝鮮停战协定签字